季羡林文集

第十四卷

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江西教育出版社

ISBN 7-5392-2717-6

9 787539 227177 >

ISBN 7-5392-2717-6/Z·14

定价:62.00 元

季羡林文集

第十四卷

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委：李　铮
本卷责任编辑：周榕芳
本卷责任校对：周榕芳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季羡林文集

JI XIANLIN WENJI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2.75　插页：8　字数550,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2717-6/Z·14
定价：62.00元

书名题字:启　功

《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江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与姜椿芳先生合影。



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庆祝作者执教四十周年大会上与部分教师和校友合影。



1986年5月访问日本，应经济界、学术界人士之邀演讲。



在日本京都火车站。

出版说明

《季羡林文集》是199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羡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第十四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1990—1994年所写的序跋杂文及其他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已在书刊中发表，在我们编好文集的《散文》(一)、《散文》(二)、《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佛教》和《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等卷以后，作者继续写了一些上述几方面的论文，现在一并收入本卷的"杂文及其他"类。两篇近年新译作为"附录"收在本卷最后。

《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补充说明：

本卷另收入作者1998年发表的《牛棚杂忆》。

《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8年6月

目　录

序　跋

杂文及其他

序　　跋

《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汉译本序言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克里木凯特博士，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宗教学学者，摩尼教研究专家。中国中山大学教授林悟殊博士，同样是著名的新疆古代宗教，特别是摩尼教的研究专家。这两位中年学者，东西辉映，照亮了新疆古代宗教研究的道路。我有幸是他们两位的朋友。我早就有一个幻想：什么时候这两位英年有为的学者能够会面并且共同进行研究工作呢？我没有想到，事情比我预期的要来得早，就在去年，他们两位已经相会于莱茵河畔，并且决定由林悟殊将克里木凯特的力作《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译为汉文了。

我大喜过望，觉得这实在是中德学坛佳话，预示着中德学术交流将会日益兴旺发达了。

多少年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认为，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不会有进步。它同样还证明了另一个历史事实：没有宗教传播，也就很难有文化交流。以中国为例，后汉时期传入的佛教，唐代传入的基督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从明代开始传入的天主教和耶稣教，这些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多少年来，我还有一个想法：中亚及中国新疆是人类历史上几大文明体系、几大宗教大规模地汇流的唯一的一个地方。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东西学者共同在这里考察、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献残卷和实物资料。这在世界和中国学术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

义。中德两国的学者都参加了这件工作。在考释和整理文献残卷和实物资料的过程中,两国学者又各自贡献了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探讨新疆古代宗教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并非轻而易举的工作。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与素养。地理知识、历史知识、语言知识、考古知识,等等,都是必不可缺的。这样的知识决非一个学者,甚至一国学者所能具备的。在历史资料方面,在世界史上以爱好历史著名的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史籍。研究古代中亚,离开这些史籍是断断不行的。而掌握、运用这些史籍,也决非轻而易举。特别是对西方学者来说,更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中外合作,东西合作。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专就中国和德国而论,这样的合作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总起来看,还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这对中亚的研究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克里木凯特教授和林悟殊教授已经开始合作了。这对中德两国的学术界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两国广大学者群,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同行们的欢迎。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满怀喜悦之情,写了这篇短序,表示我的祝贺。

1990年1月15日于北京大学

《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序

中、朝、日三国(也许应该说是四国吧)立国于东亚和东北亚,垂数千年。我们作了长期的邻居。我们不能笼统说是友好邻居。我们在历史上确实有友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不那么友好的一面,磕磕碰碰的时候也是有的。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不可避免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朝鲜的长篇演义《壬辰录》讲的就是我们三国间磕磕碰碰的时代的故事。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出30万大军,侵入朝鲜,妄图一举攻占朝鲜,再从那里入侵中国。中国的明代应朝鲜之请,出兵20余万援助朝鲜。最后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

类似的事件以后又重复了几次:清代末叶,日本又入侵朝鲜;本世纪前半期,日本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至今各国人民记忆犹新。这样的磕磕碰碰应该由谁来负责任呢? 我认为,我们三国的人民决不负责。我也不主张,今天再过细地来算这一笔陈账。除了鉴古知今,接受教训以外,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应该向前看,放大眼光,看向我们的未来。开阔胸怀,看到人类共同的前途。

有了这样的眼光与胸怀,即使再回头看历史,也会看到我们三国间的主流方面,我们友好的一面,我们在历史上曾经频繁地交流文化,互相学习,我们今天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这样一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掉的。我们要向前看,也决不能忘掉这个事实。

多少年来，我个人就有一个感觉：对于我们三国间过去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确实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研究得非常不够。朝鲜和日本我暂且不谈。仅就中国而论，我们在这样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很多空白点，有一些问题甚至还没有碰过。这大大地不利于中国人民与朝日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也不利于我们三国共同看向前方。

北京大学的韦旭升教授对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文化交流史，特别是在文学交流方面的历史，很多年来，做过很多的探讨工作，勤勤恳恳，锲而不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对加强两国人民的理解，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应该说是立了功。他的最新力作《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就是一个证明。值此书在朝鲜半岛出版之际，我写了这篇短序，表达我的欣慰与祝贺。

1990年1月18日于北京大学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序

辜正坤同志等编纂《世界名诗鉴赏辞典》,穷数年之力,现在终于出版了。这在中国外国文学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国内似乎有一股外国文学辞典热,类似的书颇出了几部。但是,这一部却与众不同,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出:第一,选的不是一般的诗,而是名诗,都是在有关国家内部和国际上久有定评的。第二,大部分利用已有的译文,多出自名译家之手。这两个条件确能保证本书的质量。因此,本书的意义就决不限于外国文学界。对广大的大中学生中的文艺爱好者,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此书都能使他们得到各自不同的满足。

我一向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搞翻译决不能为翻译而翻译,而一定要有点功利目的,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效益。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欣赏,二是借鉴。所谓欣赏,就是我们常说的美的享受,所有的艺术品都能提供这种享受。所谓借鉴,是对我们的新诗创作而言的。对以上两个方面,我们这一部书,由于是名诗,再加上是名译,都能提供最优良最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外国文学的译本在国内似乎并不走俏,但是诗歌却是例外。对于这个现象,最初我确实有点迷惑不解;继而思之,却豁然开朗。诗歌是直接诉诸人的心灵的。虽然“诗无达诂”,我认为,妙就妙在这个“无达诂”上。同样一首诗,对它的理解因人而异,灵活圆通,反增美感。如果像散文一样,有了“达诂”,一目了然,反而索然,我们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吗?

至于创作借鉴,则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六朝的诗歌译文,比如马鸣的《佛所行赞》,既不叶韵,语言又朴素平庸,与当时流行的铺陈雕琢,如七宝楼台般的文体大异其趣。然而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韩愈等以文为诗的渊源应追溯到这里。

总之,辜正坤等同志的这一部书,决非趋时之作。它既能提供美的享受,又能提供创作新诗的借鉴。它为我们当前的外国文学界,甚至一般的文学界,注入了清新的活力。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普遍的欢迎。基于这一点认识,我乐于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0年1月22日

《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

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实际上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沿路各国，对我们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方面的影响既广且深。倘若没有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我常常想，在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持续时间很久的大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而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其所以能够在这里汇流，则要归功于贯穿全区的丝绸之路。

对这样一条重要道路的研究，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单篇的论文不算，写成专书的据我所知，最早的是德国学者 Albert Herrmann 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出版于 1915 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ömischen Reich)出版于 1915 年。这两部书蜚声士林。到了最近几十年，日本学者接踵而上。他们用各种形式表现丝绸之路。五彩缤纷，令人神移目眩。

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注意丝绸之路，较德、日为晚，但是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舞剧《丝绸花雨》已经扬名世界。陈良等同志的著作也已引人瞩目。至于在宗教、文化、文学、艺术各个方面探究丝绸

之路的论文,更是与年俱增。学术是国际性的,在学术领域内不能,也不应设立关卡,我们不能学杜甫那样说什么"诗是吾家事"。但是,古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丝绸之路是中国的近水楼台,难道我们不应该先得月吗?现在李明伟等同志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即将问世了,我们得月虽然不能说是"先",但是终于把月得到了,也许是一轮异常明朗的月。一向关心丝绸之路的研究的如羡林者,虽已老朽,尚未昏庸,对这一轮明月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不是很自然的吗?是为序。

1990年4月20日

《东方趣事佳话集》序

欧风东渐，不自今日始。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试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件没有西方的影响？我们东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少？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而且反思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看东方。

我并不主张闭关锁国，学习西方是好事，也是不可避免的。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一件事：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今天我们只能向西方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我们才有前途，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学习西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有历史的眼光，我们要有瞻前顾后的本领。西方并不是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也不会将来永远是这个样子。“全盘西化”的说法，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我们的根柢是辽阔的东方，是我们辽阔的祖国。

因此，我们必须看东方。

但是，看东方有种种的看法。我们可以从学术上深入探讨，说明其原委，追踪其出路。我同周一良、庞朴两位教授主编的、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化丛书》，准备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收入的专著大多是深入探讨的、穷年累月积累资料的、十年磨一剑的成就。对象是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和专家。勉强打一个比喻，就算是阳春白雪吧。

但是，光有阳春白雪也是不行的。对广大群众来说，下里巴人也是迫切需要的。对二者的评价不能轩轾。现在由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中青年学者编写的《东方趣事佳话集》，正能满足这个需要。这部书寓深刻的学术内容于明白晓畅的叙述之中。将由黄山书社出版。我相信，而且也希望，我们这两套书能互相补充，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尽上自己应尽的义务。我相信，而且也希望，这两套书能流布寰中，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东方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1990年4月24日

《临清市》序

临清市是山东历史名城，有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倚运河，东连德、济，北通京、津，南达苏、杭，是南北交通的枢纽，人文学艺的渊薮。明代重要诗人谢榛即出生于此。著名的古典小说《金瓶梅》，也产于此地。遥想当年运河繁盛时期，航船如梭，帆影入画，文人、学士、武将、巨商，联翩驶过，留下了多少流风余韵。连皇帝老爷子，只要南巡，也必经此地，龙舟十里，嫔从如云，清朝的乾隆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到了今天，津浦铁路早已修通，临清交通的重要性当然受到巨大影响。但是，自建国以来，此地的生产，无论是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仍居聊城地区之首。最近几年，发展尤为迅速，棉花加工和纺织工业，都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合资企业也已兴建，发展势头方兴未艾。在文化方面，比如说在饮食文化方面，仍有其独特之处；宴贵宾时，能一次奉上不同的汤十几种之多，用料不同，口味不同，色调不同，芳香不同，而能大快朵颐则一也，往往引起客人极大轰动。此外，社会上文风犹浓，离休老干部，中青年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青年工人和农民，能书画、善诗词者颇不乏人，学校老师当然更不在话下。这种风气，实能为名城增辉。

在这种情况下，临清人民对未来的发展，倍增信心，不是很自然的吗？将来横贯本市的铁路一旦修通，千年运河一旦疏浚，定为南水北调的必经之地，南北文化交流的中枢，生产和文化必能蒸蒸日上，可预卜也。

现在光明日报社出版《中国城市百科丛书》,临清市也包括在里面。我觉得,这确实是一大盛举,顺乎潮流,合乎人心,必将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当然会为临清增辉;但是,我想暂开八戒之口,叫卖老王之瓜,自我吹嘘一番:我们临清也将为本丛书增添光辉。如果有海内君子,域外人士怀疑我是夸大其词,自吹自播者,请拭目以待。

1990年7月14日于北京燕园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序

最近几年，我多次阐明自己的一个看法：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我想补充一句：华侨和华人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古代同西域和南海交通史来看，最初担负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重任的是极少数的商人、僧侣和外交使节，普通老百姓是难得走出国门的。有一些战争也会使一些人流落异国，把自己的文化带了过去，起到交流的作用。所谓"华侨"这个概念，最早是没有的。只是到了最近几百年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原因，首先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剥削的需要，中国人，特别闽、粤沿海几个省份的劳苦人民，才被迫、被拐卖到许多美洲国家去，也有的迁徙到南海诸国去，背乡离井，飘洋过海，受尽艰辛，九死一生，生殖繁衍。这些就是华侨的前身。他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对当地的生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把中国的生产技术、中国的文化带出去，也把当地的文化带回祖国，促进了文化交流。

中国的华侨史是一部触目惊心的伤心史，但同时也是一部光辉灿烂的文化交流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从事于此项研究者大有人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在我国，从事华侨史研究的学者，颇不乏人，成绩斐然可观，论著层出不穷。但是，其中华侨史占垄断地位，使用词典的形式，

还不多见。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周南京教授等，还有全国侨联华侨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等单位的一些从事华侨问题研究工作的学者们，有的本人就是华侨，对华侨问题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发为文章，自能深切动人，在华侨界内外，扬名久矣。现在他们戮力合作，纂成了这一部《世界华侨华人词典》，质量确有保证，发行定无问题，实在是空前盛举，应该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对华侨问题，一知半解，除了表示敬意之外，不敢赞一词。但是，根据我的那么一点经验和一点认识，我坚决相信，这一部词典将是广大华侨华人的福音，也是非华侨华人而对华侨问题有兴趣者的良师益友。一编在手，按图索骥，愿意了解什么问题，只需一举手之劳，就能了如指掌。人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华侨在海外创业维艰的情况，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流血牺牲，受尽艰辛。人们也可以了解到通过华侨中国与华侨所在国家文化交流的生动事例。这种了解对于中国人民和华侨所在国的人民都是重要的，对年轻一代的华侨华人也是异常重要的。这种了解能密切中国祖国人民与飘泊天涯的游子之间的感情。这种了解能密切华侨华人与所在国的人民之间的感情。这种了解能沟通年轻一代的华侨华人与他们父辈的思想与感情的交流。这种了解能加强华侨华人落叶归根的思想。我并不主张华人都改成华侨，国籍问题并不至关重要。身为哪国人，就要为哪国效力，这是当然的。但是，华人为所在国效力，同时也能为祖国效力，在一般情况下，其中不但并无矛盾，而且有很大好处。无数事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之，这一部词典的作用，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低估的。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人类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料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民，除了必须保持警惕以外，应当寻求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更深的互相理解，维护世界和平，使人

类共同前进。华侨与华人在这里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我对这一部词典寄予厚望。是为序。

1990年7月15日

《归义军史研究》序

东方文化，范围至广。我们今天研究东方文化，不可能面面俱到，处处深入，而必须抓住重点。同时，我还考虑到，阐释东方文化与弘扬中华文化，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二者不可缺一。根据这些考虑，我们研究东方文化，在全面照顾的情况下，必须有所偏重，必须有重点，而重点应当放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上，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敦煌吐鲁番学实应为这样的文化交流的重点。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考虑，还是从地理上来考虑，这似乎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必能为海内外方家学者所赞同。

谈到敦煌学，我不禁想到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

>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概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

寅恪先生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中国收藏的敦煌卷子的重要性。他最后的结论是：

> 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

> 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金明馆丛稿二编》页 236—237)

寅恪先生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敦煌学又确曾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在同一篇文章中，寅恪先生再三强调学术预流问题，他说：

>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在寅恪先生写此文以后的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基本未变。难道这还不算是"伤心史"吗？日本、西欧于此道确有成绩，我们决不否认。我们自己则由于种种原因，望尘莫及，致遭国外同行的白眼，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近十几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全国同行们的努力，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老一代的学者壮心不已，成绩斐然。中年学者，不甘落后，各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开后学之先路，作中流之砥柱；俯不怍于后，仰不愧于前。如郭在贻、姜伯勤、项楚、李正宇、陈国灿、张广达等等教授，皆是也。项楚先生最近出版的《敦煌变文选注》，得到了老一代学者吕叔湘等先生的高度赞扬，说"校释精详"，"是继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后，又一部研究变文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称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很有建树的好书"。学术前辈的欣赏之情，跃然纸上。

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急起直追。他们对学术表现出非凡的热

情,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名篇佳作,层出不穷,神州腾誉,海外名播,真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敦煌之学,顿呈百花斗艳之势。这样的青年学者,颇可以举出一些来,如荣新江、卢向前、张涌泉、黄征、王素、赵和平、邓文宽、郝春文等等皆是也。

荣新江,最近若干年来,专根据敦煌写卷以及其他史料,治西北民族关系史和归义军史,已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多有创见;英年如此,前途正未可限量。我对他所研究的范围,无多通解,不敢赞一辞。我只知道,他用力极勤,搜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下漏网,难如登天。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决非偶然。

我年届耄耋,成了一个"世故老人"。我国现代学术之兴衰、荣辱,皆所亲历。有时感到,一腔热血,报国无门。现在看到这一批英姿勃发的中青年敦煌学者,雪学术之国耻,著预流之先鞭,衷心喜慰,不可言传。前见古人,后见来者;以吾老朽,尚何所求?是为序。

1990年7月27日

《世界三大文化之谜》序

娄天劲同志不远千里，从安徽来到北京，找上门来，要我给他的书《世界三大文化之谜》写一篇序。我实在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最初并没有敢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很简单：我虽然也喜欢侈谈文化问题，但自谓并非里手，最多只是一个客串而已。而且他的书稿，我也没有认真阅读。我一向不赞成写空话、废话的序，现在我就这样仓促贸然写序，难道还能避免空废吗？

但是我在一听一想之余，觉得似乎还是有些可说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近几年来，我国到处掀起了一股讨论文化的热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建设新社会，必须一方面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又吸收外来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点是大家都赞成的。但是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又是外来文化？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在大的方面容易有基本上的一致的看法，在细微末节方面却不尽然。不但当前如此，将来也会长期如此。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坏处，而只会有好处。我们提倡双百方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琢磨，各自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吸收别人的可取之处，于是真理愈辨愈明，我们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了。

不管是中华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其中总有精华与糟粕，不管是弘扬还是吸收，总之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点也是大家都赞成的。但什么是精华，什么又是糟粕，却不是每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需要了解，需要探讨。当前我国的既定政策是改革开放，

吸收外来文化是当务之急，从而了解外国文化，认识外国文化，也成了当务之急。在愈辨愈明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和外国文化加深认识，加深了解，就成了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了。

现在全国探讨文化的书，简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深入浅出的一般介绍，特别是对比介绍，似乎还不是太多。因此娄天劲同志这一本篇幅不算太长，意在通俗化的书就非常可贵了。

我不敢说，娄天劲同志的书观点、看法都会十分正确，十全十美。我上面已经说到，在这里观点很难一致。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牵扯面非凡地广，内涵又非凡地深的学术问题，不可能有定于一尊的学说。那样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只要能做到，资料准确，立论有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让人们读了能有所启发，有所收获，我觉得也就够了。这样的书对广大的大小知识分子、对有阅读能力的广大人民会有裨益的。我希望娄天劲同志的书就是这样一本书。

本来没有话，一提起笔来，竟然写了这样多，但愿读者不认为这都是空话、废话。这就算是序吧。

1990年8月15日

《吐鲁番学研究专辑》序

将近十年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时候，对“吐鲁番学”这个词儿，是有过一点争议的。大多数人同意，用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吐鲁番来代表整个新疆，甚至新疆以外的中亚的一部分。但有少数人提出，应该添上库车，又有人提出添上于阗等等，这仍然不能百分之百地代表新疆，而且罗哩罗嗦，不像一个学科的名称。最后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上面那个解释。于是“吐鲁番学”这个词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用到现在。

陈寅恪先生曾婉转地指出，敦煌学是中国的一部伤心史。他说：“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敦煌学如此，吐鲁番学何独不然？较之前者，后者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斯学建立以来的九十年中，至少有七八十年，我们是处在“伤心时代”。我在这里着重指的是古代语言文字方面。在历史文献使用和考古发掘等方面，我们的老专家决不比外人差。可是一讲到古代语言文字，我们就有点不行。我们从地里面挖掘出来的古代文字残卷，我们自己读不了，还要乞灵于外国学者，伤心惨目有过于此者乎？

但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情况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年老的考古工作者精神焕发，不甘伏枥，虽处暮年，而壮心不已。中年学者则更有新的进步，其中一些人努力学习古代西域文字。更令人兴奋的是，一些年轻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负笈千里万里，逐渐从师学习掌握了西域古代最重要的文字。过去中亚和新疆考古发掘出

来的古代文字残篇，我们对之茫然无所措手足，有若天书一般。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能读、能译了。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国际协作，这对一切学科皆然，协作是很平常的事，无须大惊小怪。但是，那种离开外国学者就寸步难行的狼狈局面，已成历史陈迹了。谁能说这不是巨大的变化呢？

专就新疆一地而论，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维、汉两族都有。在考古工作方面，穆舜英、王炳华等等同志近年来的成绩，彰彰在人耳目。在古代语言文字的探讨方面，拿回鹘文一种为例，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由木·霍加，李经纬等同志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新疆现在又成立了吐鲁番学会，得到了领导同志，比如买买提明同志等等的人力支持。吐鲁番学的研究，在新疆和在全国一样，正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前途光芒万丈。

现在出刊的这一册《吐鲁番学研究专辑》，可以说是研究成果的第一次显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显示。里面的作者不限于新疆地区，也不限于中青年。这是汉、维两族老、中、青三结合的一次盛举。我作为吐鲁番学的一个老啦啦队员，真有点兴高采烈，几乎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是为序。

1990年8月27日
在"枯草热"的攻击下，奋力写成

《新编百家姓印谱》序

"弘扬祖国文化"，这个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响应；都认为，这个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

何以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是极其明白易懂的。

过去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但是，根据最新考古发掘的结果，中国可能在距今八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文字的萌芽。我们的文明史一下子拉长了三千年，走在古代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前面了。有这样悠久而又光辉灿烂的文化，如果不去努力弘扬，将何以前对祖先后对子孙呢？

中华文化方面极广。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设法弘扬自己方面的文化。但是，我觉得，有一项的确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却还没有人提起，这就是中国的篆刻。中国篆刻大盛于汉代，此时是铜印和金印；以后历代绵延不绝，到了明清时代，石印大兴，一直到今天；篆刻所用的材料大大扩大了，图章还在流行，与签字并驾齐驱。这难道不是可以列入无双谱的绝妙的中国文化吗？

胡亚曼（琦峻）先生是一个有心人。他多才多艺，从事图书馆事业，而又擅书法，善篆刻。多年来他就按照《百家姓》的顺序，搜集古今名人的印章，积之既久，已成巨帙，行将出版面世。我小时候也曾学习过篆刻，所务不专，水平颇低。但自谓是手低眼高，对于鉴赏还颇有一点自信。我生平最推崇清代浙派领袖陈曼生，每次看到他的篆刻，心灵辄为之震动不已，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胡先生搜集的印谱中也有陈曼生的印章，可谓先得我心。但是，我

不是想说,只有他这一方印章好,其余的都不行。其余的也是好的,也有我极其喜爱的。说胡先生这一部印谱琳琅满目,它是当之无愧的。

在弘扬文化声中,胡先生默默地做了一件别人疏忽而又非常有意的工作。因此我是怀着无限欣慰的心情写这一篇小序的。

1990年9月14日

《欧美文学论集》序

中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比较晚，甚至晚于东方国家的日本和印度。因此，解放前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而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文学者的学者们，有的最初连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或意识都没有。虽然他们做了不少按照今天的含义来衡量类似或者接近比较文学的工作，都几乎是无意识的。但是，他们的功绩决不可泯。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筚路蓝缕"。我们今天还要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解放以来，一批中年的比较文学者，一开始就从比较文学起家或者出身的，也几乎没有。他们起程的始点一半是中国文学，一半是西方文学。最后殊途同归，都汇入比较文学的巨流中，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成为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的主力军。只有最近若干年来脱颖而出的青年比较文学者，才多半是科班出身。他们的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日益深入。这是我国比较文学希望之所在。像我这样滥竽比较文学界的老人，看到这种现象，心中深切意识到，我们后继有人了。我们虽然不必就下马归隐，洗手不干，但衷心喜慰，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徐京安教授是从外国文学起家进入比较文学的。他从事欧美文学的研究，历有年所，硕果累累，从这个集子中的文章中可见一斑。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赞一词，并不是因为我完全不懂；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我是懂一点的；但是此时此刻，我懂与不懂，已成次要问题，我是感慨多于理智了。

50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那时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师资，据说是全国一流，课程设置也是应有尽有。从古希腊、罗马，什么荷马史诗、悲剧、喜剧、维吉尔等起，中间经过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什么但丁等等，一直到18、19世纪文学，塞万提斯、歌德等等，直至近代和当代文学。莎士比亚专门开课；英国浪漫诗人、当代长篇小说，包括所谓意识流小说，欧洲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想史、中西诗之比较、文艺心理学、文学概论，等等，都有专门课程。既大且全，令人眼花缭乱，几乎同徐京安教授这一本论文集的内容完全一样。可惜我毕业后就当了国文教员；后来又远走异国，一头扎进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和印度佛教史的故纸堆中去，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只好拜拜了。

我是不是有点后悔呢？也不是的。我认为，我走的是一条正路。如果有什么神仙、佛爷能让我再生一次，我仍然要走这一条路。

现在居然有人也给我戴上了一顶比较文学者的桂冠，这实在出我的意料。如果我也算是一个比较文学者的话，我究竟是从中国文学出身的呢，还是从西洋文学？我自己反正茫然说不清楚。看来也没有说清楚的必要。这种事情连鸡毛蒜皮都够不上，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大局，毫无关联。

就这样，我在看到徐京安教授的《欧美文学论集》之后，不由得勾起了这些感慨。现在写了出来，聊资谈助而已。

反正我对徐京安教授的论文不能或者不敢赞一词，而这篇序文又非写不行，于是一时心血来潮，说了上面这些话。我现在写序已经成了老（?）手。我为之写序的书，内容五花八门，连自己看了都有点吃惊。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原则：决不说空话、废话。在这篇短序里，我认为，尽管似乎有点离题，实则皆非空废，明眼人自能

看出，用不着我来饶舌。有人说，最高明的序是不即不离。太"即"了则死；太"离"了则空；不死不空，得乎其中。我这篇序够得上不即不离吗？请方家评断。

1990 年 9 月 20 日

《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序

吴雨僧(宓)先生逝世后十二年,"文化大革命"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已被完全洗清。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会于陕西西安和泾阳,隆重举行"吴宓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他的及门弟子,我虽然没能躬与盛会,但是衷心感慰激动,非可言宣。被污蔑、被诽谤只能是暂时的,而被推重、被怀念则是永恒的。历史上不乏先例。

将近6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英国浪漫诗人"和"中西诗之比较"。当时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我忝列撰稿人名单中,写过一些书评之类的文章。因此同他接触比较多。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也留下了我的足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雨僧先生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他为人正派,表里如一,没有当时大学教授们通常有的那种所谓"教授架子",因而对他极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他非常不了解,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古貌古心,不随时流,又在搞恋爱,大写其诗,并把他写的《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从而成为学生小报的嘲笑对象。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我们这一群年轻学生,无一不崇拜新派,厌恶旧派。解放后有一段时期流行的"左"比右强的风气,不意我们已经有了,虽然是无意识的。所谓"新派"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坛上的著名人物。所谓"旧派"则指的是以雨僧先生为首的"学衡

派”。我们总认为学衡派保守复古，开历史倒车。实际上，我们对新派的主张了解得比较多，对旧派的主张则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有时还认为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60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导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

五四运动，其功决不可泯。但是主张有些过激，不够全面，也是事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个道理也可以应用到五四运动上。特别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四运动在基本上正确的情况下，偏颇之处也是不少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主张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扬弃，当时得到青年们的拥护。这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确有相通之处。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或所见不广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而我作为雨僧先生的学生又景仰先生为人者，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说来实在惭愧。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一时糊涂，倒也罢了。据我所知，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同我一样，这就非同小可了。如果没有这一次纪念会，我这愚蠢的想法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一方面感谢这一次纪念会给了我当头一棒，另一方面又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这次纪念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雨僧先生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大大地发扬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永远纪念他，永远学习他。

我感谢李赋宁教授和蔡恒教授要我写这一篇序，我因而得到

机会,彻底纠正我对雨僧先生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1990年9月23日

《印度古代文学史》前言

本书是集体协作的产物，主要是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的协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研究印度文学的基础，较之解放前或五六十年代，当然要好多了。但是总起来看，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写作时，尽量阅读原作，至少是原作的翻译，这是写一部有创见的文学史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有许多印度语种目前在中国还是空白，我们不得不利用其他语言的资料。这对本书的质量当然会有影响。然而话又说了回来，能直接阅读这样多的原文而写出的印度文学史，在我国这还是第一部，我们也可以稍感自慰了。

我们原来打算写的是《印度文学史》。几年来我们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最终到了要集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近代和现代部分缺的稿子还多。于是临时果断决定，先出《印度古代文学史》，时间下限是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和现代的印度文学，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稿子，其余所缺者，我们将陆续补上。我们仍然希望，最终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印度文学史》。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同志，亚太所的张锡麟同志；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刘安武、李宗华、季羡林等同志。每个人负担的任务不完全相同。编写者的名字都写在有关章节的后面，这里不再赘述。

编完本书，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肩上的担子又轻了一点。但是偏偏还有一点感慨。中国地处东方，同印度作了几千年的邻居。

文学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相互影响，至深且巨。按理说，印度文学应该受到中国各方面的重视。可是多少年来，有一股欧洲中心论的邪气洋溢在中国社会中，总认为印度文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不行，月亮是欧美的圆。这是非常有害的。我们搞印度文学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一方面又要同社会上这一股歪风抗争，任务是艰巨的。现在《印度古代文学史》出版了，我们在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肯出这样一本书之余，但愿中国的外国文学专家和一般的读者们能摒除偏见，平等地对待东西各国的文学，跂予望之。

1990年9月26日

《学者论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智能》序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个学习——广义的学习的过程。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主动,有的人被动。而意识到这一点又主动去学习的,其效果往往高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被动地去学习的。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稍一思考,就豁然了。

我们现在把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划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等阶段。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计算方便、工作方便,不得不尔。每一个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学习任务、具体的要求。看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界限,似乎十分分明。事实上决不是这个样子。从宏观上来看,一个人一生的学习,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哪一个阶段学习完,也不等于整个学习任务完。古人说:“学无止境”,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认为,大学一毕业,或者研究院一毕业,就算学到头了,这是一种误解,是对学习很不利的。

同上面说的这一层意思有密切联系的,是另外一个事实。这就是,从知识结构上来看,它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须要随时变动,随时调节。知识结构在上述几个学习阶段中,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样。世界在千变万化,社会在飞速前进,特别在今天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知识结构,必须随时更新,随时调节。一天不更新、一天不调节,就可能被时代潮流抛在后面。我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表达这个看法:稍纵即逝。

就拿研究学问来说吧。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只研究一个题目，探讨一个问题。学者们都往往要研究一个以上的题目。而且研究什么题目，往往很难预先制定计划，由一个题目想到另一个题目，其中难免有些偶然性。古今中外许多大学者都可以作证。从他们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这种情况。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证明同一个事实。研究一个题目，只要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不足之处。如果换一个题目，另起炉灶，那情况就更严重，非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行。这种调节往往是螺旋式地上升的。开头时，所知甚少；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随着调节的加多、加速，知识也越来越多，知识结构也调节得越来越能适应研究工作的要求。这反过来又能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提高。如此循环往复，宛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以至无穷。

在这里，我不妨举几个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来作例子。我是搞语言研究工作的，研究过古代印度语言——吠陀语、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后来把兴趣集中到佛教语言——巴利语和佛教混合梵语上，又扩大到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回国以后，受到资料的限制，被迫搞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从表面上看起来，都同自然科学联系不大。但是，当时想确定巴利语和混合梵语的 āsīyati 这个字的含义时，就碰到了水结冰后体积膨胀的问题，这属于自然科学。在这里，我必须调节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看一点自然科学的书。后来，我因为探讨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沙糖制造的历史。在某些环节上，这又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了。我的知识结构又必须调节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怎样来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呢？

本书中王通讯同志的文章《知识结构与智能结构》，提出了调节知识结构两个要诀：一是靠反馈，二是靠预测。我认为，他提出

这两个要诀是非常重要的,深中肯綮的。文章具在,我不必重复了。

我在上面讲到,在人生的青少年阶段上,人们人为地划分为许多阶段。每一个阶段同另一些阶段,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从调节知识结构的观点上来看,也是如此。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一点:调节知识结构,大学(包括研究院)是一个关键时期。这是因为,在中小学时期,学习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动性少而被动性多。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者不多。到了大学,也就是按部就班学习的最后阶段,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会,转入人生一个新阶段。此时,按部就班的学习,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学生的主动性增多,被动性减少。知识结构逐渐丰满,独立思考问题的必要与可能都与日俱增。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反馈与预测两个要诀,随时注意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至于怎样进行调节,本书中许多老师的文章都讲到了自己的经验。只要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必有收获。

最后,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在开头时讲的那一段话:人的一生是一个学习过程。大学或研究院毕业,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决不是学习的终结。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下去的,一直到不能学习的那一天。我们毕生的座右铭应该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老而不已,学习终生。

1990年11月29日

《海外中国学家译文丛书》序

国内从事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老一辈的学者们，一定都还能记得，五六十年前冯承钧先生翻译了大量的法国中国学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这些译文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当时中国学已流布全世界，但是在东方以日本为魁首，在西方则以法国为巨擘。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在这两个国家以外，瑞典的高本汉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为中国最有权威的语言学家所激赏。英国的 A. Waley 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译文优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成绩卓著的中国学家，这里不一一列举。

这些中国学家，对弘扬中国文化，加深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多半都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了。至今还为中国人民所阅读，所欣赏，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外国中国学家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帮助我们，在什么地方又能超越我们呢？也许还有人认为，中国语言只有我们中国人最能掌握运用，其他国家的学者总不免有隔皮猜瓜、隔靴搔痒之病。不是有的外国中国学家把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中的"玄宗"译为"玄秘的宗教"吗？不是也有外国中国学者把六朝隋唐时期习见的"诚如来旨"译为"诚然是我佛如来的旨意"吗？

这些都是事实，无可否认。我甚至还能举出更多的这样的例

子。这说明中国语言文字之繁难。连我们自己的学者也不敢保证，一定不会出这样的笑话。但是，总起来看，我认为，这不是关键问题，瑕不掩瑜。心理学家常讲一个现象：一个人在某一个环境里住久了，住惯了，对他周围的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反不如一个外来人，初来乍到，对周围的事物特别敏感，他能一眼就看到别人不注意的现象。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够证明，心理学家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话："旁观者清"，也证明同一个事实。

外国的中国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外来人"、"旁观者"。他们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能看到我们习而不察的事物。

此外，还有一点，我也必须着重指出。就拿上面谈到的西域南海的研究来作例子吧。五六十年以前，我们对西域南海的研究水平，远远比不上外国学者。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古代语言文字，我们多半不通；与这些地方有关的其他资料，我们多半不能掌握。我们除了能读中国史料以外，缺的东西太多，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不通语言文字，不能掌握必要的资料，能读懂古代汉文典籍吗？因此，当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出版的时候，我们都由衷地感谢他，法文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读的。这一套丛书，第一册出版于 1932 年，最后一册 1958 年出版，前后相距二十多年。没有需要，能做得到吗？法国之外，日本学者关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翻译了不少，比如关于《大唐西域记》、《法显佛国记》等等的著作，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些译文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可惜好景不长，冯承钧先生之后，后继乏人，像冯承钧先生这样毕生勤勤恳恳，翻译不辍的"有心人"，再也见不到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中国学者在研究西域南海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

点，连外国学者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即使自己有了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古话到了今天仍然是真理。如果多了解一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肯定会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的。我们翻译了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部巨著，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促进了外国人民对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巨大贡献的认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然而这个简单的例子不是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吗？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除了李约瑟的著作以外，我们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注意得越来越少了。我们几乎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名山事业。结果是某一些研究工作者视野不广，囿于成见，固步自封，难有新意。这当然大大地不利于我们研究工作的展开。每年都召开一些什么什么国际研讨会，专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说，多半是热热闹闹一阵，吃吃喝喝一番，长城、桂林、兵马俑，茅台、烤鸭，满面春风。即使留下几篇论文，也多半是应景之作，从中难以窥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之全豹，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深，也不能持久，对我们没有多大好处。

最近我给极受读者欢迎的《文史知识》提意见时，曾讲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文史学界多注意外国同行们的研究动态，多阅读人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决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这个意见颇受到同行们的重视。时至今日，我们提倡改革开放；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开放肯德基、米尼姆、卡拉O.K、万宝路；可口可乐、T恤衫、耐克旅游真耐穿；而对人家研究中国学的成果，则漠然置之。我这个比拟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一般说来，真正埋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对卡拉O.K.之类，不一定有多大兴趣。我只不过想指出这种风气之十分不正

常而已。

如果我们放眼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的头脑会清醒一下的。全国人民，特别是学者们，都在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曾普照西方大地，全世界文化的发展皆蒙其利。这一点没有人敢予以否认。因此，现在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口号，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弘扬什么呢？又怎样弘扬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章法。有一位同行说了一句似乎是俏皮但实则含义深刻的话："出口转内销。"他指的是，国外正在兴起一股研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的高潮，这一股高潮"波撼岳阳城"，也撼动了我们赤县神州。原来出口的东西又转销到国内来了。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我们应该竭诚欢迎，大力响应，这对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是天赐良机，求之不得的。

最近几年以来，我经常考虑在人类历史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发现，几千年以来，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迭兴替，互为补充，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从19世纪初叶一直到今天20世纪末叶，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但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也不能万岁千秋。这个文化现在已经露出了不少破绽，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了。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迹象已经萌出。西方国家，特别是那几个世界大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露出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兴趣渐浓。研究印度学的人，从历史语言的考证转向大乘佛教和佛教密宗；研究中国学的人，兴趣渐渐集中到《周易》、《老子》、《庄子》，以及禅宗的研究上来。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个人认为，原因并不难找。西方学者中特别敏感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文化有了点穷途末日之象，济之之方无他：转向东方文化。

回看我们中国学术界，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似乎还如凤毛麟

角。这种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唤起大家的注意。唤起的方法多种多样,出版这样一套《海外中国学家译文丛书》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它至少能起到当年冯承钧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已经起过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海内外中国学的研究能够互通声气。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真正能为弘扬中华文化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能改变一下当前这种闭塞的情况。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投石击破水中天",能投出一块这样的石头。总之,作用是很多很多的。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带我们跟上世界潮流。我个人认为,这是雪中送炭的工作,但又何尝不能理解为是锦上添花呢?

以上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希望。

是为序。

1991年1月2日

《中华姓氏大辞典》序

前不久，张在德同志介绍袁义达同志来看我，带来了《中华姓氏大辞典》这一部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巨著的部分稿子，要我写一篇序。这确实让我踟蹰难决：我那一点对中国姓氏的知识能保证序写成后不出笑话吗？我请他把稿子和一些说明材料留下，意思是等我学习完了再行定夺。万万没有想到，我一接触稿子和资料，立即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姓氏里面，竟隐藏着这样重要的含义。我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当机立断：这一篇序一定要写的。

我小时候读过《百家姓》，只是跟着老师念，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国内外读书做事，虚度了几十年，逐渐知道了中国的姓决不止百家。明朝有《千家姓》一书，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姓氏是否就到千家而止。可是我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姓氏制度是颇有分歧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姓。在中国，姓氏制度在各民族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姓氏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没有加以考虑。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德国同学讲过德国犹太人姓氏起源的一些笑话。原来犹太人从前就是没有姓的。几百年前，德国警察局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个姓。这对日耳曼人来说本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的。然而却难坏了犹太人。他们走到警察局，恭候发落。此时不怀好意的德国警察，却来了威风：“到门后边去站着！”他们怒喝。于是有的犹太人就真地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

后边"就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更恶毒的恶作剧。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给自己赐个姓。于是连"放屁"等一类的脏词儿都成了犹太人的姓。

这故事,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及今回思,却只觉得悲哀。在姓氏里面竟还隐含着一部民族压迫史!

这是姓氏制度带给我的第一次反思。

以后,我在治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之余,有时迫于形势,有时出自兴趣,我也搞了一点中外历史的研究。在这里面,我认识到了姓氏的重要性。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过不少的关于姓氏的专著和论文。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是这一部《中华姓氏大辞典》的参考书之一。陈寅恪先生给本书写的序里说:

> 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此读者自知之,无待寅恪赘论。惟不能不于此附著一言者,即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

寅恪师在下面列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从六朝一直列到清代,给治史者极大的启发。他不但号召别人来研讨,而且现身说法,自己著文,参加研讨,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文,比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等,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国历史上姓氏问题之引起争论者,决不止限于寅恪先生所论。即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姓氏实亦大有研讨之余地。其中颇有与历史相联系者。比如寅恪先生所提出之李姓,据目前科学

统计，李姓实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姓。其来源究竟如何呢？他们决非都是李耳的后代，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仅李唐一代，就制造了不少的李姓。有许多波斯人到了中国改姓了李，著《海药本草》的李洵即其中之一。再如马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前，比如汉朝的马援，《三国志演义》中的白袍小将马孟起等等，当然都可能是土生土长的"马"。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姓马的穆斯林，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等等有关，与马援和马超难以联系了。

这只是我顺手举的几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姓氏问题之复杂远远不止这一些。在这方面也还大有研讨的余地。

我在上面曾说到德国犹太人的姓氏问题。这样表现姓氏上的民族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在本辞典的附录中，有一篇关于岦姓与岦庄地名的文章，里面讲到岦的来源很可能与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有关。他惨遭奸臣秦桧杀害后，他的后代怕再遭到奸臣杀害，携家带眷，逃到安徽省涡阳县一个僻静的地方，并把"岳"字拆开，把"山"字放在"丘"字上面，成了"岦"字。这个传说的真实程度，我们无法推测。但是，揣情度理，勿宁说是可靠的。此外，我还想到另一个传说。今天中国姓"闻"的，不一定都是闻太师的后人。宋代的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杀害后，他的后人也为了同样原因，将自己的姓改为"闻"。揣情度理，我认为，这同样是可靠的。

上面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事情。姓氏研究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联系呢？

我认为，联系是密切的。这个认识只是我不久以前才得到的，通过这一次阅读本辞典的部分稿子和资料，又进一步加深了。先让我举几个例子。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偶尔读到了一些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给小孩子命名最流行、最时髦的风气是起单名。结果

造成了同名过多的现象,这给有关方面无端制造了大量的困难。现在我看了袁义达同志带给我的材料,里面讲到,中国汉族和满族李、张、王三大姓高踞榜首,鼎足而三。李姓占全人口总数的7.9%,张姓7.4%,王姓7.1%,三者加起来共占22%多,有几亿人口。这几个大姓再加上同名问题,情况就更加复杂化了。

比如说,今天最流行的单名是"军"、"宁"等等,再加上传统的双名"宝珍"、"玉珍"、"淑贞"、"兰英"等等和一度时髦的双名"卫东"等等;这样一些名,若与三大姓配在一起,试问普天之下将会有多少同姓又同名的人呀?事实上,专就我接触到的这一点社会层面来看,姓名叫"李军"、"张军"、"王军"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有时候,中学一个班里就有三个"张军",再加上"李军"、"王军",则教员点名,邮局送信,有人打电话,公安局登记人口,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人口普查,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况且我国已经有了专利法和出版法,这些都与姓名有关。上述情况在这里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也是一清二楚了吗?多么精细的电子计算机对此也将束手无策。文明社会,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姓名,这是必不可少的。姓名有点重复,哪一个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但若过了头,则必然影响社会的运转。这一点也用不着再求得证明了。

上面谈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本书的自序中还提到其他一些与姓氏有关的问题和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切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我读了本书部分稿子以后的诚恳的希望。

两位作者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习惯于谨严细致的科学工作方法,现在他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探讨方面上;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本书的谨严准确的自然科学的学风。我们搞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应该认真学习这种学风。

这是我的又一个诚恳的希望。

我写到这里，读者读到这里，我们必然都要想到两位作者和出版者四川辞书出版社，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独具慧眼；我们也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他们肯而且敢在今天出版界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出这样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出版这样一部大辞典。我现在向中国史学界、社会学会、民族学界、公安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等郑重推荐这一部大辞典，它会给你们的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

除了共同的感激之外，我个人还有一点特殊的感激。我在开头已经说到，张在德同志和袁义达同志代表作者找我写序的时候，我认为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使我踟蹰难决，我甚至不理解，何以找到我头上来。我内心里不但毫无感激之意，而且还颇有点抱怨，然而，到了今天，材料看完了，序也写完了，仅仅不过几天的时间，我忽然恍然大悟，这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我现在又感到，光用“感激”二字都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情了。

我的序就写到这里。

1991年1月3日

《浅草集》序

小友王亮是山东济南一中的校友。约摸在两年以前，他曾来我家一次，谈到到北京来学习的事情。一来是素昧平生，二来是我对学习不了解情况，也不感兴趣。因而他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前几天，他又来看我，带来了一本他写的《浅草集》的清样，这一举实出我意外。我没有想到，他小小年纪，竟然有了成本的著作，写出了这样的文章，我大有刮目相看之感了。

我把他的集子翻看了一遍，我计算了一下，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只有16岁，集中最后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他也不过19岁。而且这些文章体裁还比较多，粗略地分一下，有散文，有小说，有散文诗，有一些小考证，还有一些类似杂文，涉及面比较广，议论颇有见地，而文采斐然，感情真挚。读下去，让人不能释卷，可见艺术感染力之深。

作者是用一双童稚的眼睛观察人生，观察社会，观察国家大事的。这双眼睛虽饱含稚气，却又清新明亮。他这一双眼睛里所反映出来的人生大事、国家大事，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这些老人们认真严肃地参考的。我们已经老眼昏花，灵气久滞，看人生，看社会，有时难免昏暗。虽说俗话说，姜是老的辣；但是这里面透露出一点元老杯、安慰赛的味道，我辈老人千万不要完全信以为真也。我看，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向小将学习为佳。

翻阅中国古代典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十分高明的

传统;我们赞赏年轻有为的人,我们鼓励少年有才的人。举世闻名的《世说新语》里面,专辟了一章,叫做“夙惠”,记录的就是一些有“夙慧”的孩子。在其他许多古代典籍里,还可以找到许多讲少年才子的记载。可见我们对这方面的重视。

但是,我们的祖先也并没有忽视与此有联系的另一个方面。我索性再征引一下《世说新语》。在本书上卷“言语”第二里,讲了鼎鼎大名的孔融的一个故事,内容大略是:孔融10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洛阳去见李元礼,自称与元礼“有亲”:

> 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这有点唇枪舌剑的味道,我们不必去仿效。但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两句话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是有过不少的。这很值得我们引为鉴戒。

王亮以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曾获得过许多奖牌,在写作、演讲、朗诵、音乐等等方面,表现出来了令人注目的才情;曾荣膺“齐鲁小名士”的称号。他应该说是一个“小时了了”的人。但是“大未必佳”怎样呢?我不是算挂的季半仙,季铁嘴,我不敢瞎说。我只有虔诚希望而且也相信,他小时了了,大更了了,老了更更了了,了了一辈子。是为序。

1991年3月23日

《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序

我多年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我也曾在很多地方说过：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条件之一。这里面当然包括文学方面的交流。

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我们过去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总觉得其中似有偏颇之处。说清楚一点就是，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者多，而研究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影响者少。这就是我所说的偏颇之处。

这样一个偏颇，看似微末，影响实大。它至少会对外国文人和中国文人，甚至中外的老百姓，提供不真实的信息。外国人由此会产生自高自大的想法，而中国人则会由此产生某一些自卑的心理。这些都是不应该的，不利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柏寒同志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曾注释过《六一词》，颇多创获。他特别注意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从先秦文学起，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唐代文学，一直到宋、元、明、清文学，上下数千年，应有尽有，极详尽之能事。这样一来，他就弥补了一个长久以来就存在的空白，纠正了我上面说的那个偏颇，为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的研究成果，就表现在这一部书里。我翻看了一下本书的目录，觉得是一部很有用的书，故乐为之序。

1991年3月25日

《北大亚太研究》序言

亚洲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关键地区之一。从地理上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从政治上来看，从经济上来看，无不如此。

从文化上来看，更是如此。

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共产生了四个大的、独立的、历史悠久的、影响广被的文化体系，其中有三个与亚太地区有关：有两个源于这个地区，即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有一个发展于这个地区，即闪族伊斯兰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当然也进入了这个地区。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局限于历史上的一两百年、地理上的几千万平方公里，而是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则可以预言，以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将在这个地区，甚至在全世界，让位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批判继承了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

我上面说的关键的含义即在于此。

现在海湾战争已经结束，亚太地区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我国作为东方和世界大国，关心这个地区，研究这个地区，实在是当仁不让的。

而北京大学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在少数设有与亚太地区有关的专业的高校中，课程设置是比较完备的，有关这个地区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等方面课程几乎是应有尽有；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学者老中青都颇有一些。一年多以前成立的亚洲太

平洋地区研究中心，承担起协调全校各有关研究及教学机构的研究工作，统筹安排，也已做出了一些成绩。从这几方面来看，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多做一点贡献，也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

但是，我们强调团结协作。在校外，我们北大决不想也决不可能包打天下；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有关高等院校，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交换信息与资料。在校内，我们要协调各有关系所的研究步骤，也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交换信息与资料。我们相信，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把我国的亚太研究推向前进；既继承，又发展；既前瞻，又回顾，共同努力，全国一盘棋，取得了成绩，然后再与国外同行们团结协作。为了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友谊，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我们将尽上我们的力量。

全世界和全国的志同道合者们，盍兴乎来！

1991 年 4 月 24 日

《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序言

我对于文艺理论一向有浓厚的兴趣。东西文论颇读了一些，东西各国的文学作品读的也不算少。中国的文艺理论名著，如《文心雕龙》、《诗品》之类，基本上都读过。诗话一类的书读的更多了。但是业非专务，浅尝辄止，读得多而想得少。所以至今不但没有登堂入室，连堂屋的门也相距颇远，只能仍然算是一个门外汉。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说，自己对文艺理论问题没有看法，没有意见。我的看法和意见还是不老少的。我从门外向门内瞥上几眼，看到了一些情况，也许是门内汉看不到的。原因正在我不在门内，没有为什么东西所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能够完全自由自在地观察，推敲。我想改一下苏东坡那一首著名的诗："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

几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的时候，也曾选过几门与文艺理论有关的课，读过一些西方文学批评的名著，比如 Saintsbury 的《文学批评史》之类。选的课主要是两门：一门是吴宓（雨僧）先生的"东西诗之比较"，一门是朱光潜（孟实）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后者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所谓"文艺心理学"，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方的文学批评，重点是近现代。讲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理论，都是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所渴望了解的。孟实先生讲这种西洋理论，引用的例子却多半是中国的古典诗词，讲来头头是道，听来娓娓动听，听他讲课实在是极大的享受，至今难忘。我以前对中国文学理论多少熟悉一点，中国固有的专名词一看便能了

解。对西方文艺理论，开始时难免会感到有点陌生，但是一经孟实先生讲解，便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确有非常精采的东西，它给我增添了观察问题的新角度，我的眼界为之大开。我觉得，这一门课是我在清华读书四年中最引人入胜的课程。

从那以后，我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兴趣一直保持不衰。可惜的是，清华毕业以后，我在德国呆了十年，学的完全是另一套东西。在那样长的时间内，除了有时为了消遣读一些德国古今文艺作品外，文艺理论的书几乎一点接触都没有了。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主要从事的仍然是在德国学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对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兴趣又恢复了。在专搞我那一门十分枯燥的专业之余，又利用余闲阅读这方面的典籍，旁及外国当前流行的文艺理论。只要有机会，就读上一些。当年孟实先生讲西洋文艺理论，只讲到20年代。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内新发展起来的理论，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想补上这一课；但是困难极多。一方面积习难除，浅尝辄止，不想深入，无暇深入。另一方面又有极大的苦恼。介绍外国文艺理论的书，绝大部分都是满篇希奇古怪的新名词，像是一只只的拦路虎，令人欲进不能。这样的论文或专著，对我这样的凡人来说，简直成了“天书”。我没有吴用的本领，这样的“天书”我参不透。五六十年前朱孟实先生讲的课和写的书，于今真像是广陵散了。

前不久龙协涛同志把他的近著《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拿给我看。说老实话，最初我是战战兢兢，颇怀戒心的：“又是一部‘天书’吧，”我心里想，我实在怕透了这样的书。然而，当我接过厚厚的一摞稿子，准备硬着头皮读下去的时候，我却逐渐发现了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情况。协涛同志介绍的是滥觞于德国而风靡全世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对陌生者来说，这种理论难免有点古古怪怪，不大易懂。然而他引征的例子却是中国古典诗词。全书文字

生动，说理清楚。即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不少本来很难懂的新名词，但是它们一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则一看就能明白，毫无阻路虎的气味，全书一点“天书”的味道也没有。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句，在中国诗话一类的书中和文艺理论著作中多次出现，现在又被协涛同志引用到本书中。但他不是用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解释，而是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用在这里，让我感到真是恰到好处，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有一些中国古典诗词是我童而习之认为了解决无问题的，现在看了本书中利用接受理论进行的阐释，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才知道自己原来没有了解到点子上，或者了解得不深不透。

总之，这不是一部“天书”，而是一部“人书”，是像我这样的凡人能够看得懂的书。读这样的书简直是一种享受。这让我立刻就想到几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听朱孟实先生课的情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垂暮之年竟又碰到了这样的情景，心中怡悦之情真难以形诸楮墨了。

大家都知道，外国最新的文艺理论简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有的直如蟪蛄不知春秋，转瞬即逝。这些理论，大都能说出一点道理来，至少是部分地有道理。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是强辞夺理，偏颇之处，昭然可见。在这一些新理论中，接受美学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流行的地区比较广，足征它标举的新说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基础的。它之所以至今仍然流传不衰，是有道理的。

但是，接受美学是不是就是完美无缺了呢？也不是的。这个理论创始于原来的西德，后经原东德的瑙曼加以修正，增加了新的内容，理论体系比原来的精密了一点，说服人的力量增强了一点；但是，仍然不是完美无缺，理论不周到的地方有之，牵强偏颇的地方有之，应该涉及的问题而没有涉及者也有之。根据我自己读龙

协涛同志的这一部大著的初步印象，他不但介绍了这个理论——对此我想中国读者是感激的——而且对上述不足之处，他还做了一些补充或者纠正，这当然更有利于中国读者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这种理论。所以这一切非读书得间，观察细致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是一部好书，很值得推广，我乐于为本书写这样一篇序。

1991 年 7 月 2 日写完

《一七八三年孟加拉的农民起义》序

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我们所熟知的。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间或也发生农民起义。它对有关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与中国大同小异。

印度是中国的邻邦，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但与中国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而印度则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缺乏历史。印度所缺乏的是历史著作；至于历史，当然是有的。印度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有的。只是因为缺乏历史著作，研究历史的人只能在宗教经典和文学著作中字里行间去搜索农民起义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这是一件讨好然而十分费力的事。只是到了近代，印度农民抗御殖民统治者的起义才有了记载。这大大地便利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

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记载。而且印度史学家对此注意得不够，他们似乎没有了解农民起义的重要意义。就如本书所讲的1783年孟加拉农民起义的事件，在所有的印度历史著作中，都是只字不提。这一次起义狠狠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气焰，对印度人民的独立斗争有重大作用。然而竟完全为印度史家所忽视，真可以说是咄咄怪事了。

本书的作者纳拉哈里·卡维拉吉，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心人。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一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因此不惜费上了极大的力量，到孟加拉政府的档案中去爬罗剔抉，搜集有关资料，

写成了这一部书,振正义之天声,发潜德之幽光,用历史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正确观点。这对今后的印度历史学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印度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工作起了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译者雷洁琼教授也是一个有心人。她在教学和从政之余,翻译这一部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书,对中国研究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史的学者,相信会有启发作用。我在捧读本书后怀着怡悦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1年7月3日

《中国著名中学作文精华》北京四中卷序

我自幼好舞笔弄墨。现在偶尔看到年幼时所写的"文章",稚态可掬,不禁脸红心跳。然而在潜意识里我却认为,别的孩子也不过尔尔,不会比我高明多少。于是心安理得,怡然自乐,至今已有很多年头了。

但是,最近一些时候以来,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我颇注意报纸上发表的中小学生的文章,觉得耳目为之一新。最近又读到北京四中送来的学生们的文章。我不禁大吃一惊:"后生真是可畏呀!"我心里想。从今以后,对这些小字辈应该刮目相看了。

中学生的文章,几乎都不是什么大题目,好多看起来只是身边琐事;然而,同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一样,其含义一点也不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那童稚的目光,晶莹澄澈,天真无邪,穷幽烛微,不为大人们常有的成见所蔽,能看到成年人,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所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写作技巧也淳朴无华,只有实事求是之心决无哗众取宠之意,不像当今某个别的作家那样,在那里费上九牛二虎的力量去"作",结果写出来的句子忸怩作态,雕凿古怪,令人读了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看来在作文章方面,也只能这样说了。

如果在老师指导下,他们照现在这样子发展下去,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对中国文坛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人类社会的分工是复杂而又细致的,决不能每个人都成为作家。试想如果中国11亿人有11亿作家,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

了呢?我们的粮食、衣服等等从哪里来呢?这样的社会是无法存在的。我觉得,中学教育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都要照顾到,将来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在智的方面,也要全面发展,文理都不能偏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偏颇的说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只靠科技,经济文化就能腾飞的。文科决不能忽视;但是,只靠文科,国家也无法建设。道理十分明显。总之一句话:要全面发展。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有写作天才的中学生如果将来能成为作家,甚至名作家,大作家,为我们中国,为我们北京,为我们四中,不是也能增添光彩吗?

我就是怀着这一些希望,写了这篇短序。

1991 年 9 月 10 日教师节

"勺海拾回的小诗"摄影展前言

小引：

辛未夏，吴君瑛南举办个人荷花摄影展，征文于予。予虽不文，欣然应命。盖君先人吴世璜教授与予为数十年风雨与共之老友，而瑛南作品又巧夺天工，动人魂魄，势不得不尔也。短时构思，成文一章，初颇自傲，继而谛视，则又非诗，非词，非文，非赋，直非驴非马之四不像也。虽欲效颦老王，亦势有所不能矣。适《济南日报》卢新同志索稿，考虑再三，以此文付之。予暌离故乡，历有年所。有此小文，使桑梓新老朋辈，以及亲属故旧得知予虽年届耄耋，兴会犹尚不浅，或不无意义也。

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花者乎？梅兰竹菊，旧称四君子，然以吾视之，则荷花实凌驾四者之上，诚君子中之君子也。周莲溪爱莲说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厥因其在兹乎？盛夏之时，炎阳如燃，红花映日，绿叶接天，清香流溢，翠满尘寰，诚大千之胜景，乃宇宙之伟观。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者乎？然而西风起于青萍之末，碧叶落于千山万山，金秋下临，荷塘凋残，昔日之绿肥红肥者，转瞬渺然。值此之时，世之人宁有不悲伤者乎？吴君瑛南救之有方，君擅摄影之术，尤喜为荷写影写像，盛夏酷暑，竟日伫候于荷花池旁，窥伺时机，极尽苦难；探幽搜玄，尽态极妍，窥绿魂于镜头，摄红魄于机端。如此则虽四时变幻，风光不同，而荷花神魄则永存于摄像之中，无论春

夏，不计秋冬，坐对红绿，情动乎衷。

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花摄影者乎？

1991年9月26日

《中国女书集成》序

我虽然也算是一个研究语言文字的人，而且从事此项工作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女书”。去年赵丽明女士告诉我关于女书的一些情况，我真是大吃一惊，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宇宙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而我自己“孤陋寡闻”的水平也颇可观了。

最近赵丽明及其合作者撰写《中国女书集成》成，征序于我。我忙于杂务，无暇对女书作细致的研究。然而对赵丽明女士等探求新事物之精神和筚路蓝缕之功绩，实在是由衷地佩服。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功绩，在中国学术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写序的要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但自己既然是外行，内行话是说不出来的。如果打肿了脸充胖子，硬着头皮去说，则必然会贻笑大方，这也为我所不取。无已，就谈一点感想吧。

我认为，女书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众所周知，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到压迫，受到剥削，受到歧视，他们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大量的文盲就由此产生。而旧社会的妇女，更是处在被压迫、被剥削、被歧视者的最下层。她们在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四重压迫下，苟延残喘，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习呢？她们几乎统统是文盲，连起一个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但是，她们也是人，并不是牲畜。她们有思想，有感情；能知觉，善辨识。她们也想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把自己的痛苦倾吐出来。但又苦于没有文字的工具。于是就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自

己创造文字。宛如一棵被压在大石头下的根苗，曲曲折折，艰苦努力，终于爬了出来，见到了天光，见到了太阳。试想，这是多么坚忍不拔的精神，多么伟大的毅力，能不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男子汉们，敬佩到五体投地吗？这难道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吗？

赵丽明这一位女博士，本身就充分体现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她能冒万难，走僻壤，深入人们罕至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奔走访问，费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同八位合作者，调查了许多书，明白了其中的奥秘，现在纂成了这一部书。它肯定会对语言、文字、社会、宗教、民族等各方面的研究起促进作用，为我国学术界添上一朵奇花。她这种干劲不是也同样感人至深吗？

在敬佩之余，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1年10月5日于北京大学

《朝鲜学论文集》序

对于朝鲜学，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为什么杨通方教授等一向我提出写序的要求，我立即满口答应了呢？

我先讲一件事情。

今年6月，应南朝鲜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博士的邀请，我同李滔和杨通方两位教授赴汉城作学术访问。南朝鲜社会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有十几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授参加。我作一个报告，讲的是我最近几年来常讲的一个题目：《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是有区别的，区别的基础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的思维方式是综合，而西方的则是分析。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来看，人类也仅仅有这两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东西方的文化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眼前是西方文化主宰着世界，但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管眼前多么煊赫，多么不可一世，也决不能"万岁"。西方文化现在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可能下一个世纪就是河西让位于河东的转折点，是以综合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化逐渐取代以分析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转折点。我所谓的"取代"，不是消灭，而是批判、继承、改造、转化、把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接受下来，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简而言之，我发言的内容就是这样。我的话音刚落，一位南朝鲜教授立刻简捷了当地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说老实话，我实在是大吃一惊。然而我保持住冷静：自己的发言大概还不够

清楚,也许这位学者所理解的文化就是物质方面的东西:飞机、火车、电灯、电话,如此等等。

我沉住气,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说:"韩国有东方文化,而且是具体生动的东方文化。"我举出了一个小例子。头一天我参观高丽大学的时候,这所大学的前校长金俊烨博士亲自陪着我们。他离任已久,并不当权,然而我们在校园里、大楼中遇到的男女青年学生,一看到金先生,都退避两旁,敬谨鞠躬。我当时实在是非常受感动。这一方面表示了学生们对金先生的恭敬;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毫无功利目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不是东方文化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当然,东方文化决不限于这一点,它只是东方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点流露。然而这一点流露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大地重视吗?

我解释完了以后,那一位教授没有再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也许是同意我的看法了。

这一件小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确实是一件小事情。然而它却引起了我的沉思。我一方面把它同东方文化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同朝鲜学联系起来。我们为什么研究朝鲜学呢?我的答复很简单:朝鲜学是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化是东方各国,不管是国大国小,共同创造的。中国、印度、日本等国都有一份,朝鲜当然更不例外。对于东方文化,朝鲜人民在历史上做出了许多贡献,在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都有令人难忘的业绩。就拿佛教文化来说吧。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又经过朝鲜传入日本。后来也有直接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对这三个国家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用不着再做什么论证。然而在中国的《高僧传》中,西行到印度去求法的高僧中,颇有一些朝鲜古代的僧人,《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部书已经译成了英德等外国文字,研究印度佛

教史、中亚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的学者,都视此书如瑰宝。此外,还有一些万里投荒的朝鲜古代僧人,把中印文化带回中国,带回他们的祖国,当然也把中国等国的文化带出国外。朝鲜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当然决不限于佛教,我举佛教,不过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现在南朝鲜的朋友们颇为强调,南朝鲜的经济腾飞有赖于中国的儒学。事实上,他们尊孔、崇儒,恐怕要远远超过我们。可惜我于此道了解甚少,不敢赞一辞。我只是从整个东方文化关系来谈中朝文化关系的。我在上面提出的意见也许能得到南朝鲜同行们的同意吧。

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点。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将来我们中国人同外国朋友合作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我们要共同探讨的问题不可胜数。不仅在经济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文化,也是如此。在外国朋友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无疑会是同我们有密切的文化关系的朝鲜人民。在这方面,我们中朝两国的人民恐怕会是"心同此理"吧。

我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才敢于以一个朝鲜学门外汉的身份给研究朝鲜学的专著写一篇序。我大言不惭,放言高论,我不但不感到这是越俎代庖,而且感到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不知中朝双方的专家学者以为何如?

1991年12月3日

《季羡林小品》自序

当王小琪同志向我提出自选一些小品文集成一个集子的时候，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惑。喜从何来？出一本新书总不会让作者感到不高兴的。我未能免俗，于是就喜。但是惑又从何而来呢？“小品文”这一个词儿的含义我自认曾经了解过。当我在大学读书时，小品文正盛极一时。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更是十分走俏。滔滔者天下皆小品文矣。当时大家对小品文的理解就是抒情的或叙事的短篇散文。我也并无异议。然而到了今天，我从文坛下面向坛上瞅了一瞅，小品文的含义好像是扩大了不少。至于扩大到什么程度，我无从探讨，于是就惑。

经小琪女士耐心启发，李春林男士又从旁猛敲边鼓，我老年昏聩的脑筋终于豁然开朗，知道什么叫小品文了。于是就着手选起来。

选并不难。我从许多已经出版的散文和非散文的集子中，根据我对小品文含义的新理解，选成了一个集子，按照规定，有十五万字左右。内容约略有下面几个方面：回忆师友的散文、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小小的考证，也可以称做科学小品吧；还有杂文。选的标准并不严格。既然叫做小品，篇幅就不能太长。否则就会有名实不符之虑。名不正则言不顺，古有明训。我恪守古训，不得不尔也。不管怎样，选文的工作是非常顺利的。

但是，表面上的顺利并不等于一切都顺利。在挑选文章的几天内，我碰到了一件无论如何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我那已经

退休的女儿患了不治之症。这十分剧烈地撞击着我的灵魂。我走过了八十年的总起来说是相当坎坷的道路。虽然也不缺少柳暗花明，但是山重水复也碰到过不少。如今已是桑榆晚景，幸尚时有余霞满天之感。觉得今生大概能够比较顺利地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当头挨了一棒。我虽然自信已能参透人生，乐天知命，但是感情上的障碍，我还无力排除。我一方面选文章，一方面忆起往事，面影迷离，旧梦扑朔，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吟起宋代"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一句词来。这是一句貌似寻常但有极深刻的内涵的词，值得每一个人仔细玩味的。

文章选完了，自序也写好了。但愿我还能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1991 年 12 月 25 日

《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自序

我研究佛教是从语言开始的。义理非我所长。我本着藏拙的精神,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写过一段话:

> 选完了以后,再加以仔细思考,却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没有意识到的现象。我挑选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先入之见,一定要选哪一类的文章。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喜爱近乎本能地挑选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就说是"精华"吧。但是,挑选的结果,入选的全是属于考证一类的文章。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能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评估。我认为,这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意见。

同这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是我研究佛教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我把语言研究与对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我探讨古代佛教语言,并不严格地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我努力探究的是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古代佛教语言或方言的形态变化往往能透露出来这种语言或方言产生和流行的年代(时间)和地域(空间)。这能对研究佛教部派的分布地区和产生时间提供重要的依据。大乘佛教的兴起是佛教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古今中外从事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众矣。然而没有哪一个学者从语言特点入手探讨,有之自季羡林始。窃以为分析语言特点是探究大乘起源问

题必由之路。大乘兴起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在语言特点上。我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今后还将继续做下去。把语言特点与义理发展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必能使这一项研究工作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对于我的做法，海外学者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也有先反对后赞成（或者正倒转过来，我还没有弄清楚）。对于外国学者这些意见，我充分重视，既不简单盲从，也不单纯否定，而是从各方面加以推敲，然后做出结论。可惜直至今日，在反对我的学者中我还没能发现哪怕有一点根据的论证。因此，这些充满了矛盾的反对意见，更增加了我坚持己见的信心和勇气。

纵观全世界佛教研究的形势，我深深地感觉到，不管是印度佛教史，还是中国佛教史，尽管研究者的人数相当可观，出版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夷考其实，则仍然不会让人感到乐观。有大量的问题研究尚有待于深入；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根本没有人涉及。专拿印度佛教史这一个门类来看，尽管许多国家都出版了这方面的书，有一些还是长达百余万言的皇皇巨著；然而拆穿开来，必能发现，所论类多肤浅，极不全面，极不深入。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佛教史根本还没有出现，还是一个desideratum。我并不痴心妄想，要求一本十全十美的印度佛教史。这样的佛教史永远不会出现。做学问，同追求真理一样，只能得到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终极的真理是无法得到的。

如果我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从事佛教学术研究的学者就有了不容推卸的责任。佛教源于尼伯尔和印度，而大盛于中国。现在的佛教大藏经，最完整的只存在于中国。汉译大藏经和藏译大藏经，是研究佛教的瑰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的客观条件是十分优越的，是任何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然而，唯其如此，我们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外国学

者期望于我们的也就更多。这一点应当是我们的共识。

现在我国大陆和台湾都已培养出来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佛教学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在这方面一无人材，二无成就，曾经被异邦学者所鄙视。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们既有一些老专家，又有人数众多的中青年学者。我们佛教学坛上可以说是长幼有序，左右逢源。我们现在能够充分利用我们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我们能够承担起放在我们肩上的重担了。

在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同行们的研究情况，除了在报章杂志上偶一得知以外，对实际情况，我们所知不多。最近几年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能够读到台湾同行们的著作了。台湾同行们来大陆访问的也越来越多了，由闭目塞听而豁然开朗，我们愉快、兴奋，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我们早就听说，以圣严法师为祭酒的佛学研究所，人材济济，硕果累累，在国际上广有影响。我们也分得了一份愉快和骄傲。

去岁，圣严法师率团访问大陆，我得以识荆，实为大幸。圣严法师不仅是高僧，而且是学者。听鹂盛宴，万寿夜谭，至今历历如在目前，忆念犹新。现在又蒙老友冉云华教授推毂，圣严法师垂青，邀我自选一部《佛教学术论文集》。我在感谢之余，敬谨应命，选出拙著佛教学术论文 14 篇，送来台湾出版。在所选论文中有 3 篇有英译文，对不懂汉文的国外学者会有用处的，因此就分别附在原文后面。以文会友，古人所倡。窃师其意，期望得到台湾同行们的�正。

我个人日益感觉到，我国的佛学研究正处在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只要我们海峡两岸的佛学研究者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则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条件必能日益显示其威力，我们必能对于世界佛学研究工作做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岂不猗欤盛哉！是为序。

1991年12月27日于北京大学

《历史名城——临清市志》序

现在全国许多有条件的省、市、县，都在编纂地方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这是在经济初步繁荣以后，希望对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等等方面有所了解的迫切心情的自然流露。中国历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历千年而不衰，遍神州而无遗。这在世界上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值得大大地赞美和发扬。当然，我们今天的修志，同旧的修志的传统，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不能说没有继承关系。但是最根本的最重的事实是，我们不是继承，而是创新，是在崭新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势下的创新，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的创新。

我们中华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炎黄文化，彪炳千秋，影响广被，无远弗届。这是举世的公言，非我一家之私言。因此，前不久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弘扬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一国，为了中华一族，而是为了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前途。谁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现在的世界文化会成一个什么样子。

弘扬中华文化之道多端。以中国之大，文化内容之丰富，弘扬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成其事于一地。有力量有条件的省、市、县都应该先弄清自己的文化家底。我在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科技、哲学、宗教，甚至社会风习，凡是含有精华成分的，都属于文化范畴。只有在这样摸清一个地区家底的基础上，全国的文化的家底才能具体而细致地摸清楚。

只有摸清楚全国的家底,真正的弘扬才能谈到。这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而编纂地方志正是摸清家底的最有效的办法。

其次,现在大家都痛感,必须给广大青年,甚至一些中老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成为传统,由来已久,在全世界上罕见其匹。原因是在中国历代都有外敌侵略蹂躏中国人民。存在决定意识。于是就逐渐形成了浓烈的爱国主义。如果没有外敌的话,哪里还需要什么爱国主义?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成性,利用自己的坚船利炮,破门而入,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我们人民受剥削,受污辱,忍气吞声,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吃尽了苦头。到了今天,一般老年人还记忆犹新,而青年人则生长于蜜水之中,逐渐忘记了这一切。同他们谈起这些情况,有的人甚至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好像是在听海外奇谈。他们崇洋媚外,唯洋是务。我们常说:好了疮疤忘了痛。在这些青年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疮疤,当然更谈不到痛不痛了。他们只觉得洋货可爱,洋餐好吃,洋国可留,洋人可亲。连莫名其妙的"可口可乐"之类也居然风靡全国。在旧社会是洋人树立牌子,上书:"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干这样的勾当,岂不大可哀哉!又岂不大可怪哉!然而,只要睁眼一看,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屈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就是这样子吗?中国老祖宗留下的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被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好东西,则对不起,统统忘掉了。我们将何以对后世子孙!我并不是说,现在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不是事实。可是,特别是青年中,崇洋媚外者实繁有徒。有识之士怆然忧之,一致认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也并不是盲目地排外。外国的一切好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大家是都明白的。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其道多端。我个人认为,要想爱国,必

先爱乡；乡而不爱，何从谈国！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做“乡土”，专讲本地区的文化、历史，以及各方面的情况。我学了以后，觉得非常亲切、有味，受益良多。后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忽然不见了。记得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曾经谈到恢复乡土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极有远见的意见。全国各省、市、县应该尽快恢复这种做法。这个课程只限于小学或者中学，不必占过多的时间。每周一小时，一年足矣。我相信，谈说本地文化，介绍本地风光，学生听起来必然感到亲切、有味。爱乡之心，必然油然而生。乡相联而成国，在潜移默化中，既然爱乡，还能不爱国吗？乡土课的教材从哪里来呢？就是过去千百年来已经编纂过的，现在又在编纂的省、市、县志。

第三，为了当前的经济建设，我们也必须摸清本地区有关这方面的家底，而编纂地方志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办法。

基于以上三大原因——其他原因当然还会有一些的——，编纂地方志的工作确实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临清市，在这方面不甘后人，已经由市领导机构组成编纂《临清市志》的班子，工作了一段时间，初稿已经写出来了。作为临清游子，我感到欢欣和骄傲。

我们临清市，在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上的经济文化重镇。文人学士、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赶考举子，只要是从南方进京，几乎无不通过临清。遥想当年舟船星聚，帆影云展；廛闬扑地，歌吹沸天；车水马龙，商贾联翩。景象何等繁忙动人！我们临清，南通苏杭，北连皇都；会八方之风雨，通百邑之有无。地位又何等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里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是很自然的结果。

但是，曾几何时，津浦铁路修通了，运河的重要意义降低了。南来北往过往人士，很少再来临清。南北商品的运输任务，也自然

而然地转移到铁路上去。临清的经济发展当然受到阻碍,文化发展也随之受到影响。虽然还没有到一蹶不振的地步,但当年盛况则杳如云烟了。中国过去常讲气运,一个朝代,一个地区,都有气运,而气运又会转变。这决不是迷信之谈。气运是由物质环境和内部矛盾所决定的,不相信是不行的。我们临清由盛而衰,也是气运使然。

但是,文化是能够积淀的。在我们临清,过去文化的积淀迄今依然到处可见。这具体地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们文人墨客的流风余韵,依然浓烈存在。能诗词善书画者,不但有老年人,也有中青年人。自忠碑林开始筹建了,书画社已经创办了,与外地的书画家联合发起书画展也已开端了。这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都承认,饮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具体、最鲜明的表现。世界各国无不重视饮食文化。在这方面,我们临清也有独特的贡献。到过这里的外地人,对我们肴馔之丰美,花样之繁多,无不交口称誉。在我们宴会上能一气端上十几种口味各异的菜汤。这在全国也是仅见的。此外,我们在饮食方面还有不少的特产,也是遐迩闻名的。文化的积淀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几种。文化是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我们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潜力是异常雄厚的,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应该忘记,我们应该有绝对的信心。

环顾当今世界大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亚洲几条小龙的腾飞,引起了全世界普遍的注意。他们为什么能腾飞呢?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是文化教育的发展又必须有经济振兴作为基础。这难道不成了鸡与蛋的关系吗?我认为,不完全是。文化教育与经济确实是互相依赖的。但没有鸡与蛋那样谁先谁后的问题。只要双方并重,双管齐下,则矛盾并不难解决,互相促进之效可以立收。再加上一些外部的有利条件,则经济必然腾飞,文化必然昌盛,其势不得不然也。

经济的发展,专就物质基础而论,一取决于原料,二取决于交通。现在,我们临清面临的形势是,根据地质勘探,我们市境以内,有丰富的地下矿产蕴藏,石油和天然气都有。在交通方面,疏浚大运河之声,洋洋乎盈耳,而国家修建的京(北京)九(九江)和石(石家庄)兖(兖州)两条铁路,都要经过临清;南水北调工程也将离不开临清。一旦地下资源得到开发,水陆交通能够畅通,再以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并千方百计地引进中外的尖端科技,使地下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小而至于土特产品的生产和推销,饮食文化的弘扬,也决不忽视;能做到这一步,则我们临清市的经济腾飞必将指日可待,文化教育的进一步的腾飞,也将同时出现,我们市将成为北方的经济文化重镇,成为一条天马行空般地飞腾的龙,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也将做出重要的贡献。届时,舍利塔将再放光辉,鳌头矶将重显雄姿。当年极盛时期的情景,不但得以重现,而且还将大大地超过,岂不猗欤盛哉!

现在,我们的市志已经编成,对我们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摸清了底。这将大大地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大大地有利于进行爱国和爱乡的教育,大大有利于进行经济建设。这是一件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对其意义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行动。我相信,在目前的领导班子领导之下,全市人民必然会意气风发,力争上游,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好。我虽已老迈驽钝,“肯将衰朽惜残年”?我还有信心看到我上面所谈的那样的日子的到来,看到梦想成为现实。我愿追随诸君子之后,竭尽绵薄,为自己的桑梓之邑作最后的冲刺。是为序。

1992年2月22日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王小甫同志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增补、扩大了以后，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我对于他研究的这个题目没有深入探讨，不敢赞一辞。但是对于与此书有关的中亚史地研究工作，却颇有一些意见想说一说，因此便答应了下来。

全世界都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最爱历史的民族。我们不但注意写本国历史，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正史中都有讲西域（中亚和新疆，甚至这地区以外的一些地方）的专章。在大量非正史的著作中，在所谓"杂史"里，有关西域的记载也大量存在。古代西域，虽然荒凉寂寞；但在人类历史上却起过极大的作用。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干线丝绸之路，就横贯此区。它对沿途各个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起了促进作用，促进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一条丝绸之路的话，人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个地区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历史上，这个地区多为游牧民族所统治，极端缺乏文献记载。所以现在研究起来有极大困难。幸而西方古代留下了少量文献，阿拉伯、伊朗等地的旅行家也留下了一些文献记载，稍稍照亮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的暗云。而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的文献记载比较系统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其意义与价值远远超过了西方和穆斯林国家的有关文献，从而受到了全世界有关学者的重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如果没有中国的文献记载，研究古代西域，研究丝绸之路，几乎是无法进行的。

但是汉文，尤其是古典汉文却决非轻而易举就能掌握的。在这里，汉文几乎成了拦路虎。西方学者无论矣。即以日本而论，他们的学者学习古典汉文有悠久传统，有便利条件；可是，仔细推敲一下，他们对汉文的掌握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却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日本老一代的西域古代史地专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他们的著作也间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出于对西域古代语言掌握不够；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汉文古典文献的掌握也还没能达到得心应手的水平。年轻一代的日本西域史地学者，在掌握古代西域民族语言方面，较之老一代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掌握汉文方面则反而不及老一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谈到中国这方面的学者，我们有我们的有利条件，但也有我们的不足之处。有利条件首先就是对汉文古典文献的掌握。虽然我们也决不敢说毫无问题，我们的困难也还是不老少的，年轻一代学人的掌握水平更与老一代有差距；但是，总起来看，同国外学者比起来看，我们的水平是颇能令人满意的。不足之处是，虽然我们注意西域已经有了两千来年的历史，可是到了近代，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落后了。一直到19世纪末叶，西域研究才又稍稍抬头，出了一些研究古代西域史地的学者，写出了不少非常有水平的书。可是这些学者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不懂西域古代语言，不通西方近代语言。研究工作有点坐井观天的味道。接着来的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混乱的时期。政治经济的混乱影响了学术研究，其中也有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几乎达到了后继无人的程度。其间也出了几个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虽为中流砥柱，但又独木难支。西域研究变成了荒凉寂寞的沙漠。有识之士，怒然忧之。

一直到了最近十几年，我国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才逐渐昌盛起来。目前，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梯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这一个梯队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既通中国古典文献，又能通晓有关的西

域古代民族语言,还能掌握一些西方当代通行的语言。广通声气,目光开扩,与全世界的专业同行有密切联系,与过去坐井观天的情景大异其趣,可以说是已经参加到世界学术研究的行列里来了。这在中国悠久的学术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伟大事件。

在这一个学术梯队中,非常值得一提而且必须提的是中青年学者的茁壮成长。这种成长决不仅限于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在整个所谓东方学的范围内,都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现在谈的是西域古代史地研究,所以讲中青年学者也仅限于这个范围。为了给人们一些比较具体的印象,我想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张广达、耿世民、林悟殊、刘迎胜、蒋忠新、余太山、胡海燕、段晴、王邦维、林梅村、荣新江等等,这个名单不一定很全,仅就我记忆所及,不过举出几个例子而已。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中西兼通,基本上掌握所需要的西域古代语文。他们又都能通解汉文古典文献,这就如虎生翼,可以与外国同行逐鹿学坛了。我决不是说,他们都已十全十美。为学如逆水行舟,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龄,任何国家,都要不懈地努力,他们也决不能例外。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人是中国新一代的学人,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我想把王小甫也归入这些学人中。我相信,他的这一部书就能够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我原以为这篇序讲的都是书外的话,与本书关联不大。写完了以后,又觉得关联极大。究竟如何?请读者加以裁决。

1992年3月27日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梵文原文影印本小引

值此中日两国邦交恢复二十周年纪念之际，中日联合拍摄的梵文原文《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正式出版了。这是中日两国的佛学研究者密切协作的结果。它必将推动两国的佛学研究，促进两国学者和人民的友谊。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此书原件现藏中国民族图书馆，原来自我国西藏。根据现在各国学者的意见，现存于西藏的大量的贝叶梵经，并非土生土长的，而是一部分来自印度，一部分来自尼泊尔，是中、印、尼三国的佛教信徒和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它象征着长期以来我们三国人民的友谊。

这一些贝叶经，有一部分早已流传国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印度梵文学者 Rāhula Sāṅhṛtyāyana 曾几次到西藏去拍摄抄录。他拍摄的照片现藏印度 Patna（巴特那）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已经从中选取了一些，校订出版，有的编入 Tibetan Sanskrit Work Series（《西藏梵文著作丛书》），有的在别的国家出版。没有校订出版的占绝大部分，其照片拷贝早已传出印度，欧洲许多大学的梵文研究所都有。

印度所藏照片，曾发表过一个目录；但不一定完整全面。我仅知道，中国民族图书馆有的，印度没有。印度巴特那有的，中国民族图书馆没有。而现在西藏还藏有大量的贝叶梵经原件，是稀世之宝，还有待于调查统计。

我们都承认，学术研究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

国家民族所得而私之的。研究当然要有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后者还牵涉到发扬爱国主义的问题，这都是事实，不容否认。但是，我说的竞争完全是积极的，它能促进世界学术的进步，增强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友谊，其中决没有消极的因素。这样的竞争靠的是学者们个人的努力，个人的本领，个人的学术造诣。在世界上，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有靠垄断研究资料和珍本秘籍，来进行竞争的。我期期以为不可。这样的竞争从来没有产生出伟大的学术著作。一部人类的学术史充分证明了这一个事实。

现在出版的这一册《声闻地》梵文原文影印本，其原文照片早已传出国去，而且已经有了几个刊本：

A. Wayman, Analysis of the Śrāvakabhūmi Manuscrip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1

A. Wayman, A Report on the Śrāvaka – bhūmi and it's Author, JBORS Vol. XLII, 1956, 316 – 329

S. Shukla, Śrāvak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 TSWS XIV, Patna 1973

据 A. K. Warder,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Varanasi, Patna, p. 552, Dutt TSWS 1966 也有一个《声闻地》的刊本，恐系错误，因未见原书，不敢肯定。《瑜伽师地论》梵文原本其他一些《地》(Bhumi)也有刊本，这里从略。

关于《瑜伽师地论》的作者，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五，阿逾陁国：

> 无著菩萨夜升天宫，于慈氏菩萨(Maitreya Boddisuttva，弥勒菩萨)所受《瑜伽师地论》、《庄严大乘经论》、《中边分别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

由此可见,作者就是无著,是非常清楚的。A. K. Warder,上引书p.437说:in China the last work(按指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is supposed to be Maitreya's。这是一个误解。

既然《声闻地》梵文原本已经传出国外而且有了几个刊本,我们现在这个影印本的价值何在呢?我认为,仍有极大价值,因为这是直接从梵文原件拍摄的,而且五六十年前的拍摄手段,无论如何也无法同今天相比。我们这个影印本,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作为艺术品,都有其独立的价值。

而且,其价值还要超过以上所述者,因为它蕴含着中日两国佛学研究者的合作和友谊,它蕴含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我写了这篇小引。

1992年6月6日

《挑灯集——郑子瑜散文选》序

我同子瑜先生认识，已经颇有一些年头了。最初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学者。现在读到了他的散文和杂感的结集，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个散文作家。愧我孤陋寡闻，罪过，罪过！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无论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看，还要加上一个历史传统之悠久，中国都无愧是世界第一。

我没有研究过中国散文史，我不知道专家学者怎样把中国散文分类。窃以为分类的方法恐怕是很多的，比如按内容分，按形式分等等，都不失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方法。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我想按照我在上面提出的观点，把散文分为：文学家的散文、学者的散文、文学家兼学者的散文。要举例子嘛，也可以。第一类可以韩愈等为代表。第二类的代表则有司马光等。至于第三类，前有司马迁，中有欧阳修，近有鲁迅。

文学家的散文和学者的散文有没有区别呢？应该说是有的。用当前的说法，文学家颇多形象思维，而学者则偏多逻辑思维，二者之间不能说没有矛盾。对比一下抒情或叙事散文和学术著作，就能完全窥探个中消息。学术著作往往缺乏文采，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集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于一书，千古惟有司马迁《史记》，可谓戛戛乎难哉！真是"万古凌霄一羽毛"了。

读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能猜想到，我将把子瑜先生归入学者兼文学家这一类。事实正是这个样子。他天造地设地应该属于这

一类。

作为学者，子瑜先生从事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历有年所。弄大斧于鲁班之门，开讲座于东瀛上庠。一部《中国修辞学史》，皇皇巨著，前无古人。先生之为功，可谓大矣。

然而读先生现在这一部散文结集，则又能发现，先生之文章风致嫣然，极富文采，令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中国修辞学史》作者之手。又可见先生于此道工力之深。

先生虽已年逾古稀，然较之不佞，仍少五岁。以吾视之，先生正当年富力强之时，来日方长，伟业可期。谨预为之祝。是为序。

1992年6月11日

《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中国卷》序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纪末。

难道每届世纪末世界上就必然发生不寻常的事情吗? 不一定的。因为世纪末据以产生的根源:公历纪年法,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同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可是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确实产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现象。眼前的20世纪的世纪末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怎样来解释这些现象? 这不是我目前想做的工作。

在目前世界上扑朔迷离的变化中,有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世界人民总是越来越接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休戚相关的感觉越来越强。另外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极少数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之一。根据很多国内外专家的估计,到了21世纪,中国很可能同东北亚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

因此,我们中国人学习外语,特别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语言学习,而应当同促进人类的发展、团结与进步联系起来,同保卫世界和平联系起来。

专就外国人学习汉语而论,我国教授汉语的机构,首先是北京语言学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是,据当事人告诉我说,他

们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要让外国学生真正学好汉语,光在教学技巧上来作文章,还有所不足。必须注意教学的内容,必须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社会风习。因此,他们编撰了一套《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准备先出《中国卷》。

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想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也是对头的。离开内容,根本谈不到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有这样的经验。

对外国学生进行中国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方面的教育,如果利用中国历史文化教科书的形式,峨冠博带,威仪俨然,恐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采用的讲故事的形式,已经为许多学科所采用,效果良好,事半功倍。这一套《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也必将取得理想的效果,不卜可知。

我怀着对这一套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系》的良好的愿望,预祝它的成功。

我们还要感谢出版这一套《大系》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是为序。

1992年6月12日

《犹太百科全书》序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其所以独特，一是因为二者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二是因为二者都有极优异的素质，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二者共同之处。

然而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中华民族5000年来尽管治乱分合，纷至沓来；但是毕竟保持了一个统一的伟大国家，一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对世界有举足轻重之势。而犹太民族则恰恰相反。自从最古的王国以后，就分崩离析，人民被迫流转于世界各地，一直到了20世纪中叶，才建成了一个以色列国，应该说也是充满了活力的。

我们这样两个一大一小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的民族，在历史上是有过接触的。犹太人在播迁于世界的过程中，有一些也来到了中国，主要定居在河南开封。这个情况引起了中外一些学者极大的兴趣，出版过一些文章和专著。在中国今天的学术界，还流传着一些传说，说某几个著名的学者有犹太血统。这些传说真伪难辨，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探讨。但是，中国俗话说："无风树不响"。现在，既然树已经响了，恐怕会真地有风吧。

我们这两个民族，虽然在历史上有过接触，但是彼此了解得并不多。中国方面对犹太了解得多一点。犹太教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有记载的，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但是，总起来看，我们彼此是非常隔膜的。到了今天，犹太人已经有

了自己的国家。访问过以色列的人告诉我，那里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犹文化研讨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也说明了两个民族渴望相互了解。在中国人方面来说，我们非常钦慕犹太民族在浪迹天涯到处受到排挤甚至迫害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历代都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这说明犹太民族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优秀的民族。我们中国人民也对犹太人抱有深厚的情谊。我们两个国家，虽然相距万里，却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民虽然对犹太人和犹太教有过一些研究和了解；但是同当前的客观环境的要求比较起来，却是非常非常不够的。我们的学术界蓦地面临着广大人民渴望了解犹太民族、犹太文化、犹太人新建的国家等等的情况，颇有难以措手之感。南京大学以外文系为主，组织了一些颇为少有的研究犹太问题的专家学者，编纂了这一部《犹太百科全书》，实在是雪中送炭之举，一定会受到广大的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对于犹太问题向少涉猎，几乎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对于这样一部书不敢赞一辞。但是，我自己的需要我是清楚的，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需要我也能猜知一二。因此，我敢斗胆说一句：这样的书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我乐意为这一部巨著写这样一个短序。

1992年6月25日

《李森学术论文集》序

李森教授和我是老朋友，我们相识已经超过四十年了。他是当今研究本民族语文而有比较突出的贡献的维吾尔族的学者。他一生著述累累，论文就结集在本书中。

李森教授曾任教于原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1949年9月，随南京一部分师生合并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来，创建了维吾尔语专业。在建国初期，对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理解与友谊，做出了可喜的贡献。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国内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改归新创建的民族学院，李森教授在这里创建了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语言的突厥语教研组(室)，培养了大批维汉等族的学员。他从事课堂教学，田野调查等活动，取得了成绩，写出了文章。本集中绝大多数的论文就是他在这期间学术活动的总结。其价值与意义，内行人一看就能洞悉。

李森教授不但从事现代语言的研究，而且间或涉及新疆古代民族语言，如回鹘文等等，这对我们研究古代新疆文化是决不可少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友谊互助，互相了解，是万分重要的。李森教授做的正是这个万分重要的工作。他通过自己辛勤的教学与研究，在汉族和新疆各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助互爱，互相理解，充满了民族兄弟情谊的金桥，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其他兄弟民族，做出了极好的榜样。

李森教授关于新疆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对我国以及世界各国研究中亚古代文化和文化交流的学者们，提供了方便，为这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做出了贡献。

总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中，李森教授辛勤地耕耘在新疆民族古今文字这一块学术园地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学术方面，他的功绩都是不可泯灭的。

这一部论文集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其中，青年学者可以窥见老一辈学者的流风余韵，是学习的好榜样，是启发灵感的源泉。这一部文集必将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我作为老朋友，实在感到异常的欣慰。是为序。

1992年7月1日

《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序

尽管我对朝鲜学一窍不通，但是不知是什么力量却注定了我一生要同与朝鲜有关的人和事打交道；但这是非常愉快的交道。

谈到人，我在国内朝鲜族中，在国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中，都有一些朋友，有的是极为要好的朋友。

谈到事，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国内最早建立朝鲜语言专业的系。我曾多年在这个系里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虽然离开了东语系的和学校的领导岗位，却又同北大新建立起来的朝鲜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这一生，从一个青年教员开始，直至今天的耄耋之年，数十年如一日，都参与了对朝鲜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等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活动。因此，尽管我不懂朝鲜学，但是对朝鲜学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对朝鲜文化也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朝鲜学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讲。在国内，在有五十多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朝鲜族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优秀民族。他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有独创性的成就，丰富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宝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保存和发扬朝鲜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对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增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与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国外来说，朝鲜半岛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历史上也曾有

几次出现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局面。不管是分还是合，朝鲜民族对世界文化始终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在另一方面，朝鲜民族一方面创造文化，一方面吸收文化，一方面又传播文化。中国同朝鲜就有极其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国的儒学就曾传入朝鲜，直至今天，在韩国还在发挥着作用。至于影响东方广大地区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从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和尚中，在唐朝有不少就是新罗僧人。这些舍生求法的僧人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是无法否定的。佛教传入日本，除了中国这一条路之外，还有朝鲜一条路。专就佛教传布来讲，朝鲜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鲜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的。

所谓"朝鲜学"，据我个人的理解，是一门研究与朝鲜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学问，既包括地理、人种、语言等等，也包括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是一门内涵极为广泛的学问。我国建国以后，延边大学就一马当先，开展了朝鲜学的研究，四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在，在郑判龙教授领导下，延边大学朝鲜研究中心又推出了《朝鲜学研究丛书》。其中一种就是这一册《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里面所收的论文，光从题目来看，就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内容涉及朝鲜文化，涉及中朝文化交流，涉及儒学，涉及道家，等等，涉及面是非常广的。文章的作者，有我国的朝族和汉族，还有韩国的学者。这样一来，国内协作和国际合作都体现出来了。无论从学术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次盛举。

应郑判龙教授要我写序之嘱，我翻看了其中几篇文章。愧为外行，难得深入；但在浅尝辄止中，亦已有所收获。遂不揣谫陋，写成此序，意在共襄盛举而已。倘若能在外行话中有几句说到点子

上,则大幸矣。

1992 年 7 月 11 日

《中国古典文学八大名著白话精缩》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表现在各个方面。专就文学而论，历代所承认的一些正统的文学名著和文学名家，当然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一切。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家喻户晓却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古典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得到了新的地位，昂然走入过去对它们是禁地的中国文学史。这批小说也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而且据我看，其深度和广度，其影响还要超过前者。众所周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三国演义》等书。他们的伦理道德概念，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古典小说。这一批小说，对陶冶民族心灵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简直无法估量。

在过去，我国人民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人们有时间慢悠悠地阅读这一批古典小说。他们从这些书中得到的好处，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美感享受这一面的。我想，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置身于信息爆炸的环境中，生活节奏大大加速，很少有人能够慢条斯理地阅读长达百万字的古典小说了。这方面的需要却并未消失。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缩写本。这种办法过去已有人尝试过了，我记得茅盾等就搞过他们称之为"洁本"的东西，面好像不是太广，影响好像也不是太大。

现在中国之友杂志社会同华语教学出版社，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联系工作，邀请了多位高等学校的教授和中青年作家，将

八部流行了多年的、影响广被的古典小说,缩写成每部二十万字左右的白话本。这实在是极具胆识、顺乎人心、适应潮流的工作,值得我们衷心赞赏。有此八书在手,则对中国古典小说可以得一全貌。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潜移默化,提高人民的心理素质。我非常乐意写这一篇短序,为之鼓吹。

1992年9月10日

《陈瑞献选集》序

过去和现在，我在新加坡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有一些朋友。有的鱼雁传书，切磋学问；有的过从甚密，结成了深厚的友情。我觉得，这真是人生乐事。

陈瑞献先生是新加坡文艺界的巨擘，仰望大名，心仪已久。但是直至今日，尚无缘识荆，极以为憾。现在忽然偶然得到了一个宛如自天而降的良机——陈先生要在中国出版《选集》了。承蒙垂青，邀我作序。以我庸陋，感愧交加。但我愉快地承担下来了这一件工作。从此我在新加坡的朋友又增加了一个，岂非乐事中之乐事吗？

我翻看了瑞献先生的文集、欣赏了他的绘画，看了一些介绍他的文章，开始构思。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总想先正一正名，给他安上一个什么家，然后再根据这个家的特点，生发开去，写成一篇妙(也不一定都妙)文。一般人写序言，有的也是遵照这个路数。然而，这一次我却失败了——生平第一次在这样场合下失败——我找不到一顶现成的什么家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而恰如其分，虽然我的帽子铺里现成的帽子数目是不算少的。

我迷离模糊地仿佛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时候，正如众所周知的，出了一些全面的、多才多艺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universal)人才。我面对的陈瑞献先生就近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哲学家、画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学者、书法家、篆刻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者等等。在艺术范围

内，他是油画家、中国写意画家、版画家，精通胶彩、纸刻，还是雕塑家。在哲学范围内，他通佛学、西洋哲学、中国哲学、美学、宗教学等等。此外，他还精通饮食文化、园林艺术，他也搞服装设计。在语言方面，他精通汉语、英文、法文、马来语。我列举了这样多的“家”，看来还不足以窥陈先生之全豹。即便是这样，陈先生不是已经能够让人目迷五色、眼花缭乱了吗？

陈先生这样一个 universal 的全才，在新加坡和世界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和勋章。新加坡一位收藏家为他修筑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陈瑞献艺术馆”。一位评论家写道：“除了称他为天才之外，就没有别的称呼了。”中国当代大画家吴冠中先生称他为“东方青年的楷模，杰出的炎黄子孙”。因为陈瑞献先生，尽管在多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年龄还不到五十。按中国论法，只能算是中年。

怎样来解释这个“陈瑞献现象”呢？

近若干年以来，我经常考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要解释“陈瑞献现象”，必须从东西方文化关系入手。

在东西方文化关系方面，我的观点不可能在这里详加阐释。简短截说，我的主要观点是：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文化交流是促进或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历史上，世界上已经产生了许多文化（有人称之为文明），但是哪一种文化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万岁千秋。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到了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纪末中，一个新世纪——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应该立足于眼前的二十世纪末，而展望二十一世纪。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看不清世界文化的走向，而迷离模糊陷入迷魂阵中。

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陈瑞献现象”，就能理出一个头绪来。陈瑞献正是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激荡冲撞中产生出来的人物，

而且他身上也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未来。

陈先生的根虽然是在中国,然而他成长,受教育,接触社会,接受社会的熏陶感染,却是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上,正处在两方面的前沿阵地上。换句话说,新加坡是东西文化交光互影最显著最剧烈的地方。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出陈瑞献这样多才多艺几乎是全能的人物。事情不是非常明显的吗?

具体一点说,陈瑞献所受的教育,他受熏陶的文化环境,都是有东也有西。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在这里所讲的东方文化,除了包括中国文化以外,还包括印度文化。陈先生不但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他的根,而且也了解印度文化。他的一幅巨型的画,名字是 Poem on Suchness。Suchness 这个英文字翻译的是梵文原文的 Tathata,中国古代佛典译为"真如"。陈先生以此字命名自己的画,可见他对印度佛教哲学之理解,之欣赏。而他在学术上的全面发展,于此也可见一斑。

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已经有几百年了。它的光辉成就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幸福和繁荣。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麻烦与灾难。这一点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死掉了几千万人的两次世界大战,不是都从西方爆发的吗?现在困扰世界人民的许多祸害,比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的出现,甚至人口爆炸等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同西方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些祸害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

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有识之士应该有足够的明智,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个非常严酷的现实。不面对、不承认是不行的。回避也是没有出路的。

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三十年河东的现象再次出现;东西两大

文化体系沟通融合，而以东方文化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的已经奠定了的基础上，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只有这样，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危害人类未来生存的灾害才有可能得到遏制，人类才能顺利地生存下去。

我觉得，在陈瑞献先生身上，这种沟通融合东西文化的倾向已经表现了出来。所以我说，他代表着东西文化发展的未来。

陈先生的国籍虽然是新加坡，而他的文化之根则是中华。为了弘扬中华的优秀文化，为了加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与理解，把陈瑞献先生介绍给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以及全中国的人民，是非常必要的，是会受到中国人民和新加坡人民的热烈欢迎的。现在中国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套《陈瑞献选集》，虽然还不足以窥全豹，然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已足以慰情怡心了。这实在是明智应时之举，值得我们热情祝贺。我只希望把陈先生的绘画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也能介绍过来。这样我们就能对陈先生了解得更全面一些。能做到这一步，则我在上面引用的吴冠中先生对陈先生赞誉的两句话："东方青年的楷模，杰出的炎黄子孙"，才能充分变为事实，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从而会更进一步加强。这难道不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是为序。

1992年11月16日

《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新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镕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灿的明星。

中国近现代，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近现代同以前的许多时代，都有所不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俞曲园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们师弟二人身上体现了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学术发展的一个大转变。俞曲园能镕铸今古；但是章太炎在镕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这只要看一看曲园先生的文集，再读一读太炎先生《章氏丛书》，特别是其中的《文录》和《别录》中的许多文章，其区别立即呈现在眼前。太炎先生的文章如：《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送印度钵罗罕保什二君序》、《记印度事》、《无政府主义序》、《俱分进化论》、《无神论》、《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梵文典序》、《法显发现西半球说》等等，就是他会通中西的确凿证据，他的老师是写不出来的。

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镕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他们有别于前一代大师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悠久的优秀的学术传统，特别是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融会了西方的优秀传统，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是如此。他们发扬光大了中国的学

术传统,使中国的学术研究面目为之一新,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在锡予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很高,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又远涉重洋,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习梵文,攻读西方和印度哲学。再济之以个人天资与勤奋,他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岂偶然哉!

拿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来作一个例子,加以分析。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一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在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声称扬的。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永放光芒。

锡予先生的治学范围,当然不限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他在魏晋玄学的研究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对隋唐佛教也作过深刻的探讨;旁及印度哲学和欧美哲学。他完全当得起"会通中西"这一句话。

汤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真、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自己没有得到机会立雪程门。我在德国住了10年以后,先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汤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我得以来到了北大,当上了教授。此后我以学生教授或教授学生的身份听过汤先生"魏晋玄学"的课。我觉得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我不自量力,高攀为锡予先生的弟子,以此

为荣。

今年是汤先生诞生100周年。先生虽谢世已久，然而他的影响却与日俱新。这一册纪念论文集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本册所收的论文，有的来自国内学者，有的来自国外学者，不少作者就是锡予先生的门生，有的则是他的崇拜者。仅此一端，即可以看出先生影响之广被。我相信，这一本纪念论文集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对加强中外学者的协作，将做出贡献。我满怀喜悦崇敬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文。

1992年11月19日

《清渊诗词选集》序*

清渊诗社成立5周年了。对诗社本身来说，这当然值得庆祝。对临清市来说，我认为，也是值得庆祝的。

临清自古为鲁西北文化经济重镇，流风余韵，辉耀齐鲁。可惜时移世变，津浦铁路一修成，大运河又部分断了流，这对临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然产生了剧烈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方面，大有一蹶不振之势。但是，文化命脉却从未中断。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能诗善书画之士接踵兴起，各领风骚。我市曾与北京大学在北京海淀举行书画联展，一时誉满京西，成为艺坛佳话。这在山东全省也是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呢？地方历史文化积累雄厚，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一些有识之士，在离退休之后，不甘饱食终日，而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奔走呼号，惨淡经营，终于组成了清渊诗社、枣花书画社等等文学艺术团体。即以清渊诗社而论，创建以后，于今五载。以文会友，大扇诗风，成为临清文坛上一重要组织。如果要评功摆好，胡雷同志之功决不可泯。他宝刀不老，壮心不已，踔厉风发，所向无前，创诗社，建碑林，为我们临清市增添了光辉。

现在我国正努力振兴经济。初步成果，光照寰宇。但窃以对

---

* 本序原稿篇名为《清渊诗选》序，收入《清渊诗词选集》时，序的篇名未变。现随书名改题为《清渊诗词选集》序。

文化事业似有所忽视。综观全球，远之如日本之所谓明治维新，近之如亚洲之几小龙，经济腾飞，无不文化经济并举。纯靠科技而能兴国者，未之闻也。

现在我们临清市，既抓经济，又抓文化。民间组织如清渊诗社等等，从旁鼓吹，真如锦上添花。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两句话："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意似有所针砭。我看，我们临清的情况则是，文化和经济同时搭台，文化和经济同时唱戏。这是一条阳关大道。有朝一日，我们必能文化和经济双丰收，这是完全可以予卜的。

在祝贺清渊诗社成立5周年，祝贺《清渊诗词选集》出版之际，偶有所感，简述如上。希望乡亲们和同志们能了解我的心情。

1992年11月26日

《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

1992年11月3、4两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伊朗文化研究所举办了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伊朗方面大力支援，再加上中国方面的积极努力，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到会的学者，除伊朗学者外，中国学者的人数不算太多；但都是学有根柢，造诣精湛的专家。因此，论文质量高，讨论效果好，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会。

为什么伊朗学的研究在中国受到欢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竟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谈这个问题。

第一方面是伊朗文化本身的问题。有古老的文化而这文化传统又迄未中断的国家，在世界上不是太多。中国是一个，伊朗也是一个。我不想在这里探究伊朗古代文化的起源的时间问题，这牵涉的问题太多，一时不容易说清楚。反正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有一个所谓印伊时代，指的是印度人和伊朗人共居还没有分开的时代。据印度史学家高善必的估计，雅利安人第一次进入印度，约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梨俱吠陀时代”，他则定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即此一端，亦可见伊斯（波斯）文化之古老。公元前6世纪，大流士（B.C.521—486年）建成了横跨欧亚的波斯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到了伊斯兰教兴起以后，伊朗又接受了这个新宗教。从此以后，伊朗的古代文化中又注入了新鲜的极有活力的鲜血，发展更为辉煌，前进更为迅速，真如锦上添花，好似老虎生翼。伊朗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向世界放出了光辉。在文学艺

术方面,名家辈出,灿如列星,伟大作家费尔多西被认为是能同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等西方作家并列的人物。在医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等方面,伊朗也产生了许多大家。波斯阿拉伯的旅行家,对世界文化传播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第二方面是伊朗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关系。中国同伊朗并不接壤;但是伊朗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却多处可见。当然,中伊文化交流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我在这里只谈伊朗对中国的影响。这个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我仅举其荦荦大者。近百年以来,在中国新疆,出土了许多古代民族文字的残卷。论语言有焉耆语、龟兹语、回鹘语、于阗语、窣利(粟特)语等等。最后二者都是属于伊朗语系的语言。可见古代伊朗文化之广被。在其他方面,在新疆,伊朗文化的痕迹几乎到处可见,比如石窟、石窟中的壁画、艺术图案等等。在中国内地,伊朗文化的影响也在很多地方依稀可见。美国学者劳费尔专门写了一本讲中伊文化关系的书,书名叫 Sino-Iranica(《中国伊朗编》)。书中讲到两国文化的彼此影响,从动物到植物,从药品到矿物,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不由得由衷地感到了两国文化关系之密切,油然增强了对伊朗人民的友情。

这样也许显得还太笼统,我索性举一个琐细到不能再琐细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我从很多年以来就从事制糖历史的研究。我不是科技专家;但是我发现,在这一种极其微末的日常食品糖的背后,隐藏着一部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我就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对糖发生了兴趣。在交流的国家中,伊朗实占重要的地位。我现在从中国古代正史和其他典籍中举出一些例证:

《魏书·列传》90《波斯国》:

(多)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

盐绿、雄黄等物。

《周书》50《列传·异域传·波斯国》:

> (出)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隋书》83《列传·西域传·波斯国》:

> (土多)胡椒、毕拨、石蜜、半蜜、千年枣、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

《旧唐书》198《列传·波斯国》:

> (出)琥珀、车渠、玛瑙、大珠、玻璨、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梨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同波斯有关系的地方也生产石蜜。我也举个例子:

《旧唐书》198《列传·康国》:

> 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我不一一列举了。

波斯(伊朗)制造石蜜的技术,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它也传进了中国。我曾写过一篇相当长的论文:《邹和尚与波斯》,可参看。我现在从唐人的《本草》中选几个例子:

《唐本草》的作者苏恭说:

石蜜用（糖?）水、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戎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

《本草音义》的作者马（孔）志约说：

石蜜，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可作饼块，黄白色。

唐开元初，孟诜说：

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

我在上面从两个方面谈到了伊朗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伊朗学在世界学术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国东方学中的重大意义。我们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东方文化研究所，以及伊朗文化研究所，在中国可以说是唯一的研究伊朗学的机构。我们同伊朗有关学术团体、大学和学者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双方曾合作研究，并出版过一些受到中伊两国学者欢迎的学术著作。这对促进双方学者的协作，增强两个伟大民族的理解与友谊，起了显著作用。双方皆大欢喜。

这一册《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是双方学者协作和友谊凝成的。它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双方学术界的欢迎。它还预示着，双方学术文化交流将会日益加强。我怀着十分激动快乐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

1992年12月1日

《韩国学论文集》新序

1991年，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出版了一册《朝鲜学论文集》。我曾为这一本书写过一篇序。当时出于外交关系的考虑，我在一些地方使用了"南朝鲜"这个词儿。事非得已，心照不宣。

现在时过境迁，中韩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之举，两国人民皆大欢喜。对不佞来说，也取掉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其快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正在此时，北大亚太中心韩国文化研究所又准备出版《韩国学论文集》，仍然索序于我。有人建议，把前序中的"南朝鲜"一律改为"韩国"，这样送了出去，就算交了卷，多么省事，又多么干净利落。在目前我被文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绝妙的办法。但是，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不想采取这个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又因为我确实还有话要说，我决定重新撰写一篇新序。但是，在这里，我又遇到了一个新困难：前序实际上就是针对韩国写的，里面的话都是有的放矢的。如果把这篇序完全丢掉，我在这篇新序中难免还要重复那里的话，等于炒了冷饭。我是最不喜欢炒冷饭的。因此我同编委们商定，本书仍然保留那一篇序。我现在写的这一篇称为"新序"，是前一篇序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重复。一书两序，共存共荣，想读者也会不以为忤吧。

我在上一篇序中谈到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问题。我预言下一个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新施展身手的世纪。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的水平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上，东

方文化将进一步发展人类共同文化，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这个想法提出来已经有几年了。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些发言。得到的反响，正如人世间其他想法和主张一样，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总起来看，是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国内的我先不说。国外的反响，截止到今天，是一边倒，只有赞成的，而没有反对的。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都表示同意。这是在意料中的，我们都同属东方文化这个领域嘛。在西方国家竟也得到赞同的友声，却非始料所及。从德国甚至远处万里之外的加纳利亚群岛（Islas Canarias）都有人来信，表示同意。这更出我意外。这一些都当然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的自信。我这一个一向对义理不感兴趣的外行人，虽然还没有因此就飘飘然起来——我毕竟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但是心中涌起那么一股乐滋滋的味道，难道还不是很自然的吗？

最近一些时候，我参加了几个讨论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经济文化合作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我自己宣扬的当然还是我这一套想法，蒙国内个别学者垂青，他们也帮助我来宣扬。会上也有韩国学者参加，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但是，有一点是中、韩、日等国学者所同意的，即：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将是亚太地区，再缩一点范围，将是中、韩、日三国的金三角地带。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方面明确无误地论证了这个问题。

因此，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中国学者研究韩国学，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决不是空想，决不无的放矢，而是有其实际的意义的。其中有我们的一点理想、一点愿望、一点憧憬，一点感情。韩国人民过去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过贡献，今天又以惊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了东方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的价值与活力，为东方文化增了光，添了彩。

中韩两国人民有几千年的友好往来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

史;这种往来和交流,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内容,促进了彼此的文化发展。几千年当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瞻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往来和交流将会更长,更长,更长,长到不知道多少倍。不管人世间沧桑变化多么剧烈,多么迅速,人间的道路多么坎坷,我始终没有失掉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这种美好的未来要靠全世界人民去争取,去创造。我们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当然是当仁不让的。我们中韩两国人民一定会在过去友好的基础上,共同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友谊,使古老的友谊之树开出新的,更美的花朵。

我希望,我们中国研究韩国学的学者眼中有这个美好的前景,心中有旧谊加上新情。只要有了这两点,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题目,不管是大还是小,不管是新还是旧,不管是长还是短,不管是文还是史,我们的论文决不会干燥乏味,决不会空洞无物,而会是充满了激情,溢满了友谊。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写了这一篇新序。

1992年12月23日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序

我认识陈炎教授已有44年之久了。我知道，他幼年家贫，全靠自己努力奋斗，终于成材。但是不幸到了中年，又碰上了所谓"反右运动"。他没能幸免，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被打入冷宫，被剥夺了一切写作条件，垂十余年。真至天日重明，才得以彻底平反。他可以说是一生坎坷，直到知命之年以后，始得再从事科研工作。由于他自已的努力，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在探讨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卓有建树。

最近若干年以来，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俯拾即是。我们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人类文化水平会是什么样子。

专就中国来说，我们祖先的几件伟大的发明，对全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加以否认；连最狂妄自大的国家也不敢。今天我们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号召，立即受到了普遍的热烈的拥护和赞扬，盖有以也。这对于发扬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是很有利的，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我认为，仅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气度还不够恢宏，眼光还不够远大。我们应当在探讨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贡献的同时，也探讨外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这一件工作就是文化交流的研究。这一件工作做好，爱国主义就能够同国际主义密不可分地结合了起来，岂不猗欤休哉！

陈炎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正是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他的这一部《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就是他研究成果的具体表现。本书中的一些论文,我已经读过。我又把没有读过的大体上翻看了一下。我觉得,本书材料翔实,立论公允,不像现在学坛上某一些论著大言惑众,资料歪曲,空疏浮泛,立论无据。这是一部值得信赖的书。

因此,我热诚祝贺本书的出版。

最后,但不是最少,我还必须对本书的出版地点说上几句话,谈一点感想。本书由澳门政府文化署中文出版组黄晓峰先生推毂,被列入《澳门文化丛书》出版。这件事情,看似偶然;但是,我认为,它却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西化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弊端当然也有,这里先不谈,好处毕竟是主要的。溯源追本,西化文化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澳门。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的期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么大,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方豪先生说:"然近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交流及中国天主教基础之奠定,实始于利玛窦之来华。"而利玛窦之活动则实始于澳门,他是在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到澳门的。到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四百年。中外人士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之重要意义,越来越加以肯定,研究之风越来越盛。在这样一个时机,在澳门这样一个地方,出版陈炎教授研究文化交流的专著,其意义不是非常耐

人寻思的吗?

是为序。

1993年2月19日凌晨

《周林文集》序

周林同志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在解放前后，都担任过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为人民立了功。一直到比较晚的时候，他才被调到教育部和几所大学担任领导。他以老同志特有的热情和开阔的心胸，加以多年积累的领导艺术，胜任愉快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从而在教育界，特别是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师生中，赢得了友谊和尊敬。在北京大学，一直到今天，他落实政策的果断和魄力，人们还没有忘记。

周林同志从行政第一线上退下来之后，仍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副组长，兼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不特此也。周林同志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还给予了全力的支持。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倡导和支持，这个前所未有的相当重要的学会是成立不起来的。成立10年以来，学会做了一些工作，团结了全国的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学者，也团结了不少国外的同行。在这一门被认为是国际上"显学"的学问中，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我们研究成绩没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学会成立以后，由于全体中国同行们的努力，也由于得到了我们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我们用自己的成绩，改变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学术讲坛上树立了我们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形象。最重要的是，我们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年轻的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更使我们看到这

门学科的辉煌的未来。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周林同志所起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决不会忘记。

现在,周林同志的《文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周林同志在《自序》中非常谦虚地说:"很少大块文章"、"较少学术性论述"。我个人并不反对大块文章。但是,我认为,文章的真正价值决不在块头的大小,而在内容如何。现在确有一些大块文章,但是只要稍稍一挤,把其中的水份挤出,便现出干瘪相。至于"学术性论述",我当然决不反对。关键是怎样理解"学术性"这个词儿。探讨一个问题,经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最后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这样的"学术性",我们当然提倡。然而,倘若用高屋建瓴的眼光,综观全局,然后为一门学术指出方向,指出道路,这难道不是更高一层的"学术性"吗?我觉得,周林同志的一些文章或者讲话,起的就正是这样的作用。我这个意见相信会得到学术界公认的。

蒙周林同志垂青,要我写一篇序。尽管我内心里感到有点诚惶诚恐,但我还是立刻就答应了下来。因为,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同时我还可以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学术界一些同志的共同的心声:感谢周林同志过去和现在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将来也能得到他的支持。

1993年4月19日

《世界散文精华》序

自从有了文学史以来，散文就好像是受到了歧视。一般人谈论起文学类别来，也往往只谈诗歌、小说、戏剧这“老三样”。即使谈到散文，也令人有“敬陪末座”之感。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然而有其原因。

一般讲到散文的应用，不外抒情与叙事两端。抒情接近诗歌，而叙事则邻近小说。散文于是就成了动物中的蝙蝠，亦鸟亦兽，非鸟非兽。在文学大家庭中，仿佛成了童养媳，难乎其为文矣。

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散文的真精神在于真实。抒情要真挚动人而又不弄玄虚；叙事不容虚构而又要有文采，有神韵。可是有一些人往往是为了消遣而读书。文学作品真实与否，在所不计。即使是胡编乱侃，只要情节动人，能触他们灵魂深处的某一个并不高明的部位，使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也并不高明的快感，不用费脑筋，而又能获得他们认为的精神享受，在工作之余，在飞机上，在火车中，一卷在手，其乐融融，阅毕丢掉，四大皆空。

散文担当不了这个差使。于是受到歧视。

倘若把文学分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话，散文接近阳春白雪。真要欣赏散文，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艺术修养。虽然用不着焚香静坐，也要有一定的环境。车上，机上，厕上，不是适宜的环境。

你是不是想把散文重新塞进象牙之塔，使它成为小摆设，脱离广大的群众呢？敬谨答曰：否。我只是想说，文学作品都要能给读

者一点美感享受。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意义。但是，美感享受在层次上是不尽相同的。散文给予的美感享受应该说是比较高级的美感享受，是真正的美感享受。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洗涤人的灵魂。像古希腊的悲剧，它能使人"净化"；但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净化。

写到这里，我必须谈一谈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身边琐事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到近现代，最能感动人的散文往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即以本书而论，入选的中国散文中有《陈情表》、《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别赋》、《三峡》、《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祭十二郎文》、《陋室铭》、《钴鉧潭西小丘记》、《醉翁亭记》、《秋声赋》、《前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宋以前的散文名篇，哪一篇不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又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只有真实地写真实的身边琐事，才能真正拨动千千万万平常人的心弦，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宇宙大事，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当然能震撼人心。然而写这些东西，如果掌握不好，往往容易流于假、大、空、废"四话"。四话一出，真情必隐，又焉能期望这样的文章能感动人呢？

在这一点上，外国的散文也同中国一样。只要读一读本书中所选的外国作家的散文，就能够一目了然，身边琐事和个人一点见景生情而萌生的小小的感触，在这些散文中也占重要的地位，我就不再细谈了。

谈到外国散文，我想讲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那几个文化大国中，文学创作都是非常繁荣昌盛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都比较平衡。一谈到散文，则不尽如此。有的国家散文创作异常发达，有的国家则比较差，其间的差距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比如，英国是散文大国，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这里

的散文大家灿若列星，一举就能举出一连串的光辉的名字。法国次之，而德国则几乎找不出一个专以散文名家的大家。原因何在呢？实在值得人们仔细思考而且探讨。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的一位教授。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我读了一些，也觉得确实不错。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娓娓而谈，妙趣横生，真不禁神往。愧我愚鲁，感觉迟钝，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憬然顿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中间有好散文，在“史”和“子”中，绝妙的散文就更多。在“集”中，除了诗歌以外，几乎都是散文。因此，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以及从历史上悠久上来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事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管齐下，各有独特的成绩。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哪一方面成就最大？言人人殊，不足为怪。我不讨论这个论争。但是有人说，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我不评论这个看法的是非曲直；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很有启发性的。专就形式而论，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哪里有一点《三国》、《水浒传》、《红楼梦》和唐代传奇、《今古奇观》、《聊斋》等的影子？它们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戏剧，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从形式上来看，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我不反对“西化”，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至于散文，则很难说它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它基本是中国的。我个人认为，这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难道还

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

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率意而行,一片天机,挥洒自如,如天马行空。何等潇洒!何等自如!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如果不是英雄欺人,就是完全外行。现在确实有些散文确实"散"了,但是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这样的东西也居然堂皇然刊登在杂志上,我极不理解。听说,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灵感忽然飞来,于是拿起电话,自己口述,对方的秘书笔录,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这是否是事实,我不敢说。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一些散文大家,一些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又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的情况下,千锤百炼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散文和世界散文的一点肤浅的看法。我自己当然认为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写出来。至于究竟如何,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了。

因为自己不在坛上,对文坛上的情况不甚了了。风闻现在散文又走俏了。逖听之下,不禁狂喜,受了多年歧视的散文,现在忽然否极泰来,焉得不喜!而读者也大概对那些秘闻逸事,小道新闻,政坛艺坛文坛上的明星们的韵事感到腻味了。这是读者水平提高的表现,我又焉得不喜!

在这样出书难卖书难的十分严峻的环境中,江苏文艺出版社竟毅然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散文精华。对于这样的眼光与魄力,任何人也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这篇序文本来是请冯至先生

写的。他是写这篇序文的最适宜的人选。可惜天不假年，序写未半，遽归道山。蒙编选同志和姚平垂青，让我来承担这个任务，完成君培先生未竟之业，自愧庸陋，既感光荣与惶恐；哲人其萎，又觉凄凉与寂寞。掷笔长叹，不禁悲从中来。

1993 年 5 月 5 日

《张侠画集》序

张侠同志把她离休后所作的画，收集成册，准备出一本画集，索序于我。我第一个想法是感到光荣。我这样一个至少是半个画盲者，竟能有机会"佛头着粪"，实出意料，因此十分感激她对我信任。但是，第二个想法就有点不妙。我不习惯于说谎，说句老实话，我有点担心。我曾在全国旅游胜地的许多堂皇豪华的大旅馆的走廊里，看到过不少的挂在那里的书法绘画，色彩鲜丽，笔墨飞舞，纸张洁白，装裱工整。描准的当然是"老外"或"老内"的钱包。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本来是未可厚非的。然而，只要一看字画本身，却不禁让人气短而且脸红：这样的字画怎么竟肯张挂出来待价而沽呢？联想到张侠同志的画，我不禁暗自思忖：会不会也是这一流的货色呢？

等到张侠同志亲临寒舍，把原画的照片拿给我看的时候，我稍一翻看，就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画同我想象的是多么不相同啊！我暗自谴责，我是窗板子里看人，把人看扁了。难道这也是一种"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表现吗？

张侠同志的画表现了她是一个多面手。山水画、人物画、花鸟虫鱼画，无不具备，而又无不精妙。气韵生动，妙趣天成，笔墨挥洒自如，布局时见匠心，是中国的传统，但又不落俗套。一个毕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离休晚年，竟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内心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自己深知，像我这样一个半外行的意见，不见得会有多大分

量。但是，我自己虽然没有画过画，对画家一向是羡慕的，而且古今中外的名画，我在国内外确实看过不少。说我审美水平很高，当然是过分夸大；但倘说我一点水平没有，也不是实事求是之辞。绕了这样多弯子，我无非是想说，我对自己的审美水平还是有点信心的。再退一步说，即使我的审美水平不够高，以中国之大，世界之大，人才之盛，文风之烈，内行里手，到处都有，难道他们也不能给张侠同志的绘画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吗？跂予望之矣。

我怀着这种愉快而又期望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3年5月24日

《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序

在中国,规模比较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是无论谁都必须承认的。

在这40多年中,我逐渐观察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以综合大学外语系科和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为主;一个"阵营"是以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教外国文学的中文系的教师为主。前者通外国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一般较差;后者许多人不懂外国语言(如教东方文学的大都不懂除日语外的有关国家的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较高,汉语水平也较高。两个"阵营"的优缺点,正好能互相补充。虽然是两个"阵营",但决无互相轻视之意,而是互相尊重,切磋琢磨。40多年以来,有时候在一起开会,更多的时候是分开来开会。有时候联合写书,更多的时候是分开来写。我在上面提到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个人认为,这成就来自两大"阵营"共同的努力,不能有别的解释。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能够举出一些若干例子,说明两个"阵营"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否认,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两个"阵营"的划分是颇为明显的。

而且"阵营"的形成,也有其客观原因。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地来看这个问题,其形成原因并不复杂。大学和学院的中文系规定必须讲授外国文学,本系教员又必须承担。他们多半是念"子

曰"、"诗云"出身，蟹行文字有点隔膜。于是只好依靠翻译，又济之以自己的汉文水平，再努力学习文艺理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其成就就极为可观了。

在另一方面，大学外语系的教员，有关国家的语言文字是精通的；但文艺理论和汉语水平决不能一蹴而就。在这方面，相形之下，就稍逊于中文系的同行们。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环境造成的，教员个人不能负多大责任。幸而，至少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两个"阵营"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精诚团结，不分彼此，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新中国的学术贡献了力量。

现在，由陶德臻、张朝柯、何乃英、郑忠信等同志主编的《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出版了。他们四位都是属于第二个"阵营"的。但是，一看书中的作者，却是两个"阵营"的学者都有。这就充分表现了我上面说的那一种合作的精神。因此，至少对我来说，书的质量也就有了保证。我热烈祝贺这一部辞典的出版。

这一部大书虽然名之曰"辞典"，实际上却与一般的辞典不同。一般的辞典条目多，条目短，有时候短到几十个字，查阅起来，只能给人一点一般的概念。但是这一部辞典却不一样。书中以作品为单位，每一部书一个词条，词条的平均长度为四五千字。这样一来，每一个词条都等于是一篇不太短的论文，文中条分缕析，阐述详尽，读者对每一部东方文学名著所需要的了解，文中应有尽有。这实际上成了一部论文集，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辞典"。我热烈祝贺这样一部辞典的出版。

当今之世，出书之难尽人皆知之矣。东方文学又不是一个热门学科。出版这样的书实有悖"向钱看"的时代潮流。没有一点"呆气"是不肯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也决不肯出这样的书的。然而，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历来维护文化命脉的往往是一群"呆子"。"呆

子"是我们文化的寄托者,是我们文化的中流砥柱。因此,我应该更加热烈地祝贺这一部辞典的出版。

是为序。

1993年5月25日

《人学大辞典》序

人类从其余的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以后，真不愧“万物之灵”这一头衔。他们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了今天，他们创造出来的文明，光辉灿烂。大之能登上月球，进入宇宙；小之能深入原子，穷极微藐。其他动物而有知，必定会甘拜下风的。人类在有意无意之间，自命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气焰万丈，不可一世了。

然而，夷考其实，却不禁令人气短。他们有点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一个筋斗能跳十万八千里，神通真可谓广大矣。可是一旦被如来佛抓入手中，他在连翻无数的筋斗，自以为已经到了天地尽头，在五根大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来以后，才知道并没有跳出如来的手心。

这如来的手掌，对人类来说，不是别的什么奇特的东西，而就是人类本身。

但凡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会承认，我们对于自己这一架看似微末，人人都有的躯体，了解得实在少得可怜了。这样一个“人”，不管是它的自然属性，还是它的社会属性，我们都所知不多。在自然方面，我们对自己的躯体确已有所了解。对人体的骨骼，甚至对骨头的数目，我们都能了解。对脉络，甚至对血液流动的规律，我们都能掌握。然而一进入神经领域，我们就捉襟见肘。这光靠解剖刀是无能为力的。即使被解剖的是活的；但是，解剖刀一下，立即变为死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医生和生理学家，也只有望刀兴

叹了。至于人体特异功能,虽然不能说得过于神乎其神,但它的存在却不容否认。为什么会有这种特异功能呢?至今还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社会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组织结构等等,在过去的五六千年的历史上,我们人类都能逐渐有所了解,逐渐处理了解决了一些。但是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改朝换代。到了今天,就促成了全球大震荡,几乎有一个民族就要形成一个国家。其根源究竟何在呢?我们能说都清楚吗?

在自然与社会的范畴之外,也许是就在这个范畴之中,还有一个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没有能够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口口声声要"征服自然"。大自然是不会说话的,孔老夫子说:"天何言哉!"指的就是这样情况。但是,一旦过分触犯了它,它的惩罚却是十分严峻十分可怕的。到了今天的20世纪末,许多冷酷的事实已经出现在人类面前。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人口爆炸,大气污染,酸雨飞扬,臭氧层被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新疾病产生,等等。哪一项解决不好,都能使人类活不下去。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全世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这一点。但是大多数人还在懵懵懂懂中,包括一些有权势者,他们还在"错把杭州当汴州",真令人不寒而栗。

鲁迅先生认为,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类何独不然?但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要做到这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是要经过努力拼搏的。至于本书"前言"中所说的"推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诚属必要,但这却只是最起码的要求,只是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起点。我个人认为,要想完全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正确解决我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之间的问题。第一个是人的自然属

性，第二个是人的社会属性，第三个兼及前二者。这三个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人”。我们必须把“人”弄清楚，而“人学”尚矣。

顾名思义，本词典就是探究“人学”的词典。它包容的是“哲学人学”，汇总古今中外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在哲学的高度上关于人的各种观点和理论。我相信，这些观点和理论代表着东西方最高水平的智慧，对我们会有极大的启发。因此，我们应当对两位编者表示我们的谢意和敬意。

但是，我还想画蛇添足，再罗嗦上几句。我们决不能就以此为满足，我们还必须以此为起点，向前迈进。“人学”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科学，要想认真解决我在上面提出的三大问题，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这一门学问牵涉到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志于“人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通力协作，方能有成。

我希望我这些话不是空话，不是废话。是为序。

1993年5月29日

《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序

《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从那以后，"尊师重道"这句话，就广泛流行于神州大地。这也确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方面，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

先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六纪"中之一纪即为师长。可见尊师也属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决不可等闲视之。

我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尊重师长。然而同中国比较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迥乎不侔矣。因此，谁要是想找一个尊师重道的大国，他必须到中国来。

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到了十年空前浩劫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拨乱反正以后，虽有所恢复，然而已非昔比了。好学深思之士，关心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前途，惄然忧之。

现在，童宗盛先生编选了这一部《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这虽然只能说是尊师重道的一个方面，然而其意义是决不能低估的。如果我说，童宗盛先生是颇有一点"挽狂澜于既倒"的劲头的，这恐怕决非过誉吧。我相信，全国有识之士，承认尊师重道的必要性的人，关心中华文化教育发展的人，志在弘扬中华

优秀文化的人，会欢迎这一部书的。因此，我怀着愉快而又渴望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3年6月30日

《玉华宫》序

胡戟同志等编《玉华宫》既竟，索序于予。我对于玉华宫了解不多，踟蹰不敢应命。我虽不文，学殖贫瘠，但自问为人写序向不肯只说空话、废话，这一次也不甘例外。不敢应命的根源就在这里。但是，经过胡戟同志再三说明，小友荣新江又从旁敦促，同时还读了一点资料，觉得还是有话可说的。最重要的写作动力来自唐代高僧玄奘。这一位大师为我素所景仰，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我曾伙同一些学者做过详细的注释。既然玉华宫同玄奘有密切联系，我怎么能拒绝写序呢？

玉华宫，原来是唐初诸帝避暑的地方。玄奘于太宗贞观十九年(645 年)由天竺回国，先住弘福寺。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太宗驾幸玉华宫，敕追奘法师。这一次只是一次短暂的停留。到了高宗显庆五年(660 年)，“法师以为在京多务，恐难卒了(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翻译王作)，于是屡请居山，方蒙恩许，往玉花宫寺翻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50，218c)从此以后，一直到涅槃，玄奘就住在玉华宫。

玄奘晚年，一些很有趣味的事情(对我们俗人来说)就都发生在玉华宫。比如，“法师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及游西方，又闻无著菩萨兄弟，亦愿生睹史多天宫，奉事弥勒，并得如愿，俱有证验，益增克励。自至玉花，每因翻译及礼忏之际，恒发愿上生睹史多天，见弥勒佛。”(见上书卷，219a)从这里可以看出玄奘晚年住玉华宫的信仰。又比如，在法师临终前，他仍坚信自己能上生弥勒佛

所在的睹史多天。到了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法师六十五岁,法师摔伤了脚,卧病。是年二月"五日中夜,弟子光等又问:'和上定生弥勒前不?'报云:'决定得生'。言讫舍命"。(同上书卷,219c)。《行状》上记载玄奘住玉华宫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不一定都是宗教信徒,书上的记载我们不见得都能相信,但是,玄奘这个人,除了虔诚的佛教徒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品质中最优秀最突出的一点:硬骨头精神。他敢于排除万难,九死一生,到天竺去求佛法。没有迥异常人的精神,是办不到的。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中就有玄奘。到了今天,虽然朝代已经换过多次,时移世迁,沧海桑田。但是这种硬骨头精神还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我们还能够从玄奘身上学习很多很有用的东西。

玉华宫所牵涉到的当然不止玄奘一人,也还同唐初几个皇帝有联系。从这些皇帝身上,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还是能够学到点什么的,比如唐太宗的为政清明,逆耳之言能够听得进去,等等,对我们今天不是还有借鉴意义吗?

此外,玉华宫这个地方,在我们赤县神州,是山明水秀,属于"江山如此多娇"这个范畴的名山胜地,是大自然独垂青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表现。由于它的历史意义和自然风光,在唐代就吸引了一批著名的诗人到这里来流连忘返,诗圣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诗人留下的诗篇,无疑会给这个地方增添无量朦胧的美。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玉华宫是一处集高僧、皇帝、诗人、秀丽风光于一身的四位一体的名胜古迹。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在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我们国家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对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起点作用呢?这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古为今用"吧。我想,胡戟同志等之所以编撰这一部《玉华宫》正是出于这样的用意的。因此,我乐于为这一部书写

这样一篇短序。

1993年7月3日

《清代海外竹枝词》序

竹枝词，作为乐府曲名，虽然起源于唐代。但是，我总怀疑，它是源远流长的。它同许多中国文学形式一样，最初流行于民间，后来逐渐为文人学士所采用。而对竹枝词来说，这个民间可能就是四川东部巴渝一带地区。唐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有一次他来到建平（今四川巫山县），听到了民间的儿歌，受到启发，写了《竹枝》九篇。每首七言四句，绝类七言绝句，但不甚讲平仄，押韵也较灵活。当时白居易也有《竹枝》之作。

刘禹锡在《引》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刘禹锡并无意把《竹枝》的产生地带同《九歌》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这是可以联系的。中国古代荆楚一带文化昌盛，几年前发掘出来的编钟震动了世界，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巴、渝地邻荆楚，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祭神仪式和乐章，容或有相通之处。

从歌词内容上来看，也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来。中国古代南方荆楚一带的诗歌，比如《楚辞》，意象生动，幻想联翩。勉强打一个比方，可以说是颇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气息，同北方以《诗经》为代表的朝廷或民间的诗歌迥异其趣，这种诗词威仪俨然，接近古典主义。竹枝词在情趣方面比较接近《楚辞·九歌》等荆楚文学作品。

根据上面这些考虑，我就怀疑竹枝词是源远流长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竹枝》或《竹枝词》命名的文学作品不是太多。这方面的专著或论文数量也极少。我个人觉得，这似乎是

一个小小的憾事。

王慎之先生是一个有心人,多少年来就从事竹枝词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已有专著出版,享誉士林。现在她又搜集了外国竹枝词,包括了东西方很多国家。作者不一定都曾身履其境,但竹枝词中所描绘的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情趣,却几乎都是生动活泼,栩栩如身历。这会受到士林,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同行们的热烈欢迎,是完全可以预卜的。我向她祝贺。

外国竹枝词,同中国竹枝词一样,作为一个文学品种,非常值得重视。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较之中国竹枝词,外国竹枝词还有更值得珍惜的一面。几年前,我写《中印文化交流史》时,曾利用过清尤侗的《外国竹枝词》中有关印度的那几首。把古里、柯枝、大葛兰、榜葛剌那几首都引用到书里,给平庸单调的叙述凭空增添了不少的韵味。我相信,留心中印友好关系的读者,读了这几首竹枝词以后,也会感到情致嫣然,从而增加了对印度人民的理解与感情。其他国家可以依此类推。由此看来,这些外国竹枝词的意义就不限于文学方面,其政治意义也颇值得重视了。

我向王慎之先生祝贺,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

1993年7月4日

《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序

孟加拉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建国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但是一旦建国，立即同我国凝成了深厚友谊，往来频繁；不管国际上多么多变，波谲云诡，中孟关系始终友好。这是十分难得的，我们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

再转回若干年回到历史中去，中国同孟加拉地区的友好往来，更为频繁。我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时，曾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明初中国对外活动的高潮时期中国几部涉外的书籍，比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等里面对孟加拉（榜葛剌）的记载独详？我的解释是，当时的榜葛剌地区是南亚次大陆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的地方。这种情况还延续了下来，到了后代孟加拉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诗人、作家、艺术家、改革家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非其他地区所能及。

尽管还有困难，今天的孟加拉国正继承着这个优秀的文化和经济传统，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她也继承了历史上的中孟友好关系，珍视这种历久不衰的传统友谊。我们中国人民和政府也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这一位可靠的、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尽上我们的力量，加深这个传统友谊，使之与日俱新，万古常青。

可是我们也遇到了困难：我国人民尽管渴望了解孟加拉国，由于缺少这方面的书籍，却无从了解起。这应该说是一件大憾事。

现在谢福苓、林良光等同志编的《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出版了，这一件憾事可以说是得到了圆满的弥补。这几位同志长期从

事孟加拉国的研究,勤勤恳恳,兀兀穷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对这些资料作了细致的分析,结果写成了这一部书。过去他们已经发表过一些论文,得到了同行学者的好评。此书也必将受到普遍的欢迎,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一部书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民对孟加拉国的了解,增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乐意为之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3年8月1日

《谢华朱健龙绘画合集》序

我一不能书，二不能画。但是，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我曾在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美术馆或博物馆中，在私人收藏家的书斋中，看过许多古今名画，潜移默化，养成了一点品画的能力，还颇有点自信。

我认为，品评中国国画不出两途：探究布局结构，品评笔墨气韵。前者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画，后者只适用中国国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些画，比如宋朝画院里的花鸟画，还有清朝四王的山水画，布局结构比较平板，但仍不失为杰作，主要原因就在笔墨气韵之中。这个看法恐怕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谢华先生的山水画和朱继龙先生的花鸟画，我不能不认为，他们的画在布局结构方面不落俗套，时有新意，而在笔墨气韵方面又生动流畅，有些地方大气磅礴，淋漓尽致，墨韵直扑人眉宇。结构与笔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我们现在常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因为这句话提得正确，提得及时，它已成为全体炎黄子孙的共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表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其中我们的国画必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无人能否认的。因此，我们今天提倡国画，决不能就画论画，而应该把眼光放远放宽，应该从弘扬民族文化这个水平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现在再回到谢朱两位先生的国画上，他们的成就的意义决不是雕虫小技，这一点已经是非常明确，用不着再多费话了。

谢华先生和朱继龙先生都是山东临清人。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临清为南北交通枢纽,历史上文化名城。在新时期,这个光荣传统还有待于继承和发扬。他们二位都还年轻,在艺术创作上,正是如日中天之时。我这个年届耄耋的乡人,衷心希望他们戒骄戒躁,不断进步,为临清争光,为山东争光,为中国争光。在他们的绘画合集出版之际,写了这一篇短序,寄托我的希望。

1993年9月1日于北京大学

《雪庐诗稿》序言

余向不能诗，但阅读既多，自谓稍能解诗。至于知人论事，则“世故老人”如不佞者，殊不敢妄自菲薄矣。

而立之年，余负笈欧陆十年余。归国后滥竽北大教席垂五十年。其间曾漫游亚、非、欧三十余国。见闻颇广，阅人亦多。又历经国内各种运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对世态之炎凉与夫人物之心态，自谓已能洞察幽微，如烛毁犀，知人之明，油然而生。直至今日，已届耄耋之年。宋词“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他阶前点滴到天明”。此种境界过去望之如蓬莱仙山，而今视之，则宛在眼前。此心已作沾泥之絮，不逐东风历乱飞矣。

然而数年前，经刘月莲女士及黄晓峰先生之介绍，在京得识梁雪予老先生，蔼然仁者，即之也温。借用小说套语，真乃“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不意人世间竟尚有高人如雪翁者。得识此翁，即称之为不虚此生，亦不为过也。

先生之诗，虽阅读再三，殊不敢赞一辞。《雪庐诗稿》，因在澳门出版，内陆流传颇少，可谓一大憾事。古人论人，多以道德文章并举。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先生之高风亮节，彰彰在人耳目。独先生之文章殊尚隐而不彰，我辈知先生者，决不应任其如此。顷接月莲电告，大陆将出版《雪庐诗稿》。如此，则先生之道德文章皆能大昭于天下，乐何如之！故喜而为之序。

1993年9月10日

《文学语言概论》序

李润新同志要我给他的新著《文学语言概论》写一篇序。最近，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忙乱时期，身上负的各种各样的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文债、信债、会债、咨询债、顾问债、座谈会债、招待会债、送往迎来债、采访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有时候烦上心头，简直想“出家”，以了尘缘。因此，润新的要求，我本来想加以拒绝的。但是，一读到他的来信，看到他的书稿，我立即改变了主意，不但要写，而且立即就摆脱众债拿起笔来。难道他的信和书就能有这样大的神力吗？不完全是。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实获我心。我早就像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现在就借机来吐一下。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散文大国。这是天下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的私见。事实具在，勿庸论辩。从文学语言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散文丰富多采，灿如百花。所谓文学语言，内容极为丰富，但是，以我浅见，不出两途：一是修辞，二是风格，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又截然可分。二者相较，风格尤重于修辞。修辞，一两句内就可以看出，而风格则必须综览全篇，甚至若干篇，才能够显现。总之，写文章，必须重视修辞，而风格更要重视。

太远太大的例子不必举了。仅就唐宋八大家而论，从风格上来看，在唐代，韩是韩，柳是柳，明眼人一看便知，决不会混淆。在宋代，欧是欧，苏是苏，王是王，曾是曾，泾渭分明，也决不会混淆。甚至在三苏之中，也自有不同。降而至于明清，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风格清新、险怪。归有光虽接近清代桐城派，细视之，也决不

雷同。至于桐城派中，方、刘也有区别。清末的散文家龚自珍，更有独特的风格，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

五四运动以还，文言改为白话，文字工具虽变，但风格之差异，在一些大家笔下，仍然能够区分。鲁迅无论矣。即以茅盾、巴金、老舍等而论，也各自有各自的文风，决不雷同。他们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

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论文多以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准绳，这本来是未可厚非的。标准的说法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实则思想性霸占了垄断地位，艺术性只成了一句空话。至于什么叫思想性，真正的思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姑不细论。谁要是一强调艺术性，现成的帽子就会落到你的头上。结果是谈虎色变。大家写评论文章，甚至撰写中国文学史，大都是高谈阔论他们所谓的思想性，而对一个作家或一篇文章的艺术性，则只是倒三不着两地、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空洞的话，应景而已。

产生的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不，应该说，有的人熟视无睹，中国过去的悠久的优秀的散文传统，被忽视，甚至被抛弃了。在今天散文坛上（如果有这样一个坛的话），风起云涌，新的著作层出不穷。专门刊登散文的刊物，也颇有几家。看上去煞是热闹。然而夷考其实，则不禁令人气馁。从修辞和风格两个方面来看，今天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我称之为“搔头弄姿派”。这一派刻意雕琢，在修辞上死下工夫，“语不惊人死不休”。上焉者也还能够写出几篇打扮得漂漂亮亮如七宝楼台一样的文章。下焉者则不知所云。如果认为我夸大其词，我不妨顺手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很有水平的很受到欢迎的大型的散文刊物上，有一篇叫《外婆与月亮》的文章。开头两句是：“故乡独在遥远，我亦独在遥远。”接下去，类似的词句颇多。我再引上几句：“爱与恨这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最早我便源于外婆的‘土炕文化’，善良的仙姑善良的老狐善

良的月光……"。第一个例子让人似懂非懂，第二个例子懂是懂得的，然而语法却怎样也无法分析。现在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倡"模糊语言学"；但是，那里的"模糊"是非常有道理的。这篇文章的"模糊"，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出道理来。这篇文章决不能独擅专利，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这样的文章我称之为"搔头弄姿"派，难道还能算是刻薄算是过分吗？

另一大流派我称之为"松松散散派"。有人主张，散文的真髓就在一个"散"字上。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完全是大白话，一无修饰，本色天成。这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有一些作家是这样的。在诗歌方面，陶渊明和白居易的诗是有名的例子。宋代苏东坡的一些散文随笔，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但是这些诗文，貌似平淡，实则并不平淡。你越读越有味，有似吃橄榄，食之平淡，而回味无穷。这种平淡的文体是经过长期修养与磨练，又济之以个人的天赋，返朴归真，才能够形成的。如果率尔操笔，则凡能说大白话又稍能识几个字的中国人，都可以成为散文家，散文文坛岂非要广被神州吗？

可惜得很，在当前中国的文坛上，确有不少的散文家可以归入这一派。他们的文章涵义并不深远，造词遣句又有时欠考究。生造的词儿和不通的语法，时有所见。这样的文章确不雕琢，读起来也明白易懂。作为公牍文书，新闻记录，未始不是好文字。然而说它们是文学，则不佞期期以为不可。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近四五十年以来文学只重视所谓思想性，而根本抹煞了艺术性。流毒所及就造成了这种情况。以中国这样一个散文大国，有这样悠久辉煌的历史传统，到了今天，竟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实在不能不让人担忧，让人惋惜。

我最近经常考虑的就是这些问题。李润新同志也考虑到了这个现象，所以号召人们重视文学语言，重视文学的风格。我们"心

有灵犀一点通”,所以我说“实获我心”。我就利用写序的机会,把我的看法写了出来。至于《文学语言概论》本身,体大精思,理论多是从实践中抽绎出来的。明眼读者自能鉴赏,用不着我多来费话了。是为序。

1993年9月11日

《东方文学史》序

1987年,我们出版了一部《简明东方文学史》,参加撰写者都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当时尚称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东方各国文学的同仁们。既然称之为"简明",则必尚有不简明者在。事实正是如此。那一部书出版以后,我们立即扩大撰稿者的范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单位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着手撰写《东方文学史》。这一部书的规模较《简明东方文学史》要大得多,材料要丰富得多,人力的投入也大得多。几易寒暑,历时五年,终于撰成。原计划100万字,实际结果则是120万字。我们相戒不使用或者少使用第二手资料,资料基本上都采自原著。其中甘苦,内行人都是能理解的。我们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间产生问题,解决问题;产生矛盾,化解矛盾。有时真如山重水复,但又终于柳暗花明。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恕我不避老王卖瓜之嫌,称此书为空前的巨著。它实际上表现了我国东方文学界在过去四五年中努力研习东方各国文学的水平。

我曾为《简明东方文学史》写过一篇篇幅颇长的"绪论",写成于1986年3月。在那里面,我阐明了我对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看法,主要讲了东西文化的异同问题,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发展阶段问题和文化交流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年。我默自省念,以我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这些看法还是能站得住的,至少是能自圆其说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我还不想做什么改变。

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

但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既然已经过去了七年，我虽然年迈，但是还不太糊涂，而且我从来也没有让自己的脑筋倚老卖老，停止运转，因此，在认识方面也有了一些提高，把原来的想法发展了，使之深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现在写这一篇序，就不再重复讲在《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中讲过的话，只把我自谓的新发展简略地谈一谈，窃比于古之乡人献芹，野叟献曝，供大家参考。

开宗明义，开门见山，我先讲上一句：我的新发展就在于，我对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对世界未来的文化，对人类的未来所起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兹事体大。最近几年来，我曾多方思考，殚精竭虑，写过许多篇长长短短的文章，在国内外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在多次被采访时，我都曾提到了我的新看法。内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只能讲一个大体的轮廓。简而言之，我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其根本差异之根源就在于思维模式。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合二而一”。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一分为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模式制约下，近几百年以来，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辉煌的成就。不但对大自然的了解更细致了，更深入了；而且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直至今日，世界各国人民无不蒙受其利，无远弗届。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必须承认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西方一些大国因此就自命为天之骄子，作威作福，狂妄蛮横，颇似当年的佛祖释迦牟尼，一降生，走了七步，大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们忘记了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世界上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当然也就从没有

一个永恒不变万世常存的文化。

骄纵的不可一世的西方人所得到是不是就是绝对真理了呢？当然不是。我先讲几个事实。自然科学是西方的杀手锏。然而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人们逐渐发现，有一些现象，西方的理论和实验都无法解释。在人类社会方面，西方人经常是“兄弟阋于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杀人成山，血流成河，自己还一个劲儿捉对儿厮杀。如果他们的文化真正是尽美尽善的话，这种兄弟间惨绝人寰的悲剧又怎样来解释呢？西方有识之士，尽管对自己的文化所产生的根本弊端认识还是肤浅的。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是有问题的。第一次大战后出版的施本格勒的《欧洲的沦亡》一书，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又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大战时间更长，死人更多，破坏更大，影响更坏。西方的有识之士再一次猛省。他们苦思苦虑，想寻求一条出路。然而出路在哪里呢？西方不亮东方亮。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向东方寻求智慧。于是《老子》、《庄子》在欧洲再一次风靡。又加上了《易经》、禅宗、大乘佛教等等。西方学子趋之如骛了。

西方所寻求的东方文化是什么样子呢？我在上面已经说到，东方文化的基础是合二而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表现在各个方面，最集中地表现在哲学上，而在哲学中又最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流行了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上。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儒释道中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宋代的大哲学家张载在他著的《西铭》中的两句话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最通俗易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人合一”思想一言以蔽之，讲的就是正确处理大自然(天)与人的关系的问题。处理天人关系，不出两途，一是对抗，一是和解或了解、理解。西方采取的是对抗，他们常说什么：征服自然，俨然以自然为敌人，压榨之，剥削之，蛮横地对大自然索求无已，短时间内人们确实过上了豪华的生活，但是他们无限度地挥

霍浪费大自然的资源，成为全体人类的阔少爷，败家子。结果怎样呢？全世界有目共睹：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淡水资源匮乏，新的疾病丛生，等等，等等。这些弊端中的任何一项，如果无力制止，都能够使人类无法活下去，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事实俱在，我决非危言耸听。这一点，西方有识之士中有的人已经看到了，然而却似乎束手无策，徒发哀鸣。

我认为，救之之道，就是努力宣传而且遵行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东方思维模式的综合性具体产生出来的。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东方也同样有这些弊端，一点也不比西方少呢？我觉得，东方虽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但是在当今世界大潮中，也被卷入奔腾澎湃的波涛中，不能自拔。对这些弊端有的人甚至视而不见，醉生梦死，灾祸当前而怡然懵然。这是多么危险多么可怕的事啊！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过七年，一个新世纪二十一世纪就要降临到人间。我们人类，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要深刻领会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还要见诸行动，共同来消灭上面说的那一些弊端和灾害，使全人类能够顺利生存下去。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许多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西方有识之士想向东方寻求的智慧，也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我决不是说，西方文化将要消灭，东方文化将代之而起代之而兴。这样说是绝对错误的。西方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文化决不会消失的，而是在同东方文化的融合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这种融合也决不会是对等的，平等的。它必然以东方文化为主，再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使人类文化再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一新纪元。

极其简略地说，我对在《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中所表达的思想的新认识，新发展，就是如此。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读我们撰写的这一部《东方文学史》，应当站在这个高度上。书中不管哪一个东方国家的文学，归根结蒂，都必然或多或少地表现东方文化的特点。

在撰写《东方文学史》的过程中，我虽然忝居主编之位，实际上，除了出点主意之外，没有做什么事情。主要工作都压到了刘安武教授和其他一些同志的肩上。如果说这一部书能有什么成就和贡献的话，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

1993年9月13日

《中国翻译词典》序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至迟到了东汉初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十九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各种学科几乎都有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象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

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地思考讨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做为一个代表。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

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到了点子上。我必须认真地予以答复。

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

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

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译组织,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书我是完全信任的。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种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

1993年10月11日凌晨

《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序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亚诸国与中国是近邻。我们同这些国家自古以来就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天文、历算等等方面的交流的关系。这种交流丰富了彼此的文化,推动了彼此社会的发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同南亚诸国都是老朋友,好朋友。

对老朋友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也包括政治和经济——,我们在历史上有过研究。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对这种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正史和杂史中许多关于南亚诸国的记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万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必然会碰到极大的甚至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一点,连有关国家的学者都是承认的。

可惜好景不长。自从明末清初欧风东渐,西方文化怒潮般地涌向亚洲,带来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一些坏东西,比如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者,也蜂拥而至。东方国家,南亚诸国当然也在其中,逐渐堕入水深火热的深渊,自顾不暇,对于邻国的研究与关心,随之而淡漠了。对东方各国的历史与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国,也陷入同样的悲惨,无复昔日之辉煌矣。

中国人民的解放带来了一个转折点。中国对东方国家,其中包括南亚诸国的研究,重新被重视了。北大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大大地加强了。在一段时期内,它成为北大全校最大的系。这同解放前门可罗雀、在八平方米的小屋内就可以召开全系大会的情景,

恍如天上人间了。这里当然也集中了一批学有成就的研究人才。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国家就无端瞎折腾起来，运动是一个接一个。再加上无数的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真正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止，成为天大的憾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天日重明。北大的东语系，连同中国的东方学，重新获得了新生。后来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创办了南亚研究所，集中了更多的研究人员，同国外兄弟机构也逐渐建立了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我们的研究人员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又是好景不长。由于一些原因，研究所分了家。归社会科学院编制的人员回到了社会科学院，其余的人都留在北大。虽然分了家，但是共同撒下的种子，仍然在各自的园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研究人员仍然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这一部《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的几位作者都是在合并时和分家后的南亚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这一部书是他们多年探讨研究的成果。他们勤勤恳恳，积累资料，态度认真，分析细致。这些优点都是我所深知的。因此，我相信，这一部书既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和实用价值，又有学术意义，是一部完全可以信赖的书。它对推进我国的南亚研究，加强中国人民和南亚诸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会起很大的作用。我乐意为这一部书写这篇序言。

1993年12月19日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论文中，在学术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都提到了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只要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试想，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说文化只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产品，即使不是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至少也含有民族歧视的因素，是与历史事实相违的。当人类初成人类时，当由狩猎者变为采集者时，为了生存，人类就会开始交流经验。哪一种动物能吃，好吃；哪一种植物能吃，好吃，这样的经验都需要交流。范围一扩大，组成了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交流，就成了逐渐扩大的文化交流的滥觞。这种交流，对人类的生存与繁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决不可缺少的。事实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吗？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交流的范围日益扩大。物质方面固然可以交流，精神方面何独不然？宗教信仰可以交流，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等的交流也屡见不鲜。至于哲学、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这些交流所起的作用，不管是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的，还是隐而不彰，难以感觉到的，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列举，用不着更多的例证。

到了今天，人类已经处在20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不多几年，一个新的世纪就将降临世间。全世界的民族，不管多么僻远，多么

落后，无不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甜头。苦头当然也是有的，甜头毕竟为主。但是，我个人深切感觉到，在全球的芸芸众生中，究竟有几个人意识到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呢？在这一方面，人们大都是浑浑噩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连文化交流这一个概念都完全是陌生的。

同世界历史上一些时代——也可以说是一切时代，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相比，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定，也谈不到友谊和团结。这种情况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再去描述。我在这里谈的是过去和现在。那么将来怎样呢？如果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去努力加以改变，则鉴古以知今，鉴今以知未来，人类在未来也不会得到安定，得到友谊，得到团结。

可是我偏偏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不管今天人类所处的境遇多么糟糕，也不管人间有多少是非，有朝一日——当然是在遥远渺茫的未来——人类终将共同跻入大同之域。至于用什么形式，那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步，决不能空等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人们必须努力，张皇人类中的安定与友谊，和平与稳定。这种张皇不是诉之于宗教信仰，而是诉之于理智，这里面包括思辨与行动。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让人们从切身的感受中了解到，人类是互相依存的，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浑然一体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其道多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必拘泥。但是，我总认为，其中有一条阳关大道，这就是撰写文化交流史。从中国来说，就是撰写中外文化交流史。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不必空讲大而空的道理，而读者自然就能油然产生友谊与感情，团结与安定从而出现。难道这还不算是一条阳关大道吗？

根据我这种肤浅的了解,我们这一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这一套丛书既有深切的学术意义,又有实用的现实意义,决非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

以上所论,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我虽是本丛书的主编,决不想强加于人。每一部的作者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至于材料翔实,立论谨严,实事求是,不尚炫耀,我相信每一位作者都能做到的,就不再罗嗦了。

是为序。

1993年12月20日

《中德关系辞典》序

无论是从历史的久暂来看，还是从文化背景的差异来看，中国和德国都是极为不同的国家。然而从文化交流的观点上来看，两国却又是极为亲密的伙伴。

这一方面的例证是非常多的，我现在极其简略地举上几个。从明末欧风东渐开始，欧洲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蜂拥而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东西当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德国在其中占有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反过来中国文化涌入欧洲，例证也极多极多，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影响的国家中有德国，也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康熙五十年(1711年)，无名氏将《好逑传》译为英文。此书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同艾克曼谈话时说到此书，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伦理道理发出了今天难以理解的赞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7世纪末叶，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勃尼兹(Leibniz)两位大哲学家在德国发动了启明运动。二人均受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的影响，可以说是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且又与中国思想有直接关系。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曾受到中国老子的影响。

从那以后，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时而明显，时而隐而不彰，但是始终未断，双方皆蒙受其利。这一点中德两国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彰彰在人耳目。这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对于增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德国人民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他们勤劳、勇敢,有智慧,多才能,而又淳朴,忠诚,一旦结成朋友,终生不渝。他们以"彻底性"(Gründlichkeit)闻名全球,治学谨严,一丝不苟。因此,虽然立国时间不算很悠久,却以文艺科技方面的成就彪炳环宇,在这方面至今还在全世界居于领导地位。

我说了这样多的高度赞誉的话,并非出自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是完全出自个人的体验。我曾在德国住过整整10年,先读书,后工作。我广泛接触了德国社会和德国人民。当时正是法西斯猖狂肆虐的时期。法西斯头子们歧视犹太人,大肆杀戮犹太人;同时也歧视蔑视所谓有色人种。德国人民一向以忠顺服从见称。被法西斯头子蒙蔽者滔滔皆是。中国人是有色人种,当时又是德、意、日轴心的敌人。就是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在漫长的10年中,我竟没碰到一次不愉快的情况,这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朋友、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房东,对我可以说是爱护备至。至今时已过,境已迁,回忆前尘往事,仍历历如在目前,我终身难忘。

上面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个人及国家,及世界,我国同德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世界长期的和平,为了人类长远目标的实现,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方面来看,还是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的。我希望,而且也相信,这种友好的关系会延续下去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互相学习,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携手共同去完成。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阳关大道,今后我们要走的路还会更宽敞,更平坦。我想,这是中德两国的学人以及两国人民的共同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连出版社出版了这一部由陈雪根等同志共同编纂的《中德关系辞典》，我焉能不欢欣鼓舞呢？有此一编在手，有关中德双方的各种情况，一目了然。它定能进一步提高双方的相互了解，增进双方的友谊，它预示着中德双方在互相学习方面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我乐意为此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4年1月16日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小引

工人出版社提出了出版一本我的翻译自选集的建议。我稍加考虑，就答应了。原因十分简单、明了：想让更多的读者读到我翻译的外国名著。现在出版界十分不景气，一本书往往只印两三千册。试问，在将近十二亿的人口中间，3000这个数字何等渺小！

这些书都是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翻译的。当时有当时的情况。译文中除了明显的错误或错排之外，其余的我一概不加改动，意在存真，给历史留下些真实的影子。有的作家到了老年拼命改动自己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文章。好像一个老年人想借助美容院之力把自己修饰得返老还童。我认为，此举不足取。连一些说明和介绍，我也概不改动，比如对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的介绍，就是如此。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苏联，确实存在着一个民主德国。我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是这样想的，我就如实地写了下来。到了今天，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为了存真，我一个字也不改动。我想把多少年前压在书中的几片红叶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它虽古旧，却鲜艳如新，这样带给大家一个清新活泼的旧梦，不也很有意思吗？如果我不这样做，而是任意改动原文，说不好听的就是意图掩盖历史真相，也为我所不取。

以上算是小引。

1994年1月18日

《海外博士文丛》序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文化交流重要性的问题。我认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人类社会今天是什么样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文化是怎样交流的呢？不出两途：一是拿来，一是送来。在古代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时大概只有三种人肯于敢于长途跋涉：商人、僧侣（宗教家）和外交官员（旅行家）。他们之中既有拿来者，也有送来者。今天所谓的"留学生"，就包括在这三类人之内。梁任公有一篇文章：《一千五百年前的留学生》，其中讲的"留学生"几乎都是佛教僧侣。这三类人之外，出远门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今天所谓"旅游"，当时是没有的。

到了近代，中国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最初是美国，以后又扩大到欧洲和日本等地。当时的中国似乎是大梦初觉，举国上下感到非向外国学习不行，即使是"船坚炮利"也罢，反正是要学习的。因此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拿来。外国送来的也有，比如外国传教士、官员和商人。中国留学生出国，一方面是拿来，这为主；也难免有送去的，这为次。总之，这样一来，文化就交流起来了。

到了今天，100 多年以来，中国究竟派出去了多少留学生，似乎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是留学生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在这里也要说上一句：如果没有这些留学生，中国今天会

是什么样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现在，我们正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对于建国来说，现在是空前有利的时机。我们国家的建设，对内来说，将影响子孙万代；对国际来说，将影响持久的和平，其意义极为重大，建好了就了不得，建不好就不得了。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对内要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对外要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现在世界在飞速变化，科学技术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和理论，不是日新月异，而是时新分异，如不抓紧，稍纵即逝。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打好国内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利用他山之石，来攻自己之玉。两方面齐头并进，庶几有成。

这个他山之石，既包括科技，也包括文化教育。只重视科技是一种短视现象，是十分危险的。环顾近代世界上一些国家，所谓大龙和小龙，无不是两方面都重视的，然后经济才能腾飞。只重视科技而能腾飞者，还没有先例。

现在再回头来谈留学生。留学生肩负着拿来的重任，任重而道远。他们之中有学习科技者，也有学习文化教育者。他们在国外学习的成果，多表现在博士论文上。总起来看，这些论文几乎都有崭新的内容。通过这些论文可以捕捉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决不容忽视，否则将失去不少向外国学习的好机会。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过去确有忽视海外学人博士论文的倾向。一般说起来，这些论文都不容易发表。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中，博士论文往往列为专项，单独收藏。每次我拉开博士论文的卡片柜，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有点感慨：论文中恐怕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可惜现在是明珠暗投了。

现在乐黛云教授编了这一套《海外博士文丛》，人民大学出版社慨然出版，这样一来，可能被暗投的明珠，现在有可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了，快何如之！乐黛云教授和人民大学出版社都应当受

到高度的赞扬。是为序。

1994年1月27日

《世界十大史诗画库》序

史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大家想必都还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者说中国没有史诗。一些中国学者也从而附和之。其中有西方人的偏见；但也有我们中国方面对自己的民族文学遗产了解得还不够这个原因。感谢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们，他们陆续发现了几部中国史诗，无论是从长度来看，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深刻来看，都不比西方的史诗逊色，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之。

史诗同神话有密切联系。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换句话说，史诗具有永恒的魅力。这里就有了问题。一些学者不是热衷于宣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如果这两句诗能成立，哪里能有什么“永恒的魅力”呢？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史诗都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至今仍以不同的形式流行于各自国家的民间，而且还传到国外去。这就是实践，它检验出来的真理是：史诗具有永恒的魅力。

文艺是有国界而又无国界的。在最初，文艺必须产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这就是有国界。但是，一旦产生，就必然流行与传播。越是好的文艺，流行就越广。坏的文艺则是蟪蛄不知春秋。好文艺流行的速度之快和地域之广是十分惊人的。长江、大河、高山、峻岭，浩瀚的大海、辽阔的沙漠，都阻挡不住。这就是无国界。

文艺为什么会能没有国界呢？从文化交流的规律来看，给予者所给予的东西必须对接受者有用，然后才能被接受。没有用的

东西，即使是暂时被接受，迟早会被扬弃的。好的文艺对给予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因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好的文艺能增强人的智慧，能陶冶人的性灵，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这样好的东西，不管它原来产生在什么地方，一旦产生，必然传出国界和民族的界限，被那里的人民所接受。

史诗显然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它在世界上，在人民间，在民族间的广泛流传可以为证。但是，史诗的原文，结构都非常繁复，词藻都非常堆砌，一般人欣赏起来，会有极大的困难。许多国家往往把史诗从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加以简化，然后才得以流传。

现在，吉林省摄影出版社，独具慧眼，把中外的十大史诗，用文字说明和图画并举的形式，编成了这一套《世界十大史诗画库》，主要是想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十大史诗中中国占了三部，这样就纠正了过去的偏颇，同时又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我相信，它必然会受到广泛的欢迎的，在欣慰之余，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4年2月6日

《敦煌吐鲁番学论集》序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裒集近年来写成的论文41篇，编成此集。命我作序，喜而应之。

只要看一看论文目录，立刻就能看出，这部论集是通力协作大联合的结果。首先是国际上敦煌吐鲁番学学者的大联合，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学者们的论文，集中都有。其次是中国国内大陆和港台学者的大联合，集中选有这三个地区的学者的论文。最后是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大联合，老至耄耋，青至而立，各个年岁层次的学者都有。即以执行编委而论，大陆和台湾都有人参加。谓之大联合，不亦可乎！

我个人曾在一些会议上和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论点：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颇得到国内外同行学人的首肯。这一次论文的裒集能够充分体现这种精神。窃以为为人类造福唯真理是务的学术本不应有什么国界。从年龄上来讲，也不应有什么“代沟”。国籍方面的大联合，年龄方面的大联合，是科学研究的最佳形式。这种形式最能推动学术探讨的前进，特别是在当今的世界新形势下，这是唯一合理的形式。那种划地为界，固步自封，秘藏资料，垄断成果的工作方式，早已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今后再也不应该出现了。

敦煌吐鲁番学的滥觞，至今已将百年。经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关学者们的努力钻研，成绩斐然，彰彰在人耳目。然而统观研究成果，已经解决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之间的比例，尚不能尽如人

意。在数量上后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前者。因此,全世界的同行们万不能高枕无忧,稍存懈怠之心。胡适之先生有两句诗:"既成过河卒子,只能勇往直前。"我们敦煌吐鲁番学界的同仁们,不管国籍如何,不管长幼如何,我们都已成了"过河卒子",义无反顾,只有勇往直前一条路了。

我相信,从事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的朋友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国内外的老中青的同行学者们,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意气风发,奋力向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有关的学会,研究队伍日益扩大,论文数量日益增多,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真令人欢欣鼓舞。即老朽如我者,亦颇有"老骥伏枥"之感,其他概可想见了。

国际合作,也大有起色。中英合作,中俄合作,出版敦煌卷子,已成事实。出版的书籍,无论从内容方面来看,还是从装帧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几乎是无懈可击,无可挑剔的。同其他国家的协作,也正在酝酿中。甚至出版吐鲁番(也就是新疆地区)的出土文献全集的巨大工程,也正在考虑中。从上面举出的这些简单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界,全世界的敦煌吐鲁番学界,都是春色满园,前途发展,正未可限量。

我还想进一步发挥一下。敦煌吐鲁番学是科学研究中的一门学科。但是,它的意义却决不仅仅限于学术领域。我上面说到的三个大联合,能促进国内外的友谊与了解,能促进大陆与港台间的友谊与了解,能促进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友谊与了解。而友谊与了解正是我们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当今之世,我们这个小小寰球并不安定,并不清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依然是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战火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蔓延,当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幸而我们的敦煌吐鲁番学界却是安定团结的,三个方面的大联合正在日益加强,仿佛在动荡的世界中形成了一片清净的乐土。

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我就是怀着这样欣慰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4年4月14日

《白凡逸志》汉译本序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我就仰慕金九先生的大名。当时我们中国正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我们两国人民同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受尽了灾难。《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有名的话：

>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我们还没有资格"相忘于江湖"。

由于所学的行当不同，我对韩国所知不多。我对于政治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自认为自幼爱国，不敢后人。我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敬佩其他被压迫国家的爱国志士。金九先生正是这样的志士中之佼佼者。尽管我对他的活动不甚了了；但是，同他有联系的安明根、李奉昌、尹奉吉等韩国爱国烈士，却是我所熟悉而且异常崇拜的。我对金九先生又焉得不尊敬而且崇拜呢？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到了中年竟同韩国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今天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当时我正任系主任，他之所以能进北大，我应该说是尽了力的。但因所学行当

不同,平时几乎没有往来。虽然同居一楼,而且是对门,长达十年之久,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由于大家都熟知的原因,他头上无形中戴着多顶政治帽子。今天回忆起来,我长时间内是东语系的当权派,差幸我在心里并没有把他打入另册,没有落井下石,这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我只觉得他为人狷介,还颇有点敬重之意。到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倒行逆施而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因此几乎把命赔上。杨通方教授处在那样极为不利的地位上,竟也仿佛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一样,挺身出来,静坐示威,反抗那一位名扬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我真感到极为吃惊,陡然产生了尊敬之感。我心里常常自己念叨:"杨通方这人极不简单,是一条硬骨头汉子,必须刮目相看!"

到了八十年代,又通过杨通方的关系认识了他的恩师,韩国大教育家,原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博士。金博士热情,淳朴、和蔼、真诚,从任何方面来衡量,他都达到东方的最高伦理道德的标准。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这种情况,在我的一生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承蒙金俊烨博士的邀请,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我就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和杨通方教授访问了韩国。由于金俊烨博士的妥善安排,我们在那里访问了许多大学,访问了韩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了古都庆州,结识了韩国爱国大企业家金宇中先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韩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韩国学者和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我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在垂暮之年,得此天外飞来的幸福,不虚此生矣。

从那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国立东方语专的情况,了解到了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的情况,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到韩语科任教的情况,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同杨通方教授的关系,了解到了金俊烨

博士本人的一些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了：在所有的这些情况的背后，赫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个人就是韩国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和领袖，中韩近代友谊长诚的缔造者，一代伟人的金九先生。

原来在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以后，金九先生高瞻远瞩，为了加强即将成为独立国家的祖国与中国的友谊联系，派人到东方语专新成立的韩语科任教，被派的人就是韩国临时政府的年轻成员金俊烨博士。韩国光复军李青天总司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闵弼镐团长（相当于韩国临时政府驻华大使，金俊烨先生岳父），都曾到东方语专，看望韩语科学生，并发表演讲。1948年，韩语科第一届学生毕业。金俊烨博士受金九主席之托，挑选了学习优秀的杨通方等四名学生，到韩国Seoul大学校文理科大学史学科留学。金九主席在私邸设宴为杨通方等接风，对他们备加勉励。1949年6月26日，韩国一代伟人白凡金九先生被暴徒枪击逝世。在吊唁期间，杨通方不顾当时险恶环境，亲往京桥庄灵堂吊唁，并庄重签名："Seoul大学校史学科中国留学生杨通方。"三十多年以后，经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漫长的阶段，金俊烨博士和杨通方教授师徒二人，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北大会面了。北大隆重授予金俊烨博士名誉教授称号，又创办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杨通方教授为主任。这一举继承了几千年的中韩传统友谊，另一方面又奠定了中韩两国教育学术界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千秋万岁的友好的基础。

金九先生、金俊烨博士和杨通方教授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最近我又读了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先生的一篇文章：《异国空军司令的中国情》。文中对中国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对金九先生的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加深了。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欣慰。

金信先生于1922年诞生在中国的上海,那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他父亲金九先生是政府首脑。但家中极贫。他祖母提出了要金九先生找一个职业糊口。但是金九先生以国事为重,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的大门!”简短一句话,掷地作金石声,爱国之心气贯长虹,真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今天读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没有这种精神,哪里能来韩国的独立呢?金信先生的哥哥患了肺结核。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病了的同志治病,自己的儿子也决不能享受特权。就这样,儿子终于去世。金九先生悲痛万分,然而他仍然把救国放在首位。只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才能“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金九先生于1929年,在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写了《白凡逸志》,目的是教育儿子。1947年,革命胜利了,又写了续篇。为了同外寇战斗,金九先生把金信派往中国空军学校,学习驾驶飞机,为光复做准备。金信先生青少年时受教育,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他曾在中大附中读过书,上过西南联大。他在中国有很多极为要好的朋友。他对中国,像其他在中国住过的韩国的革命志士(金俊烨博士就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一样,对中国怀着万分深厚真挚的情谊。他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到什么程度!

金信先生回国以后,担任过许多显要的职务,比如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韩国驻台湾大使,现任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的顾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那“半个祖国”的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近年以来,我每年都重返中国,重游故地,踏着父亲战斗的足迹,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履痕。”这可以说是对华深厚感情见诸行动的表现。

又一个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写这一篇序文的时候,我有幸亲自会见了金信先生,他正应邀到中国来访问,陪他到北大来的还有

父亲是韩国革命志士的李素心女士。我们晤谈了没有多久，金信先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这四个字正是我在上面谈到同金俊烨博士会面时使用过的。这么多的"一见如故"难道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友谊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反映吗？面对着金信将军，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多年景仰但始终没有能见面的他的尊人金九先生。站在我眼前的仿佛就是白凡金九先生本人。我对金九先生的尊敬与崇拜仿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我此时思绪万端，一下子回忆起来了北大东语系（现改为东方学系）韩语科（朝鲜语专业）走过来的道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为了加强中韩（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培养了一批韩（朝）语人材，他们正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许多领域内，发挥着良好的作用。现在我国驻韩国的大使就是其中之一。本书《金九传》的译者也是我们的毕业生。中国有一句俗话："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没有忘，而且永远也不会忘我们的掘井人金九先生、金俊烨先生等等一批南北韩的朋友们。杨通方教授和其他一些教员也没有辜负金九先生和金俊烨先生的重望，在培养学生工作中尽上了力量。金九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情况也会感到欣慰吧。我作为系的领导人也与有荣焉。

根据金信将军的介绍，他尊人的这一部《自传》在台湾出版过译本，在韩国也印刷过。但是宣德五和张明惠这一个译本所使用的材料，则超过过去的译本，不但全，而且还使用了金九先生的手稿，这个译本是最完善的本子。在译文方面，金信先生和许多韩国朋友，亲自把关，字斟句酌，务求准确、完美，译文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金信先生说，将来还要出英文译本，而英译本所依据的就正是现在这个汉译本，可见他对这个译本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的庄浦明先生慨然应允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装帧，把此书呈

献于读者之前。总之,通过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真所谓珠联璧合,不愧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壮举。此书定将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卜可知。

但是,此书之出版,其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出版界。从远一点来说,这是继承中韩长期传统友谊的具体体现。从近一点来说,这又是当前中韩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中国,目前全国人民正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真正的爱国主义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我们既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其他国家爱自己国家的仁人志士。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永远是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毫无疑问,金九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会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我在本文开头时,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现在,我国和韩国都早已取得了独立,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各自的国家。我们已经不是"处于陆"的鱼了,用不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了,我们已经是在江湖中,可以畅游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人,不是鱼,我们是有感情懂友谊的。不但在江湖中我们不会相忘,即使是在海洋中,我们也决不会相忘,永远不会相忘。

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是为序。

1994年4月17日

《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序

敦煌学这一门新兴学科，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历史。由于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成绩辉煌，彰彰在人耳目，让人感到，发展前途正未可限量。

但是，从研究领域上来看，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比如，敦煌佛教写卷的研究就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入。鉴于佛典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个不足之处就更显得突出。

方广锠博士独具慧眼，从他的博士论文起，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敦煌写卷佛典卷子的研究上，写过一些论文。他现在又把论文裒集成册，名之曰《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让我写一篇序言。他的论文我读过一些，并没有能全部读完。他这次送来的稿本，我又大体上翻看了一些，仍然不敢说全部细读过。即使是这样，由于过去多少年来我对他的学风是有些了解的，我就应允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

翻读方广锠的论文，我的总印象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达：材料务求全备，探讨务求深透，论证务求详尽，叙述务求准确。这样四个“务求”，应该说是代表了一种好学风，是值得赞扬的。我们眼前的学术界风气并不完全正派，互相抄袭，不懂装懂，以故作深奥文浅陋，以大言不惭哗群众，这样的现象难道还是稀见的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广锠博士的锲而不舍力求全面的学风就弥足珍贵了。

做学问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苦事，没有点干劲和韧性是不行

的。范老（文澜）说得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的座右铭。方君正当盛年，多少年来，他身上就体现了这种坚忍不拔的劲头。读了他的论文，衷心喜悦，写了这一篇短序，祝他鹏程万里

1994年4月21日

《大唐西域记校注》再版后记

《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出版,1990年重印,前后共印9200册。对于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来说,这一个数字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现在对此书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此书在书籍市场上早已绝迹。中华书局决定重印,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此书曾多次获奖,今年又获全国图书奖。国内外学者对此书亦多所赞誉。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此书的优点与不足之处,我们校注者是完全清楚的。当年参加注释工作的学者已有二人谢世。有关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日新月异,我们国内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者,颇不乏人。我们正准备重新组织力量,对注释从头做起,把最新的考古结果与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悉纳入注释中,使此书真正能与时代同步。因此,这一次重印不做大的改动,不过聊以解燃眉之急而已。较好的注释俟诸异日。

1994年5月27日

《雅俗文化书系》序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和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和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者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和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

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1994 年 6 月 22 日

《未名集》序

日前，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比较年老的同仁们，见面时往往谈到一个话题：后继无人。大家都有点忧心忡忡。

中华民族是有天才有智慧的，人口多，历史久，对人类文化曾作出了非常优异的贡献。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余地。到了今天，为什么竟后继无人了呢？

其中原因，我认为，只能到当前的社会风气中去找。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还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与肯定，包括某一些身居要津的人们在内。搞这一行的人们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最关紧要的根源还不在这里，而在于流行于整个社会中的"海洋主义"。"海洋主义"者，下海留洋之谓也。在汹涌澎湃的海洋主义的大浪的撞击下，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和老年人，抵挡不住，便随波逐流，或下海弄潮，或出洋潇洒，至于后果如何，只有"管他娘"了。

我对虔诚的海洋主义者无意谴责，人各有志嘛。既然坐在岸上，临渊羡鱼，馋涎欲滴，反不如毅然下水，来个痛快。但是，我有点惋惜之情，甚至忧心忡忡，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我可是真正没有想到，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就在北京大学燕园内，竟然有一批年轻人，还包括几个外国的青年学者，他们硬是不动摇，不信邪，不垂涎，不哀叹，而是脚踏实地，死抱住人文社会科学不放，写成了论文，集成了集子。我实在非常感动，大有空谷足音之感。当年范老（文澜）有一副对联：

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赠给他们,是再恰当不过的。我们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批年轻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未来的希望。有了他们,我们就可以说是后继有人了。

他们送给我了儿篇论文,并附上了 一篇编辑集子的情况说明,想让我写一篇序。根据我上面讲到的那种心情,我立即答应了下来。但是,我最近确实很忙,家里还有一些杂乱的事情,我只看了看集子中论文的日录,送来的论文只翻看了 一两篇。然而序却就写成了。我还不认为这是一篇应酬之作。

历来就颇有一些学者主张,不看文章而写序是写序之大忌。这种主张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我也是竭诚拥护的。我现在不是犯了写序之大忌而且是明知故犯了吗? 否,否,决不是这样。我歌颂的是这种不怕坐冷板凳,不慕荣利,甘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而不是个别的文章。即使我一个字不看,只要我歌颂得正确而及时,我仍然能写出 一篇好序。事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是为序。

1994 年 7 月 1 日

《汉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目录汇编》序

唐代秦韬玉的《贫女》诗中有两句话：

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作嫁衣裳

后来形成了"为人作嫁"这一句成语，流行极广，连《红楼梦》里面都有。

我个人体会，这句成语只有褒意，没有贬意。古往今来，每一个社会都需要这种人，他们肯作出牺牲，帮助别人，自己压金线，让别人舒舒服服地穿上嫁衣裳。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这种"为人作嫁"的精神是有一份功劳的。

专就科学研究部门来说，编制目录汇编，编制索引，就属于"为人作嫁"的范畴。这种工作，在过去，我们是重视很不够的。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大大地弘扬"为人作嫁"的精神了。否则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阻碍。事关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

在我国当前的学术界中，正气是有的，这为主；但是歪风邪气也颇嚣张。有的"学者"抄袭剽窃，不懂装懂，唯利是图，唯名是务，不但不"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把别人已经穿在身上的嫁衣裳扫扯下来，穿到自己身上，公然招摇撞骗，义形于色，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事。我们的商品中有假冒伪劣，学术界何尝没有！真应该

号召正义之士，群起而攻之，使他们原形毕露，狐狸尾巴再也掩藏不住，岂不快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流砥柱也还是有的。我认为，孟华女士等一批年轻的学人，就都是砥柱。她们联合起来，"为人作嫁"，编制了这一部汇编。每一个有是非感而又潜心向学的人，不管是老，是中，是青，都不会吝惜自己的赞美的。

在汉译外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著作中，法国只占一部分，并不等于全部，也不能代表全部。我相信而且希望，其他欧美日等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汉译本，也会有人来编制目录的。这只是一个时间先后问题，无所轩轾于其间。

虽然无所轩轾，但是法国毕竟有其特点与优点。大家都知道，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欧洲独领风骚。它影响了欧洲，影响了全世界，当然也影响了中国。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法国著作。我们这些稍稍了解情况的人，心中都有一本帐。有一本帐，当然很好。但可惜这一本帐是朦朦胧胧的，隐隐约约的，是模糊的。

现在国内大扇比较之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文化交流等等，都浸浸成为显学。这是令人鼓舞的好现象。这些学问帮助我们，一扫旧社会闭关锁国之陋习，一扫新社会中长期流行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恶风。这些陋习与恶风，对我们国家长远的建设是不利的。

比较之风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我们常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谈到吸收或者扬弃。中国古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但是怎样来进行比较呢？现在颇有一些学人，把比较看得太容易，上天下地，张三李四，简直无不可比，形成了所谓"无限比较可能论"。比较而至于"无限"，窃以为不可。这样轻率的比较，每

一个中学生都能进行的。比来比去,文章写成了,夷考其实,等于一个肥皂泡。这样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我个人觉得,只有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有充分的扎实的事实根据的比较什么学,才是真正的科学,那种即兴式的,好像是作诗填词式的比较是毫无价值,毫无用处的。

专就中法文化关系而论,孟华等同志编辑的《汉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目录汇编》,就是给有志于进行中法文化关系比较研究的中国老中青学者,提供牢固的基础,提供充分的扎实的事实根据的。

我在上面说到,孟华女士等青年学人精神高尚,在浇离的社会风气中,"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中流砥柱。我现在再补充上几句。"嫁衣裳"可能还有高下之别,好孬之别,不能一概而论。孟华女士等作的这一身"嫁衣裳",我们只能说是高的,是好的,它定会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是为序。

1994年7月2日

《西文中国学研究图书目录》序

编目录或索引的人们有福了。

我尊重一切宗教，但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可我是赞成"积累功德"说的。专就学术界而言，编纂目录或者索引，就是积累功德。积了德，就会有福。因此，我套用耶稣教《圣经》中的口气，说一声：编目录或索引的人们有福了。

我刚写完一篇《汉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目录汇编》的序。在那里，我赞扬了作者孟华女士等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为人作嫁"，就是积累功德。那一篇短序中的许多意见完全可以搬到此处来的。

这两部书同样自称为"目录"，都同样是"为人作嫁"的。然而内容却是不同的。一部书是介绍中国人翻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目录，一部书是介绍西方（包括法国）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文化成果的目录。一部是由西向东，一部是由东向西，方向正相反，然而却正好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现在，在学术界中，有不少人认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绩斐然，有口皆碑。但也有不足之处：一个是了解外国情况不够，对当前世界本学科的理论走向不清楚；一个是了解外国学者，所谓"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不够。这两个不足之处，大大地不利于我们的科学研究。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以论代史"，看问题只有一个角度，讲理论不根据资料；却往往又盲目自大，认为唯我独尊，唯我独物（唯

物也),唯我独高,唯我独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思想僵化,固步自封。

我们都应当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错综复杂的,看问题应当有很多角度。如果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则必然肤浅,必然简单化。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更能看到事物的真相。这个道理简单明了,用不着过多的解释。

角度怎样才能多呢?办法很多。有一个最现成的办法,就是看一看外国人是怎样看的。

这个办法虽然现成,然而应用起来也必须克服一些思想障碍。不妨说一说我自己的例子。最初,我对外国的"汉学家"是有看法的。他们有的不会说中国话。有的虽会说,但也不地道,决比不上北京小胡同里那些大脚板的老太太,她们的京腔抑扬顿挫,嘹亮悦耳,简直赛过莫扎特的"小夜曲"。他们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也间或出点笑话,比如把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玄宗"译为"玄秘的宗教"。可是,当我进一步读他们的著作时,我逐渐发现,他们有一些本领,是我们目前还难以企及的。比如,讲比较,他们能把古希腊罗马拉来,如数家珍。讲横向联系,他们能把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洋一带请来,左右逢源。这样一来,看问题的角度,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就大大地增加,做出来的结论就容易更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真正掌握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决非易事。语言繁多,书刊分散,搜求起来,异常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觉悟了的,想寻找多角度的,想得到"他山之石"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就变成了没有嫁衣裳的新嫁娘,等待别人来作嫁衣裳了。

现在,嫁衣裳果然来了。王丽娜等同志编纂的《西文中国学研究图书目录》出版了,这就是最好的嫁衣裳。一编在手,按图索骥,

大大有助于学者，有助于学术。偈曰：编纂目录，积德造福，便利天下学子，胜造七级浮屠。吾乐而为之序。

1992年7月3日

在喜雨声中，一挥而就

《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跋

主编对我说："要写一篇跋。"我漫应之曰："可以。"那一位我姑且称之为"助理主编"的小伙子从旁边敲了一声边鼓："越长越好！"我也漫应之曰："可以。"于是就写跋。

但是，写些什么呢？我心中无数。

按照老习惯，我还是先交代一下本书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为好，这样对读者会有益处。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学术文化随笔"？最初我对这含义是并不清楚的。"学术文化"的含义我是清楚的。但是一同"随笔"联系起来，我就糊涂。按照我的理解，随笔都是短的或者比较短的，长篇大论的随笔我没有见到过。而真正学术文化的论文往往比较长，甚至非常长，至少我自己的论文就是这样子。这真是一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削足适履，我认为不是好办法，这样会破坏了论文的完整性，为我所不取。我坦率地提出了我的意见，主编和"助理主编"通情达理，虽微有难色，但仍然安慰我说："长一点也可以"。这可以说是给我吃了定心丸。但也只定了一半。"长一点"究竟长到什么程度呢？我心里仍然没有底。

长短之争是与"可读性"有联系的。据说，短了就有可读性，长了可读性就差，或者甚至没有。对于这一点，我又对他们两位慷慨陈词，说不要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最近报刊上时有一些短文，长只凡百字，短则短矣，无奈空话连篇，味同嚼蜡，一无文采，二乏内容。这样的文章可读性究竟在哪里呢？反之，《红楼梦》长达百余万言，

然而人们却一拿起书,就放不下,如磁吸铁,爱不释手,你能说这书的可读性差吗?

"你在狡辩!"我仿佛听到有人在说。我承认,狡辩是有一点的,但不全是。我们且退一步想。只给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吃冰淇淋和奶油可可等甜品,决非健康长寿之道。冰淇淋和奶油可可等是可以吃的;但应该加上一些苦的、辣的、涩的、酸的、咸的食品,让他们知道,世界上的食品不都是甜的。这样可以锻炼他们的胃口,使它能适应世间一切味道。偏食是有害无利的。

长篇的学术论文,有的确实是艰涩的,难以一下子就读懂,决不像冰淇淋和奶油可可那样香甜适口。但是,这样的文章是有余味的,如食橄榄,进口苦涩,回味方甘。这个"甘"同一进口就感觉到的"甜",决不是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境界。稍有经验的人一想便能明白。何况,这样的文章在本"大系"里是绝难避免的。因为,不管是"大师系列",还是"探索系列",其中有一些人是专门写这样的文章的。如果不选这样的文章,有些人是难以进入任何"系列"的。

他们两位还曾提出另一个解决矛盾的办法,那就是,将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分拆开来,分成几个短篇。对此我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否定的意见。我觉得,一个人写论文,不管多长,总都有一个整体概念,整体结构,起承转合,前后呼应。如果一旦分拆开来,则驴唇难对马嘴,宛如一个八宝楼台,分拆开来,不成片段。

以上就算是我的"狡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幸而,他们两位"从善如流",没加批驳。这个问题就算是圆满解决了。他们大概有先见之明,早已注意到可能有"特殊情况"了。于是在"探索系列"编写要求中,在第4条,特别加上了一句话:"特殊情况请作者自己决定。"尊重作者之诚意溢于言表。这对我来说,无疑就成了一把"尚方宝剑",拿在手中,我可以"便宜行事"了。

我在这里还想讲一个情况。主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你写的

悼念胡乔木的文章，颇有意味，也可以选入。”石破天惊，这是我原来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既然上编这样说，他当然会有自己的考虑。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可以大大地增加“可读性”。而且像乔木这样的人当然与学术文化有关。选悼念他的文章，决不是离题，而正是切题。像乔木这样的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我的师友中还有一大批。为什么不把悼念、回忆他们的文章也选进来呢？于是一发而不能收拾，我一选就选了一大批。文章好坏，且不去说它，反正我的这一些师友大都在现代中国文坛和学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读了悼念、回忆他们的文章，对读者来说决不会没有收获的。

说了这么多的话，绕了这么多的弯子，现在才谈到正题：我的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

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上面实际上已有所涉及。总的原则不外是“编选要求”第一条提到的：“全书要求体现本人学术思想的‘整体性’。”但是，我是一个杂家，我所涉猎的范围多而且杂，体现这样的“整体性”，必须分门别类来编选。即使这样，也难做到面面俱到。我只能举其荦荦大者，加以介绍。大体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佛教史

二　中印文化关系史

三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四　东方思想的独特之处——天人合一

五　怀人

上面的项目已经够多的了，但是“完整”不“完整”呢？还不完整。了解情况的人大概都知道，上面哪一项也不是我毕生精力集中兴趣集中之所在。我在德国十年，精力完全集中在对印度古代俗语，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佛教混合梵语和吐火罗语上。真要想有

"完整性",这方面的文章是必须选一些的。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无论是佛教混合梵语,还是吐火罗语,都无疑是"天书"一般。先不讲语法的稀奇古怪,就以字母而论,用拉丁字母转写,必须头上戴帽,脚下穿靴,看上去花里胡哨,让人莫明其妙。我虽然主张给读者一点苦的、涩的东西;但是,不用水泡而竟把一盘苦瓜端上餐桌,这简直是故意折磨读者,有点不"道德"。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我还是决定:把我那一套"天书"留给极少数的素心人去啃吧,在这里我只好割爱了。由此而带来的不"完整"——由它去吧。

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就讲到这里。但是我感到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一开头就提到那位"助理主编"的话:"越长越好!"对这句话,我曾漫应之曰:"可以"的。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管我算不算"君子",食言总是不好的。而且我一向是一个很容易对付的作者,对主编和责编一向驯顺,善于"以意逆志"。这一次我能破坏自己的"善良的行为"吗?我不想破坏。

但是,我却遇到了实际困难。从模糊语言学的角度来讲,"长"字是一个模糊概念。多长才算"长"呢?谁也说不清。至于"越"字,那就更模糊了。现在我已经写了六页半,有三千五、六百字了。对一篇"跋"来说,我觉得,这已经够长了。根据不成文法,跋一般都是比较短的。跋太长了,会有喧宾夺主的危险,为智者所不取。

如果"以意逆志"的话,我体会,"助理主编"是想让我谈一谈我的治学经过或者什么经验之类。这个题目谈起来并不难,而且我是颇愿意谈的。但是,我有一点担心,怕一谈起来就煞不住车,洋洋十万言也还未必能尽意。前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老少之间》。在这里面,我讲到了一个现象,不少的老年人太爱说话。除了有一点"倚老卖老"的意味,似乎还有生理上的原因。我于是给自己和其他老人写了几句箴言:

老年之人
血气已衰
煞车失灵
戒之在说

能做到这一步,就能避免许多尴尬局面。你看,开会时,一个老人包办了会场,口若悬河,刺刺不休,一无内容,二无文彩。在场的人有的看表,有的交头接耳;但是,此老老眼昏花,耳又重听,不视不见,不听不闻,这岂不大煞风景。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所以写了上面的箴言。既然写了,就必须遵守。因此,这一回我的什么治学经过和经验就先不谈了。最近喜爱听评书。千百年来讲故事,说评书的艺人,为了招揽生意,说到兴会淋漓处,总爱卖一卖关子,戛然停下,让听者牵肠挂肚,明天非听不行。我现在也学学他们,卖一个关子,说上一声:咱们下一回再说。

1994年7月16日

《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十年，不算是太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崇拜整数的民族。十年是一个整数，因此十年大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怎样来庆祝呢？我们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们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们无法一掷几十万，摆一桌专门吃金粉的华筵。我们也都不是孙悟空，无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来祝寿。我们是一介书生，是一群秀才。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我们只有半张纸的能力，半张纸就是我们能力的极限。

我们自己决不会轻视这半张纸，人世间有识之士也不会轻视。我们都能了解这半张纸的份量。它是从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流出来的。其中隐含着不知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无一例外。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无一例外。这半张纸都是一行行的字组成的，行间烟霞，笔底风云，它覆盖着宇宙万有，为先民继传统，为万世开太平。这半张纸正是中华文化寄托之所在。

今天，我们这一群秀才就用我们自己的这半张纸，来为我们的书院祝寿。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世纪末，新的一个世纪正向着我们走来。我们都明白我们肩头担子之重。二十一世纪将不会是一个平常的世纪，它将为人类的前途开辟新路，它将给我们中华文化，我们东方文化带来腾飞的机遇。在它来临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

工作。我们深知，弘扬端在努力，爱国不敢后人。我们书院的同仁们，以及院外的志同道合的同行们，年龄不管老少，共同的目标把我们拉到一起来了。年老的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年轻的则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我们一点也不衰颓。不能说我们对现实的一切都感到满意，但是我们眼前看到了光明，我们心中蕴含着光明，为了追求这点光明，实现这点光明，我们将意气风发，勇往直前。

在过去，我们努力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这半张纸上。在当前，在未来，我们努力的结果主要仍然会表现在这半张纸上。但是，我希望，而且也相信，我们决不会固步自封，永远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我们会跟上世界潮流，随时更新我们的思维，随时接受新鲜事物，使我们这半张纸也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等到我们书院庆祝二十年整寿时，世纪已经换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纪，我们的半张纸也将变为全新的半张纸。是为序。

1994 年 8 月 5 日

《敦煌学辞典》序

我们这一部辞典是中国全国敦煌学者通力协作的产品，是獒胥继彝奋发图强长达十年之久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收获。

敦煌学建立快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中，前一半是四海翻腾内战频仍的时期。后一半是政局算是安定了、但又无端自己瞎折腾的时期。二者对学术研究都是极为不利的。在前一阶段中，少数敦煌学的先驱者，往往是单枪匹马，万里孤征，专靠个人的努力与牺牲，筚路蓝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含辛茹苦，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我们后来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后一阶段中，到了十年浩劫以后，否极泰来，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实在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就是在 1983 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立的。从此以后，就国内来说，团结协作有了可能；就国外来说，与外国同行们广通声气，也有了条件。这样一来，双方皆蒙受其利。在这样内外两方都表现为团结祥和的气氛中，我国的敦煌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现在，老一辈的敦煌学家，有的还健在，一批中青年学者又脱颖而出。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掌握新资料，具备新见解。老中青三代团结协作，为编写这样一部空前的、大型的《敦煌学辞典》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部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学术进步有似运动场上的接力赛。后者总是在前者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推陈出

新,踵事增华是学术发展的规律。这一条前进的道路永无尽头,什么时候也划不上句号。我们这一部辞典,虽然带一点全面总结的意味;但是,与其说它是旧成绩的总结,毋宁说它是新创获的起点。我们只能在学术接力赛中起我们眼前这一代老中青学者所应该起所能够起的作用;我们只能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过份吹嘘自己和过份贬低自己,都是不恰当的,不足取的。我们新的创获不能说没有,但是谁拿在手里的都只能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是人们永远也拿不到的。真理的长河有待于世世代代的学人逐渐加以认识的。

对世界学术界来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不能得而私之,敦煌学也不能例外。前几年,在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两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受到了在座的国内外学者的同声赞扬,可见这两句话是说到了点子上。学术的目的在于求真,从长远的发展上来看,真与美和善是完全一致的。为了人类的发展前途而求真,其中包括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东方优秀文化,弘扬世界优秀文化,而美与善即在其中矣。我们中国的敦煌学者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工作,我们这一部《敦煌学辞典》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纂的。

中国古话说:“以文会友”。又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是在想“会友”,是在想“求其友声”。现在敦煌学已寖假成为世界“显学”。我们诚恳希望,在中国敦煌学者同心协力加强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国外同行们的协作,互通有无,互通信息,互相补充,互相砥砺,让我们这一门学问发展得更迅速,更顺利。我现在再引一句中国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欢迎来自他山之石。不管是对本书的赞扬,还是对本书的批评,我们都会实事求是地来接受。我们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敦煌学才会前进,世界

的敦煌学才会前进。

1994 年 10 月 16 日

《怀旧集》自序

《怀旧集》这个书名我曾经想用过，这就是现在已经出版了的《万泉集》。因为集中的文章怀念旧人者颇多。我记忆的丝缕又挂到了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我因此想到了《昭明文选》中潘安仁的《怀旧赋》中的文句："霄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我把那一个集子定名为《怀旧集》。但是，原来应允出版的出版社提出了异议："怀旧"这个词儿太沉闷，太不响亮，会影响书的销路，劝我改一改。我那时候出书还不能像现在这样到处开绿灯。我出书心切，连忙巴结出版社，立即遵命改名，由《怀旧》改为《万泉》。然而出版社并不赏脸，最终还是把稿子退回，一甩了之。

这一段公案应该说是并不怎样愉快。好在我的《万泉集》换了一个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反应还并不坏。我慢慢地就把这一件事忘记了。

最近，出我意料之外，北大出版社的老友张文定先生一天忽然对我说："你最近写的几篇悼念或者怀念旧人的文章，情真意切，很能感动人，能否收集在一起，专门出一个集子？"他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悼念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他这个建议过去我没有敢想过，然而实获我心。我首先表示同意，立即又想到：《怀旧集》这个名字可以复活了，岂不大可喜哉！

怀旧是一种什么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我还没有读到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恐怕这个定义是非常难下

的。根据我个人的想法，古往今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既然前进，留在后面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类有一个缺点或优点，常常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好，觉得当时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总之，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

但是，根据常识，也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有的旧事，就并不值得去怀。有时一想到，简直就令人作呕，弃之之不暇，哪里还能怀呢？也并不是每一次怀人或者怀事都能写成文章。感情过分地激动，过分悲哀，一想到，心里就会流血，到了此时，文章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每个人一想就会明白的。

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我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人的七情六欲，我一应俱全。尽管我有不少的缺点，也做过一些错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别人；如有必要，我还伸出将伯之手。因此，不管我打算多么谦虚，我仍然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我是一个"性情中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平常。我生平颇遇到一些人，对人毫无感情。我有时候难免有一些腹诽，我甚至想用一个听起来非常刺耳的词儿来形容这种人：没有"人味"。按说，既然是个人，就应当有"人味"。然而，我积八十年之经验，深知情况并非如此。"人味"，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怀旧就是有"人味"的一种表现，而有"人味"是有很高的报酬的：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亲故老友逝去了，或者离开自己远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一些优良的品质，离开自己越远，时间越久，越能闪出异样的光芒。它仿佛成为一面镜子，在照亮着自己，在砥砺着

自己；怀这样的旧人，在惆怅中感到幸福，在苦涩中感到甜美。这不是很高的报酬吗？对逝去者的怀念，更能激发起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让我们哀伤，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们身上的心灵上的担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们不知不觉了。后死者却还活着，他们能知能觉。先死者的遗志要我们去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即使有时候难免有点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声音笑貌，立即会振奋起来。这样的怀旧，报酬难道还不够高吗？

古代希腊哲人说，悲剧能净化（katharsis）人们的灵魂。我看，怀旧也同样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这一种净化的形式，比悲剧更深刻，更深入灵魂。

这就是我的怀旧观。

我庆幸我能怀旧，我庆幸我的“人味”支持我怀旧，我庆幸我的《怀旧集》这个书名在含冤蒙尘十几年以后又得以重见天日，我乐而为之序。

1994 年 10 月 22 日

《人生箴言》序

本书的作者池田大作名誉会长，译者卞立强教授，以及本书一开头就提到的常书鸿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同他们的友谊，有的已经超过了四十年，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年了，都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我尊敬他们，我钦佩他们，我喜爱他们，常以此为乐。

池田大作名誉会长的著作，只要有汉文译本（这些译本往往就出自卞立强教授之手），我几乎都读过。现在又读了他的《人生箴言》。可以说是在旧的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了解。在旧的钦佩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钦佩，我更以此为乐。

评断一本书的好与坏有什么标准呢？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能为一般人都接受的标准还是有的。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几项：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类似的标准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上面这一些也就够了。统而言之，能达到问题的前一半的，就是好书。否则，若只能与后一半相合，这就是坏书。

拿上面这些标准来衡量池田大作先生的《人生箴言》，读了

这一本书，谁都会承认，它能鼓励人前进；它能给人乐观精神；它能增加人的智慧；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它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它能给人以力量；它能鼓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它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总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它能帮助人明辨善与恶，明辨是与非；它能帮助人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不至迷失方向。

因此，我的结论只能是：这是一本好书。

如果有人认为我在上面讲得太空洞，不够具体，我不妨说得具体一点，并且从书中举出几个例子来。书中许多精辟的话，洋溢着作者的睿智和机敏。作者是日本蜚声国际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宗教活动家。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芒。读这样的书，真好像是走入七宝楼台，发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又好像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本书一一人生中的第一段话，就值得我们细细地玩味："我认为人生中不能没有爽朗的笑声。"第二段话："我希望能在真正的自我中，始终保持不断创造新事物的创造性和为人们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社会性。"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态度，真可以振聋发聩！我自己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特别欣赏这一段话："'老'的美，老而美——这恐怕是比人生的任何时期的美都要尊贵的美。老年或晚年，是人生的秋天。要说它的美，我觉得那是一种霜叶的美。"我读了以后，陡然觉得自己真"美"起来了，心里又溢满了青春的活力。这样精采的话，书中到处都是，我不再作文抄公了。读者自己去寻找吧。

现在正是秋天。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就在我的窗外。案头上正摆着这一部的译稿。我这个霜叶般的老年人，举头看红叶，低头

读华章，心旷神怡，衰颓的暮气一扫而光，提笔写了这一篇短序，真不知老之已至矣。

1994年11月8日

《东方文论选》序

东方国家有长期探索文艺理论的历史。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在公元前数百年甚至更早的时期，两国已经有了有关文艺理论的记载。以后，在几千年的漫长的历史上，两国都出了不少的文艺理论家，创立了许多新学说，灿如列星，照亮了东方文艺发展的道路。

东方其他国家，比如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韩国)、波斯等国，都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基础上，发展了文艺理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印度。总之，东方各国共同努力，形成了东方文艺理论体系。内容有同有异，总起来看却是一个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

与之相对的就是自古希腊、罗马时起一直到今天的欧美国家的文艺理论体系。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同自产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科技方面进步一样，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的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方文艺理论，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

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崇洋媚西的气氛。最可哀的是，有人连这种感觉都没有了，觉得向西方学习，同麦当劳、肯德基一样，是天经地

义的事。岂不令人骇怪吗?

难道我们东方的文艺理论就真地不如西方,应当向西方低头认输,自惭自愧吗?

否,否,决不是这样。

鉴古以知今。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我们东方国家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想一想我们过去的辉煌,就能知道,当前的情况是十分不正常的,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办呢?

我个人认为,首先必须打掉"贾桂思想",同时又必须十分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估一下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不同之处和相通之处,评估一下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决不能盲目排外或媚外。西方的文艺理论同西方的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模式有关,而东方的文艺理论则与东方的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模式密切相联。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补。

可是,我们眼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知西而不知东。知西知到什么程度,虽然还可能有些疑问;但不知东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这种"无知"正是"贾桂思想"的根源。

怎么样才能知东呢?

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书籍,古今出版的都有,读起来比较方便。中国以外的则有困难,首先需要翻译。而中外两方面都需要选本。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选本就成了当前的东风了。

曹顺庆教授英年歧嶷,独具慧眼。他约请了国内外的一些真正的同行专家,准备群策群力,编一本《东方文论选》,这确实是雪里送炭之举,一定会受到国内外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热诚欢迎。读此一书,东西兼通。有识有志之士定能"沉浸酦郁,含英咀华",融会东西,以东为主,创建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把中国文艺理论的

研究水平，东方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和世界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水平上，岂不猗欤休哉！我乐而为之序。

1994年11月17日

《敦博本禅籍校录》序

众所周知，禅学虽然号称来自天竺，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学。在所有的中国佛教宗派中，独有禅宗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个中消息，不难参透。

禅宗兴起以后，中国就有人研究禅学。禅学精神，一方面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极其普遍地极其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文艺理论，等等，等等整个文化领域。

禅宗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据我个人的看法，禅学是越向前发展，离开真正的佛教越远。到了后来，一直发展到呵佛骂祖，形成了佛教的一个反动，一个否定。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禅宗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先是中国人研究，后是外国人研究，韩国、日本等国的禅学专家，一代接一代，至今不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上消沉了几百年以后，又有了重现辉煌的端倪的显露。禅学已浸浸成为世界显学。东方各国，固无论矣。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对禅学有兴趣的学者。翻译禅籍，撰写文章，颇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这将为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开辟道路。

稍为内行的人都知道，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最为重要，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宋元刊本之所以为世所重，道理就在这里。自从敦煌石室遗书被发现以后，世界学林为之震惊。在石室中众多的典籍中，禅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从此以后，中外研究禅学的学

者，争先恐后，纷纷对敦煌禅籍加以校勘，加以探讨。正如王静安先生、陈寅恪先生等国学大师所指出的那样，新材料的发现必然能带动新学问的产生。在敦煌吐鲁番学范围内，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其能推动这一门新学问迅速前进，完全是意料中事了。

眼前这一部邓文宽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校录》，是在众多的国内外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这两位学者认真严肃，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因此我称之为集大成之作。最值得称道和重视的是，他们读书得间，细入毫发。对一些以前从未有学人注意到的敦煌写本的书写特点阐幽发微，公之于世，为斯学做出一大贡献。这一点，我相信，凡读本书的学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写到这里，我想要说和应该说的话可以说是已经说完了。但是我想再加上一条尾巴。这当然不是狗尾，甚至连貂尾都不是，而是，一条超过了众尾之尾。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别人也许对它会感兴趣的。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也就是把接力棒传给年轻人的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

逢人说项斯。"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我有意写一篇短文，姑名之为《燕园四杰》。先此预告，望"读官"（套用"看官"这个词儿）们注意则个。

1994年12月12日

《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序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大国，国境毗连。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友好往来，交流文化，促进了彼此社会的发展，成为千古佳话，在世界史上只此一家。

我们两国，不同的地方当然是有的；但是，共同的地方似乎更多一些。幅圆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风习。这些都是最显著的共同点。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挟起科技优势，船坚炮利，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东方，中国和印度首当其冲，这里成了他们推行商品再加上殖民主义的好场所。这一点中印更是共同的。

在这样情况下，尽管我们两国都有极其悠久、独特而又优秀的文化传统，到了此时，有时候似乎反而成了包袱。如何调和东西文化来适应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介入，就成了我们两国的首要而又颇为棘手的任务。在这里面，政治制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政治制度，其道多端。我想在这里只谈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这就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在任何时候，国家的统一都是重要的。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中国在秦代以后形成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虽然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毕竟是合多分少。大统一的局面一直到今天没被破坏。而在印度，情况殊有所不同。在历史上，统一的局面，甚至部分的统一，真如凤毛麟角。到了近代，不管怎样，

印度政治统一的局面,总是保留住了。尽管众多矛盾依然存在;但是,统一的中央政府是屹立不动的,统一的议会是牢固存在的。其故何在呢?在这里面,印度固有的政治经济传统,印度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传统,各自起着什么作用呢?这都是印度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的一些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林良光教授主编的这一部《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得出了一些看法或者结论,很值得研究印度问题的中国学人的注意和重视。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与印度有所不同。但是,两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我国善良的爱国的人民所最关心的,据我的观察,一个是安定团结,一个就是祖国的统一,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统一。在这里,印度政治制度也有一份力量促成的统一,难道对我们中国人民就没有借鉴的意义吗?

因此,我认为,本书不但有较高的学术意义,而且也有十分有用的现实意义。我祝贺本书的出版。

此外,我还想附带说一句:我们北大亚非所,对同兄弟单位的同行们的合作,一向十分重视。这是一个极为良好的作风,值得大大地提倡。这一本书又是四个单位协作撰成的。我谨向他们表示我诚挚的敬意。是为序。

1994年12月24日

杂文及其他

一点希望

——庆祝《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

我对文艺理论所知不多，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也没能全读。本不该说三道四，但出于对发展中国文艺理论的渴望，提出一点希望。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文艺理论能自成体系，历史久，影响大者，只有四家：中国、印度、古希腊、近代欧美。这四家影响了世界文艺理论的发展。这四者之间有同有异，而浅见所及，同大于异。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就是。对美的理解，民族性有其作用，但共同的人性作用更大。因此，文艺理论，古与今，中与外，颇多相通之处。时至今日，我们要想宏扬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提高研究水平，一方面要认真钻研我国古代名著，另一方面又要广开眼界，认真钻研其他三者。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得启发，有了鉴别能力，又得到启发，才能融会贯通，把研究提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开辟新境界。

这是一条阳关大道，可惜注意者不多，同意这个看法者恐怕更少。就我浏览所及，文艺理论文章丰富繁多，这样来探讨问题的却如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自己是眼高手低，无能为力。仅献刍荛之言，难登大雅之堂，姑妄言之而已。

1990年3月6日

对开好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两点意见

一、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这几年,经过大家惨淡经营,我国的比较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的声势不小,人数也不少,但是,认真钻研、艰苦努力还不够,好文章不多。当前最重要的是提高水平,在学术探讨上多下功夫。不然,这么大的声势,学术水平却老是一般化,那怎么行呢?! 不要把比较文学研究看得太容易,好像只要把这个作家与那个作家相比;这部作品与那部作品相比,就算是比较文学了,那样的研究太简单了。我一看到这一类题目,就知道写不出好文章。应该把比较文学研究看得难一点。这样想,在当前也许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我们开学术会议,当然可以把声势搞大,但是,关键是把水平提高。我们现在的水平与五年前相比,当然是大不一样了,但是,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说要建立"中国学派",谈何容易! 什么叫"中国学派"? 它包括哪些内容? 谁也说不出来。有哪部著作能体现"中国学派"? 很难说。外国有威勒克的批评史,有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这都是巨著,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书。

二、加强团结

现在,比较文学成了热门,许多省市成立了分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加强团结,从总会到分会,都要注意团结。搞改选,也要

注意有利于团结。咱们中国有种特殊的学科，叫位置分配学、座次学，连报上登名字，也要讲次序。这种事情国外是没有的，但是在中国不能不讲，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学会成立新的工作机构，我赞成年轻化。我已年近八十，希望不再当名誉会长，可以让原来的两位年老的副会长来当名誉会长。以后可以规定一条，超过八十的都退下来，不管是谁。既然讲年轻化，老的就要退下来。老的不退，怎么能年轻化呢？关于会长，我建议由乐黛云同志来当，她有能力，也有干劲，她各方面联系多，会讲英语，这就便于工作。副会长名额可以分配到地方，由当地同志自己提名，最后由大家选举产生。最重要的是，事先一定要好好酝酿，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酝酿好了，意见会集中的。最后，还是要尊重大家的意见，决定于选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工作，为了团结。

1990 年 7 月 15 日

祝贺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了,几乎是与新中国同龄。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出版社都经过了。在这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内,它一直屹立中流,出版了大量的好书,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增添了光彩。我同其他人一样不能不表示由衷的钦佩与赞美,我祝它长寿,寿比终南山。

当今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并不是走在阳关大道上,面临的困难重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个人认为,越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出版界越应该巍然不动,看准了正确的方向,排除万难,毅然走上前去。困难总会被排除掉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总会来临的。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祝愿。

1990年8月8日

祝贺《学林》创刊400期

我是《文汇报》忠实的读者,《学林》我当然是经常读的。我对《学林》的爱好,经久不衰,原因何在呢?

同其他报纸比较起来,《文汇报》是有鲜明的特征的,《学林》亦然。一张报纸的个性不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新闻方面,不表现在冠冕堂皇的大块文章上——这是所有报纸共有的,而表现在地方新闻和副刊上。《学林》,我觉得,风格清新庄重,内容坚实恳切,不是高头讲章,而是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的畅所欲言;不是催人欲睡的八股,而是让人读了兴趣盎然回味无穷的佳作。

现在报纸副刊的数目减少了,真受读者欢迎的更不多见。我诚挚地希望《学林》健康长寿,把自己特有的风格更加发扬光大,在全国报纸副刊之林中闪出灿烂的光芒。

1990年10月18日

一点希望

——致藏学研究中心

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浸浸成为显学。欧、美、日本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对西藏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民俗、艺术等等,进行深入细致认真严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译文,原文已佚,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难以进行。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藏学的根源当然是在中国西藏。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若干年以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决不能实行鸵鸟政策,或者视而不见,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为我辈所不应取。论藏文使用水平,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但是论辅助条件,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外国藏学者又往往超过我们。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鹤鹳饮海,井蛙观天。这样是决无进步可言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了,信息极不灵通,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杂志也十分不全。这是非常危险的,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进步的。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

携手共进,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

1990年10月20日

诚挚的祝贺 热切的希望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十周年

今年一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十周年。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自谓有足够的感性认识，能比较深刻地了解它的重要意义。现在就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上，表示我诚挚的祝贺。

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条例，在过去十年内，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费词宣扬。它加强了旧学科的改造与更新；它促进了新学科的建设；它弥补了过去学科建立中的空白点；它扩大了学科点的分布面；它在国家教委和两个科学院的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范围以外促成了全国学科的建设；它调动了全国科研单位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总之，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祝贺以外，我还想提一点希望。学位制度、导师制度同科研机关和高等学校的职称评定工作一样，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决不容抹煞。但是，里面也决不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个人认为，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位与地区间的不平衡；一是个别单位掌握过宽。上述这些制度的目的无非是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做到了。但是，如果掌握标准不平衡或者过宽，则会反过来影响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这种消极的现象在过去确已出现，在报纸上和人们的谈话中，时常能够读到和听到。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前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附有一

份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信和文章讲的都是对评定教授职称过滥提出的批评，也讲到评选博士生导师时不够严格的情况。我相信，这不是个别的意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此我希望，我们学位委员会，还有国家教委，以及有关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实施学位条例时，要掌握得严一点，再严一点。这决不会有什么坏处，反而更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1990年12月25日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

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

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饤饾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

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

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九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月5日写于北京大学

藏书与读书

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

什么叫书？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下定义。我们姑且从孔老夫子谈起吧。他老人家读《易》，至于韦编三绝，可见用力之勤。当时还没有纸，文章是用漆写在竹简上面的，竹简用皮条拴起来，就成了书。翻起来很不方便，读起来也有困难。我国古时有一句话，叫作“学富五车”，说一个人肚子里有五车书，可见学问之大。这指的是用纸做成的书，如果是竹简，则五车也装不了多少部书。

后来发明了纸。这一来写书方便多了；但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藏书和读书都要用手抄，这当然也不容易。如果一个人抄的话，一辈子也抄不了多少书。可是这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我们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作佳话。我们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所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宋版、元版、明版的书籍被视为珍品。历代都有一些藏书家，什么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等等，说也说不完。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为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服务。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藏书的祖先。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有人做过试验，无论萤和雪都不能亮到让人能读书的程度，然而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们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还有一些鼓励人读书的话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诗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说这种话的人的“活思想”是非常不高明的，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至于“四时读书乐”一类的诗，也是人家所熟悉的。可惜我童而习之，至今老朽昏聩，只记住了一句：“绿满窗前草不除”，这样的读书情趣也是颇能令人向往的。此外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读书情趣，代表另一种趣味。据鲁迅先生说，连大学问家刘半农也向往，可见确有动人之处了。“雪夜闭门读禁书”代表的情趣又自不同，又是“雪夜”，又是“闭门”，又是“禁书”，不是也颇有人向往吗？

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据浅见所及，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因此我才悟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一条简明而意义深远的真理。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传流下来的。到了今天，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回避不掉的。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1991年7月5日

老年谈老

老年谈老，就在眼前；然而谈何容易！

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自己有时候承认老，有时候又不承认，真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记得很多年以前，自己还不到六十岁的时候，有人称我为“季老”，心中颇有反感，应之逆耳，不应又不礼貌，左右两难，极为尴尬。然而曾几何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听得入耳了，有时甚至还有点甜蜜感。自己吃了一惊：原来自己真是老了，而且也承认老了。至于这个大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有点茫然懵然，我正在推敲而且研究。

不管怎样，一个人承认老是并不容易的。我的一位九十岁出头的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他还不觉得老，其他可知了。我认为，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渐”字。若干年前，我读过丰子恺先生一篇含有浓厚哲理的散文，讲的就是这个“渐”字。这个字有大神通力，它在人生中的作用决不能低估。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果不渐渐地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的。人们逢到极大的喜事，如果不渐渐地恢复平静，则必然会忘乎所以，高兴得发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能够感觉到老，其妙无穷。人们渐渐地觉得老了，从积极方面来讲，它能够提醒你：一个人的岁月决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该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做好，免得无常一到，后悔无及。从消极方面来讲，一想到自己的年龄，那些血气方刚时干的勾当就不应该再去硬干。个别喜欢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

或许也能收敛一点。老之为用大矣哉！

我自己是怎样对待老年呢？说来也颇为简单。我虽年届耄耋，内部零件也并不都非常健全；但是我处之泰然，我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年老了，硬是一点病都没有，人人活上二三百岁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今天狂呼"老龄社会"者，恐怕连嗓子也会喊哑，而且吓得浑身发抖，连地球也会被压塌的。我不想做长生的梦。我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我信奉陶渊明的两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这就是我对待老年的态度。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有一位化学系的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试问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

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可是偏有一些排在我后面的比我年轻的人，风风火火，抢在我前面，越过排头，登上山去。我心里实在非常惋惜，又有点怪他们，今天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七十岁，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你们正在精力旺盛时期，为国效力，正是好时机，为什么非要抢先登山不行呢？这我无法阻拦，恐怕也非本人所愿。不过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夹塞。

不抢先夹塞活下去目的何在呢？要干些什么事呢？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材。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作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但是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发点牢骚。我在上面提到“老龄社会”这个词儿。这个概念我是懂得的，有一些措

施我也是赞成的。什么干部年轻化,教师年轻化,我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我对报纸上天天大声叫嚷"老龄社会",却有极大的反感。好像人一过六十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看有点危言耸听,不知道用意何在。我自己已是老人,我也观察过许多别的老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只是少数,并不是老人的全部。还有不少老人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样一些人也算是社会的包袱吗?我倒不一定赞成"姜是老的辣"这样一句话。年轻人朝气蓬勃,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让他们登上要路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老年人也不必天天絮絮叨叨,耳提面命:"你们已经老了!你们已经不行了!对老龄社会的形成你们不能辞其咎呀!"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还要提高,将来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即使你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你也没有法子改变。听说从前钱玄同先生主张,人过四十一律枪毙。这只是愤激之辞,有人作诗讽刺他自己也活过了四十而照样活下去。我们有人老是为社会老龄化担忧,难道能把六十岁以上的人统统赐自尽吗?老龄化同人口多不是一码事。担心人口爆炸,用计划生育的办法就能制止。老龄化是自然趋势,而且无法制止。既然无法制止,就不必瞎嚷,这是徒劳无益的。我总怀疑,"老龄化"这玩意儿也是从外国进口的舶来品。西方人有同我们不同的伦理概念。我们大可以不必东施效颦。质诸高明,以为如何?

牢骚发完,文章告终,过激之处,万望包容。

1991 年 7 月 15 日

六字真言

我正在赶写一部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书。我翻阅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郑振铎先生生前寻访、搜集、影印、出版的《玄览堂丛书》。这里面收的书绝大部分是明代的手抄本和刊本，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其中有关中国边疆和中外交通的书籍，占相当大的比重，而正是这些书对我们研究中外交通史的人极关重要，因为里面的资料往往为正史或其他官方史籍中所无法找到的。如果没有西谛先生的努力搜求，我们今天恐怕就难以看到。懂得这一门学问的甘苦的人，没有不感激他的。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太仓促了，太出人意外了。哲人其萎，至今思之，犹不禁泫然泪下。

在《玄览堂丛书》中，我目前翻阅得最多的是《续集》中的《四夷广记》，明慎懋赏撰，是旧抄本，出自明人之手。这一部书大概不全，头绪很乱，翻检起来，颇不容易。但是内容却极为有用，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书中(第98册)有一部分讲“榜葛剌”，即今天的孟加拉。在“榜葛剌国统”这一节里，首先说：“榜葛剌，即东天竺也。……释迦得道之所也。”接着讲“汉明帝时，天竺浮图法入中国。”一直讲到戒日王(尸罗逸多)同唐太宗的关系，还有王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下面讲明朝：

> 本朝永乐三年，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诏赐王纻、丝、纱、罗各四匹，绢八匹。王妃纻、丝、纱、罗各三匹，绢六匹，命使往天竺迎异僧。既至京，居灵谷寺，教人念唵嘛呢叭咪吽。

> 翰林侍读李继鼎曰:"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其所谓唵嘛呢叭咪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知悟耳。"

这一段话的前一部分见于很多史籍中,我在上面也已谈到过,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关于六字真言这一段话和这一位翰林公的理解,却真有点石破天惊,匪夷所思,读了真是忍俊不禁,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按唵嘛呢叭咪吽,即所谓"六字真言"。原文是梵文:oṃ maṇi padme hūṃ,含义是:"唵!摩尼宝在莲华中,吽!"这是音译。关于六字真言,佛典中有不同的说法。有所谓观音菩萨的六字陀罗尼,有文殊菩萨的:唵缚鸡淡纳莫,有阿难的。上面写的这个六字真言,一般说是出自莲华手菩萨,是喇嘛教的。在西藏等喇嘛教流行的地区,非常习闻。中国长篇小说《济公传》里面的济公念之不离口。据说是有极大的神力。这些情况,我们不能要求明代初年的一位翰林能了解。但是他根据六字的发音而做出来的推断,不能不说是很值得大书特书了。

我认为,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六字真言相当古老。其次,上面引文中的"命"字上没有主语。根据口气,应该说主语是永乐皇帝。他派人到印度去,而不是到西藏去迎异僧。这位异僧会说六字真言,那么印度就是六字真言的发源地。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我猜想,孟加拉是印度密宗最早流行的地方。六字真言看来与密宗有联系。孟加拉在地域上同西藏接近。这是否就是传播的基础呢?我说不出来。敬请博雅之士教正。

我在这里想顺便讲一件事。在《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08册上,有一本书叫《云台广记》。在这一本书讲须文达剌国、特播里国、曼陀郎国、苏吉丹国、麻呵斯离国这一页的书眉上,另一个人用

毛笔写了一句话："以下诸国皆永乐宣德间中官使西洋有随去周老人者所说。"这个"周老人"大概是像费信、马欢、巩珍等一样随船下西洋的人。可能他不会书写，所以只能口述，由别人记下来。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看出，《云台广记》中的材料，是得自口述，不是转抄。这些材料的价值，由此可见。

1991年10月28日

漫谈古书今译

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甚至一些外国友人的热烈响应。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民族情绪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大公无私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中华文化则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想求得人类的共同进步，必须弘扬世界优秀文化。想弘扬世界优秀文化，必须在弘扬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重点突出中华文化。不这样做，必将事倍而功半，南辕而北辙。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其道多端，古书今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赞成古书今译。

但是，我认为，古书今译应该有个限度。

什么叫“限度”呢？简单明了地说，有的古书可以今译，有的难于今译，有的甚至不可能今译。

今译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原文的内容含义尽可能忠实地译为白话文，以利于人民大众阅读。这一点做起来，尽管也有困难，但还比较容易。有一些书，只译出内容含义，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也就够了。但是，有一些古书，除了内容含义之外，还有属于形式范畴的文采之类，这里面包括遣词、造句、词藻、修饰等等。要想把这些东西译出来，却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古书中，文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文学作品来说，不管内容含义多么深刻，如果没有文采，在艺术性上站不住，也是不能感动人的，也或许就根本传不下来，例如《诗经》、《楚辞》、汉魏

晋南北朝的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这些作品，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只抽出思想加以今译，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古人阅读古书，是既注意到内容，也注意到形式的，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讲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里面既有思想内容方面的东西，也有艺术修词方面的东西。韩昌黎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观察，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观察也包含着他对古书的要求。他观察到的艺术修词方面的东西，文章风格方面的东西，是难以今译的。如果把王维、孟浩然等的只有短短二十个字的绝句译成白话文，我们会从中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至于原诗的音乐性，更是无法翻译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限度"。不承认这个限度是不行的。

今译并不是对每一个读者都适合的。对于一般读者，他们只需要懂得古书的内容，读了今译，就能满足需要了。但是，那些水平比较高的读者，特别是一些专门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不管是研究古代文学、语言，还是研究哲学、宗教，则一定要读原文，决不能轻信今译。某些只靠今译做学问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应该受到我们的怀疑吗？

西方也有今译，他们好像是叫做"现代化"，比如英国大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有现代化的本子。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他们古书不太多，可能没有这个需要。

中国古代翻经大师鸠摩罗什有几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我认为，这几句话是讲得极其中肯、极其形象的，值得我们好好玩

味。

总之,我赞成今译,但必有限度,不能一哄而起,动辄今译。我们千万不要做嚼饭与人,令人呕吐的工作。

1991年12月11日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东方文化的问题。虽然我并不是什么文化学家，自己不擅长义理，对义理兴趣也不大，我是敬鬼神而远之；但是，由于自己是一个天生的“杂家”，翻看不少的有关文化的书籍，使我不得不考虑东方文化的问题；细说起来，我考虑的有东方文化的特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我的初步认识已经写成了几篇论文，在一些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上也讲过。出我意料的是，国内外反应相当强烈，而且几乎都是同意我的看法的。这更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决心继续探讨下去。

详细阐述，此非其地。我只能极其简略地讲上几点。归纳起来，我的想法大体上是，在人类五六千年的文化史上，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的数目相当多。根据我的看法，人类总共创造了四个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而思维模式又是一切文明或文化的基础。简而言之，我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这在医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西医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完全把人体分割开来。用

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治脚,脚痛治头,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两者的对立,十分明确。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文明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消逝的过程。历史上,哪一个文明或文化都不能万岁。

我还有一个想法是,从人类全部历史上来看,东西两大体系之外,没有第三个大体系,而东西两大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或文明到了衰微和消逝的阶段,接之而起的必是西方文化或文明。等到西方文化或文明濒临衰微和消逝的阶段时,接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或文明。

我最后的一个想法是,到了今日,世界面临着另一个世纪末,二十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我之所谓"代",并不是完全地取代,更不是把西方文化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矫正其弊病,继承它的一切有用的东西。用综合思维逐渐代替分析思维,向宇宙间一切事物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再靠近一步。这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就将从二十一世纪开始。

极其简略地说,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同时,我还发现,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的偏颇之处。他们之中有的人提倡模糊学,有的人提倡浑沌学。内容我无法在这里详细阐述。他们的想法不可能同我的完全一样;但是其间相似之处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新兴的西方边缘科学,强调普遍联系,强调整体概念,与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是非常接近

的。为什么习惯于分析思维方法的西方有识之士会忽然转变看法呢？我的解释是，存在决定意识。到了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到了二十世纪的世纪末，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发展的事物，其发展规律更接近事物的真相。这种规律反映到西方有识之士的心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些新兴学科。

上面讲的是东方文化，现在谈东方文学。

文学本来属于文化范畴，东方文学当然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为了突出文学，所以分开来谈。

我想先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温庭筠的名句：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描绘深秋旅人早起登程的寂寞荒寒之感，到了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然而并没有失去其感人之处。这两句诗十个字列举了六件东西，全是名词，没有一个动词。用西方的语法来衡量，连个句子都成不了。这六件各不相干的东西平铺直叙地排列在那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清楚，换句话说就是模模糊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美就美在模糊。诗人并没有把这六件东西排好位置，他把安排位置的自由交给了读者。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自己的理解，去任意安排位置。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所安排的位置也决不会相同。读者有绝对的完全的自由来放开自己的幻想，美就在其中矣。反之，如果一定把六件东西的位置安排得死死的，这会限制读者的自由，美感享受从而为之减少。我认为，这就是东方综合的思维方式或者模糊的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元代马致

远的那一首著名的曲是大家都熟悉的:

>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曲中列举了很多东西,其位置都是模糊的。勉强搜求,只有"下"和"在"二字可以算是动词。这一首曲对读者审美活动所起的作用,同上举温庭筠的诗完全一样,用不着再详细阐述。

中国诗歌中其他例子不再举了。

我想举一首中国诗,同它的英译文对比,从中窥探出中西语言之不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语言的不可穷尽性和朦胧性(借用陶东风同志的用语)。陶东风同志有一部非常精采的书:《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里面就有现成的例子。我且做一个文抄公,从中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李白的那一首非常著名的诗《静夜思》:

>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陶东风的解释是:

> 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诗,诗中的人称和时态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体被隐去,可以是诗人,可以是别的他,也可以是你自己;动词"举头"、"望"、"低头"、"思"等词都没有时态的限制,它的时间性是灵活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补充,如果你把诗的主人公理解为诗人,那么,时间当在过去;而如果你设想自己正置身于诗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那么,时

间也可以是当下。但此诗的英译却把这不确定不落实的一切都确定了,落实了:

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 ——
Could there have been a frost already
Lifting myself to look, I found that it was moonlight.
Sinking back again ,I thought suddenly of home.

译诗加上"I"(我),使原诗不确定的人物关系变得确定,即只能理解为李白自己;"found"和"thought"是否译得准确且不去管他,单是把不确定的时态限定为过去时,就使诗的意境大为逊色;"望"本可以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而用"found"(发现)就使之变成一个终止于过去的动作;"思"也是如此。一个连续性的思念变成了"突然想到"(thought suddenly of),不能不使人感到沮丧。

陶东风的解释,基本上符合我的想法。他未必知道我那一套关于东西方文化的看法,他也没有提到综合思维模式和西方思维模式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诗歌的看法却是如此地接近,难道这就是所谓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吗?我在本文开头讲到,思维模式是一切文明或文化的基础。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当然就是东方文明或文化的基础,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不确定性和朦胧性。西方文学使用的西方语言是分析思维模式的产物,它同东方文学,比如说中国文学所使用的汉语是完全不同的。两者比较起来,正如我在上面分析的那样,中国的汉语有明显的优越之处。

我在这里还要添上几句。现在西方新兴的模糊学、浑沌学等等,其思想基础不像是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而接近东方的综合思维模式。何以产生这个现象,我在上面已略加解释,这里不再谈了。

我在上面曾提到我的一个想法: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而兴。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的东方文学怎样呢?过去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现在的考虑也不成熟。无论如何,东方语言,比如说汉语,是无法被西方所接受的。从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上来看,物质文明容易输出,也容易被接受,中国的几大发明可以为证。而精神文明则较为困难。在精神文明的接受中,因事物之异而异。比如绘画、音乐、建筑风格等等容易被接受。而文学,特别是文学语言,则十分困难。美国近代诗人 Ezra Pound 曾模仿过中国诗歌的创作方法,主要就是我在上面讲到的温庭筠的诗和马致远的曲。但是影响也不十分显著。用分析性的语言模仿综合性语言的诗歌,恐怕是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吧。至于将来的发展如何,那是以后的事,我不是算命先生,就此打住吧。

1992 年 4 月 24 日写完

对于《基督的最后诱惑》的意见

围绕着卡赞扎基斯的作品,特别是《基督的最后诱惑》的争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这一位新希腊的大作家,对待人生的态度十分严肃。他一心一意想弄清楚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想弄清楚灵与肉的矛盾问题。他通过了一生的学习和实践,经过了几个巨大的转折,从基督教→尼采→柏格森→佛→列宁→奥德修斯,终于又回到了基督教;同时又经过了自己的认真严肃的实践,最后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认识。这种认识他已写入几部长篇小说中。

在探究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方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即使利用宗教资料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是未可厚非的。在钦定某某教为国教的国家里,可以例外。比如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伊朗,曾出现过宗教领袖霍梅尼判处英国作家拉什迪(《撒旦诗篇》的作者)死刑的事件。关于此事,我们只能尊重伊朗人民的宗教感情,作为非穆斯林的外国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国教,不可能说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是,信教自由,不信教也自由。信奉某一个宗教的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互相尊重,各行其是。这样来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共同携手,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在过去,我们中国也曾出现类似《基督的最后诱惑》的事件。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出关》,写的是道教尊为老祖的老子。他

对老子出关的故事有自己的解释。但是，从来没有听说有任何道教徒出来抗议。1929年，山东省出现了曲阜二师演出林语堂所著《子见南子》剧本的风波。曲阜孔氏六十户族人代表呈请国民党教育部控诉二师校长宋还吾。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鲁迅先生对此事十分关注。他搜集了与此事有关的呈文、训令、记者采访的记录等所有的文件（见《鲁迅全集》卷8）。他的同情显然是在宋还吾一面。他对"强宗大姓"孔家（实际上是有国民党大官僚自命为孔子裔孙的孔祥熙为后台）的胜利十分不满，愤愤不平。

我举以上两个例子，意在说明，此事不但外国有，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今天再次发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吃惊。听说，《基督的最后诱惑》不但在美国出版，而且耗巨资拍成电影，轰动一时。美国一些虔诚的教徒也有挺身出来抗议并且扬言要杀人者。但是电影照放不误。美国政府置之不理。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同在中国不同。虽然没有"国教"之称，却是大多数国民所信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多少也有点参考价值。

我读了一点本书的汉译本。我觉得，这是一部严肃的文学创作。解放以来，我国研究外国文学成绩辉煌；但是对当今希腊文学的介绍，却还是如凤毛麟角。这一部汉译本的出现，多少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卡赞扎基斯在本书的自序中说："灵与肉的斗争，反叛与反抗，和解与屈从，最后达到最高的目的——与上帝合一，基督就是这样一步步上升到最高境界，他召唤我们跟随着他的血迹，也走这样一条路。"他又说："如果我们想追随基督，就必须深刻理解他经历过的斗争，就必须重新经历一次他受过的苦难。"他还说："我写下了这一剧烈痛苦的自白和人类伟大的希望，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态度之严肃。他决不是想反叛基督教，他只是想对基督牺牲精神做一个新的解释。

总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宗教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应该是"双百方针",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何况这一部书并不是中国作家创作的。原文是新希腊文,已经被译为许多语言。中国作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应该阅读,而且完全有权利阅读这一部书。如果个别信徒对此书有反感,他们有权利不去阅读。我在上面讲到,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非宗教信徒无权强迫宗教信徒读他们所不愿意读的书。反过来,宗教信徒也无权禁止非宗教信徒阅读他们愿意阅读的书。何况这一部书已流行全世界,谁能禁止中国读者阅读此书及其他文字的译本呢?在双方相互尊重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安定团结。

作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已经表示,愿将此书改为内部发行。我个人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为了顾全大局的让步。如果想再越过这一条线,在我们社会主义中,似有极大的不妥之处。我相信,全国有识之士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1992年5月7日

对于《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的一点意见

拜读了本刊(指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编者)第36期伍铁平、范俊军两先生的评申小龙先生部分著述的文章,受益不少。他们在文章中谈到了不少的问题,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对任何学科来讲,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端正的讨论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有益无害的。人类学术之所以有进步,之所以不断进步,关键就在于讨论,甚至争论。如果故步自封,划地为牢,则学术决不会有进步的。

因此,对于在某一个学科内敢于提出新见解的人,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鼓励,而不是指摘,鼓励并不等于承认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正确的。这是不可能的。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在学术上的新见解,决不可能一出世就十全十美。发扬正确的方面,纠正甚至于完全推翻不正确的方面,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在评论一种新见解或者与个人看法不同的见解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决不应与此相反。更不应该像我们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那样扣帽子。扣帽子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不幸的是,我在伍、范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就发现了扣帽子的现象。我先引一段原文:

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

> 大得多，除开对汉语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外，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语言学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汉语、日语、印地语等东方语言学著作，他们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语言研究状况了解得不多，申怎么能轻易断言，“当代语言学的钟摆正摆向东方”呢！这同国内有人说“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一样，反映了一种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我们万万不可因批判要将中国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就提倡将世界东化。（页37—38）

轻轻的或者重重的一顶“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的帽子就这样扣了下来！不图在十年浩劫中流行的手法又见之于今天！我实在觉得非常遗憾！“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即使这些话完全是真实的，难道就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吗？如果我学习伍、范两位先生的做法也来祭起一顶帽子：“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请问伍、范两位先生，你们能承受得了吗？这种极端恶劣的做法，诚不应该为我们所取！

蒙伍、范两位先生笔下留情，没有点我的名字。我现在投案自首，对号入座。两位先生所谓“国内有人”，指的就是我。我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欢迎讨论。但是必须首先丢掉帽子，屏除罗织，对我的想法有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了解。

1992年6月30日

对余太山中亚研究的看法

从国际上来看，中亚(包括中国新疆)史地的研究，算是一门起步比较晚的学科。十九世纪末年，1899年出版的罗思和斯克兰二人合著的《亚洲的心脏》，还成不了多大气候。连著者本人后来都并不满意。

但是，从那时起，欧洲的所谓“探险家”接二连三地到中亚，到中国新疆来“探险”，所到之处，做了不少发掘工作，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古物。这个地区古代文化情况，特别是文化交流的情况，乃逐渐大白于天下。欧洲学者根据“探险”取得的材料，在很多方面都写出了比较有水平的学术著作。引起了全世界学人的瞩目。

我们中国学者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按时间先后来说，中国学者注意研究“西北史地”，早于欧洲学者。在十九世纪末叶就有一些人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后来还有人利用了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

在研究中亚史地方面，中国学者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也有其不足之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历史的民族。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我们的史籍汗牛充栋，记载的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而且也有大量周边国家的历史记载。所谓“中亚”也在其中。中国学者使用这些资料，自然比较得心应手。外国学者是难以做到的。中国学者不足之处就是很少通解中亚古今语言。这一点最近几年已有所改进。我们出了一批青年学者，既通中国古代史籍，又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通晓中亚语言。这是中国学术

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决不可低估。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某一些外国学者在这方面藐视我们。现在在事实面前，再也不敢狂妄了。由此可见，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与发扬爱国主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余太山同志就属于这样一批青年学者之列。他既能使用中国古代史籍，又能利用当前外国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能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卓有建树的中国青年学者切磋琢磨，从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写了不少的论文，写成的专著迄今共有两种：

一、《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

二、《塞种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

书中涉及极其广泛的问题。对一些中外学术界争论极久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见解，为国内外同行们所瞩目。做到这一点是颇为困难的，没有艰苦努力再加上真知灼见，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在余太山研究的问题中，有几个全世界著名的难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月氏问题，不少国家的不少的学者都写过文章讨论这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旁征博引，引用中国史料——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引征中亚古代语言资料，洋洋洒洒，垂数万言而不止。德国学者 Gustav Haloun 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到头来，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迄无一个大家都承认的结论。余太山不回避困难，他敢于班门弄斧，写出了文章，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

有的人很关心学术与政治的问题。生硬地提出这个问题，无助于学术的发展。当前我们国家一批搞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等比较冷僻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并没有把政治挂在嘴上，然而他们埋头苦干，做出了成绩，外国某一些原来抱有偏见的学者，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中国学者的成就。这无形中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增了光。难道这不是最好的政治吗？

余太山就属于这一类学者。

1992年7月7日

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

当前中国青年正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纪末，二十世纪的世纪末。

所谓世纪和与之相联系的“世纪末”，完全是人为地造成的，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上一个世纪末，十九世纪的世纪末，世界上，特别是文化中心的欧洲，却确实出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更为显著，比如文学创作之类。

到了今天，一百年过去了，另一个世纪末又来到了我们眼前。世界形势怎样呢？有目共睹，世界上，特别是在欧洲，又出现了一些特异的，甚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政治方面，存在了七八十年的苏联突然解体了，东欧国家解体的解体，内讧的内讧，等等，等等。在经济方面，人们也碰到了困难。难道这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在寰球激荡中，我们中国相对说来是平静的。这正是励精图治，建设我们国家的大好时机。但是，有一些现象也不容忽视，我指的是社会风习方面。在这方面，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有识之士早已惄然忧之，剀切认为，应当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

在不良风气中，最使我吃惊的是崇洋媚外。这种极端恶劣的风气，几乎到处可见。我们中华泱泱大国过去的声威，现在不知哪里去了。我坚决反对盲目排外那种极端幼稚可笑的行动。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来看，我们的先民都是肯于，善于，敢于学习外国的好东西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无远弗届历久不衰，其根源就在这里。到了今天，外国的好东西，特别是在科技方面的好东

西,我们必须学习。不但现在学,而且将来也要学,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眼前是什么情况呢?学习漫无边际,只要是外国东西,一律奉为至宝。给商品起名字,必须带点洋味,否则无人问津。中国美食甲天下,这一点“老外”都承认的,连孙中山先生都曾提到过。然而今天流行中国市面的却是肯德基、麦当劳、加州牛肉面、比萨饼。门市一开,购者盈万。从事涉外活动的某一些人,自视高人一等。在旧中国,“华人与狗,不许人内”,立这样的牌子的是外国侵略者。今天,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树立这样牌子的却是某一些中国人自己。

哀莫大于心死,我们某一些人竟沦落到这样可笑又可怜的地步了吗?

上面这种情况,你可以说是在新旧文明交替时代不可避免的。这话有几分道理,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是,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必须敢于面对现实,不屈服于这个现实,不回避这个现实。我认为,在这里,关键是提高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对祖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认识。我们要得到一种完全实事求是的、不偏不倚的,深刻而不是肤浅的认识。

尽人皆知,祖国文化是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认识祖国文化,必须从宏观上来看,“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鼠目寸光,不能只看眼前。我国汉唐时期,文化广被寰球。我最近看到了一则报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根据最新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唐代的长安(今西安)面积比现在大二十倍。这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长安真是当年世界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万国商贾会萃于此,交流商品,交流文化。八方风雨会长安,其繁荣情况至少可以与今天的纽约、巴黎、柏林、东京相媲美,何其盛哉!

据我自己的思考,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失去光辉是从1840年鸦

片战争开始的。在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不必说了。那时候流行的是“东化”,而不是今天的“西化”。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1827年1月,欧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可以说是欧洲文化化身的歌德,在同爱克曼谈话时,还盛赞中国文化,盛赞中国伦理道德水平之高,认为远非欧洲所能比。仅仅在十三年之后,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把鸦片送了进来,中国这一只貌似庞然大物的纸老虎被戳破了。从此中国的声望在只知崇拜武力的欧洲人眼中一落千丈。

在这以前,中国的某一些人,特别是那几位皇帝老子,以及一些贵族大臣,愚昧无知,以为自己真是居天下之中,自己真是真龙天子和天上的星宿下凡,坐井观天,不知天高地厚,骄纵狂妄,可笑不自量。可是,一旦当头棒加,昏眩了一阵以后,清醒过来,就变成了另外的人。对洋人五体投地,让洋人的坚船利炮吓得浑身发抖。上行下效,老百姓中也颇有一些人变成了贾桂。

旧社会有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自尊自爱,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健康的。中间几经变乱,特别是十年浩劫,把中国人的思想又搞乱了。到了今天,就发展成了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岂不大可哀哉!

我们究竟怎样看待西方文明呢?首先我们对人类历史上文明或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明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有一个诞生,成长,繁荣,衰微,消逝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是如此。

在欧洲,自从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不管是在科学技术领域里,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西方人都获得了极其辉煌的空前的成就,他们把人类文化

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上。一直到今天，西方文化还占有垄断的地位。世界各国，包括我们国家在内，无不蒙受其影响。上而至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等等，下而至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西方资本主义和以后的帝国主义，对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那是另一本帐，我认为，可以与西方文化分开来算。

这样的西方文化是不是就能万岁千秋永远繁荣下去呢？根据我上面谈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那是决不可能的。西方文化也会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的。而且据我看，这个衰的过程已经露出了端倪。西方有识之士也已承认，自己的文化并非万能。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它也并不能解决。两次杀人盈野的大战都源于欧洲，就是一个具体的证明。有人主张，资本主义能够自我调节。这是事实，但是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正如人们服食人参鹿茸，只能暂时生效，不能长生不老。

就连西方文化表现得最突出的自然科学方面，西方人，甚至一些东方人，认为那就是真理，可是有许多自然现象它仍然解决不了，比如中国的气功和特异功能，还有贵州傩文化的一些特异现象。把这些东西说得神乎其神，我并不相信。但是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却也无法否认。

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方文化的情况就是这样。人类文化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呢？

我不搞意识形态的研究，探讨义理，非我所长。但是，近几年来，一些社会和自然现象逼着我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一部人类文化史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文化不外两大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则是分析的思维模式。所谓“综合”，其核心是强调普遍联系，注重整体概念。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拿治病来做个例子，头痛可以医脚。所谓“分析”，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只是一个极其概括的说法，百分之百纯粹的综合思维或分析思维是没有的。

此外，我还发现，在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曾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方文化逐渐取代了东方文化，垄断世界达数百年之久。现在似乎是渐渐成了强弩之末。济其穷者必然是而且也只有东方文化。

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东方文化消灭西方文化。那是完全荒谬绝伦的。我只是想说，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纠正分析的思维方式的某一些偏颇之处，能够解决西方文化迄今无法解决的一些自然和社会问题，把人类文化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决非一代人或几代人在一两百年内就能完成的。我认为，下一个世纪就会是一个转折点。

今天的青年是迈向一个新世纪的一代新人，这个任务的开端工作就落在他们肩上。

1992年7月8日

佛典中的“黑”与“白”

羡林按：

明年是著名学者汤锡予(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我虽然不是锡予先生的正式学生,但是我读过先生的很多著作,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深远的影响。1946年我来北大任教,实出于陈寅恪先生和锡予先生以及胡适之先生的提挈。我曾听锡予先生讲授“魏晋玄学”,一堂课没有缺过,并且认真做了笔记。因此,我自认为是先生的弟子。在纪念先生百年冥寿之际,一介学弟拟出版纪念论文集。此乃学坛盛事,实慰下怀。一介让我写篇文章,我欣然应命。但窃以为纪念论文集文章以短为宜,于是就根据多年搜集的资料,写此短文,滥竽论文集中,谨表对锡予先生仰止之敬意。

1948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现收入拙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页309—311)。我在里面讲到朱子教人用白豆黑豆来“系念”,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起一恶念,则投黑豆。我认为,这个办法来自印度佛教。我举了《贤愚经》卷十三的一个例子。我的结论是:“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

后来翻阅汉译佛典,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类似的例子,更足以证

成我的前说。我现在再举出几个例子,稍加诠释,并引申谈一谈佛典中的“黑”与“白”。

《摩诃僧祇律》卷十三:

> 羯磨已,此比丘应作二种色筹:一者黑,二者白。不应唱言:非法者捉黑筹,如法者捉白筹。应如是唱:如是语者取黑筹,如是语者取白筹。(㊅22,334b)

如果觉得这不够清楚,我再从对应本中举出一个例子。《十诵律》卷三十五:

> 若比丘已作行筹人,随僧多少应作二种筹:一分长,一分短;一分白,一分黑。说如法者,为作长筹;说非法者,为作短筹。说如法者,为作白筹;说非法者,为作黑筹。(㊅23,254b)

所谓“筹”,是小竹片。这里讲的是用投筹的办法来裁决和尚中的争端。我不讲裁决的过程,因为那同我要讲的无关。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这里,黑筹和白筹尽管用途不一样——黑豆和白豆以及黑白石子象征的是恶念和善念,黑筹与白筹和善恶念头无关——可是黑仍然表示反面的近乎恶的东西,而白则表示正面的近乎善的东西,东西不同,含义则一。关键不在东西,而在颜色。

白黑象征善恶,还表现在其他场合。我举几个例子。《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九:

> 苾刍当知,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是故苾刍应离纯黑及黑白杂业,当勤修学纯白之业。(㊅23,674b)

对几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业"，梵文 karma，巴利文 kamma，指的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异熟"，也译为"报"或者"果报"，梵文和巴利都是 vipāka，我们平常所谓"报应"。"白业"，指的是善行，"黑业"，指的恶行。善行得善报，恶行得恶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反复说明这个善恶报应的道理，参看㊅23，814b；827b；837b 等等。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二，更言简意赅地说明："汝等苾刍当知，黑业还得黑报；若行白业，还得白报。"（㊅23，1029b）

"黑"，梵文，kṛṣṇa，巴利文 kaṇha；"白"，梵文 śukla，巴利文 sukka。"黑业"，梵文 kṛṣṇa-karma，巴利文 kaṇha-kamma；"白业"，梵文 śukla-karma，巴利文 sukka-kamma。"黑异熟（黑报）"，梵文 kṛṣṇa-vipāka，巴利文 kaṇha-vipāka；"白异熟"，梵文 śukla-vipāka，巴利文 sukka-vipāka。同在其他语言里一样，白的颜色总是同"光明"联系在一起，引申为"善"。黑的颜色总是同"黑暗"联系在一起，引申为"恶"。

黑白不但同业报相联系，而且还同人的思维直接联系。《那先比丘经》说："因知善恶，知当所行，别知黑白思惟"。（㊅32，697c）有时甚至同"出家""在家"联在一起。

在中国，黑白有时也有类似的含义；但决不像佛典中这样具体，这样复杂；用途决没有这样广泛。

1992 年 7 月 14 日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据说全世界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超过五百多个。这就等于没有定义。根据我粗浅的理解，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就叫做文化。

文化的产生

笼统地说，对文化产生不外有两种看法，一是一元产生论；二是多元产生论。

一元产生论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产生文化，这就是nordic(北欧人)。其他民族都不产生文化，甚至是文化的破坏者。这是德国法西斯的"理论"，自然为我们所不取。

我是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的。世界上任何民族，不论大小，都能产生文化，都对人类总体文化有贡献。但是，各民族产生的文化，在质和量上，又各自不同，甚至有极大的悬殊，这是历史事实。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科学态度。

文化的交流

自从有人类那一天起，就有文化交流。一个人在获取食物方面有了一个新的方法，别人学习，这就是交流。这当然是最简单最原始的交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逐渐形成了氏族、部落等等。氏族与部落也有文化交流。以后形成了民族，形成了国家。民族与国家之间也有文化交流。这是更大范围的、内容越来越丰

富的文化交流。一直到今天，文化交流还在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以至形成了眼前的光辉灿烂的五光十色的人类文化。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寿命越来越延长。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最主要的力量。

文化的体系

尽管文化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创造出来的；但是归根结蒂，这些文化却形成了或者结成了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文化体系。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人类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这些体系是：

一、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含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与发展)；

二、印度文化体系；

三、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

四、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

两大文化体系

以上四个文化体系，如果再归纳一下的话，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上面的一、二、三三个文化体系；第二个是西方文化体系，就是上面的第四个。

人类自古以来的文化，尽在此矣。

两大文化体系的同与异

两大文化体系相同的地方是，都为人类造福，都提高了人的本质，都提高了人类的生活和享受水平，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两大文化体系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我认为，

最根本的不同却表现在思维模式方面，这是其他一切不同之点的基础和来源。一言以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comprehensive)，而西方则是分析的(analytical)。正如人类只能有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人类也只能有两个思维模式，不能有第三个。这种二分法，好像是大自然以及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国《易经》讲乾坤，也就是阴阳。自然界有日月，昼夜。宗教哲学伦理有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等等。

所谓综合思维，其特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整体概念与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用医学来打个比喻：头痛可以医脚，反之亦然。

所谓分析思维，其特点就是抓住物质，一个劲地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是不是还能再往下分呢？在这里，科学界和哲学界意见都有分歧，一派主张物质无限可分，一派主张有限。这种分析的思维模式，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再用医学来作比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维模式的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印度古代哲学宗教的"你就是它"——指宇宙，也表现了同一思想。印度佛教的名相分析，看似分析，深究其实，则与西方的分析迥乎不同。

对东方文化的看法

现在主宰世界的是西方文化。这是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但这只能是一时的现象。西方人轻视东方文化，实出于民族偏见。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轻视东方文化，则是短见。如果看问题能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则能看到事实的真相。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中国在汉唐时期，长安(西安)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也是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自明末西学东渐开始，情况逐渐有了变化。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日本认真学习西方文化，自 1868 年明治维新开始，时间早于中国，成绩大于中国，直到今天，科技浸浸乎将据世界首位矣。

河西河东行将易位

西方人挟其科技优势，自命为天之骄子。然而，据我的看法，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文化能延长万岁千秋，从下一个世纪开始，河东将取代河西，东方文化将逐渐主宰世界。西方人自认为他们那种以分析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科学和哲学是绝对真理，然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许多现象和问题，他们并不能解决。这一点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比如德国的施本格勒(Spengler)、英国的汤因比(Toynbee)等等。西方最近几年兴起的一些新兴学科，比如模糊学、混沌学等等，也表现了同一个朕兆。我认为，这些新兴学科，尽管内容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却表现了某一些共同的思维特点，这些特点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典型的分析的思维模式，而是表现出近似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比如主张普遍联系，有了一些整体概念。

人类文化发展的前途

我说，自二十一世纪起，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完全铲除或者消灭西方文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的做法是继承西方文化在几百

年内所取得的一切光辉灿烂的业绩，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

人类文化总会不断地前进的，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停步不前的，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1992年8月4日

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国际性的，所谓“汉学”或“中国学”，也不能例外。中国学者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当然有其得天独厚之处。但也难免有观察不周的缺点。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往往能使用新资料，观察往往能有新角度，从而获得独到的成果。

过去冯承钧先生以毕生精力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作，使不能直接读法文著作的中国学者获益良多。他们同声赞叹，对冯先生的翻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翻译直至今日也没有失去其价值。

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其成绩决不下于法国学者。过去虽间有人加以翻译、介绍，但为数不多，使不能阅读日文著作的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不便。

现在刘俊文同志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丛书，在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的赞助下，在中国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协同努力下，已由中华书局刊行。我们对中华书局，对日本河合塾，对刘俊文同志必须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1992年8月30日

历史研究断想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作者。50多年以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探讨。但是,到了今天,年届耄耋,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结论相距极远。

大家都承认,今天我们对古代史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前人。换言之,离开古代越远,则对古代史的了解越深刻,越细致,时代差距与了解正成反比。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归纳起来,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研究的指导思想随时在变,越变越准确,越精细,从而也就越能实事求是。大而言之,利用历史唯心主义作指导思想,与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其结果大不相同,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名副其实的,决不能作教条主义的、肤浅的、僵化的理解。最近四五十年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由于教条与僵化,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第二,研究的手段也随时在变。我举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搜集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搜集得越齐全,越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怎样才能搜集得齐全呢?过去有很长一段时期是靠学者的记诵之功。后来出现了索引,这大大地有助于资料的搜集。但仍难免有所遗漏。最近若干年来有了电脑,只要

把一部书输入,则查检起来必能竭泽而渔,决不会有任何遗漏。

第三,新材料的发现越来越多。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考古发掘,但也不限于此,比如孔壁古文就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专就考古发掘而论,世界上可以发掘的地方多如牛毛,中国当然也是如此。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地下埋藏的历史,比我们已知的还要多。

以上三个方面,仅仅是荦荦大者。其他次要的原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记得章实斋曾经说过:“六经皆史也。”这个说法得到了近代学者的赞同。六经是我国形诸文字的最集中的文化载体,研究中国古代史是绝对离不开的。但是,我们对六经的理解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看汉人的解经,难免有离奇荒诞之感。司马迁作《史记》,引了一些《书经》里面的话,都不是原封不动,而是加以“当代化”。以后,到了清代,经过了许多朴学考据大师的诠释,才了解得多了不少。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学者敢口出大言,说自己完全了解。《书经》如此,其他诸经以及别的古典文献,莫不皆然。孔壁古文的发现,汲冢周书的发现,后来敦煌古籍的发现,接踵而至。每一次发现都能增加我们对古书的了解。至于考古发掘工作在这方面的贡献,更是尽人皆知。这样的发现将来还会不断地出现。因此,我们根据目前能得到的资料所做的结论,都必然只能是暂时的。

考古发掘工作对历史研究有巨大贡献,最突出、最具体、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新疆的考古发掘。原来我们对于这一带的历史地理情况,通过中国的古籍,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实物,不管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都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加深了我们的认识,对这个地区的古代史地情况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上面讲的多是空洞的理论。我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子

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能多举，仅举一个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有很长时间都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这也算是一个结论吧。但是事情是不是真就是这个样子呢？很可能不是。在解放前，唐兰先生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这一部书中，就曾提出了中国文字可能产生在夏代以前的观点。当时意见极不相同，但由于资料不够多，无法做出结论。最近我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8 期第 19 页读到胡厚宣先生的一段话，我现在引在下面：

> 目前已知甲骨文有十五万件，最近又新发现了一个藏甲骨的大坑。甲骨文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说文》中的六书，甲骨文都已具备。看来在甲骨文以前就应有原始文字。所谓苍颉造字，很可能他是研究整理当时文字的专家。现在豫、晋、陕、鲁等地都发现了史前文字，可材料太少，未能与甲骨文联系起来。可以推论，甲骨文之前文字已有了很长历史。现在需要考古、历史、地理各界联合起来，共同寻找炎黄时代的古文字。

这不过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但是，我相信，它会有举一反三的作用。

总之，我想说的无非是，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第一，不能认为任何结论都是真理，不可动摇；第二，必须敞开思想、放远眼光，随时准备推陈出新，改变以前的所谓结论；第三，我们必须随时注意新材料的发现，不管它是来自考古发掘，来自新发现的古籍，还是来自某一个地方偶然发现的石碑、墓碑等等；第四，我们必须随时注意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特别是国外的报刊杂志。

我在这里想着重指出考古发掘的重要性，有人告诉我说，往往

有这种情况,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某一个地方,经过艰苦的劳动和细致的探索,写出了发掘报告,把发掘的情况和发掘出来的实物,都加以详尽准确、科学的描述,作为发掘报告,有极高的水平。但是往往不把这些发掘结果应用到历史研究上来。结果给外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素材。他们利用了这些素材,证之以史籍,写出了很高水平的历史专著。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国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真应该认真对待。最好的做法当然就是,自己发掘,自己研究,自己利用。

我的这些想法可能都是肤浅的。一得之愚,仅供参考而已。

1992年9月21日

"天人合一"新解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哪一个也回避不开。但是,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解释和阐述,却相当分歧。学者间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理解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几乎没有哪一个哲学史上的命题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下面先简略地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然后介绍一下几个有影响的学者对这个命题的解释,最后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新解"吧。对于哲学,其中也包括中国哲学,我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站在哲学门外向里面望了几眼的好奇者。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往往有非常奇怪的,真正的内行"司空见惯浑无事",对一些最常谈的问题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而外行人则怀着一种难免幼稚但却淳朴无所蔽的新鲜的感觉,看出一些门道来。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很容易解释,在人类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并不稀见。我希望,我就是这样的外行人。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命题的来源和含义。

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人",容易解释,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凡人。"天",却有点困难,因为"天"字本身含义就有点模糊。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笔下,天有时候似乎指的是一个有意志的上帝。这一点非常稀见。有时候似乎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志的自然。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我相信这八九不离

十,离开真理不会有十万八千里。这对说明问题也比较方便。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哲学家,使用"天"这个字,自己往往也有矛盾,甚至前后抵触。这一点学哲学史的人恐怕都是知道的,用不着细说。

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来源,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这是很有见地的话,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解来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意思就是,不限于思孟,也不限于儒家。我先补充上一句: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为了方便起见,我还是先从儒家思想介绍起。《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

孔子对天的看法有点矛盾。他时而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不言而四时行,而万物生。他时而又认为,人之生死富贵皆决定于天。他不把天视作有意志的人格神。

子思对于天人的看法,可以《中庸》为代表。《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孟子对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子思的衣钵。《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人力做不到达不到而最后又能使其成功的力量,是人力之外的决定的力量。孟子并不认为天是神;人们只要能尽心养性,就能够认识天。《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是当时儒家的代表。是

他认真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天人感应说,有时候似乎有迷信色彩,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

到了宋代,是中国所谓"理学"产生的时代。此时出了不少大儒。尽管学说在某一些方面也有所不同。但在"天人合一"方面,几乎都是相同的。张载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

宋以后儒家关于这一方面的言论,我不再介绍了。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思想不限于儒家。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么在儒家之外,其他道家、墨家和杂家等等也都有类似的思想。我在此稍加介绍。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说: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看起来道家在主张天人合一方面,比儒家还要明确得多。墨子对天命鬼神的看法有矛盾。他一方面强调"非命"、"尚力",人之富贵贫贱荣辱在力不在命。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天志"、"明鬼"。他的"天"好像是一个有意志行赏罚的人格神。天志的内容是兼相爱。他的政治思想,比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也有同样的标记。至于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说:"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这里又说:"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吕氏是主张自然(天)是与人相应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介绍这样多。我不是写中国哲学史，不过聊举数例说明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而已。

不但中国思想如此，而且古代东方思想也大多类此。我只举印度一个例子。印度古代思想派系繁多。但是其中影响比较大根柢比较雄厚的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印度使用的名词当然不会同中国一样。中国管大自然或者宇宙叫“天”，而印度则称之为“梵”(brahman)。中国的“人”，印度称之为“我”(Ātman，阿特曼)。总起来看，中国讲“天人”，印度讲“梵我”，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印度古代哲学家有时候用 tat(等于英文的 that)这个字来表示“梵”。梵文 tatkartṛ。表面上看是“那个的创造者”，意思是“宇宙的创造者”。印度古代很有名的一句话 tat tvam asi，表面上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你就是宇宙”(你与宇宙合一)。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我是小我。奥义书中论述梵我关系常使用一个词儿 Brahmātmaikyam，意思是“梵我一如”。吠檀多派大师商羯罗(Śaṅkara，约公元 788—820 年)，张扬不二一元论(Advaita)。大体的意思是，有的奥义书把“梵”区分为二：有形的梵和无形的梵。有形的梵指的是现象界或者众多的我(小我)；无形的梵指的是宇宙本体最高的我(大我)。有形的梵是不真实的，而无形的梵才是真实的。所谓“不二一元论”就是说：真正实在的唯有最高本体梵，而作为现象界的我(小我)在本质上就是梵，二者本来是同一个东西。我们拨开这些哲学迷雾看一看本来面目。这一套理论无非是说梵我合人，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请参阅姚卫群《吠檀多派哲学的梵我关系理论》，《南亚研究》1992 年第三期，页 37—44)

从上面的对中国古代思想和印度古代思想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使用的名词不同，而内容则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我个人认为，

这种思想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专就中国哲学史而论，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哪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也回避不开"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要想对这些学者们的看法一一详加介绍，那是很难以做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在下面先介绍几个我认为有代表性的哲学史家的看法，然后用比较长一点的篇幅来介绍中国现当代国学大师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他的意见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首先介绍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冯芝生(友兰)先生的意见。芝生先生毕生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等身，屡易其稿，前后意见也不可避免地不能完全一致。他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皇皇巨著，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过程中，随着时代潮流的变换，屡屡改变观点，直到逝世前不久才算是定稿。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那许多版本的异同。我只选出一种比较流行的也就是比较有影响的版本，加以征引，略作介绍，使读者看到冯先生对这个"天人合一"思想的评论意见。我选的是1984年中华书局版的《中国哲学史》。他在上册页164谈到孟子时说："'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语，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认真重视，认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看来他并不以为这种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其他意见不再具引。

第二个我想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他在《中国思想通史》(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一卷，页380，谈到《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引用了《中庸》的几段话，其中包括我在上面引的那一段。在页381侯先生写道："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神上面加上了一层'修道之谓教'。"看来这一

位中国思想史专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与欣赏水平，并没能超过冯友兰先生。

我想，我必须引征一些杨荣国先生的意见，他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御用哲学家的意见。他是十年浩劫中几乎仅有的一个受青睐的中国哲学史家。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年，人民出版社)可以代表他的观点。在这一部书中，杨荣国教授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古代哲学家一竿子批到底。他认为孔子“要挽救奴隶制的危亡，妄图阻止人民的反抗”(页25)。孔子的“政治立场的保守，决定他有落后、反动的一面”(同上)。对子思和孟子则说，“力图挽救种族统治、把孔子天命思想进一步主观观念化的唯心主义哲学”。(页29)“孟子鼓吹超阶级的性善论”。(页34)“由于孟子是站在反动的奴隶主立场，是反对社会向前发展的，所以他的历史观必然走上唯心主义的历史宿命论”(页35)。“由是孔孟之道更加成为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要彻底砸烂这些精神枷锁，必须批判孔孟哲学，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页37)。下面对董仲舒(页74—84)，对周敦颐(页165—169)，对程颐(页171—177)，对朱熹(页191—198)等等，所使用的词句都差不多，我不一一具引了。这同平常我们所赞同的批判继承的做法，不大调和。但是它确实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潮，读者不可不知，所以我引征如上。

最后，我想着重介绍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

钱宾四先生活到将近百岁才去世。他一生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他真正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著作等身”，对国学研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涉猎方面极广，但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轴心。因此，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他那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著述中，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天人合一”。我不可能一一列举。我想选他的一

种早期的著作,稍加申述;然后再选他逝世前不久写成的他最后一篇文章。两个地方都讲到“天人合一”;但是他对这个命题的评价却迥乎不同。我认为,这一件事情有极其重要的含义。一个像钱宾四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在漫长的生命中,对这个命题最后达到的认识,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

我先介绍他早期的认识。

宾四先生著的《中国思想史》(《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一辑)中说:

> 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主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内在于人生界之本身,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者共同者而言,此可谓之内向觅理。

书中又说:

> 中国思想,则认为天地中有万物,万物中有人类,人类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为人类中心,人类不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又为其中心之中心。而我之与人群与物与天,寻本而言,则浑然一体,既非相对,亦非绝对。

在这里,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加任何评价。大概他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之处。

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宾四先生在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八月第四期,页93—96)中,对“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有了全新的认识。文章不长,《中国文化》系专门学术刊物又不大容易见到,我索性把全文抄在下面:

〔前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适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

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生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生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

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以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义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我抄了宾四先生的全文。此文写于1990年五月。全抄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读者得窥全豹。我不敢擅自加以删节,恐失真相。

我们把宾四先生早期和晚期的两篇著作一对比便发现,他晚

年的这一篇著作，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大大地改变了。他自己使用"澈悟"这个词，有点像佛教的"顿悟"。他自己称此为"大体悟"，说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又说"此事涵义广大"，看样子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当然都非常希望知道，这"澈悟"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可惜他写此文以后不久就谢世，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谜。宾四先生毕生用力探索中国文化之精髓。积八十年之经验，对此问题必有精辟的见解，可惜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他在此文中一再讲"人类生存"。他讲得比较明确："天"就是"天命"；"人"就是"人生"。这同我对"天""人"的理解不大一样。但是，他又讲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把"天"与"自然"等同，又似乎同我的理解差不多。他讲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认为"欧洲文化近于衰落"，将来世界文化"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一点也同我的想法差不多。

宾四先生往矣。我不揣谫陋，谈一谈我自己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希望对读者有那么一点用处，并就正于有道。我完全同意宾四先生对这个命题的评价：涵义深远，意义重大。我在这里只想先提出一点来：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来在这一点上我同宾四先生意见是不一样的。

我怎样来解释"天人合一"呢？

话要说得远一点，否则不易说清楚。

最近四五年以来，我以一个哲学门外汉的身份，有点不务正业，经常思考一些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思考与宾四先生提出的"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相似的问题。我先在此声明一句：我并不是受到宾四先生的启发才思考的，因为我开始思考远在他

的文章写成以前。只能说是"不谋而合"吧。我曾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我的想法,在许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也发表了一些讲话。由最初比较模糊,比较简单,比较凌乱,比较浅薄,进而逐渐深化,逐渐系统,颇得到国内外一些真正的行家的赞许。我甚至收到了从西班牙属的一个岛上寄来的表示同意的信。

那么,我是如何思考的呢?

详细的介绍,此非其他。我只能十分简略地介绍一下。我从人类文化产生多元论出发,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管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

一、中国文化

二、印度文化

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

四、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

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

式则正相反。

现在我回到本题。“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我理解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我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

人，同其他动物一样，本来也是包括在大自然之内的。但是，自从人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顿觉自己的身价高了起来，要闹一点“独立性”，想同自然对立，要平起平坐了。这样才产生出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成为“万物之灵”之前或之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取给于大自然，衣、食、住、行，莫不皆然。人离开了自然提供的这些东西，一刻也活不下去。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关系之密切、之重要。怎样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

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炼的表述。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十年河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时移势迁，沧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钱宾四先生所说的：“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十年河西”。世界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

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人不能把其他动物都视为敌人，要征服它们。人吃一些动物的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古至今，东方的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就反对杀牲，反对肉食。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鸟兽表示同情的表现，在在皆有。最著名的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对鸟兽表示出来的怜悯与同情，十分感人。西方诗中是难以找到的。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表现了同一种感情。

东西方的区别就是如此突出。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对人类的得寸进尺永不餍足的需求，大自然的忍耐程度并非无限，而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以内，它能够满足人类的某一些索取。过了这个限度，则会对人类加以惩罚，有时候是残酷的惩罚。即使是中国，在我们冲昏了头脑的时候，大量毁林造田，产生的后果，人所共知：长江变成了黄河，洪水猖獗肆虐。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西方的有识之士，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直到最近，已经感到西方文化行将衰落。钱宾四先生说：

“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他的忧虑同西方眼光远大的人如出一辙。这些意见同我想的几乎完全一样,我当然是同意的,虽然衰落的原因我同宾四先生以及西方人士的看法可能完全不相同的。

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 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有一位语言学家讽刺我要“东化”。他似乎认为这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之举。愧我愚陋,我完全不理解: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决不应妄自尊大。但是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不应当囿于积习,鼠目寸光,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这我期期以为不可。

多少年来,人们沸沸扬扬,义形于色,讨论为什么中国自然科学不行,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都认为这是一件事实,不用再加以证明。然而事情真是这样吗? 我自己对自然科学所知不多,不敢妄加雌黄。我现在吁请大家读一读中国当代数学大家吴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 年第四期)。大家从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

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对“天人合一”这个重要的命题的“新解”，就是如此。

1992年11月22日写毕

在“纪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七十周年暨俗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对于民间文学是个外行。钟老对我很推心,找我参加。后来段宝林同志也找我。今天本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再三请我参加,我推掉了,而是到这里来。我感到很高兴,见到了很多多年不见的人,而且还有我的老师。钟老是我的老师,杨堃教授也是我的老师。

我不想讲那么多话,只想讲两点比较实际的。第一点是歌谣的用处。刚才几位同志都讲了,我看了些文章,大家都强调歌谣对文学创作的用途,其中有一条讲的是采风。封建社会里的采风,实际上是搞民意测验。它也反映了一点真正的民意。现在我们国家反映民意的渠道很多,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们是反映了民意。是否全面?恐怕也不是。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新歌谣还是要采一采风。前段日子王蒙在《随笔》上写了一篇文章《也算下情》,里边讲到:最近两三年有些顺口溜很流行,话说得不太好听:“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后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下边还有,我就不说了。这里边恐怕是流露了一定的真情。搞研究我想是应该重视搜集这些歌谣的,不用担心,“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没什么坏处。

还有一点:我想现在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有中文系,每个大学都应办出自己的特点。国外是这样,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有重点的系,重点的系里有重点的学科。解放后我

国人学对于文学的研究，我想北大是一个重点，还有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像俗文学，我很孤陋寡闻，我想是否北大是一个中心，北师大有钟老在，也是一个中心，别的大学就不清楚了。现在在座的都是搞文科的，我想以后我们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要搞得大平均，对重点系、重点学科应重点支持。教委也在抓重点学校，这很有必要。

1992年12月17日

祝贺《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出版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祝贺《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的出版。

几年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全国各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一些外国友人的热烈欢迎，原因很简单：这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响亮，提得全面，提得及时。

跟着口号来的是行动，而这次的行动同过去有点不同。它来得迅速而且普遍。这口号真正拨动了中华民族的心弦。反应焉得不迅速而且普遍！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所表示，而文化界出版界则是一马当先。开会，座谈，撰文，出书，一时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对这个口号的反应上，爱国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至。

在所有的出版物中，我们这一套《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巍然屹立，独树一帜。出版消息一经传出，国内外征订者纷至沓来，前赴后继，洛阳纸贵，可预卜矣。

当今出版业务并不能说是很景气的，严肃认真的出版物并不是很畅销的。我们这一套书为什么能独受读者的青睐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不外四端：曰新，曰大，曰精，曰全。

何以曰新？皇皇八巨册图像，有的当然是已经印过多次的，我们也见过多次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称之为“新”。不亦可乎？

何以曰大？全书十六开本，分装八册，共有三千多页，图像数百张。其重量一个老年人是火不动的。难道这还不算大吗？

何以曰精?纸张精,印刷精,装帧精。图像印刷之精,至少在中国来说是空前的。彩色鲜艳,细入毫丝。有些我以前见过的图像,这次重逢,由于印制精美,好像换了样子。看这样的图像,简直是最高的美的享受,不称之曰精,又能称之为什么呢?

何以曰全?全书八册,分八个部分:始祖、神农、钟鼎、通市、社稷、文渊、世风、颐寿。我们的古代文明尽收其中。毫无缺漏,此谓之全。

不管本书多么新,多么大,多么精,多么全;但这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弘扬祖国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新、大、精、全,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祝贺《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的出版。

1992年12月31日晨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七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90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境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

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零丁，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

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

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六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颠颠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

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

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昆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乱，鸡犬不宁。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军国主

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五卅惨案。高中关了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

此时日军当然就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决不能理解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

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在我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鲁迅写的序。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60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

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忿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京（北平）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坎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我来投考的那一年，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七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与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

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吴宓先生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郑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

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级。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县宝”，每年津贴我50元。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四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像，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

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四个国文教员，每人教三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三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三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16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32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定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

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 1935 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级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呆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此地信美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 120 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月 800 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

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件,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

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我天天挨饿，夜夜作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窝、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 Prof. E. 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按岁数来讲，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机，通过了口试，布朗恩口试俄文和斯拉夫文，罗德尔口试英文。考试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怀念我的家庭。此时邮政早已断绝。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却是"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事实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这大大地增强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药量，与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时英美的轰炸已成家常便饭，我就是在饥饿与轰炸中写成了几篇论文。大学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当了兵。过了没有多久，男生有

的回来了,但不是缺一只手,就是缺一条腿。双拐击地的声音在教室大楼中往复回荡,形成了独特的合奏。

到了此时,前线屡战屡败,法西斯头子的牛皮虽然照样厚颜无耻地吹,然而已经空洞无力,有时候牛头不对马嘴。从我们外国人眼里来看,败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无力了。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说,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点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彻底完蛋了,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又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点昏昏然、懵懵然。

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6年,现在终于闭幕了。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10年了,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几经交涉,美国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

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含泪登上美国吉普。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十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呆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呆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11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11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三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

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11年的北京。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35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受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败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进化的规律。1949年春，北京终于解放了。

在这3年中，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我习惯的说法是，前一截是旧社会，共38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我无法给我的一生划上句号。

为什么要分为两截呢？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40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

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走过了漫长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

则可以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原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父母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

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

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

到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党的威信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有的话说得并不好听。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结果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徒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20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

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拣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5年饿,“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人,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30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

资的数目还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岗山"，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大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

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

这种变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现过一次。

在"老佛爷"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至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什么人的"革命路线"。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又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里写过："为了保卫什么人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完全是真诚的，半点虚伪也没有。

同时，我还有点自信：我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怀着冒险、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挺身出来反对那一位"老佛爷"。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来"的。

没想到，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这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佛爷"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

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 1976 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 40 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40 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 40 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在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 40 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

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20世纪生活了80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80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1993年2月17日写完

专而又通的榜样*

今天我来参加纪念郭老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目的是向郭老致敬。但是林甘泉同志一定让我讲话，对我来说实在是诚惶诚恐。因为郭老是文化巨人和科学的伟大的人物，对他的造诣，我实在是仰之弥高，不敢赞一辞。但是既然讲话，我就简单地讲两点：

第一点：《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成立距今已经将近40年。老的编委，我知道还有三位，一位是刘大年同志，一位是白寿彝同志，一个就是我。郭老是主编。我与郭老解放初期接触时，主要是通过《历史研究》编委会。编委会开会有时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室，有时在郭老家里。郭老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绝对没有给我留下"我是院长，我是科学家"的印象。

1955年，中国一个大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郭老是团长。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与郭老接触比较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平易近人。这是我们应该向郭老学习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中国过去讲究三绝，即诗、书、画——作诗、写字、画画三绝。要做到这三绝是比较难的。但是中国过去有不少人超过了三绝。首先是苏轼，是四川人。郭老也是四川人。四川是出天才的地方。我对苏轼作过统计，他诗、书、画、词、文，应该是五绝。

---

* 这是作者在"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郭沫若研究》编辑部周亚琴同志据录音整理，将收入《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

文嘛，大家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可是我对郭老就统计不出他有多少绝。总之他超过了苏轼。苏轼没有郭老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郭老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我在大学工作快半个世纪了。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大注重专，对于“通”这方面有点忽视。我们要培养通人。专是要专的，可是专而不通就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郭老在这方面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总之，郭老在专和通两方面都做了榜样，我们应该很好地向他学习。

1993 年 3 月

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去年夏天，我应人民日报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到长江豪华游轮峨嵋号上去参加一个有关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国际研讨会。我们途经武汉和荆州，然后在宜昌上船，开始学术讨论。

在武汉，我们参观了黄鹤楼和博物馆。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许多出土的文物，其中有许多青铜器和名震世界的编钟。我大为惊诧，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心中兴奋，非言语所能表达。

我们从武汉到了荆州。在那里又参观博物馆，看到了更多的更精美绝伦的从古墓里出土的青铜器，我的惊诧又上了一个台阶。在这里又看到了编钟，并且听了演奏。这一套编钟计65件，分层悬挂着。这套编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音域最宽的、具有12个半音音阶的特大定调乐器。美国音乐家麦克·克来恩教授说："曾侯乙编钟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圣山"，并誉之为"世界第八奇迹"。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也说："希腊的乐器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可是希腊的乐器是竹木的，到现在不能保存下来，只有中国的乐器还能够使我们听到两千年前的声音。"可见世界上音乐大家对编钟评价之高。能产生"世界上第八奇迹"和其他许许多多精美铜器的地方，一定会有异常雄厚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这是不辩自明的。古代的楚国是文化辉煌之邦，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

我在参观时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必须重写。

楚国，也可以泛泛地说中国的南方，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占的地位怎样呢？有目共睹，它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在所有的

中国通史中，比如郭沫若的，范文澜的，吕振羽的、翦伯赞的，尚钺的，以及比这些书更早一点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统统都是文化北方中心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或南方文化已经勃然兴起。再重弹北方中心论的老调，已经不行了，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从别的方面着眼，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楚辞》。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丰厚的、肥沃的，而且又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是决难以出现的。屈原的著作幻想瑰丽，描绘奇诡，同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文风迥乎不同。勉强打一个比方，北方接近现实主义，而《楚辞》则多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恐怕是许多人能接受的。

屈原的作品中，无论是在词句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有一些北方作品中不见的东西。比如《天问》中的许多神话，根据中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同外国的颇多相似之处，其中很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如《离骚》一开头就有"摄提贞于孟陬兮"这样的句子。"摄提"一词，确有点怪。是否与天竺天文有关？学者们有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不再一一列举了。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至晚到了周代，楚文化或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域外的文化交流也已经有了一些。在这些方面，至少可以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然而在学者们的历史著作中，从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南方仍然是蛮荒之地，在文化上上不得台盘。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情的。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古代史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就主张：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1993年4月8日

在跨越世纪以前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再过七年就要跨越到二十一世纪了。所谓"世纪末",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世纪?如果没有世纪,又哪里来的"世纪末"?可是一旦有了"世纪末",这个"末"字似乎真具有了一点神力。上一个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学艺术界和思想界确实出现了些异乎寻常的现象,带有一点末世颓废的色彩。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且不去说它。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纪末怎样呢?当前世界上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异乎寻常的现象,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一个超级大国一夜之间解了体,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们国家和我们个人身上,情况并不怎么明显。我们国家确实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在一个世纪内打了两次规模空前的大战,杀人盈野,血流成河。可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难道我们不应当在跨越世纪以前认真地反思吗?

拿我们国家来说,在过去一个世纪内,我们经过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洪宪帝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波谲云诡,蹭蹬多磨,一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才算是找到了一条路。找到的这一条路,可惜也并不平坦,仍然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特别是十年浩动,把我国固有的优秀文化破坏得百疮千孔,连经济也被破坏到崩溃的边缘上。其恶劣影响,至今犹在。今后怎样呢?我们希望,我们要

走的路会平坦一些。

至于我们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知识分子,我们走过来的是一条艰难困苦的道路。1949 年以前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我们度过了一段极为兴奋极为欢欣鼓舞的时光。可是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了四十多年,一直走到现在。幸亏中国知识分子有几千年的热爱祖国的传统,为其他国家所未有,我们平平静静,怨尤不多,在内心深处盼望我们国家富强起来。

谈到我个人,除了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些共同的期望和憧憬以外,还有我自己的一套想法。我不是搞哲学的,对东西方的哲学和文化问题,即使不完全是门外汉,最多也只能说是一知半解。可是,近几年来,不知怎么一下子心血来潮,忽然考虑起东西方文化来。因为毕竟不是内行里手,所以考虑是逐渐展开的。最初只不过是一点一闪念,用一句诗的语言来说,可以称之为"灵感的火花"吧。

我这"火花"是什么样子呢?我最初觉得,东西方文化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而所有的文化都不能是永存不朽的,都有一个诞生、成功、繁荣、衰竭、消逝的过程。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数目颇多。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前者的思维模式或思维基础是综合的,后者是分析的。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来说,前者是"合二而一",后者是"一分为二"。前者的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后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倘若仔细观察,这个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两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两句话有人不赞成。然而,我却认为,这不是个理论,而是历史事实。理论可以反对,而历史事实则只能承认。

西方文化，在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之后，把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各国人民无不蒙受其利。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必须承认的。

然而，今天的西方文化，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它迟早也会消逝的。而且据西方少数有识之士的看法，到了今天，到了这个新的世纪末，已经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

这种情况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与西方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威胁着人类生存前途的那些致命的弊端，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的警惕。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臭氧层的破坏，大森林的砍伐，海洋的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淡水资源的匮乏，酸雨的横行，新疾病的出现，等等，等等。这些弊端中的任何一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都能够使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何况多种齐头并进呢？

西方文化是怎样促使这些弊端产生的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它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它源于西方文化对大自然的态度。我觉得，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来自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这些东西，是绝对需要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索取的指导思想或哲学基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西方以自然为敌人，高呼要“征服自然”。但是，大自然这东西是非常怪的，你要征服它，它就以牙还牙，对你加以惩罚。西方文化依靠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目空一切，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自己是“天之骄子”，“征服”自然，征服了几百年，取得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于是忘乎所以，不辨方向。而自然的惩罚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以雷霆万钧之力劈了下来，我在上面

说的那些弊端，就是这种惩罚的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

而东方文化呢，至少在哲学基础上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基于我们的哲学基础，我们对大自然采取了同西方迥异的态度。我们把自然当做朋友，不把它当做敌人，不去“征服”它，而是去了解它，然后再从它那里索取一切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何以为证呢？我的证据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从先秦儒道墨等等各家共有的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我认为，宋朝的大儒张载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他在著名的《西铭》里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话甚至受到他的反对派程朱的赞扬。

今天,在这一个新的“世纪末”里,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已如上述。要挽救人类,必须改西方之弦,更张东方之弦,大力倡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我甚至敢毫不夸大地说:只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能够救人类。到了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之光必将普照世界。这就是我的信念。

但是,我的意思决不是想消灭西方文化。我们建设国家也必须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点是坚决不能动摇的。我只是想说,在西方文化迄今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改变指导思想,要同大自然做朋友,在利用西方科技时,取其优点,去其弊端,使人类文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还要强调一点:“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源于中国,然而也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其深远的意义,也不是每个人都遵守的。我们也干过不少违反这思想的蠢事,比如乱伐森林,破坏生态平衡等等,而且我们也已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洪水泛滥就是其中之一。总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必须大力宣扬。在大多数人掌握了以后,行动才能出现。有了行动,人类前途就有保障了。

这就是我在跨越世纪以前所想到的。

1993年4月12日

决不丢掉自己的本色

——祝《群言》出刊一百期

据说，全国现在有七八千种杂志，种类庞杂，良莠不齐。其中确有优秀者，但"四话"化者也不在少数。所谓"四话"者，即假话、大话、空话、废话也。按流行的办法，可以缩称为假、大、空、废。

我们的《群言》决不属于"四话"类，它还能讲一些真话，是与人为善的真话。它一不靠内幕新闻，二不靠秘闻和小道消息，专靠真理吃饭，一身正气，威仪俨然，一不潇洒，二不灵活。按道理说，这样的刊物是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的。

然而，事实上却正相反。它颇有一些热心的读者，而且已经出刊了一百期。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群言》这一瓶酒想必是相当香的，否则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读者到这样一个陋巷里来呢？同时，也必须指出，中国读者是有识辨能力的。

我热诚向《群言》祝贺。我希望，而且我也相信，它能出到二百期、三百期，以至更多的期，而决不丢掉自己的本色。

1993年4月24日

推荐《吴宓与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他集义理、辞章、考据于一身，著作影响广被。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家三代（祖陈宝箴，父陈三立）都以热爱祖国著称，在素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爱国楷模。

吴宓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诗歌理论家，东西比较文学的倡导者。他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识，当时与汤用彤共称“哈佛三杰”。其后陈吴二位宗师都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过。

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根据吴宓日记，撰成此书。将陈吴二位长达半个世纪的忠诚不渝的友谊加以翔实的纪录，成为研究二位学者的最可靠的资料，为其他任何资料所不能代替。

此书出版前曾有人估计，此种“冷僻”之书不会有很多人垂青，二位宗师的名字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也不熟悉。因而只印了二千册。二千册在今天中国出版界也不能算是很低的数目。但是，此书一出却大爆冷门。二千册转瞬售罄，求此书者仍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中国真正的读书人还是有的，真正的“识货人”也还是有的。此书之价值也由此可见。

从学术意义来看，此书抄录了不少陈寅恪的诗，为他处所不见者，又记录了一些陈寅恪对世事、对人生、对文化等等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中是难以找到的，这对于研究陈寅恪的著作和思想，很有裨益。吴宓的学术观点，以及他对于世事、人生、文化、爱情等的观点，当然更保存了不少。对研究吴宓的著作和思想，也有不可估量

的意义。所有这一些资料对将来撰写《中国近现代学术史》都有很大用处,这样一部书迟早总会要写的。

1993年4月

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

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且涉及的方面非常广。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学者，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交流的情况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探讨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果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过去探讨过分集中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方面，对科技，特别是对医学，似乎有所疏忽。

1936年，周济先生在《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我国传来印度眼科术之史的考察》，利用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对印度眼科医术传来中国的过程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叙述，开阔了我们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眼界。但是，这一篇重要论文仍似乎有些不足之处，这就是，它讲的只限于中印两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重视不够。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感兴趣，多年以来，积累了一些资料。现在就根据我搜集的资料，作一点补充。见于周文的资料一般不再重复。

我想从唐杜环的《经行记》谈起。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杜环在怛逻斯之战中被大食兵俘虏。762年回国，把他在大食等地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名叫《经行记》。在本书六、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一章中有几句话：

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中国的正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新唐书》，221下，《西域传》下：

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

取材可能就来自《经行记》。

这两个地方都讲到“开脑”。什么是“开脑”呢? Meyers 认为是针刺。但是,根据 F. Hirth 的意见,这很可能指的是“环锯”(trepanning),就是开颅。这种开颅治病的办法,在古代南美印加人中间似乎就用过。在使用金属以前的时期,有些地方甚至用石头开颅,在意大利就是如此。古希腊 Hippocrates 也讲到过开颅的手术。可能是通过景教徒,这种技术传播开来。这些景教徒以善医著称。他们曾将希腊医书译为阿拉伯文,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途径,他们得知 Hippocrates 的说法。总之,在古代亚洲,特别是从中近东到印度一带,这种“开脑”的方法相当流行。[1]杜环的《经行记》和《新唐书》中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有文化,就会有交流。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医学的交流在历史上也是非常习见的现象。专就印度和中国而论,在后汉三国时期,佛教一传入中国,同时也就传来了印度医学。一些最早来华的外国僧侣都会一点医学。这实际上是一种传教的方法。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也同佛教一样,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办法而获得成功。

在印度,从很古的时代起,就有非常高明的医学,有理论、有实践、有典籍,在人类文化史上放射出异样的光辉。在医学诸分科中,眼科似乎更为突出。[2]这种水平很高的印度医学,包括眼科在内,就在长达数百年的期间内陆续传入中国。这方面的记载相当多,散见于《高僧传》中者也有一些。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与针刺有关的例子,因为我在下面还要谈到针刺治眼病的问题。梁慧皎《高僧传》卷四,《于法开传》:

又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危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开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其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㊀50,350a)

这是晋朝的事情。到了唐朝,印度医法继续传入中国。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相当多,散见于《高僧传》等书中者也有一些。我在下面只举几个例子,以概其余。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一,《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传》:

时为太子染患,众治无效。下敕延颇入内,一百余日,亲问承对,不亏[3]帝旨。疾既渐降,辞出本寺。(㊀55,853b)

上引书,卷十四《三藏沙门达摩战坦(涅)罗传》:

学通三藏,善达医明。……进奉方术医方梵夹、药草经书,称惬天心。……弟子比丘利言随师译语,方药、本草,随译上闻。(㊀55,878b)

上引书,卷十二,《那提传》:

显庆元年(656年)敕经昆仑诸国采异药。(㊀55,863b)

《开元释教录》,卷九,《菩提流志传》:

阴阳、历数、地理、天文、咒术、医方,皆如指掌。(㊀55,

570a。《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菩提流志传》文全同）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照传》：

> 见唐使人引卢迦溢多于路相遇。卢迦溢多复令玄照及使傔数人向西印度逻荼国取长年药。（㊅51，2a）

上面是几个深通医术的印度和尚的情况。印度医学的一般情况，也通过中国游学印度的僧人传来中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行》介绍了印度医术的一般情况：

> 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下力。（㊅54，223b－c）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针刺首疾"，义净在后面又加上了一句："首疾但自在头。"这说得更清楚了。

在唐代，印度医学影响中国，决不只是上面说的这一些。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中说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种温汤疗疾的办法，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而印度又由中亚学来。[4]这同我上面说的开颅疗疾的医术一样，先流行于古代中近东一代又传至印度。

下面我集中谈一谈眼病和由头疾而引起的眼病的治疗方法。在古代，印度眼科久负盛名，一方面是印度人民自己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还有外来的影响。针刺疗疾印度好像是有悠久的传统，上面提到的于法开就是一个例子。唐朝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特别讲到了"针刺首疾"，把针刺和头病联系起来。此时印度的

眼科大夫已经来到了中国。唐代一些非常著名的诗人，诗中有咏眼病之作。如杜甫《谒方公上方诗》，白居易《病眼诗》，李商隐《和孙朴韦蟾孔雀咏》，刘禹锡《赠眼科医婆罗门僧》等等。这些诗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是谈到金篦或金锟，一件是谈到《龙树论》。谈到"金篦"，当然指的是治白内障的工具。读到《龙树论》，则指的是关于眼病的一部书。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2有：

> 《龙树眼论》三卷　晁氏曰：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治七十二种目病之方。

这里治的眼病竟有七十二种之多，白内障只是其中之一。

龙树菩萨的《眼论》或者《眼经》，当然是一部印度著作。根据周济的意见，这一部书流传印度，当在隋唐之间，其为隋唐间人所译，应无可疑。[5]这一部书见于许多书目中。

除了直接翻译印度的眼科著作以外，中国医学家的著作中也引用印度的说法。最著名的一部书是唐王焘的《外台秘要》。王焘约生于670年，卒于755年。本书第二十一卷是专门讲眼科的。一开始就有"天竺经论眼序"一首，后面加上的解释是"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胡僧"指的显然是印度大夫。

在其他一些书中，也有关于"胡人"治目疾的记载，比如日本僧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就有：

> 时大和尚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㊅51，991c)

这是治眼失败的一个例子。这里治的不是白内障，不必用金篦。

是否是针刺?不得而知。"胡人",一般学者都认为就是印度人。"大和上",指的唐代高僧鉴真。

以上是一些关于眼病的例子。也还有由于头疾引起的眼睛失明的例子。《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

> 永淳二年(683年)三月,上苦头重,不可忍。侍医秦鸣鹤曰:"刺头微出血,可愈。"天后帷中言曰:"此可斩!欲刺血于人主首耶?"上曰:"吾苦头重,出血未必不佳。"即刺百会。上曰:"吾眼明矣!"

这个故事见于许多书籍。首先是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之九,"谀佞"第二十一说:

>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6]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高宗甚愧焉。

这同《旧唐书》讲的是一回事,而叙述较详细。至于时间,这里只说:"高宗末年。"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唐高宗,系此事于弘道元年(683年),内容基本一致,资料来源想即《大唐新语》。但元弘道元年,则似有所疏忽。按《旧唐书》应为"永淳二年",本年十二月才改元弘道。《旧唐书》置此事于改元之前。

唐高宗这个故事，讲的是治头疾，而兼及眼睛，所以高宗才说："吾眼明矣。"

这同我上面所讲的"开脑"有什么关系呢？开颅手术在现代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古代却是神奇的。然而又确有其事，不能否认。大秦人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中国《三国志演义》也有华佗"开脑"的故事。至于"出虫"，则恐是幻想。连"开脑"这件事，在某些地方，恐怕有的也是针刺的夸大，不可尽信。不管怎样，唐代印度眼科医术已传至中国，而且流行相当普遍。至于针刺治眼病，可能部分来自印度，而印度的这一部分也有外来成分，它在古代中近东一带已经流行。

1993 年 5 月 3 日

注　释

〔1〕Friedlich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Leipsic & Munich,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301—304。

〔2〕参阅周济，上引论文，页 54—58；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年，页 178—181。

〔3〕此据《续高僧传》，卷三，《波颇传》。原书作"下"，误。见㊅50，440b。《续高僧》的记载与《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全同。

〔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一章，《长恨歌》，页 20—23。

〔5〕上引论文，页 56。

〔6〕张文仲医学著作尚存在一些断片，见方斯年编译《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 年，页 113—139，日本黑田源次著《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

推荐十种书

一 《红楼梦》

《红楼梦》是古今中外最优秀最杰出的长篇小说。我不谈思想性，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只谈艺术性。本书刻画人物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人物一开口，虽不见其人；但立刻就能知道是谁。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实无其匹。

二 《世说新语》

这也是一本奇书。当时清谈之风盛扇。但并不是今天的"侃大山"，而要出言必隽永有韵致，言简而意深，如食橄榄，回味无穷。有的话不能说明白，但一经说出，则听者会心，宛如当年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

三 《儒林外史》

本书是中国小说中的精品。结构奇特，好像是由一些短篇缀合而成。作者惜墨如金，描绘风光，刻画人物，三言两语，而自然景色和人物性格，便跃然纸上。尤以讽刺见长，作者威仪俨然。不露笑容，讽刺的话则入木三分，令人忍俊不禁。

四　李义山诗

在中国诗中,我同曹雪芹正相反,最喜欢李义山诗。每个人欣赏的标准和对象,不能强求一律。义山诗词藻华丽,声韵铿锵。有时候不知所言何意,但读来仍觉韵味飘逸,意象生动,有似西洋的pure poetry(纯诗)。诗不一定都要求懂。诗的词藻美和韵律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汉诗还有一个字形美。

五　李后主词

后主词只有短短几篇。他不用一个典故,但感情真挚,动人心魄。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言似夸大,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后主,他也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没有多大分量。但是,如果缺一个后主,则中国文学史将成什么样子?

六　《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发而为文,遂成《史记》。时至今日,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历史最是无情的。

七　陈寅恪《寒柳堂集》

八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融铸今古。他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乾嘉朴学大师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扬了西方近代考据之学,实又超出二者之上。他从不用僻书,而是在人人能读人

人似能解的平常的典籍中,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即他常说的"发古人之覆"。他这种本领达到了极高明的地步,如燃犀烛照,洞察幽微,为学者所折服。陈先生不仅是考据家,而且是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实超过许多哲学家。

九　德国 Heinrich Lüders(吕德斯) Philologica Indica(《印度语文学》)

在古今中外的学人中,我最服膺,影响我最深的,在中国是陈寅恪,在德国是吕德斯。后者也是考据圣手。什么问题一到他手中,便能鞭辟入里,如剥芭蕉,层层剥来,终至核心,所得结论,令人信服。我读他那些枯燥至极的考据文章,如读小说,成了最高的享受。

十　德国 E. Sieg(西克)、W. Siegling(西克灵)和 W. Schulze(舒尔茨)Tocharische Grammatik(《吐火罗语法》)

吐火罗语是一种前所未知的新疆古代民族语言。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一些残卷,字母基本上是能认识的,但是语言结构,则毫无所知。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协作,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日日夜夜,终于读通,而且用德国学者有名的"彻底性"写出了一部长达 518 页的皇皇巨著,成了世界学坛奇迹。

1993 年 5 月 29 日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今年春天,我在新创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天人合一"新解》(以下简称《新解》),阐述了我最近对东西文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大概仍然属于野狐谈禅之类。不意竟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剑虹、向云驹等先生相告)。同时,我自己也进一步读了一些书。我并无意专门搜集这一方面的资料,资料好像是自己跃入我的眼中。一经看到,眼明心亮。我自己也有点吃惊:资料原来竟这样多呀!这些资料逼迫我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到,东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是当前国内热门话题之一,国外也有类似倾向。最近一两年内,我曾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研究东西文化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同声相求,同气相应,颇有一些意见相同者,窃以为慰。但是,兹事体大,决非一两个人,在一两年内,就能获得比较满意的解决的。因此,把我进一步考虑的结果以及新看到的一切资料,搜集起来,对《新解》加以补充,会是有益的。

这就是这篇论文产生的根源。

我的做法是,先补充一些资料,然后再分别介绍李慎之先生一篇文章和郑敏先生一篇文章。最后讲一点纳西族的哲学思想。

补　　充

我在《新解》中引用了不少中国资料;但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

人物，宋代的张载，却只提了一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张载是宣扬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深刻最鲜明的代表，是万万遗漏不得的。我现在来弥补一下。

张载是宋代的理学大家之一。在遵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条条框框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中，他一向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我对这种愣贴标签的、把哲学现象过分简单化的做法是不敢苟同的。这且不去说它。我现在引他一些话，补《新解》之不足。

天人合一思想在张载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表现。比如在《正蒙》中他说："爱必兼爱。"他又说："物无孤立之理"，意思就是，事事物物都互相联系。这同我多次提到的东方文化的特点：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是一个意思。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鲜明、最深刻的例子，是张载著名的《西铭》（后收入《正蒙》中）。《西铭》极短，我不妨全文抄出：

>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张载就补充这样多。在当时，张载同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意见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是对张载这种鲜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程朱也是赞赏的。可见这种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深入人心的。

现在我想补充一点关于日本的资料。日本深受中国宋明理学

的影响，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陌生。这一点在讲日本思想史的书中，在许多中国学家的著作中，很容易可以找到，无需我再加以详细论列。前不久，我接到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哲学和日本学专家仓泽行洋博士的新著《东洋と西洋》，其中有的地方讲到天人合一：第一章，“世界观の东西”，13 众生本来佛；14 万物我と一体。我请人[1]把 14 译为汉文，附在这里，以供参考：

14 万物与我一体

这样，在佛教中认为人与万物并无差别，同为佛，实质上同为一物。当然，我们即使不以佛作为依据，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同样可以发现人与万物本质上完全相同。

譬如，在印度有一种古老的哲学，叫“奥义书”。这种哲学出现在佛教尚未形成之时。奥义书哲学的根本理念、根本思想就是 ātman 与 brahman 同一。ātman 就是自我的本质、我的实体。brahman 就是宇宙的原理，译为“梵”。这里就是讲我与梵，自我的本体与宇宙的原理是相同之物。日本明治时代的某位学者把它称为“梵我一如”。奥义书思想之本就在于“梵我一如”。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表现。“梵我一如”也是我、人与人以外的万物完全相同的另一种讲法。

另外，还有一种十分简洁、十分明确的说法，这就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句话出自中国的一本古书(碧岩录)。此句的意义，我想是不说自明的。

与此十分相似的还有《庄子》中的一句话：“天地与我竝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万物皆一，万物一齐。”此处的万物中包含着人类。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从本质上看都是

相同的。“万物一齐”的“一齐”就是相同、相等之意,所以就等于说万物毫无例外都是平等的。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2]

现在补充一点关于朝鲜的资料。

朝鲜有比较悠长的哲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己本土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受到了邻国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儒家思想在三国时期已传入朝鲜,儒家的天命观影响了朝鲜思想。到了高丽末李朝初期,宋代程朱之学传入。作为宋代理学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在朝鲜占了上风。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比如李穑(1328—1396年)、郑梦周(1337—1392年)、郑道传(1337—1398年)等等,在他们的学说中,都有一些关于天地万物之理的论述;但是,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权近(1352—1409年)。他用图表来解释哲学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他把这张图摆在所有图的最前面,以表示其重要性。他反对天人相胜论。他说:

> 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

权近又提出了天人相类相通的学说,他说:

> 盖天地万物,本同一体,故人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天地之有灾祥,良由人事之有得

失也。人事得,则灾祥顺其常;人事失,则灾祥反其正。

他还说:

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天人之际,虽交相为胜,然人之胜天,可暂而不可常;天之胜人,愈久而愈定也。故淫者必不能保其终,而善者必有庆于后矣。

李朝前半期的哲学思想,以及那以后的哲学思想,仍然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天人合一"的色彩。[3]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东方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也是比较明确的。

补充就这样多。

在《"天人合一"新解》里,我论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我又补充了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我都谈到了。因此,我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主导思想,应该说是有坚实可靠的根据的。

我在下面介绍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李慎之教授的《中国哲学的精神》[4]。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讲一点琐事,也可以算是"花絮"吧。

我最初并不认识李慎之先生。只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理事会上见过几次面。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外交官,一个从事国际活动的专家,给我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前几年,台湾的星云大师率领庞大的僧尼代表团,来大陆访问。赵朴老在人民大会堂设素斋招待。排座位,我适与他邻座。既然邻座,必然要交谈。谈了没有几个回合,我心里就大吃一惊,我惊其博学,惊其多识,我暗自

思忖:"这个人看来必须另眼相看了。"

《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出版,在懂行者的人们中,颇引起一点轰动。报刊杂志上刊出了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上对陈吴二师的思想学术和交谊,做了一些探讨,极有见地,相当深刻,发潜德之幽光,使二师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我心中窃以为慰。

有一天,见到李先生。他告诉我,他看到我为那一本书题的封面,我在书名之外写上了"弟子季羡林敬署"。这本是一件微末不足道的小事,他却大为感慨。我小时候练习过毛笔字,后来长期在国外,毛笔不沾手者十有余年。我自知之明颇有一点,自知书法庸陋,从不敢以书法家自命。不意近若干年以来,竟屡屡有人找我写这写那。初颇惶恐觳觫,竭力抗拒。人称谦虚,我实愧恧。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不嫌丑,我就不脸红!"从而来者不拒,大写起来。但是、《吴宓与陈寅恪》却不属于这个范畴。为两位恩师的书题写书名,是极大的光荣。题上"弟子"字样,稍寓结草衔环之意。这一切都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进行的。然而慎之却于其中体会出深文奥义,感叹当今世态浇漓,师道不尊,十年浩劫期间,学生以打老师为光荣,而今竟有我这样的傻子、呆子,花岗岩的老脑袋瓜,仍遵古道,自署"弟子"。他在慨叹之余,提笔写了一篇关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的文章,寄了给我。不知何故,没能收到。他又把文章复制了一份,重新付邮,并附短札一通。文章的名字叫《守死善道强哉矫》,副标题是《——读〈吴宓与陈寅恪〉》。信与文章都是一流的。我现在先把信抄在下面:

季先生:

拙文于六月底草成后即寄上请正。既然没有收到,就再次挂号寄上。

上次信中,还写了一些对陈吴两先(生)表示钦仰的话,并

且希望两先生的老节能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操守立一标准。这次就都不说了。只是仍然深感自己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两先生的潜德幽光，滋有愧耳。

专此即颂

秋安

李慎之　1992年中秋夜

看了这封信，我相信，读者会认为我抄它是应该的。至于那一篇文章，我力劝他发表，现已在《瞭望》1992年第42期上刊出。我劝对陈吴两师有意研究了解者务必一读。我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有见解，有气势，有感情，有认识；对两先生毕生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对两先生生死全交终生不渝的友谊给予了最高的赞美。文章说：“陈先生的悲剧并不在他的守旧而正在于他的超前，这就是所谓‘先觉有常刑’”。真可以掷地作金石声！

这就是我认识李慎之的经过，这就是我认识的李慎之。

这“花絮”实在有点太长了。但是，我相信，读者读了以后，或许还有人认为，它还应该再长一点。

现在来介绍《中国哲学的精神》。

按照平常的做法，我应当先对本文加以概述，然后选取某些点加以详细评论，或赞同，或否定，或誉，或毁，个人的看法当然也要提到，于是一篇文章便大功告成。我现在不想这样办。我觉得，这样办虽符合新八股的规律，然而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大家不是常说“求同存异”吗？我想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求异存同”，并非想标新立异，实不得不尔耳。

说到“求异存同”，我又不得不罗嗦几句。李慎之先生在《守死善道　强哉矫》那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古人的话：“朋友，以义合者

也。”我认为，这是涵义深刻的一句话。但是，什么叫“义”呢？韩文公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这仍然是“妻者，齐也”同音相训的老套。我个人觉得，“义”起码包含着肝胆相照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说，朋友之间不说假话，要讲真实的话。慎之做到了这一点，我现在努力步其后尘。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介绍《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不谈本文，只谈《后记》。慎之说：“我过去看到季先生一些短篇论东西文化的文章，总以为他的思想与我大相径庭。这次看到他的长篇论述，才发觉我们的看法原来高度一致。”(原文页10，第二栏)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关于“高度一致”的地方，我就不再谈了。我现在专谈“高度不一致”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我归纳为以下三点，分别谈谈我的意见。

一　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问题

李慎之先生说：“季先生似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看得多了一点。”可我自己觉得，我看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是先知先觉。西方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而且提出了警告。不但今天是这样，而且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下面介绍郑敏教授的文章时，我还将谈论这个问题。这里就暂且不谈了。

前几天，我在香山召开的“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少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听到一位女士说，她最近读了一本外国某专家的书，书中列举了大量类似我在《新解》中所指出的西方科技产生出来的弊害，有说明，有理论，他最后的结论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末，人类就到了“末日”，实在让人惊心动魄。我还没有像他那样悲观，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我并非科技专家，也非社会学家。我所能看到的并且

列举出来的弊害，并不全面。虽然我在列举弊害时，往往在最后加上“等等，甚至两个“等等”这样的字样，看来是胸有成竹，种种弊害罗列心头，唾手可得。实际上是英雄欺人，是我要的一种手法。我限于能力，再也列举不出更多更具体更有力的证据了。

但是，就拿我所能列举出来的弊害来看，这些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而且还日益发展蔓延。这决不是我个人的幻想，而是有目共睹的。可怜当今世界上那些有权势的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大人物，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懵懵懂懂，如在梦中，仍然在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自我感觉极端良好哩。

慎之在《后记》中又提到：“去年六月讨论环境问题的全球首脑会议前夕，有一批当今世界上在各种学科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特地写信给首脑会议发出呼吁，认为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决不能为保护环境而抑制发表，否则将两俱无成。我是赞成他们的意见的。”[5]直白地说，我是不赞成他们的意见的，我期期以为不可。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绝对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from the very beginning)，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发展！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中国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手无策了。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

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唐僧取经。但同时又把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真无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西方科学家们决不能望其项背。他们那一套"科学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事实早已证明了:科学决非万能。

二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

李慎之先生说:"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和已经开始了。"[6]

笼统地说,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文化一经产生并且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融合;而只有不同的文化的融合才能产生更高一层的文化。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在这里,关键问题是"怎样融合"? 也就是慎之所说的"如何"(how)的问题。这也就是我同他分歧之所在。他的论点看样子是东西文化对等地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是酒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很美妙的。

但是,我却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

这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太不讲理了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话必须扯得远一点。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把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所创造的文明归纳为23种或26种。意思就是说,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永存不朽。这个观点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情况的。我归纳了一下,认为人类的文明或者文化大体上有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种消逝不是毫不留踪迹地消失了,而是留有踪迹的,踪迹

就存在于接它的班的文化中。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融合;但却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从的。

我们现在所说西方文化,是指汇合了古代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而发展下来的欧美文化。其思想基础是分析的思维模式。其繁荣期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有密切联系。这个文化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创造的物质财富使全人类皆蒙其利,无远弗届。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强调的。但是,中外少数有识之士,已经感到,到了今天,这个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它那分析的特点碰到了困难,一些西方的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封闭"的理论。我于此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不敢赞一辞。即使是还能分析下去,也决不能说永远能分析下去。那种"万世不竭"的想法,恐怕只是一种空想。反正一向自认为已经抓到了真理,无所不适、无所不能的自然科学家并不能解决或者解释自然界和人类躯体上的一切问题,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西方文化衰竭了以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自有东方文化在。

可是,李慎之先生在这里又提出了问题。他在《辨同异 合东西》这一篇发言里说:"首先是,所谓东方与西方文化究竟何所指,就很难弄清楚。"这话自有其道理。一直到今天,主张东西文化有别的人还没有哪一个能够条分缕析地,详实而又确凿地,令人完全信服地说出个道理来。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与研究。但是决不能因噎废食,就说东西文化分不清楚了。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地纯的。连"真空"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真"。自其大者而言之,东西文化确有差别,而且差别极为明显,这一点无法否认。人类创造的文化很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人类的思维模式,尽管名目繁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也只能分为两大体系:综合的思维模式与分析的思维模式。这与东西两大文化体系适相对应。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西方文化决不

能万岁千秋，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决非万能。自然界和人体内许多现象，西方科技无法解释。比如人体特异功能、中国的气功，还有中国傩文化中的一些现象，按照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是无法说得通的。把这些东西过分夸大，说得神乎其神，我并不相信；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又无法否认。

怎样来解释这些现象呢？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无能为力，也就是说，西方以分析思维模式为主导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已经无能为力了。换一个方式试试看怎样呢？在这里，alternative 只有东方文化，只有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的东方探讨问题的方式。实迫处此，不得不尔。一个人的个人爱好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现在众多的地方。原来我以为只有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是这样的。后来我读了一些书和文章，才知道区别并不限于上述两种科学，连自然科学也不例外。给我启发最大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吴文俊教授的《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副标题是《东方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研究》序言，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十二卷，总 68 期，1990 第四期，页 37—39 上。第二篇是关士续先生的《科学历史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副标题是《由吴文俊教授一篇序言引起的思考和讨论》，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 年第五期，页 27—31 上。两位作者都根本不是讨论东西方文化的问题；然而对探讨这两种文化之差别时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意义。我郑重推荐给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行们读一读。

话扯得有点太远了，是收回来的时候了。话虽然多，但我深信并不是废话。看了这些话以后，读者自然就能明白，我理解的东西文化融合与慎之理解的大相径庭。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试问一个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文化怎样

能同一个以分析思维为基础的文化对等地融合呢？那样产生出来的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否则的话，我上面的那一些论证都成了肥皂泡，一吹就破。这就是：中国文化，或者泛而言之的东方文化，也已有了若干千年的历史，难道这个文化就不受我在上面提出来的文化发展的五个阶段的制约吗？难道在这里必须给东方文化以“特权”吗？否，否，东方文化也必须受那五个阶段的制约。在规律面前，方方平等。我拿中国文化作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汤因比在他的书中曾把中国文化分为几个文明。其说能否成立，姑置不论。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输液”或者甚至“换血”的过程。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五四运动也可以算是第三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这样的“输液”，西方文化是不明显的。工业革命以后的繁荣阶段，更是根本没有。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

基于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慎之的意见。

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上面二里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但是，慎之在《后记》里十分强调说：“季先生所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因此，我觉得还有必要，再唠叨上几句。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慎之的“论”），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事实。既然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化或者文明，生生灭灭，变动不已，从广义上来看，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把范围缩小一点，缩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情况稍有不同。在这里，

历史上曾有过“三十年河东”,现在正是“三十年河西”,是否能再一个“三十年河东”,这就有点理论味道了,因为历史还没有证明其“是”与“否”。我认为是“是”,理由上面二里已经陈述过了。至于究竟如何,那就有待于历史的证明。黑格尔用正—反—合这个公式说明事物发展规律。我觉得,在东西文化的关系上应该是正—反—正。但是我对于理论不是内行,提出来求教于通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是关于两个近视眼看匾的,内容大家都知道的。我同慎之以及其他先生讨论的问题,等于还没拿出来的那一块匾。这样的问题只有历史的发展能最终解决,理论不管多么完美,多么奇妙,在没有被事实证明以前,都只能说是空想。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就到此为止,今后不想再写二十一世纪“畅想曲”了。这个问题留给文学家,留给诗人去处理吧。

下面介绍第二篇文章:郑敏教授的《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辩〉的震动与困惑》。[7]雪莱(1792—1822 年)这一篇文章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真正闪耀着“天才的火花”。西人有言:“诗人是预言家”,这话极有见地。诗人大概比我在上面提到的看(猜)匾的近视眼要高明得多多了。郑敏先生又以自己诗人的敏感写出了重读这篇文章的震动与困惑,极具有启发性。这与我在《新解》中提出的看法几乎完全符合。我不禁有点沾沾自喜了。

我在下面就郑敏教授的文章谈几点意见。

一 雪莱预言工业发展的恶果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惊人的诗人的敏感,在西方工业发展正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时候,预先看到了它能产生的恶果。因为

我自己没有读《诗辨》，我只能依靠郑敏先生的介绍，我还是抄一点她的文章吧：

> 在他的感受里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文化和人民的心态可谓病入膏肓。人们醉心于利用新兴的科学占领财富，一味放纵钻营的才能，而忽视心灵的培养。人们以机械的生产压制真正的创造性，而只有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识的源。在《诗辨》中雪莱指控工业革命将人们引上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8]

郑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面又写道：

> 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明在强大富裕的路上疾驰，价值观念经受强大的冲击，科技的惊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学黯然失色。为积累财富所需的知识和理性活动成为文教界所重视的，而诗和想象力由于其无助于直接换取市场上的优势而受到忽视，前者雪莱称之为钻营的本领，诗人意识到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发展。[9]

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也还有其借鉴的意义。我并不主张一切的财富积累都必须反对。那是某些宗教教派的信条，为我所不取。但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不应该进行点精神文明方面的教育吗？

接下去，郑敏教授根据雪莱的预言列举了一些随着高科技在20世纪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罪恶"：原子弹、艾滋病、民族仇恨的战火、森林的被破坏、海洋受污染、动物种类不断减少、臭氧层遭破坏、吸毒的蔓延、国际贩毒活动猖狂、黑手党的暴力活动、灭绝种族的纳粹大屠杀、恐怖的夜间失踪、精神病院的黑暗等等。这同我在

一些文章中列举的"弊端",大同而小异。真是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

二　雪莱开出的药方

上面列举的那一些现象,不管称之为什么,反正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必须有解救的办法,必须有治这些病的药方。

根据郑先生的介绍,雪莱开出来的药方是诗与想象力,再加上一个爱。

根据郑先生的解释,"诗",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诗的功能。雪莱认为,诗是神圣的,它具有一种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恶。"想象力",雪莱在《诗辨》中提出了它作为对物质崇拜和金钱专政相对抗的解毒剂。这种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先验主义,以及大量带有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义。在《诗辨》看来,那在富与高尚之间遗失的环节,就是想象力和诗。

雪莱医治人类创伤的另一剂良药就是"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地下凶神德漠高吏说爱这双有医疗功能的翅膀拥抱满目疮痍的世界。

总之,雪莱的浪漫主义想以爱来医治人的创伤,以想象力来开拓人的崇高,以诗来滋润久旱的土地。他的这一些想法,我们不见得都能接受。但是,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性,则是必须肯定的。

三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讲到爱,就会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挂上了钩。在这个问题上,郑敏教授有非常中肯的论述。我在下面抄一段她的话:

> 譬如当一部分人为了发财而疯狂的破坏自然时，诗心使得一些人抗议滥杀野生动物，破坏原始森林，破坏臭氧层。愈来愈多的人走出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愚昧的宇宙观，认识到自然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要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盲目破坏自然环境，最终是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在工业的初期，人类兴奋于一些科技的发明而以为人类万能，自我膨胀。……使人类在愚蠢的谋财过程大量伤害了自然，今天我们已看到人和自然间的文本的关系，人的存在因自然受伤也面临危机。[10]

这些意见同我在《新解》和其他文章中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意见的正确。中国和东方一些国家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和感情。拯救全人类灭亡的金丹灵药，雪莱提出来的是想象力、诗和爱，我们东方人提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归，不必硬加轩轾。

四　西方向东方学习

写到这里，已经接近西方必须向东方学习的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郑敏先生介绍了一些情况。她说，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发展了一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的良药的潜流。她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本世纪初的费诺罗萨(Fenollosa)和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的兴趣。"这一支向东方文明寻找生机的学派虽然在20世纪以前已经开始，但在19世纪与20世纪发展成西方文化中一支颇有影响的亚文化。从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来讲，

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希望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在这里，郑敏教授举出了 F·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海德格尔，还有日本学者 Tezuka(手冢)，以及德里达关于语言的讨论。

总之，西方向东方学习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大好的事情。特别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曾掀起了向东方学习的高潮。其中原因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

五　两种思维方式

最后我想着重谈一谈东西两种思维方式或模式的问题。

几年以前，我提出了世界上两大思维模式的想法，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我在本文中，在上面，也谈到了这个想法。我有点自知之明，自己决不是什么哲学家，至多不过胡思乱想而已。可是对这种胡思乱想偏偏又有点沾沾自喜。这或许是人类的弱点之一吧，我也未能免俗。虽然对读者同意的反应和不同意的反应我并不怎样介意，但看到赞成的意见，心里总是有点舒服。这或许是人类的另一个弱点吧。

在郑敏教授的这一篇文章里，我无意中找到了同我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的论述，窃以为慰。我先把有关的地方抄在下面：

> 20 世纪后半期，西方结构主义与解构思维都以语言为突破口，对人类文化的各方面进行阐释，最后落实到两类思维模式，结构主义带着浓厚的崇尚科学的客观性的倾向，企图将文字、语言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纳入脱离人性及主观想象力的活动而独立存在的结构符号系统的世界。解构思维则对这种崇

尚逻辑分析并以此为中心的智性活动的垄断进行反抗。[11]

再往下，郑敏先生又从人类智能的倾向方面把智能分为两大类：

分析的、重实的和综合的重穿透和超越的。雪莱认为科技属于前者，而诗的想象为后者。

这同上面讲到的人类的两种思维模式完全相当。根据郑先生的论述，这两种模式表现在很多方面，我先归纳一下，列出一个简明扼要的表，然后再逐项稍加解释：

分析	知性(理性)	分析力	结构主义
综合	悟性	想象力	解构思维

为了真实和准确起见，我在解释时少用自己的话，而多用郑文原文。

先谈分析和综合。“从18世纪以来，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人们更重视分析的逻辑思维，而忽视想象力的海阔天空的创造性”(郑文，页48b)。“但现在这类分析活动，正试用压倒创造发明的功能(指想象力——作者注)的直接表述”。(页49b)“综合”，上面引文中已有，不再重复。

谈知性和悟性。“忘记了想象力、悟性是保护人类崇高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一种天性。”(页49a)“但他坚信这一切必须置于诗的功能和想象力的悟性(非狭隘的理性)之下。”页48b有“智性活动”这个词儿。“理性的运用强调分析、知性和实证，而忽略悟性，虽然悟性是凌驾于事实之上的一种超越的穿透性。”(页48b)

谈分析力和想象力。上面的引文已经涉及到这方面了。现在再引上几句话。“想象力的集中表现为诗和哲学，分析力的集中表现为科技(与科学理论有别)；想象力的发展走向是超越物质世界，

走向无拘束、无边无限的精神世界，而分析活动的发展产生了人对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见 49a—b)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征服自然”是西方文化有别于东方文化的重要特点。郑文还提到，雪莱的《诗辨》主张以诗的功能和想象力来与分析性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抗衡。(页 49a)

结构主义和解构思维，上面已引过。我现在再补充上一条：“解构思维反对定型的僵化的系统和抽象，因此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道’、‘无常道’、‘无名天地始’、‘常无观其妙’(羡林案：原文如此)、‘玄者无形’等强调‘无’的思维。”(页 48b)这样解构思维就同东方文化挂上了钩。

郑敏教授的论文就介绍到这里。

雪莱的《诗辨》和郑先生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但是，是否我就完全同意不敢赞一词了呢？也不是的。我现在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一点补充，并且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雪莱所谓的“诗”，不可能指世界上所有的诗。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各国人民创造了不少的种类繁多、内容和形式各异的诗，诗的功能也各种各样，有的诗显然并不具备雪莱所说的那一种“诗的功能”。我猜想，雪莱心目中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诗。

其次，郑文中谈到了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但是没有指出，这二者是否在地球上有所区别。我在上面已经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从总体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分析思维模式。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东方哲学思想的特点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

最后，我还想对诗人诅咒金钱谈上几句话。我觉得，金钱本身是没有什么善与恶的。善与恶决定于：金钱是怎样获得的？金

钱又是怎样使用的？来的道路光明正大，使用的方式又合情合理，能造福人类，这就是善。否则就是恶。这个常识，很多人都会有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于补充一点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的类似汉族"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思想。

我在《新解》中和本文里讲的人与大自然合一的思想，都讲的是汉族的。对于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我很少涉猎，不敢妄说。不久以前我收到云南朋友们赠送的《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13]赠送者就是本书的作者李国文先生。读后眼界大开。书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三 古老的宇宙观》。在这一章里，作者叙述了"动物崇拜型的世界血肉整体联系说"。这里讲了三种动物：虎、牛、青蛙。对于这三种动物与世界血肉整体联系，本书有很简明扼要的叙述，读者请参阅原书，我不再引证。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印象，我引用东巴经《虎的来历》中的一段话：

> ……大地上很好的老虎，虎头是天给的。虎皮是大地给的。虎骨是石头给的。虎肉是土给的。虎眼是星宿给的。虎肚是月亮给的。虎肺是太阳给的。虎心是铁给的。虎血是水给的。虎气是风给的。虎的声音是青龙给的，虎爪是大鹏给的。虎胆是胜利神和白牦牛给的。虎耳是豺狗给的。[14]

不用加任何解释，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跃然纸上。

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其他少数民族中一定还有。我现在暂且不去探索了。

我这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拙文到此为止。它看似凌乱，实

则有一条主轴思想贯串其中。明眼人自能看出,我就不再罗嗦了。

1993年6月6日写完

注　释

〔1〕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于荣胜同志,谨向他表示谢意。

〔2〕仓泽行洋《东洋と西洋》,日本大阪东方出版社,1992年,页52—54。

〔3〕以上的叙述根据朱红星、李洪淳、朱七星《朝鲜哲学思想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9年。

〔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页3—11。

〔5〕上引书,页10—11。

〔6〕见《辨同异　合东西》。

〔7〕《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一期,页45—51。

〔8〕上引文,页45b。

〔9〕上引文,页46a。

〔10〕上引文,页47b—48a。

〔11〕上引文,页48b。

〔12〕上引文,页49a。

〔13〕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著者李国文。

〔14〕上引书,页115—116。

一点补充

今夏,韩国东国大学校佛教大学院院长吴亨根教授率佛教代表团访华。到北大以后,我应吴教授之邀,给全体团员(僧、尼均有)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内容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思想的特点和精华,只有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够拯救人类。讲的

时间只有四十分钟，讲话和翻译各占一半，我不能够充分发挥，是可以想见的。不意竟受到韩国朋友的热烈赞扬。最近接到吴亨根教授8月20日来函，对我的想法做了重要的补充。现在我把信的一部分抄在下面，完全抄原信，没有更改一个字：

季羡林先生　您好。

最近好吗？上次您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演讲，真的非常谢谢。对学生，当然包括我在研究东洋思想上帮助是很大的。先生您发表的论文“天人合一”，我已经读过了。我个人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否和大乘起信论中的“色心一如”思想是否相通呢？中国僧肇大师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此思想全是东洋思想的最极至。彼此好的因在一起就有果，相扶相助。华严思想中的法界缘起可以说是东洋思想的最好代表。

我想此种思想，要是能有所觉悟，则人类相互之间才能互相爱护，同体大悲思想才能出现。原信就抄到这里。

1993年9月19日

关于临清的一个掌故

偶读英国学者 Henry Yule(亨利·裕尔)的名著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东域记程录丛》),第一册,伦敦,1913 年,页 212—214。其中有一段关于临清的记载。这是天主教神父 Odoric(鄂多瑞克)旅行记中的一段,他的旅行时间是 1316 年至 1330 年,是在中国的元朝。原文是:

> 离开了那一座城 Me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叫做临清。它位于一条叫做 Caramoran 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 Ferrara 的 Po 河一样。

我必须解释几句。

"临清",原文作 Lenzin。不同的本子还有很多异读,不具引。从各方面判断,这是"临清",毫无可疑。

Caramoran,义为"黑河",实指黄河。文中说"流经中国正中",非黄河莫属。鄂多瑞克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混淆了黄河和运河,或者什么其他的河。古人地理知识,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清楚,不足责怪。

临清地傍运河,历代为历史文化和经济名城。在铁路修通以前,实为南北交通枢纽。中国载籍中,有大量关于临清的记载。但在外国旅行家的游记中,过去还没有人指出来过。连著名的马可

波罗《游记》中也没有提到临清。因此,鄂多瑞克这一段话,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在那样多的中国名城中,鄂多瑞克为什么垂青临清?其中必有道理。六七百年前的临清必然是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给这个外国旅行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才笔之于书。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我们临清正面临着新时代的文化和经济的腾飞。缅怀往昔的光荣,我们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作好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1993年8月7日

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最近翻看宋人笔记，发现一条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稍有改变的笔记，竟出现在八本书中。我现在从宋赵与旹的《宾退录》卷九中把这条笔记抄在下面：

>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条笔记始作俑者是谁，我想，我们不必去深究。既然它出现在几本书中，可见它触到了一些人的灵魂，引起了共鸣。我们今天读了，仍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共鸣。至少是我自己，还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读了《出师表》、《陈情表》和《祭十二郎文》，确有想堕泪之意。这几篇古典文学作品确实触碰到了我们内心中的某一些地方，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受到感动，得到了"净化"。

但是，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时代性的，是有民族性的。《红楼梦》中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喜欢林妹妹，事实昭著，不容否认。这一套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有其正确之处，也不容否认。

连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代诗人赵瓯北也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在一定程

度上否定了赵瓯北的论点。李杜文章到了现代，经过了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仍然很“新鲜”。像李白、杜甫，中国还有一些诗人和散文家，诸葛亮、李密和韩愈就属于这一些人。外国也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哪里去了呢？我个人觉得，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敢于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

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我这种说法或者想法，在文艺理论家眼中，也只能是文艺理论幼儿园的水平。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谁要提“人性”就是“人性论”，而“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离开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我们今天托了改革开放的福，敢于把人性提了出来。我偶然读到宋人的笔记，心有所感，不避幼儿园之讥，写了以上这许多话。

1993年8月22日

推荐《学人》杂志

尽管现在人们大声疾呼：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但是好书和好杂志都还有一些的。专就杂志而论，高品位的专门谈文史的杂志，北京和上海都有几种。这几种杂志真像是八仙过海，各自有独有的神通，受到了广大学者们的欢迎。

我现在要推荐的《学人》，也是一种品位高、内容丰富的学术刊物，是我非常喜爱的。但是，我觉得，它同其他几种又有些不同。据我个人的浅见，《学人》学风谨严，不说空话，讲古代学术，却又有新风；讲考据，却又贯之以义理，新旧结合，事理相济，读其中的一些文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编者和作者中青年学者居多，他们学有根柢，新旧兼通，东西融会，不矜不躁。现在文坛上和学坛上，都有一些中青年的“作家”和“学者”，学殖瘠薄，竞奇斗新，夷考其实，多类羊头。要期望这一批人接老人的班，使中华文化不致中绝，那就等于南辕而北辙，决不会成功的。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是这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依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有出息的国家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在这里，文化当然应当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离开了自己的独特文化的那一点点科技，就等于水上的浮萍，是没有根的。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全国人民，在不知道多少代的漫长的时间内，创造出来的。每一代人，特别是学者们，对于民族文化，一要继承，二要发展。代代相传，以至永恒。就中国文化来说，老一代的

文化托命之人必然要相继退出传承活动，把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里。据我个人看，主编《学人》的三位学者以及为这个刊物写文章的中青年学者们，从他们的文章来看，是有资格接过这个接力棒，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而又能发展中国文化传统的令老人放心的好接班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全可以肯定的。用敢郑重推荐这一个刊物。

1993年9月17日

在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外国贵宾！

承蒙云南昆明市领导同志邀请，我同北京的一些同志们来到了昆明，参加"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感到非常高兴，非常光荣。我要向主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我来说昆明并不陌生。我第一次到昆明，是在1955年。当时郭沫若先生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去参加亚洲国家会议。代表团中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作家、演员、艺术家等等。我们是从香港乘飞机到达新德里的。开会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中国政府为了全团人员的安全，不让代表团再经由香港回国，而是商请印度政府派军用飞机送我们到昆明。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到昆明的原因。这一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和回忆。

以后又来过几次。1962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云南视察工作，我有幸参加，在云南住了两个多礼拜，访问了西双版纳和大理。我对云南的印象更深了，更美好了，更难以忘怀了。回北京以后，我曾写过一篇名叫《香橼》的散文，歌颂思茅，歌颂云南。

在云南老一辈的学者中，我也有很多朋友。已故的著名白族史学家方国瑜教授，现在健在的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马曜教授，等等，都算是我的朋友。我敬重他们的道德，羡慕他们的学问。中国古代论人，道德文章并重。这些云南的学者，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总起来说,无论是从自然环境来说,还是从人物来说,云南都是高水平的。我想借用唐代王勃的两句话,来形容云南,这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两句话,云南是当之无愧的。

讲到正题,讲到纪念郑和的活动,我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云南和中国有了郑和,是一件十分可以骄傲的事。可惜我并非研究郑和的专家。年轻时候,曾涉猎过一些有关郑和的著作、法国伯希和对郑和研究的著作,中国郑鹤声教授搜集的关于郑和的资料,以及中国和外国学者关于郑和的论文我都读过。这些书籍和论文讨论的问题当然很多,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项:郑和出使的目的,郑和出使的次数和郑和出使所产生的影响。对这些专门问题,我没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不过,最近我读了《郑和研究》1993年第3期潘群和王建成两位先生的《明初政治与郑和初期航海动因》,我觉得这是一篇好文章。他们的结论是:明政权建立之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威胁明朝统治的"海上力量",它直接影响明帝国与南洋、西洋地区各国的友好关系。关键在三佛齐一地。所以必须用武力与政治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三佛齐问题。这结论是合情合理的。

我个人认为,研究郑和航海,应当多研究其结果,其影响,而不必过分探讨其动机。其结果,其影响有目共睹,是加强了明与南洋、西洋各国的联系,我们迄今仍蒙受其利。

现在云南同我国各地一样,正在加强建设,一手抓文化,一手抓经济,文化、经济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则两败俱伤。几年前我在日本东京一次演讲会上说过:文化、经济,殊途同归。今天我想重复这一句话。纪念郑和活动属于文化范畴,其结果必然表现在经济建设上,这是正常的。

祝云南文化和经济双丰收。

谢谢大家!

1993年9月19日

养生无术是有术

黄伟经兄来信，为《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向我索稿。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向是敬谨遵命的，这一次也不能例外。但是，健美双谈，我确有困难。我老态龙钟，与美无缘久矣，美是无从谈起了。至于健嘛，却是能谈一点的。

我年届耄耋，慢性病颇有一些。但是，我认为，这完全符合规律，从不介意。现在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每天仍工作七八个小时，论文每天也能写上几千字，毫不含糊。别人以此为怪，我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粟德金在 China Daily 上写文章，说我有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说到了点子上。我虽忘记了年龄，但却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这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我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时间。如果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这有什么意义呢？至于“不挑食”，那容易了解。不管哪一国的食品，只要合我的口味，我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黄，吃肉不吃内脏。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我的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人皆

以为怪，其实有什么可怪呢？至于“不嘀咕”，上面讲的那些话里面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而愁眉苦脸。有的人无病装病，有的人无病幻想自己有病。我看了十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

我是陶渊明的信徒。他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这一篇短文的题目是：养生无术是有术。初看时恐怕有点难解。现在短文结束了，再回头看这个题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1993年11月26日

国学漫谈

《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一文（见《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第三版），在国内外一部分人中引起了轰动。据我个人看到的国内一些报纸和香港的报纸，据我收到的一些读者来信看，读者们是热诚赞成文章的精神的。

想要具体的例证，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前不久，我曾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过一次报告。一位青年同志写了一篇“侧记”，叙述这一次报告的情况（王之昉：《高屋建瓴启迪后人》，《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日第三版）。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我因为是当事人，有独特的感触，所以不避罗嗦之嫌，在这里对那天的情况再讲上几句。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晚间，天气已颇有寒意。报告定在晚上7时。我毫无自信，事先劝同学们找一个不太大的教室，能容下100人就行了。我是有私心的，害怕人少，讲者孑然坐在讲台上，面子不好看。然而他们坚持找电教大楼的报告大厅，能容下400人。完全出我意料，不但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不少人站在那里，或坐在台阶上，都在静静地谛听，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我这个年届耄耋的世故老人，内心里十分激动，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据说，有人5点半就去占了座位。面对这样一群英姿勃发的青年，我心里一阵阵热浪翻滚，笔墨语言都是形容不出来的。

海外不是有一些人纷纷扬扬，说北大学生不念书，很难对付吗？上面这现象又怎样解释呢？

人世间有果必有因。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必有其原因。我经过思考,想用两句话来回答: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很难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原因何在呢?这个号召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弘扬什么呢?怎样来弘扬呢?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国学"就是专门做这件工作的一门学问。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借用德国现成的话),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如果有人有兴趣有工夫去探讨这个词儿的来源,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无权反对。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我们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科技对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万万不能缺少的。但是,科技却很难表现出什么特色。你就是在原子能、电脑、宇宙飞船等等尖端科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超过了世界先进国家,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只能是程度的差别,是水平的差别,谈不到什么特色。我姑且称这些东西为"硬件"。硬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色可言。

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称之为“软件”，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于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最近听一位国家教委的领导说，他在新德里时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一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的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事实已经证明，连外国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的。

国学的作用还不就到此为止，它还能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爱国主义”是一个好词儿，没有听到有人反对过。但是，我总觉得，爱国主义有真伪之分。在历史上，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尊严，不惜洒热血、抛头颅，奋抗顽敌，伸张正义。这是真爱国主义。反之，压迫别人侵略别人的民族，有时候也高呼爱国主义，然而却不惜灭绝别的民族。这样的“爱国主义”是欺骗自己人民的口号，是蒙蔽别国人民的幌子。它实际上是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遮羞布。例子不用举太远的，近代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一类货色。这是伪爱国主义。

中国的爱国主义怎样呢？它在主体上是属于真爱国主义范畴的。有历史为证，不管我们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内，“天朝大国”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事实上我国始终有外来的侵略者，主要来自北方，先后有匈奴、突厥、辽、金、蒙、满等等。今天，这些民族基本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在当时只能说是敌对者，我们不能否定

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历史上，连一些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也难以逃避耻辱。刘邦曾被困于平城，李渊曾称臣于突厥，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也不能说，中国过去没有主动地侵略别人过，这情况也是有过的，但不是主流，主流是中国始终受到外来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中国人民敬仰、歌颂许多爱国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是。一直到今天，爱国主义，真正的爱国主义，始终左右我们民族的心灵。我常说，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我这说法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国学的任务可能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以上三大项，我认为，已充分说明其重要性了。我上面说到"顺乎人心，应乎潮流"。我现在所谈的就是"人心"，就是"潮流"。我没有可能对所有的人都调查一番。我所说的"人心"，可能有点局限。但是，一滴水中可以见宇宙，从燕园来推测全国，不见得没有基础。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发现，他们是很肯动脑筋的一代新人。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感到迷惘。这并不是坏事，这说明他们正在那里寻觅祛除迷惘的东西，正在那里动脑筋。他们成立了许多社团，有的名称极怪，什么"吠陀"，什么禅学，这一类名词都用上了。也许正在燕园悄然兴起的"国学"，正投了他们之所好，顺了他们的心。否则怎样来解释我在本文开头时说的那种情况呢？中国古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应人心和潮流的就是"道"。

但是，正如对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对国学也有不同的看法。提倡国学要有点勇气，这话是我说出来的。在我心中主要指的是以"十年浩劫"为代表的那一股极左思潮。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半路上竟杀出来了一个程咬金，在小报上写文章嘲讽国学研究，大扣帽子。不知国学究竟于他何害，我百思不得其解。无独有偶，北师大古籍研究所编纂《全元文》，按说这工作有百利而无一

弊，然而竟也有人想全面否定。我觉得，有这些不同意见也无妨。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既然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必然会发展下去的。

1993年12月24日

老　年

人确实是极为奇怪的动物，到了老年，往往还不承认自己老。我也并非例外。过了还历之年，有人喊自己“季老”，还觉得很刺耳，很不舒服。只是在到了耄耋之年，对这个称呼，才品出来了一点滋味，觉得有点舒服。我在任何方面都是后知后觉。天性如此，无可奈何。

我觉得，在人类前进的极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只是一条链子上的一个环。拿接力赛来作比，每一代人都是从前一代手中接过接力棒，跑完了一棒，再把棒递给后一代人。这就是人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这一棒的任务。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古代印度人有人生四阶段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

这个道理其实是极为明白易懂的，但是却极少人了解。古代有一些人，主要是皇帝老子，梦想长生不老，结果当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古代和近代，甚至当代，有一些人，到了老年愁这愁那：一方面为子孙积财，甚至不择手段；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身后着想，修造坟场，筹建祠堂。这是有钱人的事。没有钱的老年人心事更多，想为子孙积攒钱财，又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财积不成，又良心难安。等到大限来到之时，还是两手空空，抱着无限负疚的心情，去见阎罗大王。大概在望乡台上，还是老泪纵横哩。

最近翻看明人笔记，在一本名叫《霏雪录》的书里读到了一段话，是抄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自警诗，原诗是：

蚕老茧成不庇身
蜂饥蜜熟属他人
须知年老忧家者
恐似二虫虚苦辛

诗句明白易懂，道理浅显清楚。在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中，白居易活的年龄算是相当老的。他到了老年，有了这样通脱的想法，耐人寻味，这恐怕同他晚年的信仰有关。他信仰佛教，大概又受到了中国传统道教的影响。这一首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1993年12月26日

写文章

当前中国散文界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散文妙就妙在一个“散”字上。散者，松松散散之谓也。意思是提笔就写，不需要构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锤炼字句，不需要斟酌结构，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理论如此，实践也是如此。这样的“散”文充斥于一些报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辈子格子，虽无功劳，也有苦劳；成绩不大，教训不少。窃以为写文章并非如此容易。现在文人们都慨叹文章不值钱。如果文章都像这样的话，我看不值钱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吕蒙正让皂君到玉皇驾前去告御状：“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如果指的是这样的文章，这可以说是刁民诬告。

从中国过去的笔记和诗话一类的书中可以看到，中国过去的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十分重视修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诗人经过几度考虑才选出来的。王国维把这种炼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艺理想“境界”挂上了钩。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什么叫“境界”呢？同炼字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他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闹”字难道不是炼出来的吗？

这情况又与汉语难分词类的特点有关。别的国家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上面讲的是诗词，散文怎样呢？我认为，虽然程度不同，这情

况也是存在的。关于欧阳修推敲文章词句的故事，过去笔记中多有记载。我现在从《霏雪录》中抄一段：

> “前辈文章大家，为文不惜改窜。今之学力浅浅者反以不改为高。欧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粘之屋壁，出入观省。至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惟睹其浑然天成，莫究斧凿之痕也。”

这对我们今天写文章，无疑是一面镜子。

1993年12月26日

翻译的危机

这个题目看上去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我自认是实事求是的,毫无哗众取宠之意。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翻译大国,历史长,数量大,无论哪一个国家都难望其项背。这是中外都熟悉的事实,用不着再论证,也用不着再重复。

从清末民初开始,中经“五四”,一直到解放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了大量的书,文、理、法、农、工、医,各科都有。这些翻译对促进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启迪中国人民大众,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我简直无法设想,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中国今天的教育文化和国家建设事业会是什么样子。

关于翻译问题,我自己曾涉猎过一些书籍,古今中外都有。对于翻译理论,我也特有兴趣。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内容异常丰富,涉及的面也很广。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理论蜂拥而至,五花八门,争奇斗艳。有一些理论分析得非常细致,显得十分深奥;然而细究其实,却如绣花枕头,无补于实用。在这一方面,同在别的方面一样,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认为,为一些人所非议的严又陵的一句话:“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道理十分简洁明确,然而又切中肯綮,真可谓“要言不繁”了。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多一个也似乎没有必要。能做到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

我个人觉得,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这个字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我探讨翻译问题,评论翻译作品,首先就是看它信不信,也就是,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不叫翻译。什么"达",什么"雅",就如无根之木,无本之草,无所附丽。严复定下了这三条标准以后,自己是认真遵守的。翻译《天演论》时,因为是借题发挥,不是真正的翻译,所以他不叫"译",而叫"达恉"。

我这篇短文的题目是《翻译的危机》,危机正出在不遵守"信"这个标准上。

我最近若干年来没有从事翻译工作。但是,由于主编一些刊物和丛书,有时候也难免接触一些译稿。去年,友人推荐了一部译稿,想收入我主编的一套丛书中。友人介绍说,译者英文水平是高的,曾多次担任口译工作,胜任愉快;在笔译方面,也已出过两部书。这样一个译者应该说是能信得过的,友人又是我的老朋友,一位在国内外声名远扬的学者,也应该说是能绝对信得过的。译稿就要寄出版社付排了。不知为什么,我一时心血来潮,非要看一看译稿不行。于是向译者要来了原文。我仔细对了几页,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自己拿不准,又央求周一良教授把译文同原文对上几页。结果他的意见同我的完全一样:译文有问题,不能寄出版社。我仍然相信,这位青年译者的英文是有水平的,他胜任口译也是可信的。但是,口译与笔译不同,口译要求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是很难做到的。一个译者能译百分之七八十,就很不错了。过去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先生我都亲耳听他们说过这样的意见。但是,笔译由于有充分的思考的时间,必须要求极高,即使不能达到百分之百,也必须接近这个水平。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通情达理的,必能得到大家的赞同。

上面说到的这位青年译者的已经出版的那两部书,情况怎样

呢？我没有读原书，不敢瞎说。但是，根据合理的推测，它同我看的译稿差别不会太大。我们很难设想，送给我看的这一部译稿碰巧了水平特别低，而已经出版的则水平特别高，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的思想从这里生发开去，想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想到了最近几十年来全国已经出版的若干千种万种的翻译，我就有点不寒而栗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翻译的著作中，有水平很高的，能达到信、达、雅三个标准的。但是，同样也不能否认，其中必有相当多的一批译本是有问题的。我没有法子去做细致的统计，我说不出这些坏译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估计，坏译本的数量也许要超过好译本。

什么叫做"坏"译本，什么又叫做"好"译本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信"或不"信"。首先要"信"，要忠实于原文，然后才能谈"达"和"雅"。如果不"信"，"达""雅"都毫无意义。译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信""达""雅"都合乎标准，这是上等。第二类，能"信"而"达""雅"不足，这是中等。第三类，不"信"，不"达"，不"雅"，这是下等。有的译文，"达""雅"够，而"信"不足。这勉强可以归入第二类。当前颇有一些非常流行的译本，译文极流利畅达，极"中国化"。但是"信"不"信"呢？我没有核对原文，不敢乱说。我是有怀疑的。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话，我认为，这种译风无论如何是不应提倡的。

我现在要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译而不信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语水平，一是工作态度。

先谈外语水平问题。学习外语，至少应该有两个认识；一不要认为外语很神秘，简直无法学好，因而望而却步。二不要认为学外语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掌握。我们必须认为外语能够学好，但又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学外语同学习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必须有点天赋，又必须勤奋，二者缺一不可。学习任何外

语，学一点皮毛，并不困难。但要基本上能够掌握，却又不那么简单。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学习外语，有如鲤鱼在黄河中逆水上溯。前一段也许并不太困难。但是，一旦到了龙门跟前，想要跳过龙门，却万分困难。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这个龙门，只能糊里糊涂，终生是一条鲤鱼，变不成龙。拿学习外语来说，每一种外语都有一个龙门。这座龙门在什么地方呢？因人而异。天赋高而又勤奋者，龙门近一点；否则就远。只有能跳过外语这个龙门，你才勉强有一点语感。这一门外语就算是为你掌握了，被你征服了，它能为你所用了。这时你就变成了一条龙。这一突变是用艰苦的劳动换来的。

上面谈的是外语水平，现在来谈工作态度。工作态度，不是天赋问题，而是认识问题。有的人缺乏自知之明——顺便说一句，这种人是并不老少的——当自己还是一条鱼的时候，便傲然认为自己已经成了龙。本来查一查字典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连字典也懒得查了。其结果并不美妙。当年赵景深教授把 milky way（天河，银河）译为“牛奶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讥讽，成为译界的笑话。今天这样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数量和严重性都远远超过了“牛奶路”。有的人把 Man of the God（牧师）译为“上帝的人”。有的人把 so far the introduction（导论到此为止）译为“导论是这样远了”。类似这样的例子，我还能够举出很多很多来。举一反三，这两个也就够了。这是由于缺乏自知之明或者由于懒惰而造成的笑话。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原文有的地方看不懂，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可是却一不请教人，二不查字典，胡译一通，企图蒙混过关；或者干脆删掉，反正没有人来核对原文，马脚不会露出来的。这简直应该归入假冒伪劣一类，为我们所应该反对的。

把上面所说的外语水平和工作态度两个标准综合起来评论，我觉得，翻译工作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次。外语水平高工作

态度好,这当然是上等。外语水平高工作态度差,或者外语水平差工作态度好,这属于中等。外语水平差工作态度又不好,这当然就是下等。我在这里所说的翻译危机,主要来自下等的翻译工作,中等也可能沾点边。在翻译工作中这三个等次所占的百分比,我说不上来。从我所接触过的现象来看,下等所占的百分比不会很低,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

也许有人认为,翻译出点小错误,古今中外概所难免。在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上,就不知道出现了多少错误,有的错误简直离奇可笑;然而这并不碍于佛经的流通。这种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那是过去的事,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中,我们不能为这种意见张目。而且,今天的下等翻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痼疾,成为一种风气。许多人习焉不察,当事者则沾沾自喜。这样的风气我们还能熟视无睹不起来反对吗?

反对之法其实也并不复杂,无非是加强翻译评论,加强监督而已。

这种办法我们曾经使用过。在50年代,在当时出版的《翻译通报》上,时不时会出现几篇评论翻译书刊的文章。这种文章往往很长,因为一要引用原文和译文,二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对译文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评论。这都是踏踏实实的、动真格儿的工作,不能徒托空言,因此非长不长。据我自己的回忆,这种评论工作起过很好的作用,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下去。我真正感到惋惜。

时至今日,翻译书刊之多,远迈前古。今天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不借鉴他国,完全是不能想象的,而借鉴就需要翻译。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好的译品是有的;但也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报章杂志上有时也会见到几篇评论翻译的文章,但是同已经出版的翻译书刊的数量比起来,却显得非常微弱无力。我们毫不夸大地

说，今天的翻译已经失去了监督。有良心有本领的译者，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上等的翻译，是用不着监督的。但是中等翻译，特别是下等翻译，则是非监督不行。非监督不行却又缺少监督，于是就来了危机。

克服这个危机的出路何在呢？我原来想得非常单纯，非常天真：不过是加强监督而已。我曾同《中国翻译》杂志的一位负责人谈到这个问题，我劝他多刊登一些评论翻译的文章。我原以为，他会立即接受我的建议，并付诸实施。对他来说，这并不困难。然而，真是大出我意料，他竟似乎有难言之隐，对我诉了许多苦，其中最主要的是，许多被批评的译者喜欢纠缠。一旦受到批评，决不反躬自省，而是胡搅蛮缠，颠倒黑白；明明是自己译错了，却愣不承认。写信，打电话，写文章，闹得乌烟瘴气。一旦碰到这样的主儿，编辑部就苦不堪言。

我恍然大悟，很同情这位负责人的意见。环顾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其他领域里也有类似的现象。个别的人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不给民主，他们怨气冲天；给了民主，他们又忘乎所以。看来正确运用民主权利，也还需要有一定的水平。有些人认为民主就是打官司。最近看到报上刊登了一个消息：在某部电影中，有一个群众场面。当时拍摄时，拍上了一个他或她。现在电影一旦上演，他或她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于是拍案而起，告到法院，说是侵犯了他的肖像权，索要五位数字的赔偿费。我不懂法律，但总觉得这样做是“民主”过了头。回到我们翻译界，难道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吗？我有点担心。

我原以为克服翻译危机并不困难。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现在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变戏法的跪下，没撤了。

可是，我并不气馁。我呼吁翻译界的同行们和广大的读者，大家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想出克服翻译危机的办法。我相信，办法

总会想出来的，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那样。

1994年1月9日

获奖感想

这一次全国性的空前的对过去十几年来出版图书的评奖活动，其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我国的出版事业，甚至对整个的文教事业，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可以预卜的。

这次活动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作为评奖委员会的副主任和文学组组长，我感到肩头上的担子异常地重。至于我自己能够获奖则是连梦也没有做过的。结果在全部45个图书奖中我一个人独得其二。这实在是大出我意料。我感愧交加，心不自安。我并不是说，我的书一塌糊涂，不配得奖。我只是想说，还有比自己的书更好地书没能得奖，因而感到惭愧耳。

在文学组中，五部获奖的图书，有两部出版社并没有正式申报。小组成员提出来了，经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才正式列入评选对象中。为了回避，我在小组会上曾提出撤掉《罗摩衍那》，其他成员不同意，我只能以自己不投票来了此一段公案。

另一部获全国图书奖的书是我参加注释的《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不属于文学组，是作为古籍整理优秀图书而获此殊荣的。评选过程我不清楚，是傅璇琮同志告诉了我，我才知道的。这一部杰作之所以能够得到注释而且最终出版，完完全全是中华书局玉成的。中华书局为此付出了颇大的财力和物力，他们从其他省市请来了专家，长期住在中华书局内，历时颇久，始能完成。出版以来，极得好评，多次得到不同类型的奖励，最后又在这一次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得到全国图书奖，奖誉达到了顶点。我们全国学术

界,甚至外国的同行们,都应当诚挚地感谢中华书局有眼光,有魄力助成这一次壮举,推动了古代西域史地的研究。

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一部注释的书籍的优点,我们很清楚;它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我们也很清楚。最近几十年来,与本书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有了进展,文献资料的研究也有了新收获。因此,从去年起,我就开始考虑,给《大唐西域记》重新作注释。我已经邀集了一些中青年学者,组成一个注释小组,开始工作。这一些中青年学者都是最近十几年来新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印度和西域的历史、地理、语言、宗教等等方面有颇为精湛的跟得上时代的造诣。我希望能在五年内完成此项工作。到那时候,我们才真敢说,这是世界水平的。

1994年1月18日

寻根漫谈

世间万事万物总都有个根。根者，产生之根源也。我国文化也必有其产生的根源，寻找这个根源，其意义无比重大。前几年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目前流行于社会中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倡议，实际上也都是寻根的举措。

《三国志演义》一开头就说："夫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两句话概括了一部中国史。然而，仔细计算起来，中国历代总是合多分少，至今我们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海峡两岸目前的情况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统一迟早必定会实现的。

这种人类史上空前的现象，其根何在？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彪炳环宇，辉煌璀灿，众口交誉，其影响广被大千世界，历数千年而不衰。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地球上没有中华文化，人类今天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文化史上的稀有现象，其根安在？

中华文化，不但在大的方面辉煌灿烂，在小的方面也是如此。中华的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医药文化、戏剧文化，等等，等等；更小而至于围棋、象棋、麻将等等，亦无不博大精深；连针灸、气功、按摩、推拿等等也都能造福人类。拿西方的扑克等等来与之相较，其深浅真难以道里计了。

这些人类史上的奇迹，其根何在？

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的世纪末，一个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门前，我国和全人类都处在一个转折关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为了

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福利,为了人类前途的发展,上面谈到的这一些根,都有必要来寻上一下。根就是本,循本才能求末,本末同求,斯为至善。

因此,我祝贺《寻根》的创刊。

我祝福《寻根》茁壮成长,寿登千岁。

1994年1月19日

《齐鲁文化特刊》创刊祝词

《齐鲁文化特刊》创刊了,我祝它长命千岁!

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海内外华人、华侨、华裔的热烈响应。原因十分明显:时光的车轮现在正滚到了20世纪的世纪末。垄断世界文化的西方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在下一个世纪,代之而起的必将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只有东方文化能够使人类文化继续发展下去,已成为东西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东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在今天,这也并非耸人听闻之谈。

怎样来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呢?其道多端。从宏观上以高屋建瓴之势综论全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发扬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前进,并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发展。这是一条道路。这方面已经刊出了不少的专著和论文,材料翔实,内容丰赡,说理切中肯綮,论证合乎逻辑。这些专著和论文受到了海内外人民的赞赏。

这无疑是一条阳关大道。

第二条道路是把文化分学科,分门类来加以论证,比如文学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化教育史等等,以至于更细小的分类。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脍炙人口的论著。

这也无疑是一条阳关大道。

第三条道路是分时代来加以论证。或按历史分期,或按中国

的朝代。二者都是可行的,并无高下之分。这方面也有极其优秀的论著。

这当然也是一条阳关大道。

道路的数目并非到此为止。最近若干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对文化分地区来加以论证和探讨。在这方面已经有人著了先鞭,比如巴蜀文化、楚文化、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等等,都已有了专书。这样做,自有其优点:容易细致和深入。本地人了解本地文化,真是近水楼台。如果每一个地区都这样做了,整个的中华文化的研究水平,必然会大大地提高。这一点用不着解释。

这是不是一条阳关大道呢?我认为,是的。而且是阳关大道中的阳关大道。

齐鲁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事实是每个人都会承认的。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祝贺《齐鲁文化特刊》的创刊。

我祝它长命千岁!

1994年1月23日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

——从西域文化的传入谈起

"西域"这个词儿的含义并不是固定的。约略言之,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包括古代中国以西的地域,没有什么一定的边际。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讲到了今天的新疆一带一直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阿富汗、伊朗,甚至阿拉伯的一些地方。狭义的西域则多半指今天新疆一带。

西域地处欧亚大陆中间偏东的地带,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横贯此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地方。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共创造了四大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在新疆交汇,在全世界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只从这一点上来看,西域之重要概可想见。

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民族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但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文化绝对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创造的。说文化是一个天之骄子的民族创造的,是法西斯论调。历史事实是,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对人类文化共同的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化有一个特点:一旦产生,它就要传播,在民族内部传播,又传播到民族地区以外去,这就形成了文化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民族间弃短取长,互相调剂,互相补充,把许多民族的智慧汇集在一起,又从而发扬光大之,才形成了今天世界上这种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的文化,使全人类皆蒙受其利。

这里所说的"西域文化",主要是指广义的西域,因为狭义的西域本地产生的文化不很显著,它主要是一个文化交流会通的地方。世界四大文化在这里汇流后,又向东方传播。"西域文化"就是汇流在这里的文化。要想讲这种文化的传播,必须追溯其根源,不能以狭义的西域为出发点。

追溯西域文化的根源,十分复杂。就其大者而言之,不外三途:一是印度,包括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二是伊朗,即中国古代史书上的波斯;三是阿拉伯国家,即中国古代史书上的大食。我在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印　　度

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头绪万端,其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彼此所受的影响之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学者,专门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者颇不乏人。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千言万语也难于说得清楚。我在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加以叙述。

佛教的传入

谈中印文化交流,首当其冲的就是佛教的传入。

我们对于佛教以及其他的宗教,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看法,过去那种批、批、批的做法不见得是正确的。对佛教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它有它的糟粕,这不容怀疑。但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中国的儒学素来是辟佛的,但是,事实上许多儒家的大学者都学过佛,佛教的教义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口头上是阙，骨子里是吸收。中国哲学史上的光辉的顶点之一的宋明理学，大家都知道，是吸收了佛教的一些东西，才能成其大，才能成其深。此外，佛教还带来了不少副产品。中国如果没有佛教的话，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建筑艺术，我们的绘画艺术，我们的雕塑艺术，决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古诗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没有佛教，就没有僧；没有僧，就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佛教庙宇。对我们今天的旅游事业，也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一想就能明白。

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实际上是在尼泊尔境内。他后来游行传教多在印度境内。所以我们一般都说印度佛教。这个说法不全面。

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确切日期我们还说不出来。一般的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年间(58—76 年)派人到西域去求法。这位皇帝夜梦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于是派人到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在洛阳城西起佛寺白马寺。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我们现在还说不出。但是，在大月氏写经却可能有历史根据。大月氏这个游牧民族当时正住在大夏(Bactria)，到大夏去抄写佛经，很有可能。据我的研究结果，佛教最初传入中国都是通过陆路，途径共有两条：

一　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

二　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最近有人主张所谓"南传佛教"，并倡言有考古发掘工作为证。其实这是颇为玄乎的。一则"南传佛教"这个词儿易生误会，因为一般说"南传佛教"指的是从印度传向南方斯里兰卡以及缅甸和泰国的巴利文小乘佛教。二则从汉译最原始的佛教术语来看，没有一点南方的色彩。

印度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影响中国

在精神文明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佛教。此外在天文、历算、文学、艺术等等方面，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彰明昭著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语言中还有不少从印度来的词汇，经如佛、菩萨、僧人、尼姑等等一系列的宗教术语，仍然是老百姓嘴里常常使用的。这方面的例子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

在物质文明方面，印度同样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这情况同样表现在词汇上。我们常说的“玻璃”、“琉璃”等词儿，最初也是印度传来的。但是，最初的玻璃、琉璃等等，同我们现在常说的不是一码事。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词义是能够变动的。

这方面的例子也太多，我也无法一一列举。我现在只举一个例子，是一般人不注意的。这个例子就是糖。

糖是我们今天天天吃的东西，看起来微末不足道，不值得去伤脑筋。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一部持续时间很久、内容异常曲折、头绪纷繁的文化交流史。它牵涉到很多国家，我在这里先谈中国同印度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蔗（最初写作“柘”）而无糖，蔗只饮蔗汁。古代的“饴”是用粮食熬制成的。“糖”这个字本身出现得比较晚，《说文》中没有此字。用蔗汁熬糖，大概在南北朝时期才有，工艺比较粗糙。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印度的一部分）去学习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新唐书》，221 上《摩揭陀》）这里有几点需要加以解释。“诸蔗”，亦作“藷蔗”，指的就是甘蔗。从印度学来了熬糖法，诏扬州贡上甘蔗，然后按照印度的配方拃甘蔗汁，熬糖，结果无论是在颜色方面（更白了），还是在味道方面（更甜了），都远远地超过

了印度。

这可以说是中国制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中国的熬糖法还不就到此为止。以后中国又从波斯学习，从埃及和伊拉克学，从西洋（明代的“西洋”和那以后的“西洋”）学习，熬糖技术日臻完善。明末，中国的白沙糖已经输出国外了。

波斯（伊朗）

在西域诸国中第二个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国家是波斯。

伊朗是文明古国，历史极长，成就极大，在西域时盛时衰，起过重要的作用。伊朗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可以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部分。在精神文明方面，伊朗的摩尼教在西域一带兴盛过一阵，后来也传入了中国。这个宗教同佛教不一样，兴盛过一段时间以后，逐渐衰微，终至灭亡。传到了中国以后，也是如夏夜的流星一样，在一些地区有过信徒。后来也消亡了。摩尼教的许多经典残卷，在中国新疆一带被发掘出来。另外一个伊朗的宗教袄教，也传入中国，后来也灭亡。伊朗宗教在中国留下了影响和痕迹，在建筑和艺术上有所表露。中国农民起义很多，有的利用宗教的形式，其中也有伊朗宗教。中国古籍中所谓“吃菜事魔”者就是。

伊朗艺术的风格和图案，在丝绸之路上，影响极大。在中国境内的一些洞窟中，壁画上都有伊朗的影响。

在物质文明方面，我首先还是讲一讲糖。从汉末起，中国古籍中就出现了“石蜜”这个词儿。石蜜是一种蔗糖，估计比较硬，所以名之以“石”。同“石蜜”相联系的不是“西国”，就是“西极”，足征这是外国来的。唐代一些《本草》中常说：石蜜，西戎、波斯来者良。可见这东西是从波斯来的。唐代大历年间（766—780年），四川遂宁来了一个“西僧”邹和尚，教当地农民制糖霜。不必实有其人，

不能说没有其事。我怀疑,这个和尚来自伊朗。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这件事也与波斯有关。

石蜜以外,还有一些植物和矿物从波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所食用的一些菜蔬和果品,我们是食而不思。实际上每一种菜蔬和果品的背后都隐藏着一部交流传播史。有时候,我们只知道,它是外来的东西;但是,究竟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呢?我们却往往说不清楚。今天我们的舶来品往往冠以"洋"字,比如洋葱、洋火腿、洋酒、洋烟等等。古时候这一类外来的东西往往冠以"海"字、"胡"字,比如洋药称为"海药",又有"胡桃"等带"胡"字的东西。有时候也冠以"番"字,比如番茄等等。三十年代北京称西餐为"番菜"。从波斯来的或者在传播过程中同波斯有某些瓜葛的果菜花木颇多。我现在只举几个例子:苜蓿、葡萄、胡桃、安石榴、胡荽、黄瓜、胡葱、红花、茉莉、指甲花、五倍子、胡椒、诃黎勒、菠菜、巴旦杏、无花果、水仙、西瓜、胡萝卜等等。

此外,从波斯传入中国的还有锦缎、氍氈和其他一些纺织品,还有一些矿物鍮石、翡翠之类。

阿拉伯国家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是源远流长的。至迟到了汉代,中国就同阿拉伯有了往来,当时还不叫阿拉伯。到了唐代,中阿交通达到了顶点,中国古代史籍中的"大食",就是阿拉伯国家。回教在唐初传入中国,到了今天,中国56个民族中有不少是穆斯林。阿拉伯国家的旅行家,有几个也到过中国,在他们的游记中记载着中国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伯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当然会传入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我想举的例子仍然是糖,这我在上

面讲到印度和伊朗时已经讲过了。

古代的埃及和伊拉克的熬糖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和其他的材料，阿拉伯的熬糖技术也传到了中国。在制糖方面，所谓技术高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色与味。颜色是越来越白，味道是越来越醇而且甜，因为杂质被熬掉了。一部中国制糖史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向前发展的。

此外，阿拉伯的动、植、矿物有一些也传到了中国。根据中外历史资料，我选几个比较重要的介绍一下：

动物　马　“大食国马解人语”　鸵鸟　大尾羊　胡羊　羚羊　木乃伊　珊瑚树　珠　象牙　腽肭脐　龙涎

植物　石榴　人木　阿芙蓉(鸦片)　熏陆香(乳香)　骐骥竭　苏合香　无食子(没食子)　诃黎勒　金颜香　栀子花　蔷薇水　丁香　阿魏　芦荟　押不卢　火牛刺把都

矿物　马脑　无名异　琉璃　回回　石头　红石头　绿石头　鸦鹘　猫睛　甸子　火油

此外，阿拉伯的天文历算也影响了中国。

我在上面极其简略地介绍了西域文化东渐和佛教、回教传入中国的情况。这不是学术论文，我不能详征博引，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轮廓，让大家了解中国同西域文化交流的情况而已。

了解文化交流的情况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一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如果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从印度、伊朗、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的西域地区或国家接受我在上面叙述的那样一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简直连想也不敢想。只此一点就足

以证明文化交流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在最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章中，屡次提到了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这一点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吗？

我个人觉得，这一点认识异常重要。这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爱国心，另一方面又能激发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恰当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就能够做好，我们就能够无往而不利了。

1994年1月30日写完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就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 (宋)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一段话说不定也是"颂圣"之辞,不尽可信。然而我宁愿信其有,因为它真说到点子上。

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意思也一样。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

"卷"指的是书,"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书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

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以此为苦。在眼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四人帮"说:读书越多越反动。此"四人帮"之所以为"四人帮"也。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有个别的"大款",

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传承文化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人身上，而只能寄托在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先，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必须读书。这已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

根据我同北京大学学生的接触和我对他们的观察，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肯读书的。他们有的说，自己感到迷惘，不知所从。他们成立了一些社团，共同探讨问题，研究人生，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感到兴趣。他们甚至想探究宇宙的奥秘。他们是肯思索的一代人，是可以信赖的极为可爱的一代年轻人。同他们在一起，我这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也仿佛反老还童，心里溢满了青春活力。说这些青年不肯读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读什么样的书呢？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读，这不在话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为大时代所抛弃。

因此，我奉献给今天的大学生们一句话：开卷有益。

1994年4月5日

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

——读《丝绸之路》的观感

稍微了解情况的人大概都会认为，这样一个题目太空泛，太陈旧，简直有点老掉了牙的味道了。如果摆在小报上或通俗刊物中，还可以勉强过得去。但当做学术论文，则没有再写之必要。我们对于丝路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知道得实在已经够多了。

在读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中华书局出版的《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1993 年出版）之前，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关于中波文化交流的著作，我们确实已经有了不少，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劳费尔、张星烺、朱杰勤、方豪、林悟殊、沈福伟等学者的著作。如果再计算上论文，那数量就更加可观。中国古代典籍中还有大量的原始资料，迄今还没有人认真探讨和利用。在这样情况下，再谈丝路与中波文化交流，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

但是，我读了耿译的《丝路》（以下皆用此简称）以后，眼前豁然开朗，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丝路"。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书中提出来了。我原来想得不深的问题，书中想得很深了。这大大地提高了我对"丝路"的认识。阿里·玛扎海里，祖籍伊朗，波斯文是他的母语。此外，他还通晓阿拉伯语以及许多中亚重要语言。研究"丝路"，这些语言都是绝对需要的，断断不可少的。至于西方重要的现代语言，他也大都能掌握。再加上他那极为丰富的学识，他可以说是撰写研究"丝路"专著的最恰当的人选。因此，他这一部书，即使难免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总起来看，它超过了所

有的前人的著作。我手不释卷,欲罢不能,在繁忙的工作和会议之余,几乎是一气读完。我应该十分感谢阿里·玛扎海里先生,我应该十分感谢耿昇同志。我想把这一部书推荐给所有研究"丝路"和中波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们。

内心的激动逼迫着我拿起笔来,写了这一篇论文,想把我所感兴趣的一些历史事实介绍给读者。我一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感兴趣,其中对中波和中印文化交流史更感兴趣。最近若干年来,我从文化交流这个角度来研究糖史,而正是这个看似微末不足道的糖,却在中印、中波、中阿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我的介绍,除了一般事实之外,重点是放在制糖术的交流上面的。

分以下几节:

一、几句内容充实的"套话",

二、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贡献,

三、对研究中国历史有裨益的小资料,

四、埃及制糖术,

五、波斯制糖术。

一、几句内容充实的"套话"

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目的首先在于求真。真就一定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真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真,有的能够立竿见影,产生政治、经济或其它效益;有的就暂时不能。具体事例多得很,用不着列举。

文化交流史是一门科学,它当然不能脱离上述原则。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是一门能立竿见影的科学,它能够产生政治、经济和其它效益。它至少能让人们了解到,人民与人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一向是互相依存的,互通有无的,互相促进的,谁也离不开谁

的。了解到这一点大有用处。它能加强人民与人民间,民族与民族间的感情与友谊。有了争端,双方或者多方要心平气和地来解决,不必大动干戈。对真正的侵略者和压迫者,他们是世界人民的公敌,当然不能照此处理。我始终相信,不管当前看起来世界上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危机,人类最终总会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

二、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贡献

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皎如日月,有口皆碑,无待赘述。但是,人们谈论的和我们想到的,无非是那著名的四大或几大发明。这是非常不完全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众多细微的(也许并不细微)发明创造,我们不十分清楚。这无疑是一件憾事。令人奇怪的,也或许是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知道得要比中国学者多得多。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在我在谈的阿里·玛扎海里是又一个例子。

在他的这一部巨著里,在很多地方,好像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它都指出了许多中国文化影响外国文化的事实,有不少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他讲得没有体系,我也不画蛇添足,勉强制造出一个体系来。我只是按照本书的顺序,把他讲的记录下来,标上中译本的页码,以便读者查阅核对,做进一步的探讨。我间或也抄一点他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有时我自己也发上一点议论,目的只在弄清事实,提高大家探讨研究的兴趣而已。

"译者的话",页 2:

作者于 1960 年著文《论杆秤起源于中国》,说古代罗马人使用的杆秤以及后来由此发展起来的衡具都应追溯其中国来源。

"中译本序",页 11:

波斯和中国两种文化有相似性。

同上，页13：

"我于此把中国读者当作知己而无所不谈。他们将会看到，在经过这样长的岁月之后，我是第一个受他们及其历史吸引的伊朗人。"(羡林注：加引号者是抄录的原译文，不加者则是我的叙述)

"导论"，页4：

"在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应该提到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工业以代用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

同上，页5：

讲到中国纸的情况。

同上，页8：

波斯语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通行语言。

同上，页9：

讲到中国的大黄。

同上，页10：

讲到中国茶和"茶叶之路"。

同上，页12：

从明代到清代，中国出国的商队都一律具有"使节"的官方特点。外国人也只能以使节的身份进入中国。

同上，页17：

"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在丝绸之路正常运行的整个期间，也就是说在近2000年期间，中国天子们一直不停地索求波斯马。"

羡林案：本书中多次谈到马，比如页136，页314等等。下面页19，讲到大黄治马病。

页20：

"大黄、大枣等在很古老的时候就从中国传入(到)波斯。"

页25:

这里作者谈到了"具有滋补强壮作用的人参或糖。"糖,我将在下面专章论述。

我引一段话:"来自穆斯林一方的使节——队商要比来自中国一侧的多得多。因为主要是伊朗——伊斯兰世界需要中国产品,而中国则可以离开'西域'"。

正文,页81:

这里作者谈到酿酒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应该归诸中国。

页85:

作者对"中国的娱乐活动在世界上是独具一格的"(页45)这一句话所作的注是:"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娱乐活动'理解作已被萨珊——阿拉伯文明所抛弃的戏剧和喜剧。如同异教徒艺术一样,这种艺术被他们完全如同对待雕塑和某些油画一样而抛弃了。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文明中,戏剧(尤其是喜剧)已遭'遗忘'。'中世纪'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放弃了这一切。中国的宋朝,尤其是15世纪的明朝则必须重创戏剧。在拉丁世界和南印度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当时在世界的三极,在远离伊斯兰教直接影响的地方,存在着3个复兴中世纪大陆文明的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娱乐活动在世界上是独具一格的'一句话的意义。"

羡林案:这一段话很有意义,很值得重视。大多数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戏剧史的学者们,眼光往往囿于国内,对宋元明戏剧的复兴说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来。本书作者把这个问题放到世界范围内,来加以宏观的考察,使我们的眼界为之一扩。作者的说法也有欠周到的地方,比如他只提宋、明,而不提元,显然是不全面的。

页86,注(45):

"波斯商人穆罕默德·吉拉尼老爷于15世纪下半叶在肃州和威尼斯之间从事中国药品贸易,他为其顾客们准备有一本图解药品目录,从中可以看到普通中国人用药的情景。他对其意大利顾客说,在肃州附近有非常丰富的大黄,人们用来喂家畜,还作为'神香'而用来在偶像前焚烧。檀香木(中国檀香木)、麝香、诃子、茶叶、姜黄('印度红花')等使肃州成了一个向西方出口的重要中心(卫匡国:《中国新舆全图》)。最后,我们还应补充说明,中国人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阿拉伯数字称为肃州数字'"。

羡林案:这里提到中国药品传入西方的情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黄。我在上面讲到原书,页17和页20时,已经提到大黄,下面还将提到。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在肃州和意大利威尼斯之间做生意。下面我在"埃及制糖术"一节中还要谈这个问题。由此可见,马可波罗来中国,不是偶然的。

参阅本书,页299,注(6)关于中国医药的论述。

页121:

讲到中国针灸。

页124:

《大明律》代替了蒙古人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处于中国南方,蒙古人的政权未能对那里实行全面统治。因此,'汉族法学家'(我们使用了契达伊的表达方式)也成功地恢复了先前的汉地法制。至于在伊斯兰教界,那里的文明中心在中亚而绝不是像大家经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在'阿拉伯世界'。一旦当伊利汗和其他'成吉思汗后裔们'彻底摧毁了这一中心之后,穆斯林法学家们复兴古'阿拉伯法'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当我们在以比较的方式研究不同王朝的穆斯林法和中国法的时候,不应忘记'佛教法'和萨珊王朝的法,它们都曾是远东法和近东法之间的媒介。所以我们必然会对所有这些法律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而感到吃惊。事实上,尽管在中国法和'阿拉伯法'之间存在着宗教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差异,但这两种均起源于'天'的法则更应该是相似的,仅与我们那完全是经验性的近代法律是对立的。"

羡林案:这一段话是很深刻的,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大明律》,把中国法、佛教法和阿拉伯法加以对比,确定其相互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东方三法与西方法相以对比,一下子就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这对探讨东西文化之差异,也具有启发意义。我甚至想把它与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联系起来。

参阅下面页129,页166,关于《大明律》的论述。

页127:

这里讲到16世纪奥斯曼人占领波斯首都,大肆劫掠。"赛利姆算端(按即苏丹——羡林)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仿效帖木儿作出的榜样,如同对待'战俘'一样劫掠了所有具有科学才华的人、学者、艺术家、瓷器匠、青铜器匠、铸铁工、铁匠、画师、草药药剂师、化学家……等等。"

羡林案:这一段记载很有趣。这立刻就让我们想到中国同大食的坦逻斯之战,中国战败,大食人俘虏走了中国的工匠。世界史上许多战争都有这种情况。连本世纪的二战也不例外,美国不是把德国的导弹专家抢到美国去了吗?

页135—137:

《中国志》的导论中,历数全书20章的内容,讲到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其中不少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页139:

"他们的和尚和尼姑以及他们念咒语练气功的方式。""他们的"指的是"中国人的"。下面页148—9对这句话加的注对中国的气功作了详细的解释。作者在这里写道:"但中世纪熟悉苏菲派信

徒们习惯的契达伊却未从中看到任何荒诞可笑的内容。据他认为,本元之气实际上与心理之气没有差异,它们二者都是一种换气的方式。其唯一的差距仅在于内气具有'肉体的'和'恶臭的'特点,从其气味中便可以分别出来;而上气则是由'肺脏''抛泄'出来的,具有一种'精神的'和'神奇的'特点。"无论如何,总可以看出,中国的气功早就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注意。研究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不妨根据本书作者提出来的线索加以探讨,这要比眼光只限于中国要好得多。

页 154—6:

作者用了三页长的篇幅对于火炮作了详尽的阐释,其中包括1257年蒙古大军围攻巴格达时使用过火炮。研究中国史以及火炮史的学者都应该参考这一个长注。

页 199—215:

契达伊的《中国志》的第6章,内容讲明代皇帝的统治,从皇宫一直讲到政府组织。这对于中外学者研究明史会有很大的帮助。页215,《中国志》的作者说:"如果中国人的帝国在如此之多的'千年纪'中安然无恙,而且还每年都在扩大,那末难道不是由于他们奉公守法吗?"这只能是作者一个人的臆断。封建王朝的皇帝和政府哪能谈到什么"奉公守法"呢?可是经作者这样一理想化,在国外产生点好影响,也不是不可能的。

页 204:

《中国志》原文是:"3扇主门的门扇都是用中国钢铸成的。"阿里·玛扎海里给"中国钢"写了一个注,见页222:"有关这些钢和铸铁,见笔者的论文:《刀击剑,论熔炉钢的中国起源》,载《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第4期,1958年。中国钢完全是熔铸的,完全如同我们的铸铁。……波斯人从帕拉亚人时代起就已经从中国进口许多铸铁产品,尤其是长把平底铁锅和一般锅。……此外中国铸铁工

们的工艺可能是经伊朗而传入了西方，即与第一批大炮是同时传去的，始终是由于受威尼斯人（如果当时不是由热那亚人）诱惑的某一匠人的背叛而造成的后果。”由于篇幅关系，我的引文不能再长，请有兴趣者阅读原书。

此外，在《中国志》中还多次提到中国的铸铁。页294说：“中国的铸工们用铸铁铸造了一座如同岗楼那样高的供像，但它内部是空心的。”阿里·玛扎海里又作了注释，见页296。注中说：“但商旅们最早似乎也从中国向波斯出口非常豪华的铸铁器。”下面他讲到“中国的镜子”、“中国剃刀”、“中国剪刀”，还有马蹬，被波斯人称为“中国鞋”。

下面，页315，《中国志》又说到中国商品，绸缎以及马蹬、铠甲、剪刀、小刀、钢针等等用钢铁制成的东西。阿里·玛扎海里在注释里又讲到“中国的钢铁铠甲”，页322；讲到“剪刀”，页324—325。页376，注（20）中，阿里·玛扎海里强调说：“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

本书页435，“梅南德·普洛特科尔（6世纪）有关突厥人的几段记述”中说到突厥人要出售铁，“使人知道其国盛产铁”。这可能与中国也有关系。

我在上面从本书中征引了许多关于中国钢铁的记述。这当然还不够全。但对古代中国出产钢铁这个事实，已经足够了。

关于中国古代能生产优质钢而且输出这种钢，我早就注意到了。最初给我启发的不过是一个梵文字：cīnaja，是由两个字组成的，cīna，意思是“支那”，即中国；ja，意思是“生”，合起来意思就是“生于中国的”。真正的意思却是“钢”。可见中国产钢，在古代印度是著名的。我曾在拙著《中印文化交流史》，《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新华出版社，1991年，页20—22，谈到过这个问题。现在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又提供了这样多的宝贵的资料。我对自

己的说法更加坚信不疑。

页230注(54):

作者在这个注里讲到了中国的印刷术。他认为,《中国志》的作者契达伊间接地了解到了中国的印刷过程。

同页,注(57):

作者讲到中国的矮桌子和常见的桌子,后者由伊利汗传入波斯,又由此地传入意大利。作者说:"这次文艺复兴在许多方面都有求于中国:食物、衣着、室内陈设、印刷术、火炮等,完全如同它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也有求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一样。"

页260—262,注(14)—(15):

这里讲的是瓷器。中国瓷器原有两个传统品种:乳白色的和杏黄色的。但是,早在明代,这种古瓷就已停止生产,并开始制造"穆斯林"们的那种蓝色瓷。作者开列了几种西方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参考书。读者如有兴趣,可以找原书查找,我不一一列举。他在下面又详细讲了古代波斯在一些典礼上和丧仪上使用中国瓷器的情况。

页269,注(29):

作者在这里注的是上面页253的"临清",但是那里的注号是(30),作者显然是弄错了。

上面讲到临清出产瓷器;但是,我们都知道临清并不出产瓷器。这怎样解释呢?阿里·玛扎海里的解释是:"契达伊把临清一名扩大运用到了大运河沿岸的整个地区。"他还认为,契达伊可能混淆了山东的临清和江西的龙津,龙津在鄱阳湖东南,距南昌不远。乾隆时代,中国瓷器制造中心是位于鄱阳湖东北的景德镇。

页299,注(6):

这里讲的是中国医学。作者写道:"我们仅仅讲一下中医在波斯所享有的威望。这种威望可以追溯到萨珊王朝时代,但特别是

自13世纪中叶以来得到了复兴。我们还应提请大家注意,早在加利安和奥斯科里德身上就已经反映出了中国的影响。后来于12世纪又重新变成波斯医学的中世纪"阿拉伯医学"中便有半数以上充满了中国的药理学和临床的药剂及配方。15世纪所绘制的帖木儿王朝医学的5种图案、"血液小循环"的发现,最后是许多被认为是"阿拉伯人"、"意大利人"或"新教徒们"的发明的许多问题归根结蒂都要追溯到中国医学。最奇怪的事实是,由伊利汗的中国医生们发现的血液流动论立即被苏菲派信徒们归于了他们的圣人,被什叶派信徒们归于了他们的医学博士,最后被新教徒们归于了他们自己的医生。同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禁止解剖身体,而南宋人(公元10世纪,原文如此,应为11世纪)则在中国允许这样作。在伊利汗(当时尚为异教徒)统治下的波斯于13世纪中期,在帖必力思的医学院中,中国医生们传授并亲手进行解剖人体的活动。他们甚至还从事活体解剖,以便讲授血液的流通以及其它许多内容。蒙古人的许多犹太族医生也被准许与他们的汉族同事一道工作,所以在他们返回意大利之后便可以向正在酝酿中的文艺复兴运动传授医学的最新发展成果。"

这一段话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不觉就抄得多了一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医学对西欧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影响。中国医学和解剖术以及血液环流的理论之传入欧洲是经过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媒介的。要特别注意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文化交流。我在本文中几个地方都讲到中国与威尼斯和热内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我在前面本书页87,注(45)中已经讲到中国医药,请参考。

页299—301,注(7),前面页295:

这里讲的是天文。众所周知,世界古代天文学的互相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迄无定论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天文史专家写的论文和专著,即使不能说是汗牛充栋,数量也极为可观。作者

在这里旁征博引，涉及的问题多，文章太长，无法征引，请读者自行参阅吧。我只提出一点，请读者注意作者在页301提出来的“中国天文学的贡献实际上曾有过了太高潮。”

页302—303：

“中国和伊朗——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关系要比大家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得多。这种关系与‘丝绸之路’一样古老，它们缓慢地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同时也造就了其形式，即波斯文学、阿拉伯文学，而且还有新拉丁文学、拉丁教会文学，特别是行吟诗人文学。……事实上，新拉丁文学由于其内容和形式都要经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中国文学。……我们仅仅希望指出这一点。此外，我们还想说明，在中世纪中期，一名多少懂一点汉语的波斯普通商人是怎样把汉语中的一些措辞、谚语、谜语，当然还有中国乐曲从北京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中国文化从东向西缓慢地取代了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形成了我们文化的基础，我们那由文艺复兴造成的新希腊文化仅仅是晚期的一层美丽外表。”（羡林案：这一段话恐有排印错误。“君士坦丁堡”后面应该断句。）

页308：

在这里作者引用了“纯粹的古典作家撒德”的一首诗，说中国人40年制造一件瓷器，在波斯一天可造100件，“这样一来，你就看到了两种瓷器的行情。”下面，作者接着写道：“阿维森纳写道：‘我在布哈拉萨曼人的皇家图书馆中发现了一些任何人都从未见过的书’。这里只能是指由摩尼教徒们译作的粟特文或波斯文的汉文文献。……这就是为什么继萨珊王朝的思想家们（阿尔法比尤斯、拉赛斯、阿维森纳）之后，他们的弟子们不断地被迫将他们的‘中国哲学’伪装上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外表’，这正是‘启示哲学’，也就是‘被灯罩遮住的烛光’”。

页311：

作者首先写道："整个'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的脊柱、脊髓、消化器官和动脉就是丝绸之路，即那条通向中国（即今天著名的'红色'中国）的大道"。下面他说到伊斯兰世界所急需的中国产品，"如用防腐剂处理尸体必不可缺的樟脑或麝香。"

页324—325：

"剪刀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我们看到中国在考古发掘中已得到了这种工具。……对所有这一整批资料的研究都可以使我们坚信，裁缝的剪刀，简单地说也就是'裁剪术'在传入西方伊斯兰世界之前曾是一种中国技术。"

页345：

"最早到达中亚的穆斯林非常惊奇地在那里发现了风磨。阿拉伯人（也就是伊朗的拓殖区）在西西里和西班牙模仿了这种风磨，又从那里传到了弗兰德和其它拉丁地区。这种风磨也应追溯到一种中国的发明。"

页361：

"它（羡林案：指郁金香）实际上是一种国花，波斯植物学家们称之为'中国罂粟'。……郁金香在15世纪末就很著名，并在帖木儿朝的京师赫拉特（哈烈）被广泛种植，它很可能是从那里被首次移植到伊斯坦布尔（似乎是在美男子苏莱曼时代），荷兰于那里发现了它并将之移植到自己的国家，被以一种突厥文名字tulpen相称，我们由此而得出tulipe（郁金香）一名。"

羡林案：这是一段很有趣的说法。荷兰郁金香名满天下，由此而获得极大的经济效益，想不到竟是一种中国花。

页376：

"继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铜、砂浆、泥浆的发现一古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绸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

——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下面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吉希斯：《论有色人种较白人之优越性》)"

羡林案：上面这一段话十分重要，涵义十分深刻。我将另文阐述。这里讲到了中国与希腊的区别，因此，我想对这个问题做一点补充，再抄一段本书前面页329讲到的中国与希腊对比的话：

"在伊斯兰教初期，还流传着有关中国人的另一种传说：'中国是雅弗的后裔'，他们创造了大部分专门艺术(艾敏—艾哈迈德·拉齐：《七大洲世界》，约为公元1617—1618年)。根据这种在17世纪时还可以解释一种事实真相的传说认为，中国在工艺和技术方面都较西方民族发达，是中国发明了大部分艺术。在当代的欧洲，大家还认为是希腊创造了所有的艺术，'希腊奇迹'是官方教育中所热衷的内容。在波斯，大家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在承认希腊人于科学理论领域中无可争异(羡林案：应作'议')的功德的同时，却发现他们在技术领域中完全无能。"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时代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工艺，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羡林案：原文作'论理'，似误)。'"

"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下面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除了以他们的两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扎希兹：《书简，论黑人较白人的优越性》)。这些作者们认为，这种观察证明了中国人

（如同‘阿拉伯人’一样也属于有色人种）较希腊人、波斯人和‘突厥人’（费尔干纳人，即锡尔河上游的塔吉克人）等民族（他们都是‘白人’）的优越性。”

因为这些话实在很重要，所以多抄了一些。这对欧洲中心论者和言必称希腊者，无疑是一剂清凉药，能让脑筋清醒。这对实事求是地探讨和研究东西文化的差异者，也是极其重要的参考。这对真正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者，也是一个极其有用的教材。这对想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者，也是一个异常有意义的异常具有启发性的参照。

页379：

“从非常远古的时代至今，中国人就一直拥有持续不断的编年史和断代史，非常喜欢纪年和列传，而类似的作法仅仅才近几个世纪以来才在西方出现。‘古代史’和‘编年史’应该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中国的体裁。塔西佗、蒂特利夫、絮埃顿、厄赛卜、宗教史学家（亚美尼亚人、穆斯林、拜占庭人、克什米尔人、僧伽罗人和拉丁人）则都根据年代顺序而记载各位君主及其事实，他们都是中国人血缘遥远的弟子……在我们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既无时间，又无任何衡量已度过的时间之标准，而仅仅是一堆无年代顺序的辩词片断。它与司马迁的《后汉书》（误，应为《史记》。——译者）该有多大差距啊！司马迁的书中充满了在我们20世纪仍值得信赖的时间和传记。”

页424：

这里讲到中国蚕卵被一位波斯人藏在手杖的空心中带往拜占庭。

页441：

“据我认为，谷子和高粱是古代中国大陆上的农作物，经过丝绸之路先传至波斯，后传到罗马。”下面页519又讲到中国的谷子

和水稻。

页 442：

"随同谷子和高粱一起外传的还有中国人的'封建文化'和村社制度。"下面页 519 又谈到谷子和水稻。

页 444：

"其中用佛教的、中国的和东伊朗(呼罗珊)的医学丰富了地中海人的医学。"

"总而言之，穆斯林中使用樟脑香脂的习惯肯定要通过祆教徒和其他民族而沿着丝绸之路追溯到中国人本身，中国人当时是世界上樟脑的最大生产者和消费者。"

关于中国医药西传的记载，上面页 86 和页 299 已经谈到过，请参考。下面页 452 和 455 又谈到樟脑，也请参考。

页 452：

这里讲到中国茶叶的西传。

页 455：

"《智慧的乐园》是第一部典型的中世纪医学著作，因为它是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科学交叉的结果。"请参阅上面页 444。

页 463—486：

这里讲中国肉桂的西传。

页 487—518：

这里讲到中国姜黄的西传。

页 522—535：

中国麝香的西传。

页 536—552：

中国大黄的西传。

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贡献就讲到这里。

尽管看上去我在上面征引得已经相当详细了；但是，离开完备

还有一段极长的距离。因为本书中谈到中国文化影响外国文化的地方,太多了,太细了,完全征引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征引只能算是鼎尝一脔。我还是劝有兴趣者取阅原书。作者博闻强记,内容极其丰富,极有启发意义,阅读决不会失望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到,作者引了许多细微的东西,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然而,正是这一些为我们所忽视的"细微的"东西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对我个人来说,读了书中的记载,眼前真似豁然开朗,真正感到中国文化,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的文化曾照亮了丝绸之路,曾照亮了欧亚大陆。这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现在不是强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吗?对中国青年来说(中年和老年也一样)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的方式,据我个人的看法,不外两途:一是讲道理,讲理论;一是摆事实。而后者的作用往往胜于前者。只要把事实一摆,道理自在其中,爱国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如果只讲理论,最容易流为空疏;空疏一过头,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平常讲的"事实胜于雄辩",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必须再强调一下。文化是多元产生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世界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只是程度和性质不同而已。我说中国文化伟大,并不等于说其他民族的文化不伟大。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三、对研究中国历史有裨益的小资料

我在上面几次说到,此书资料丰富,可抄者极多。但总不能漫无止境地抄下去的。我现在仅把对研究中国历史有用的资料再抄一点,其余的就都免了,请读者自己在这一座宝山中去挖掘吧。即

使是对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料，也只能是有选择地抄一点，聊作示范而已。

“导论”页 2—4：

这里讲了丝绸之路与海路盛衰消长的情况。“我们不要认为丝绸之路在 18 世纪是骤然间消失的，完全是因为葡萄牙人发现了海路。因为这两条路曾在长时间内相辅相成，它们甚至稍晚在 18 世纪期间尚互为补充。……在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应提到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工业以代用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下面作者举出了麝香、铜镜、铁铸火炉和饭锅、钢针、钳子、铁锉、火镰和几乎所有的小五金制品来做例子。

页 8：

“在中世纪，也就是直到 19 世纪初叶，波斯语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亚洲的其余地区尚扮演着一种英语在我们当今世界所具有的角色，即贸易和外交界以及稍后不久思想界的一种国际通用语言。”

页 12—13：

讲到明朝的对外政策，进出中国都有类似海关的机构。中国官府严格要求进出口的关文。某些交易被严格禁止。中国商队一律具有“使节”的官方特点。外国人同样也只能以使节身份进入中国。任何人都不能以普通商旅的身份越过中国的“关卡”。西域所有的王国都要进贡，每个王国原则上每年只有一次派遣使节的权力。有的使节带着“奇兽”，更像一个流动的杂技团。真正的商人跟随使节从事贸易活动。

页 26：

朱元璋于 1398 年晏驾，发生了皇位继承问题。年迈的瘸子帖木儿想以成吉思汗和安拉的名义征服中国，征集 20 万大军，而永乐还被蒙在鼓里。

第一编,页53—61:

波斯使节沙哈鲁具体生动地记录了他朝见永乐皇帝的情况。天子上朝的情节、永乐的相貌、皇帝审问罪囚的情况、沙哈鲁同永乐谈话的细节、御宴的菜肴,以及音乐和杂技的表演等等,都一一绘形绘声地记录了下来。在中国史书中都是难以找到的,对于研究明史的学者会增加许多感性认识。

页62:

"皇帝自己出资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清真寺以供北京的穆斯林使用。"这可能是一种怀柔政策。

页62—63:

描绘了处决犯人的场面,令人毛骨耸然。这样的史料,中国载籍中几乎难以找到。鲁迅先生在南明史料中找到了差堪与此媲美的资料。

页65:

"有人把所有来人都领进了新宫殿内。从契丹、中国中原、摩诃支那、卡尔梅克(蒙古)、吐蕃、哈密、哈剌和卓、女真(满洲)、海滨地带(渤海国)和其它未知名地区的四面八方涌来了10万之众。有人把他们引进了新宫殿,皇帝在那里盛宴群臣。"

羡林案:这一段话颇为重要。地名中的"摩诃支那",梵文是Mahācīna,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学者们之间是有争议的。本书中还有几个地方提到它,我现在抄在下面。页260:

"拉施特、贝纳凯蒂、阿穆利和瓦萨夫等人均写作:'蛮子是中国东南的一个城市,蒙古人称之为印度和摩诃支那或大中国,我们波斯湾的其他穆斯林则称之为大秦。杭州是该国的一个主要港口。'"

"mahā-cīna(摩诃支那或大中国)也有可能仅仅是mingchu/menzu(明州)经梵文化之后的形式。但某些人却提议把它看作是

mènzè，即‘蛮子’，这勉强可以使人接受，因为在该名称传播的时代，‘南蛮子’获得汉地方化就有数世纪的光阴了。”

下面页450，又有关于这问题的一段话：

“被马立克·穆宰非尔称为‘小中国’的地方更难比定。它可能是出自印度语的一个名词，与‘大中国’（在印度文作 Mahācīna，在波斯文中作 Ma-Tchin［羡林案：应即是汉文‘大秦’之对音］，即摩诃支那）相对。我记不起来是否曾在阿拉伯文献中遇到过其同义词 al-Sin al-Kubra，也记不起穆泰米德书中的 al-Sin al-Sughra 的波斯文对应词了。在拉施特史（蒙古人的历史）中，我们遇见了一个阿拉伯/波斯文短语 sin-Kalān（大中国），它可能是印度文 Mahā-Cīna（摩诃支那）的伊斯兰文形式。”

关于 Mahācīna 的材料就抄这样多。我在这里不再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相信，上面的材料对同行们是非常有用的。

页67：

描绘了中国人过新年的情景，也很生动。

页69：

记载了永乐对使臣的赏赐。

页79，注（15）：

在波斯文中称佛陀为 But。请参阅拙著：《浮屠与佛》（《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页1—16）；《再谈浮屠与佛》，《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页85，（39）：

这里谈到中国的戏剧，极有参考价值。

页113—116：

在这里作者讲了明代中国宗教的情况。作者说：“他（按指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提到了大明历代皇帝对穆斯林教徒们的好感以及他们个人希望皈依伊斯兰教的那种具有不同程度真

实性的愿望。”下面他又说，甚至蒙古诸汗都曾认真地考虑过皈依伊斯兰教。他还讲到了伊斯兰教与萨满教、喇嘛教、佛教和儒教（这是原书的名称——羡林注）之间的竞争。他说喇嘛教是一种由伊斯兰教因素所丰富了的佛教，清王朝后来也皈依了该宗教。这些都是新颖而有趣的说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页 116：

正德皇帝（1506—1521 年）登基时，契达伊已经离开中国相当久了。他定居在君士坦丁堡，一些来自北京的商人——使节向他详细叙述了正德皇帝是怎样刚刚经北京穆夫提之手而皈依了伊斯兰教。下面页 157，契达伊（羡林案：即《中国志》的作者）又绘形绘色地描绘了皇帝（可汗）信仰伊斯兰教的情景。“可汗令人于其宫殿中绘制了人类最高领袖（穆罕默德）的画像。穆罕默德的画像完全以宝石镶嵌”。更下面一点，页 162：“总而言之，中国政府的习惯是各自信仰其宗教，而又不会表现出以不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邻居的信仰。但是，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偏爱胜过了其它所有宗教。”这些都是非常有趣而又重要的叙述，对于治明史的学者极为有用。上面页 62，已经提到明成祖建清真寺的事情，也可以参阅。总之，我认为，明代皇帝对伊斯兰教有所偏爱，恐怕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恐怕是出于一种策略。说正德皇帝皈依伊斯兰，颇难置信。我非明史专家，记下这些资料，仅供专家学者们参考而已。

页 132：

《中国志》的“题献”中说，兀鲁伯算端派驯鹰人和护送狮子的人到中国来。明朝皇帝对鹰和狮子特别喜爱，本书中屡有记载。参阅下面页 136，页 154—155，页 321，等等。

页 135—136：

这里列出了《中国志》的章节，可参考。

页 136：

西域贡品中有马。自古以来，西域的马就为中国皇帝所喜爱，本书中屡有记载。

页 161：

“中国的法律是欢迎所有外来宗教团体的信徒，只要他们明确宣布承认中国皇帝为其君主。”这句话真说到了点子上。作者对这一句话作的注见页 169：

“事实上，根据穆斯林教法（这是获得永久拯救的关键），穆斯林教徒们只有在中国皇帝本人也是穆斯林时才能成为他的‘臣民’。因此，为了确保其穆斯林‘臣民’们的忠诚，大明王朝曾试图以标准‘算端国’自居。在举行穆斯林们的公开祈祷时，很可能是以‘大明汗’的名义作呼图白（演讲，圣训）。当时曾流传说大明人是秘密信仰伊斯兰教的，那里有祭天的绿色教堂以及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载有《古兰经》主要章节的牌子。”

羡林案：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在上面几个地方提到了大明皇帝同伊斯兰教的关系，初看似难以理解。现在就得到了理解的钥匙。我从此还联想到本书下面的几段话，因为有密切联系，我也一并在这里讲一讲。页 167：

“在蒙古人统治时代（1206—1370 年），中国的穆斯林变得人数众多和力量强大了，并且在那里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护和尊重。明朝的创始人太祖对穆斯林教徒们重新实行了元代的政策。”

羡林案：这一段话也非常重要。明太祖的子孙们对穆斯林特别垂青，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又为了继承先人的遗志和政策，这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监掌权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自古已然，于明为烈。原因何在呢？本书中收入的契达伊的《中国志》对此有具体的记载，见本书页 174—176，请参阅。但是，本书页 176 有几句话：“中华帝国繁荣昌盛的另一种原

因是存在着一些如同皇帝养子一般的太监。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第一句话容易明白，第二句话就颇费解。赫赫有名的郑和就是回教徒。原来好像还没有人追究其原因。现在，如果把我在上面所说的情况联系起来，就可以恍然大悟，这看似偶然的事件，也是事出有因了。我因此想到，研究中国史，必须多读外国书。这意见恐怕是大家都能够同意的吧。

页162：

波斯人讲释迦牟尼和佛教，有一些颇为奇特的说法，很值得参考。

页169—170：

作者在这里讲儒教，也很有参考价值。他写道，注(21)：

“理学(新儒教)的创始人朱熹完全同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也被认为是接受了摩尼教徒们神秘学说，其学说令人难解的一面及其非常宽宏的容忍精神即由此而来。孔夫子本人的施教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和一种无神论。曾有人断言，忽必烈首先把理学变成了中国的一种信经和他希望成为其‘哈里发’的一种教派。因此，取代了元帝国的大明皇帝继续为官方新教派的宗教首领，其官吏们形成了他的教士。所以，早在契达伊那个时代，理学就以其倚仗‘先知’孔夫子名义的“哈里发”和广泛容忍外来信仰之双重特点而引起了外来人的注意。正是这种双重特点后来在满清时代轮番地引起耶稣会士们及其对手——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好感。前者向它借鉴了由大清人传入的‘禁书索引’，后者向它借鉴了一种广泛的宽容制度，甚至对外来宗教也无动于衷。”

羡林案：这些意见十分值得重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必须参考外国学者的看法。否则，思想方式总跳不出老框框，这对学术研究十分有害。

页187：

讲的明英宗的被俘、契达伊的叙述非常值得参考。

页 199—215:

关于明代皇宫的描绘有参考价值。其中上朝仪式,更为具体、生动。页 212—215 的政府组织,也很具体。

页 272:

这里讲到于阗和于阗人的古伊朗文名称,可以参考。

页 281:

这里讲到妓女求雨。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原始社会风俗残余——关于妓女祷雨的问题》(见《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年,页 539—548),可参考。证之以文中讲的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契达伊在这里的说法是完全可信的。

页 291:

"在 2000 多年中,白银曾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因为在这一漫长的时代中,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中国出售它那颇受'西方'重视的产品时完全索要金属银。"请注意两件事:一,当时黄金不是国际货币;二,中国曾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

页 381—383:

讲到纳迪尔王(沙)和乾隆在中亚的较量,值得参考。下面页 410,有乾隆送给纳迪尔沙的礼品单,极有趣。

资料就抄到这里。

这方面的资料,比起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贡献的资料来,数量还要多,头绪还要复杂,完全抄录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劝有兴趣者去阅读原书了。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认为非补充不行的史料。我在上文中多次提到中国产的大黄(参阅原书页 9,页 20,页 119,页 251,页 499,页 536,页 549)。我曾提到大黄能医马病。现在我

补一点大黄能治人病的叙述。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大黄愈疾":

>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从太祖下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吁！廉而不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见之明,则非人之所可及者。

可见大黄能治瘟疫。

四、埃及制糖术

这可以说是本文的主题。写了将近两万字,到现在才写到主题,不是很有点"博士卖驴"的意味了吗?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主题是对我正在撰写的《糖史》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第二个原因是:本书中的珠宝实在太多,即想少拣,也是欲罢不能,只能把文章拖长,势不得已耳。

我的《糖史》第一编,第七章是:《元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其中我提到了名闻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中国任官17年,深得元世祖的信任。引起我的兴趣的是《游记》中关于福建产糖的记载。我抄一段冯承钧译本的文字:

> 自建宁府出发,行三日,沿途常见有环墙之城村,居民是偶像教徒,饶有丝,商业贸盛,抵温敢(Unguen)城。此城制糖甚多,运至汗八里城,以充上供。温敢城未降顺大汗前,其居民不知制糖,仅知煮浆,冷后成黑渣。降顺大汗以后,时朝中

> 有巴比伦(Babylonie,指埃及)地方之人。大汗遣之至此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1936年初版、1937年再版,商务印书馆,第77章)

在上面这一段引文中,学者们之间有一些争论的问题,首先是温敢指的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与我要讨论的主题关系不大,可以略而不论。

最重要的是关于巴比伦的一句话。我翻阅了《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个权威的本子:A.C.Moule和Paul Pelliot(伯希和)的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George Routledge,London 1938。共两册,第一册是英译文,第二册是在Toledo发现的拉丁文本。这个本子中有关巴比伦的记载是这样的:

> 在三日行程之后,又走了15哩,来到一座城镇,名字叫Vuguen(武干),这里制造极大量的糖。大汗宫廷中所食的糖皆取给于此城;糖极多,所值的钱财是没法说的。但是,你应当知道,在被大汗征服以前,这里的人不知道怎样把糖整治精炼得像巴比伦(Babilonie)各部所炼得那样既精且美。他们不惯于使糖凝固粘连在一起,形成面包状的糖块,他们是把它来煮,撇去浮沫,然后,在它冷却以后,成为糊状,颜色是黑的。但是,当它臣属于大汗之后,巴比伦地区的人来到了朝廷上,这些人来到这些地方,教给他们用某一些树的灰来精炼糖(这是我的译文,原文见Moule。伯希和本155,p.347)。

其他与《马可波罗游记》有关的段落,就不抄录了,请读者参阅我那一篇论文。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巴比伦(Babylonie,Bobilonie)究竟

指的是什么地方。上面抄录的冯承钧译文："指埃及"。而 Marsden 的本子则说："'巴比伦'应该理解为巴格达城，这里技艺繁荣，虽然是处在蒙古鞑靼人统治之下。"（见 William Marsde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London 1918，页 557，注 1104）

把上面抄录的和论述的归纳起来，我个人认为，有几个问题，虽极重要，但却模糊，必须进一步澄清。这些问题是：

（一）马可波罗是一个远距中国万里之外的意大利威尼斯人，他为什么到中国来了呢？

（二）"巴比伦"究竟是指埃及呢，还是指巴格达（伊拉克）？在中国制糖史上，阿拉伯制糖术的传入，标志着一个新阶段，是一件大事，必须弄清楚的。

（三）阿拉伯国家的制糖术是怎样传到中国来的？通过什么渠道？是海路呢，还是陆路？

这些显然都是重要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始终耿耿于怀，心里很不踏实。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在我偶尔读到的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

我还是先抄一些有关的资料。只要讲到糖的地方，我尽可能都抄下来：

页 25：

"我们通过书末所附的索引而将看到的具有滋补强壮作用的人参或糖。"

请注意"滋补强壮作用"这一个词儿，糖好像是也包括在里面了。

页 59：

永乐时代，招待外国使臣的伙食中有"突厥果仁糖"。

页 82：

蒙古人和突厥人有一种朗姆酒,"用蜂蜜或甘蔗(蔗?)尖梢酿成"。

页 82—83:

"克什米尔所拥有的全部褐色糖都用于酿制其酒(克什米尔酒)。在该算端执政年间,于那里再也找不到棕色糖了。棕色糖与可以廉价得到的白糖、粗红糖和精炼糖不同(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 245 号,第 202 页)。

页 83:

埃及的麦木鲁克王朝(奴隶王朝)的人每次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都使用丝绸之路,而不是海路。哈烈的赛义菲(《哈烈史》)指出了阿富汗北部的山地人于 10 世纪中叶(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抢劫经大夏前往中国的埃及商队的事实,这些骆驼队满载麻织品和糖。他指出,古里斯坦的山人'很久'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也没可能穿的东西,只好咀嚼冰糖和穿麻织细纱'绑腿布'"。

页 86:

波斯商人在 15 世纪下半叶在肃州和威尼斯之间从事中国药品贸易。引文已见上面二中,这里不再具引,请参阅。

页 180—181:

"阿维森那曾建议用赫卡尼亚的枣子入药,'与糖'同时服用(枣饯),如同中国人的'蜜枣'一般。枣子的最佳品种是'无核枣',生长在中国北方,如山东的乐陵。……在中国,北方地区及其多毛细孔的碱性黄土和毛毛细雨的寒冬气候肯定为枣子的发源地。大枣沿丝绸之路而大量传到那里。蜜枣在中国流传之广就如同葡萄干在伊朗和安纳托利亚或耶(案应作'椰'——羡林)枣在阿拉伯人中一样。中国人把枣子放在糖水中煮熟再于空气中凉(似应作'晾'——羡林)干之后,又用蜜来渍枣(蜜枣),再第二次风干(参阅《中国百科全书》)。大枣正是以这种形式进入他们食物中的。"

页 257—258：

在对前面页 251 原文“甘州”的注（注(3)）中，作者写道：“在 15 世纪下半叶，对该城（指甘州——羡林）的最佳记述是由波斯商人火者·穆罕默德·吉拉尼所作。此人在甘州和威尼斯之间经商（裕尔：《东域纪程丛录》，第一卷，第 218—219 页）。”

页 259—260：

在对前面页 251 原文“讨来思”的注（注(12)）中，作者写道：“我们还掌握有一名威尼斯商人于 1511—1520 年间留下的对该城的记述（《波斯经商纪》，哈克鲁特学会 1873 年版，第 166—172 和 182 页）以及由于 1436—1471 和 1478 年间参观过该城的其他威尼斯人留下的记述（同上引书）。”下面作者接着写道：“帖必力思的贸易特别吸引人，因为威尼斯人前往那里用伦巴第和西方其余地方的产品交换中国的，甚至印度的产品，这尚且不说在帖木儿王朝中亚及波斯卡香和耶兹德等地制造的绸缎、绒布与其它织物。威尼斯人输往贴必力思的主要是银钱。……总之，贴必力思当时是位于威尼斯和中国之间的一座最宏伟、最庞大的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无疑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为光辉灿烂的城市。对于‘古开罗’一名，我们应理解作‘穆斯林们的大都市’，并不一定是指埃及首都。从前也是根据同一意义（现在尚这样讲）‘最大的都市萨拔特（Sawâd，即 Sabât 大都市萨拔特）在指萨珊人的京师（泰息丰—塞流西亚，绥芬和拜特—赛鲁基）之后，接着又指黑衣大食人的缚达（巴格达），我们可以理解作指任何一个大京师。”

页 275—276，(41)：

这是上面页 256—257 的一个注。原文是：“中华帝国 12 个布政司中的第 12 个位于大地尽头和远东大海之滨，它包括广西和广东这两大地区。……该布政司出产的主要产品是糖。那里的甘蔗相当好。那里 1 赛儿(29.16 克)白糖能出售 5 种不同的价钱，即 3

个第拉姆的白银(14.58 克或 8.748 克)。这一布政司是绝对的热带雨季区(即热带地区)。"阿里·玛扎海里的注是:

"马可波罗(韩百诗版本,第 219 和 223—225 页)观察到:'蛮子地区占有为世界其余地区两倍的糖。'契达伊也声称他吃过的糖出自福建(其省府在福州,位于面对台湾的海岸上)。

"在蒙古人征服之前,汉人就会煮甘蔗汁,打去其泡沫之后便使之冷却,这样就获得了一种黑面团似的东西。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该阶段已被'阿拉伯人'的技术所超越,以至于苏西亚那(苏斯特)的'阿拉伯人'向他们传授澄清这种糖并使之成为面包状的技术,这就是说使用某些他们懂得其碱性特征植物的灰烬来净化。

"糖(阿拉伯文作 at-Sukker,我们的 sucre 即由此而来)在波斯文中(Shêker)指甘蔗及其汁液。从甘蔗中榨出的汁液在波斯文中叫作'经过净化的干蔗汁'(在阿拉伯文叫作 al-sukkar al-mukarrar,阿拉伯文歪曲了这一词组而从中得出了 askar Mukarram)。

"在波斯,大家把'白糖'称作 Shèker-isēfid(法文中 Cand,冰糖),把圆锥形的糖块(粗红糖)称为 ablug(我们所说的 Cassonade,该词可以翻译波斯文 Kassa-nahât)。在马可波罗时代,中国人经过福州和泉州而接受'阿拉伯糖'。在 15 世纪的契达伊时代,这种贸易掌握在苏门答腊人手中。

"在 18 世纪时,欧洲商人在印度斯坦采购两种糖,即'粗红糖'(阿拉伯文中作 al-sukkar al-tabarzad;在波斯文中作 Shèker tēpērzèd,它仍是萨珊王朝人的一个术语)和冰糖(阿拉伯文中作 al-Cand,来自波斯文 Khayendi)。这两种产品均出自一种萨珊王朝的技术,在贡迪萨布尔完成,后文(疑当作'来'——羡林)传入苏萨,最后在为逃避蒙古人而出走的波斯工匠们的帮助下传到了古开罗。

"在 1300 年左右,这批工匠中的一些人又被请回波斯自由地工作。伊利汗哥疾宁曾鼓励其中的某些人应忽必烈的邀请前往中

国，以便在那里传授他们先祖的方法（巴黎国立图书馆波斯文特藏1059号，第76页正面和背面）。

“总而言之，虽然‘糖’一词起源于印度（如同甘蔗一样），但制造纯白糖或冰糖的方法相反却起源于萨珊王朝。在这一问题上，波斯人先向阿拉伯人，后来又向中国人（14世纪）传授这些技术之后，最后又于16世纪传给了印度人。”

页515：

“中国人为此而剥去姜块的皮，将它投入浓稠的糖浆中，然后再放在日光下曝晒”。

羡林案：这一段资料并不重要，也与我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但为了完整起见，我也把它抄在这里。

资料就抄到这里。

不用过多的解释，仅仅从上面抄录的资料中就能够看出，停留在我脑海里的那三个问题，统统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答。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会到中国来？从资料中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的西端的重要城市之一是威尼斯，而东端则是中国，至于中国的哪一个城市，有人说是西安，有人说是洛阳；最近又有人提出，应该是山东，因为当时山东生产丝绸。对于这些意见，因为与本题无关，我在这里不去讨论。不管怎样，在中国境内，肃州是一个重镇。本书中屡屡提到。至于本书中讲到威尼斯的地方，除了上面征引的以外，还有多处。因此，许多威尼斯人通过丝绸之路这一条大动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中主要是商人，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做生意。其他的人间或也有。马可波罗一家几代，都来到了中国，也就丝毫没有什么可怪之处了。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雄踞丝绸之路中间的波斯人，在东西贸易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下一节中还要谈到。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巴比伦”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过去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们的眼光有于开罗与巴格达,非此即彼,没有能跳出这个界限。我自己也一样。读了上面征引的页259—260的论述,我似乎有点豁然开朗。作者说:“对于‘古开罗’一名,我们应理解作‘穆斯林们的大都市’,并不一定是指埃及首都。”很有可能,“巴比伦”也同“古开罗”一样,不一定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指“穆斯林们的大都市”,它既指埃及首都开罗,也指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两个地方都处在阿拉伯世界中。如果我这个猜想能成立的话,这个开罗和巴格达的矛盾也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上面征引的页275—276的论述说:“在1300年左右,这批工匠中的一些人又被请回波斯自由地工作。伊利汗哥疾宁曾鼓励其中的某些人应忽必烈的邀请前往中国,以便在那里传授他们先祖的方法。”这个事实同《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讲的完全能对得上,两者都是可靠的。在中国古籍中也能够找到旁证。元杨瑀的《山居新话》(四卷,北大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手抄本)卷之一有一段话:

> 李朵儿只左丞,至元间为处州路总管。本处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李公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价,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

这同马可波罗讲的有些差异。这里讲的是杭州,马可波罗讲的是福州。这里讲的是“糖官”,马可波罗讲的是“授民以制糖术”,二者好像难以统一。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处讲的都是穆斯林(回回)。是不是“授民以制糖术”者就成了“糖官”?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否则,为什么偏让回回来当“糖官”呢?无论怎样,杨瑀的这一段话完全可以作为上面谈到的大汗派埃及人或巴格达人到

福州来教民制糖这一件事情的佐证，道理是讲得通的。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阿拉伯国家的制糖术是怎样传到中国来的？海路还是陆路？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阿拉伯人到中国来大都走海路，因为这最方便。这种情况，唐代已然，明又加甚。可是，根据上面所引的资料，制糖术传入中国却是经过陆路。原因资料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不烦覼缕。至于波斯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下一节再谈，这里就不罗嗦了。

我只想对阿里·玛扎海里的论述做一点不太重要的补充。"糖"这个字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在近代欧亚一些语言中的形式，都来源于一个梵文字 śarkarā。至于阿拉伯文中的 cand 和波斯文中近似的形式，近代欧洲语言中的 candy（英文），Kandis（德文），candi（法文）等等，都来自一个梵文字 khaṇḍaka，意思是"冰糖"。

五、波斯制糖术

在上一节"埃及制糖术"中，波斯制糖术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现在我做一点归纳工作，再补充一些资料和论述。

在从西端的威尼斯到东端的中国，主要是肃州和甘州的迢迢万里的丝绸之路上，波斯人在做生意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能在全路进行贸易活动，又能在中间传递或者转运。我在上面曾经提到：全路的通行语言是波斯语，这一件事就能充分说明波斯人的重要性，没有他们参加，丝路的贸易活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专就制糖技术而论，把上面的资料归纳一下，可以列出下面一个表：

制糖技术源自波斯，主要是贡迪萨布尔→逃避蒙古人的波斯工匠把它带至开罗→又从开罗或巴格达（巴比伦）传至中国。

把这个表简单化一下,就成了:

波斯→开罗(巴比伦)→中国

由此可见波斯制糖术的重要意义。但估计阿拉伯人一方面利用波斯工匠,一方面也自己发展和创新。

阿拉伯人制造的是什么样的糖呢?我现在不敢肯定地回答,因为书缺有间。但是,从上面四中引的页83的那一条资料来看,很可能是冰糖。因为阿富汗北部的山地人抢劫经大夏前往中国的商队的骆驼队携带的是冰糖。当然,这并不能证明,除了冰糖外,他们什么别的糖都不制造。

是冰糖又有什么意义呢?宋代王灼《糖霜谱》讲到唐大历间(766—780年)有一个邹和尚来到四川遂宁,教人民制糖霜(一名"糖冰",就是冰糖)。邹和尚这个人迷离恍惚,不像是一个真人。我曾写过一篇论文《邹和尚与波斯》(发表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91年),在文中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邹和尚是波斯制糖术,具体地说就是制冰糖术传入中国四川的象征。文章很长,不具引,请有兴趣者自己参考。现在,在玛扎海里的著作里又找到了冰糖的踪迹。难道这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个人认为,其中有必然的联系。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在这里也谈一谈,这就是:波斯人制糖(糖霜和石蜜)始于何时?德国学者Lippmann在他的名著《糖史》(Geschichte des Zuckers seit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Beginn der Rüben-Zucker-Fabrikation, Berlin 1929)中提出了一个说法:5世纪末波斯人还不知道甘蔗。连甘蔗都不知道,当然更谈不到制糖了。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曾写过一篇论文:《西极(国)石蜜》,是我的《糖史》中第二编,第六章(一),顺便补一句:上面提到的《邹和尚与波斯》是同书、同章的(二)。在这篇文章中,我讲到后汉、三国时期一些作家文章中使用一个词儿"西极(国)石蜜",比如张衡的《七

辩》、刘勰《七华》、傅巽《七海》、魏文帝《与朝臣诏》等等。据我的考证,"西国"或者"西极"指的只能是波斯。"波斯"这个名,欧洲早就有,中国则大约是始于《魏书》,汉代叫做"安息"。三国时的许多姓"安"的人,都来自安息。总之,波斯这地方制糖已有很长的历史。如果说5世纪末波斯人还不知道甘蔗,则上述的历史事实就无法解释。印度种蔗制糖早于波斯,这一点恐怕是可以肯定。是否印度就是甘蔗的原生地,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讨论范围以内了。

1994年4月19日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

——读《丝绸之路》札记

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巨著《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已由耿昇先生译为汉文。中国学人,懂英文者多,通法文者少。耿君此举,功德无量。

作者原籍伊朗,波斯文是他的母语,又精通阿拉伯文及多种突厥系语言。他能直接使用用这些语言写成的典籍。这一点许多国家的学者都难以做到,我国学者也不例外。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读此书真如入宝山,到处是宝,拣不胜拣。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文中拣了一些宝。现在我专就中西文化差异这个主题,再写这一篇文章。

我先抄几段原书:

在伊斯兰教初期,还流传着有关中国人的另一种传说:"中国是雅弗的后裔",他们创造了大部分专门艺术(艾敏—艾哈迈德·拉齐:《七大洲世界》,约为公元1617—1618年)。根据这种在17世纪时还可以解释一种事实真相的传说认为,中国在工艺和技术方面都较西方民族发达,是中国发明了大部分艺术。在当代的欧洲,大家还认为是希腊创造了所有的艺术,"希腊奇迹"是官方教育中所热衷的内容。在波斯,大家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在承认希腊人于科学理论领域中无可争异(似应作"议"—羡林注)的功德的同时,却发现他们在技术

领域中完全无能。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时代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论理(似应作"理论"——羡林注)。"

羡林案:这话说得似乎太绝对了一点,中国不能说没有一点科学理论。再接着抄:

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下面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除了以他们的两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扎希兹:《书简,论黑人较白人的优越性》)。这些作者们认为,这种观察证明了中国人(如同"阿拉伯人"一样也属于有色人种)较希腊人、波斯人和"突厥人"(费尔干纳人,即锡尔河上游的塔吉克人)等民族(他们都是"白人")的优越性。波斯国王哈桑(1453—1478 年)也向威尼斯的使节约萨约·巴尔巴罗提到了这句谚语,但把"希腊人"译成了"法兰克人"。由于该使节非常欣赏波斯君主向他出示的中国产品,承认在威尼斯意大利都不能生产如此漂亮的东西。所以国王回答他说:"先生,当然如此。您当然知道这一句波斯谚语:中国人有两只眼,同时法兰克人则只有一只"(《若萨法(羡林按:恐即上面的"约萨约")·巴尔巴罗游记》,哈克鲁特出版社,1873 年版,第 58 页)。然而,意大利当时已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西方人在技术上的优势仅仅在 18 世纪初才成为事实。(页 329)

下面再抄一段原书:

继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古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绸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古希斯：《论有色人种较白人之优越性》)(页376)

羡林案：这里讲的同上面讲的是一码事。所谓"古希斯：《论有色人种较白人之优越性》"一书，实即上面的"扎西兹：《书简，论黑人较白人的优越性》"。译者一时疏忽，把著者译成几乎完全不同的名字，又误译"有色人种"为"黑人"。

但这不是我要研究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上面两段引文中所叙述的事实和谈到的说法，实有重大意义。到了今天，其意义更为突出。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个说法中实际上蕴含着一种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比较研究。我决不是由于古代的穆斯林，特别是波斯的穆斯林，说了中国的好话，而沾沾自喜，想同古希腊争一日之长，尽管在今日世界上"言必称希腊"的氛围中这个"一日之长"还是可以争一争的。我所说的"比较研究"，是指古代穆斯林们在中希文化的对比中所做的分析和观察，含有非常深的意义，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

在漫长的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一些不同的文化。每当

两个文化相接触相撞击时，敏感的人们就能从中体会出、感觉出、观察出两个文化间的同或异，特别是差异，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要举这样的例子，是颇能举出一些来的。但是，我现在要探讨的范围仅限于以中国为一方的文化撞击。所以，我举例子，也只举这方面的例子。

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二次：一次是佛教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两次撞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贯串在自佛教传入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外来的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边撞击，边矛盾，边和解，边融合，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提高，外来文化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永远也不会结束。

佛教至迟到了汉代已经传入中国。尽管在最初它也做了一些姿态，甚至依附于鬼神方术，以期能在这一块陌生的土地上立定脚跟；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同中国文化的根本差异，敏感的人士不久就觉察到了。牟子《理惑论》援引世俗非难佛道的话说：

>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

佛教教义与中国文化其他差异也表现出来了。《理惑论》又说：

> 向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

甚至佛教最根本的教义之一：无我（Anātman）也有所流露。《四十

二章经》说：

> 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

"无吾"就是"无我"。此外，佛教还有一些行动规范，比如沙门不拜王者之类，都是与中国的传统的道德规范针锋相对的。佛教为一方，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和道家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中国古代儒释道的典籍中都能找到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不列举了。唐代高僧玄奘实际上也观察到了中印文化的差异，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我在这里只举一个平常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小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唐太宗应天竺童子王(Kumāra)之请，让僧道协作，把《道德经》译为梵文，以流布五天竺。但是翻译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经中的"道"字怎样翻？道士们主张译为"菩提"，也就是梵文的 bodhi，是佛家名词。玄奘以为不妥，坚持译为 Mārga(末伽)，梵文的意思是"道路"。双方争执，各不相让。《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件事。我从中选出关键性的一节，抄录如下：

> 自此众锋一时潜退，便译尽文。河上序胤，缺而不出。成英曰："老经幽秘，闻必具仪。非夫序胤，何以开悟？请为翻度，惠彼边戎。"奘曰："观老存身存国之文，文词具矣。叩齿咽液之序，序实惊人。同巫觋之媱哇，等禽兽之浅术，将恐西关异国，有愧卿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陈诸朝宰。中书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庄不？"答："彼土尚道九十六家，并厌形骸为桎梏，指神我为圣本。莫不沦滞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

陶练精灵，不能出俗。上极非想，终坠无间。至如顺俗四大之术，冥初(物)六谛之宗，东夏老庄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为笑林。奘告忠诚，如何不相体悉！”当时中书门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页387a－b)

从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在体会到中印文化有差异的基础上，既贬抑了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的序，又贬抑了老庄本身。这是唐代佛道矛盾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到了宋代，高僧赞宁在他的《高僧传》，卷27，《含光传》后面，写了一个“系”。里面讲到佛教“倒传西域”的问题。他由此而讲到中国人和印度人著述体裁的差异，对待哲学宗教态度的差异，其基础也就是文化的差异。我引一段话：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大正藏》，卷50，页879)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儿是“念性”和“解性”。对于这两个词儿，我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分析，请参阅。我在这里只笼统地解释几句。所谓“性”，在佛典中有很多含义。梵文的 prakṛti，svabhāva 都能译为性。意思是“本体”、“自性”、“本质”，平常所说的“真如”，有时也等于“性”。“念性”，就是“忆念性”，着重在传承，不重创新。“解性”，就是“解释性”、“分析性”，着重在创新。一传承，一创新，中印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赞宁这个对中印思维和行动的差异所做的结论颇为深刻，极有启发性。

上面讲的是中国文化和佛教的差异，中国和印度的差异。这

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同外来思想或外来文化的撞击。

第二次撞击就是一千多年以后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从此以后，我们才有了“中学”和“西学”这样的名称，才有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的说法。“西学”的先遣部队是天主教。耶稣教入中国，并不自明末始。但是像明末清初这样大规模的传入，确还是第一次。唐代所谓“三教”是指儒、释、道。此时又来了一个新三教。道家退出，增添了一个天主教。矛盾和撞击就在这个新三教中展开了。三教之间(事实上代表着三种文化)的纵横捭阖，请参阅方豪：《中西交通史》，(五)，第五章《欧洲宗教与神哲等学之东传》。我不再详细叙述。

到了19世纪，经过了鸦片战争的考验，中国天朝大国这一只纸老虎，被戳上了几个大窟窿。有识之士，如魏源等等，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世界的真相，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真相，一时痛感前非，大声疾呼，想把入睡的中国人唤醒。从此时起，“西学”(我没有研究过这个词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不再是仅仅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的空洞的学问，而是同船坚炮利、富国强兵联系起来了，其意义与前此迥乎不同了。其后又经过了八国联军、甲午海战等等丧权辱国的战争，到了19世纪末年，张之洞等人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主张，充分承认了“西学”的地位，使之与“中学”并列，差别只在体用。到了此时，东西文化的差异被充分认识与肯定。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认为这两种东西是西方的东西，中国必须传入。这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实质上也是东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五四以后，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辩论还发生过多次。到了今天，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这一点毫无疑义。而现代化，虽然不就等于西化，然而西化的成分却是很突出

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无疑义了。这一个事实也是东西文化长期撞击的余震。

我在上面用极其简略概括的语言描述了中国两千年来中外(后来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与撞击,当然也有融合。现在再回头来看本文开头时引用的那几段话。这几段话说得已经清清楚楚,用不着再作什么解释。我现在只想就这几段话说点感想或者看法,最后解释其产生的原因,算是我一家之言:

第一,中国人创造了大部分技艺的说法,在"伊斯兰教初期"就已经有了。伊斯兰教初期,相当中国历史上的初唐,公元第七世纪。那时候,还没有东西文化这个概念,当然更谈不到孰优孰劣,孰高孰下的价值判断。穆斯林们,特别是波斯的穆斯林们,能有这样的见解,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能令人吃惊又钦佩的。他们说出这种看法,毫无所蔽,毫无先入之见,因此是完全真实的,完全真诚的,完全可信的。

第二,在中世纪,穆斯林是东西方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他们是文化的内行里手,他们的话是有分量的。

第三,穆斯林们提到了中国人和希腊人。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基础,而古希腊文化则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当时虽然还没有东西方文化这个概念,讲的却就是东西方文化。

第四,为什么只讲东西方文化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类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尽管已经创造大大小小许多不同的文化;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人类文化只能分为东西两大体系。一直到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一千多年前的穆斯林们直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把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希腊拿来对比,产生了引文中所说的那一种看法

第五，古代穆斯林的这一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不管古希腊文化多么灿烂，多么光辉，出过多少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但是，古希腊确实没有像中国有的这样几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等，等等。因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代穆斯林观察之细致，综合之准确。也许由于我孤陋寡闻，读的书不够多，我还没有在任何书中读到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对古代穆斯林表示敬意。

承认这个说法，是一回事。怎样来解释这个说法，是另一回事。那么，究竟怎样来解释这个说法呢？

我还是我那老一套。最近几年来，根据自己的胡思乱想，我逐渐认识到，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从宏观上来看，只有两种：一种是分析的思维模式，一种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以这种思维模式为基础，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露，并不限于哲学，不限于精神文化。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种二分法是正确的话，那就必然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果只表现在某一些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不是这样子，那就证明我的二分法不准确。

在精神文化中，应用这二分法，并不困难。我曾在一些文章中，给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这一个著名的命题做了“新解”。天，我认为指的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否则人类前途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存在不下去。在天人的问题上，西方与东方迥乎不同。西方视大自然为敌人，要“征服自然”。东方则视大自然为亲属朋友，人要与自然“合一”。后者的思想基础显然就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而西方则处在对立面上。

这个道理，在哲学上并不难讲。但是在技术方面怎样呢？由于自己不是搞科学技术的，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思考不下去，甚

至有点不大敢思考。偶尔阅读《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页37—39，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间有一段话：

> 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我国的古代数学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从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数学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形成概念与方法，并上升到理论阶段；精炼成极少数一般性原理，进一步应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问题。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由于形形色色的问题往往归结为方程求解，因而方程求解就成为中国传统数学《九章》以来发展中的一条主线。这与西方数学之以定理求证为中心者正相对照。
>
> …………
>
> 我国传统数学在从问题为主旨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构造性和机械化为其特色的算法体系，这与西方数学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所谓公理化演绎体系正好遥遥相对。《九章》与《刘注》是这一机械化体系的代表作，与公理化体系的代表作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可谓东西辉映。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肇始于我国的这种机械化体系，在经过明代以来近几百年的相对消沉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已越来越为数学家所认识与重视，势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九章》与《刘注》所贯串的机械化思想，不仅曾经深刻影响了数学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数学的现状

也正在发扬它日益显著的影响。它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数学中的地位，几乎可以预卜。”

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第7卷第5期上，吴上续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历史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由吴文俊教授一篇序言引起的思考和讨论》。在这里，李昌先生又重复讲了吴文俊教授的上述论点，不再抄录，请读者取阅参考。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于无意中找到了一把解决科技方面问题的钥匙。

吴文俊教授在这里根本没有谈什么“二分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二分法”是我个人胡思乱想的结果，吴先生怎么能谈呢？但是，他讲的这一番道理却是不折不扣的“二分法”。他在数学发展的过程中看出了东西之差异。西方是推理论证为主旨，是演绎的体系。而中国(东方的代表)则从实际问题出发，以方程求解为主线，以构造性和机械化为特色。两者遥遥相对，差异是再明显不过的。

我现在把古代穆斯林的看法和吴文俊教授的论点结合起来，进一步对我所主张的“二分法”作一点新阐释。简单明了地说，我的新阐释就是下面的两句话：

分析(演绎)出理论
综合(归纳)生技术

我想，对这两句话用不着再仔细解释了，上面连篇累牍讲的都是解释。我只想补充几句话。百分之百的纯分析和百分之百的纯综合，都是难以想象的，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这样的归纳，只不过表示其主流和主要倾向而已。

总而言之，看了古代穆斯林对中国和希腊文化的对比，读了吴文俊教授对中国和西方数学的分析，我对自己胡思乱想的"二分法"——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总共创造出来了东西两大文明体系，人类的思维模式也只能分为东方的综合与西方的分析两大体系——信心更增强了。我曾再三声明过，我不是搞这一行的，我对于哲学分析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可我最近几年以来，在务正业的同时，又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超出了正业的范围。却又偏偏锲而不舍，自我感觉良好，越来越良好。这真叫做没有法子——请真正的内行里手来裁决吧

1994年4月26日

老少之间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总都会有老年人和青少年人同时并存。从年龄上来说,这是社会的两极,中间是中年,这样一些不同年龄的阶层,共同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所谓芸芸众生者就是。

从社会方面来讲,这个模式是不变的,是固定的。但是,从每一个人来说,它却是不固定的,经常变动的。今天你是少年,转瞬就是中年。你如果不中途退席的话,前面还有一个老年阶段在等候着你。老年阶段以后呢?那谁都知道,用不着细说。

想要社会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三个年龄阶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两极的老年与少年的关系。现在人们有时候讲到"代沟"——我看这也是舶来品——有人说有,有人说无,我是承认有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是否认不掉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代沟"正标明社会在不断前进。如果不前进,"沟"从何来?

承认有"代沟",不就万事大吉。真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还必须进一步对"沟"两边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中年这一个中间阶段,我先不说,我只分析老少这两极。

一言以蔽之,这两极各有各的优缺点。老年人人生经历多,识多见广,这是优点。缺点往往是自以为是,执拗固执。动不动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个别人仕途失意,牢骚满腹:"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世人皆浊而我独清。"简直变成了九斤老太,唠唠叨叨,什么都是从前的好。结果惹

得大家都不痛快。

我现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个我个人观察到的老年人的缺点，就是喜欢说话，喜欢长篇发言。开一个会两小时，他先包办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别人不耐烦看表，他老眼昏花，不视不见，如果如何？一想便知。听说某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开会他一发言，有经验的人士就回家吃饭。酒足饭饱，回来看，老教授的发言还没有结束，仍然在那里"悬河泻水"哩。

因此，我对老年人有几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气已衰；煞车失灵，戒之在说。

至于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进取心强。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仿佛铺满了玫瑰花。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畏缩，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易如反掌，唾手可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只能保护，不能挫伤。然而他们的缺点就正隐含在这种优点中。他们只看到玫瑰花的美，只闻到玫瑰花的香；他们却忘记了玫瑰花是带刺的，稍不留心，就会扎手。

那么，怎么办呢？我没有什么高招，我只有几句老生常谈：老年少年都要有自知之明，越多越好。老的不要"倚老卖老"，少的不要"倚少卖少"。后一句话是我杜撰出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杜撰是正确的。老少之间应当互相了解，理解，谅解。最重要的是谅解。有了这个谅解，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有了保证。

1994年7月3日

再说“嚏喷”

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说“嚏喷”》（见拙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页362—365；原刊《文史知识》）。这一篇短文似乎颇引起了一些学人的注意。

在那篇短文里，我曾说到，打嚏喷是一件极其微末的事，与之相联系一些禳解、祝福一类的举动，竟能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不能不令人惊异了。

最近，我因为搜寻《糖史》的资料，翻阅了大量在中国特别流行的一种著述体裁“笔记”。不意在里面竟也找到一些有关嚏喷的资料。足见中国文人对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加以注意了。

看来我那一篇短文确有加以补充的可能与必要。饶宗颐先生说：“参互推证，论其崖略，戋戋所得，于研究古代遗俗，谅不无涓埃之助”这话说得好。我就本着这种精神，写下这一篇短文。

我先查了查《说文解字》，用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二篇上口部中查到了“嚏”字。原文是：“嚏，悟解气也。”段氏注中引了几句话说：“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俗也。”这说明了，这种遗俗之古，传播之广。

我现在把我翻检“笔记”所见到的材料抄在下面，然后再根据材料，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解释。

明徐伯龄撰《蟫精隽》卷九：

喷 嚏

《柳氏旧闻》:唐玄宗于诸昆弟友爱弥笃。呼宁王为大哥，每与诸王同食。因食之次，宁王错(七过反)喉喷上髭。王惊惭不已。上顾其惶赧，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错喉，是喷帝。上大悦。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 予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二:

羡林按:《懒真子》这一段记载，我看了两个本子，字句有几处稍有不同，但无大碍。下面抄原文。我以《丛书集成新编》11 为主，校之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63—427 下(下简称《四库》本):

嚏 喷

俗说以人嚏喷为人说，此盖古语也。《诗·终风》之诗曰:"寤言不寐，愿言则嚏。"笺云:言我愿思也。嚏，读(按此字《四库》本缺)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四库》本作"真")忧惊(《四库》本作"悼")而不能寐，女(《四库》本作"如")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遗语也。《汉·艺文志》，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而嚏、耳鸣杂占十六卷。注云:嚏，音(此字《四库》本缺)丁计反。然则嚏、耳鸣，皆有吉

凶,今则此术亡矣。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六:

喷　嚏

《随笔》曰: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嚏祝云"有人说我"。按《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注:女思我心,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仆观《类要编风篇》,正有是说。

材料就抄这样多。

中国古代典籍中,特别是"笔记"中,讲到嚏喷的地方一定还有不少,我暂时不去追踪了,这工作留待以后再去做。

综合新发现的材料,加上第一篇文章中已经使用过的材料,我现在谈几点看法:

第一,这个风俗是非常古老的,相信可以追溯到蒙昧的远古。《诗经》、《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等书中都有所表现。在世界上恐怕也一样。

第二,这个"遗语"引起了众多的文人学士的注意,把它写入自己的"笔记"中。他们说,这是"俗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风俗,看样子自己是不相信的。

第三,在中国,这个风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别人打嚏喷,自己必须说:"长命百岁!"大概是因为嚏喷表示不吉祥,必须说点什么以禳解之。第二个是打嚏喷表示"人道我"。是不是"人"——"道我",就不吉祥?不得而知。另外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在我所读到的中国古代"笔记"中,都只讲"人道我",不讲"长命百岁"。也许有人讲过,而我没有发现。"人道我"这种说法不见于其他国家。

第四,在欧洲,Gesundheit(健康)派独领风骚。没有见到"人道

我”的说法。“健康”同“长命百岁”，应该属于一派。我们不是常说“健康长寿”吗？

第五，在非洲，情况有点模糊。国王一打嚏喷，举朝举国皆“高声应诺”。嘴里是否还要说点什么呢，比如“长命百岁”之类？不得而知。

第六，在印度，材料比较多。它也属于“长命百岁”派。有人一打嚏喷，旁边的人就应当立即说：“长寿！”倘若不说呢，“定被药叉（夜义）吸其精气”，必须加以禳解才行。这一点是对“长命百岁”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中国也可能有类似的信仰。

第七，从全世界来看，“长命百岁”派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人道我”，其他国家不见。这是否是我们的独特之处呢？如果是的话，应当作何解释呢？

第八，《现代汉语词典》：喷嚏，也叫嚏喷。这表明，两个说法都可以。我在上面抄录的材料，证明了这个意见。《柳氏旧闻》引黄幡绰的双关音“喷帝”，足征当时说“喷嚏”。《容斋随笔》也作“喷嚏”，而《懒真子》则作“嚏喷”。

拉杂写了上面一些意见，事属猥琐，文非宏文，聊资谈助而已。然而，对研究古代民俗学的专家来说，未必没有参考价值。

1994年7月8日

柳暗花明又一村

——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

回忆有的甜蜜，有的痛苦；有的兴奋，有的消沉；有的令人欢欣鼓舞，有的令人垂头丧气；有的令人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有的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想整整十年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当时，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虽已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真成气候，后来的所谓“文化热”还没有形成。但是，这一批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学人，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能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位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颇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过去几千年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彪炳寰宇。但是，正如人世间一切好东西一样，中国文化也遭受过厄运，碰到过挫折。太远的历史不必提了。仅就现当代而言，就遇到过两次极大的灾难。一次是五四运

动，一次是十年浩劫。五四运动那一次，我认为，还情有可原。想要破坏封建、顽固、僵化、倒退的那一套东西，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能不采取些过激的手段，泼洗澡水暂时连孩子也泼掉了，不得已也。矫枉要过正，有时也真难以避免。但是，十年浩劫却是另外一码事，性质迥乎不同。浩劫的目的就在于破坏、盲目地、残暴地、毫无理智地、失去一切人性地，一味地破坏，破坏，破坏，不但把孩子泼掉，连洗澡盆也不要了。这是人类空前的悲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

然而，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那样：真金不怕火炼。中国文化是真金，不但不怕火炼，而且是越炼越精，越光辉闪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头脑的（我说的是：有头脑的！）人们认真进行了一番反思，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决心发扬光大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外国，那里的有头脑的人士根本用不着反思。他们对中国特有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就惊愕不已，嗤之以鼻，深恶而痛绝之，不用反思什么。总之，在国内外，中国文化的价值又重新得到确认。前几年发生的著名的"海湾战役"，中国的孙子兵法曾大显神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国文化也不会都是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说，糟粕毕竟是次要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立"字当头，而不应该"破"字当头。一字之差，天地悬殊，明眼人自会体会其中微妙而又巨大的差别。我看，这一个"破字当头"，实质上就是"十年浩劫"的指导思想。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

当空，也有阴霾蔽天。这是正常的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普遍的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古代印度哲人有一句名言：“真理毕竟胜利”(Satyam eva jayate)。这真是至理名言，征之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总逃不出这一句话的。

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方面，我们不敢后人。我们院内的老、中、青三代同仁们，是非常团结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认识到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我们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在内部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广交天下仁人志士和所有的志同道合者，同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面前的困难还不少，我们从来也没有妄想只有阳关大道。但是，起码我个人总有一个感觉，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放翁的一句诗：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94年7月19日

推荐饶宗颐教授《梵学集》

饶宗颐教授为学术界泰斗。学富五车，中西兼通。对于梵学造诣亦深。曾在印度游学数年，从彼邦梵学大师游，对印度古代语言文化之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本书中所收论文，皆有独到见解。对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断更富有创见。能于人所共知又习而不察之处，独辟蹊径，发为文章，言前人所未言，予学人以无穷启迪。研究中印文化关系，有学术意义，又有政治意义。中印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又同为世界大国。两国之团结至关重要。有识之士所见皆同。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实能促进两国人民之相互了解，增强两国人民之友谊，决非细事。饶宗颐教授此书在这方面，贡献至大。用敢郑重推荐。

1994 年 7 月 23 日

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印度

磁器制造术源于中国，这是众所周知而又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的磁器制造，发展到了明代，形成了一种颇为独特的青花白磁的风格，过去少见，后来也难以为继。这种磁器传出了中国。仅就广义的南洋、西洋一带而论，这种青花白磁广泛地受到了重视和喜爱。我在下面举几个例子，以概其余：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

> 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青白磁器交易。

同上书、卷 渤泥国：

> 出生香、降真香、黄蜡、瑇瑁。商人以白磁器、酒、米、粗盐、白绢货金易之。

羡林按：这里的"白磁器"，显然不是出自渤泥国。至于"商人"，没有说明是哪一国的，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商人。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爪哇国：

> 货用硝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

同上书，勾栏山：

地产熊、豹、麂、麂皮、玳瑁。贸易之货，用谷米、五色绢、青布、铜器、青器之属。

羡林按：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页248—249注，说“青器”与“青磁”汪大渊往往互用。

同上书，三岛：

地产黄蜡、木棉、花布。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

明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

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纻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

明费信《星槎胜览》，剌撒国：

地产龙涎香、乳香、千里骆驼，余无物也。货用金、银、色段、色绢、磁器、米谷、胡椒之属。

明张燮《东西洋考》

羡林按：此书没有讲到青花白磁，但多次谈到中国商人与“夷”人贸易的情况。想来磁器贸易也必然如此。因此，我在这里抄上一段，供参考。卷四　丁机宜：

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

货较平。

明罗曰伉《咸宾录》，南夷六剌撒：

其产惟龙涎、乳香、骆驼、磁器等物。

羡林按：从口气上来看，好像剌撒这个地方能生产磁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但是证之以上面引用的《星槎胜览》中关于同一个地方的记载，我们只能说《咸宾录》的记载值得怀疑。因为在《星槎胜览》中磁器归入"货用"一类，而不归入"地产"一类，可见不是本地产品。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中，锡兰山国第十五：

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铜钱、樟脑等物，彼则以宝石、珍珠易换。

《明会典》，卷112　礼部70　给赐三　外夷下　四　西域哈密：

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茶叶五十斤，青花磁器五十副。

羡林按：从这里可以看到，不但南洋、西洋喜爱中国的青花磁器，西域亦然。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没有再引用的必要了。仅仅上引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南洋、西洋、西域还有其他地区所特别喜爱的青花磁器是产自中国。在这里丝毫也没有怀疑的余地。

但是，在明代一些书籍关于孟加拉（宋代是“鹏茄罗”，元代是“朋加剌”，明代是“榜葛剌”或“榜葛兰”）的记载中，却有令人吃惊的东西。我也引几个具体的例子。为了周详起见，我从元代的《岛夷志略》“朋加剌”条引起：

产苾布、高你布、兜罗锦、翠羽。贸易之货用南北丝、五色绢缎、丁香、荳蔻、青白花器、白缨之属。

在这里，青白花器还不属于“产”一类，而只是“贸易之货”。

明《星槎胜览》榜葛剌国：

地产细布、撒哈剌、绒毯、兜罗锦、水晶、玛瑙、珊瑚、真珠、宝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货用金、银、布缎、色绢、青白花磁器、铜钱、麝香、银珠、水银、草席、胡椒之属。

在这里，“青白花磁器”仍然不属于“地产”，而属于“货用”。此书作者费信可能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此书自序写于正统元年（1436 年）。

但是，到了 60 多年以后出现的一本书里，调子忽然改变了。我指的是约成书于 1520 年间的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在本书卷上，榜葛剌国第十六：

其朝贡无常。（永乐六年（1408 年），其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九年（1411 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十二年（1414 年），又遣其臣把一济等来朝，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1438 年），贡同，表用金叶。）其贡物：马、马鞍、金银事件、戗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剌、者抹黑答立布、洗白苾布、

兜罗锦、糖霜、鹤顶、犀角、翠毛、莺哥、乳香、粗黄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

上面曾讲到榜葛剌的产品:"其布帛之品有六。"其后又讲到:"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玛瑙、翠羽……。"

拿这些产品同上面讲到的"贡物"比较一下,只有几件对得上。按常识,贡物同产品不一定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的话,那就表示:把所有的土产都拿来进贡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贡物是怎样来的呢?一般说来,不应该过多地轶出土产的范围。从别的国家或地区买奇物来进贡的情况也是有的。但一定受到严格的限制。

我讲这些话,用意何在呢?用意就在于贡物中有"青花白磁"一项,如何解释?我在上面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青花白磁是中国产品。从《岛夷志略》上可以看到,这种磁器元代已开始生产,至明而大盛,运出中国,受到所到之处的欢迎。

这种情况,印度学者 Haraprasad Ray(雷易)在他所著的《印中关系中的贸易和外交——十五世纪孟加拉之研究》(Trade and Diplomacy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A Study of Bengal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Radiant Publishers, New Delhi, India 1993)中,是完全承认的。在本书页 113—116,列了一个从中国输出和输入中国的物品表,表中列了不少的国家,但都只是陪衬,而以孟加拉为主。页 114,表中孟加拉,在"输出"(Exports)项下有"青花白磁"。顺便说一句:"输出"不是指的从孟加拉输出,而是从中国输出,完全是以中国为基准。这里列上"青花白磁",是完全正确的。在"输入"(Imports)项下,没有列"青花白磁"。作者在页 185,有一个注 14:说这个表与李东阳《大明会典》中所列贡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李东阳没有列入"青花白磁"。可是《明会典》,卷 98,榜葛剌国"贡

物"中却是有的。贡物名单如下：

> 马、马鞍$^{金银}_{事件}$、戗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喇、者抹黑答立布　洗白嚐布、兜罗锦、糖霜、鹤顶、犀角、翠毛、莺哥、乳香、粗黄、熟香等等。

这个表同《明史》，卷326，"榜葛剌"的叙述基本一致。为了利于比较，我也抄在下面：

> 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磁、鹤顶、犀角、翠羽、鹦鹉、洗白苾布、兜罗锦、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等等。

"青花白磁"这里也是有的。我再补充一条材料：明慎懋赏《四夷广记》，榜葛剌贡物中有"青花白磁"。

我们先不去纠缠，为什么李东阳《大明会典》中没有"青花白磁"。我仍然继续谈H. Ray的著作。页116，在"中国向孟加拉输出的货物"这一段中列入了"青花白磁"。页117，在"中国从孟加拉输入的货物"这一节中，没有提到"青花白磁"。页144，Ray根据《西洋朝贡典录》，在给中国的贡品中列上了"青花白磁。《西洋朝贡典录》的原文上面已引，兹不赘，请参阅。

我在上面已经谈过，《西洋朝贡典录》成书较晚。《星槎胜览》成书在前，把"青白花磁器"列入"货用"一类，说明它不是孟加拉产品，而《西洋朝贡典录》把它列入"贡物"中，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可是《西洋朝贡典录》的叙述不够清楚。我们看不出，是孟加拉哪一年朝贡的贡品中有"青花白磁"。但是，无论怎样，孟加拉贡品中有了"青花白磁"，证之以《明会典》和《明史》的记载，是不容怀疑的，

完全可以肯定的。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贡品一般都应该是土产，从别的国家或地区买了东西来交贡品，是比较稀见的。何况"青花白磁"这种物品的原产地就在中国。向中国或别的国家购买了"青花白磁"，再用之向中国进贡。俗话说："江边卖水，圣人门前卖字"，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孟加拉的统治者或大商人决不会糊涂到这个程度，竟把"青花白磁"充当贡品，运回中国。难道他们不怕中国皇帝老子见笑或怪罪吗？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解释呢？我想，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孟加拉能生产"青花白磁"。

可是，问题跟着又来了：为什么在五天竺，甚至在整个南洋和西洋，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独独只有孟加拉能生产磁器？又为什么生产的偏偏是"青花白磁"？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我们必须回答。

据我个人的看法，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了印度，传入的地点是孟加拉，传入的时间是明初，至早是元末，正是中国同孟加拉外交和贸易活动最频繁的时期。要我拿出印度方面文献的证据，我拿不出。众所周知，印度人对历史事实不大重视，他们古代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历史。但是，我有旁证。"白沙糖"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名称是 cīnī，意思是"中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cīnī 问题》，见《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一篇是《再谈 cīnī 问题》，见《文史知识》，1994 年，第 2 期。在这两篇文章里，我论证了中国白沙糖传入印度，特别是孟加拉的问题。在第二篇文章里，我引用了《明史》，卷 326"榜葛剌"中的几句话：

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

世所流入也。

用到"青花白磁"上，也完全适用。磁器制造术也是"前世所流入"的。这就是我的结论。我相信，它是正确的。

《再谈 cīnī 问题》发表以后，我又找到两条材料。一条是明郑晓撰《皇明四夷考》，卷下，榜葛剌：

阴阳、医、卜，百工技艺，大类中国。

一条是明罗曰褧著《咸宾录》，《西夷志》卷之三　天竺：

又有榜葛兰，即西天东印度也。……其产……丝棉、镔铁、枪、剪（极巧且利）、漆器、磁器（俱极精巧）为奇。

"榜葛兰"，是"榜葛剌"的另一个写法。在这里，第一条材料明确说，孟加拉"百工技艺""大类中国"，这同《明史》卷 326 的说法全同，只是没有说"前世所流入"。第二条材料证明，孟加拉能生产磁器，而且"极精巧"。这几个字也很重要。如果不"极精巧"的话，孟加拉的统治者和大商人怎么敢拿来向中国进贡呢？这也许能说明，孟加拉人在学习了中国制造磁器的技术以后，在某一些方面有了改进，有如中国唐太宗派人向印度学习了熬糖法，最后"愈西域远甚"。

1994 年 7 月 27 日写毕

后记：

文章写完了，我还想加上一条尾巴，写点后记。本文中提到了我两篇关于白沙糖传入印度孟加拉的文章。现在又写了这一篇中国制造磁

器术传入印度孟加拉的文章。也许有人会认为,白糖和磁器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伟大物件,你这样刺刺不休不厌其烦,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有重要意义。我们经常讲,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能提高彼此的精神文化水平和物质文化水平,是互补互利的。这一点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没有再争辩的必要。如果世界人民都能了解这一点,必能促进彼此的了解,提高彼此的友谊,大有助于世界和平之保卫。拿中国和印度来说,两国都是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我们间的文化交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两国皆受其益。但是一翻开历史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宗教史、中国艺术史、中国音乐史,还有这史那史,连篇累牍,我们读到的几乎只有印度影响中国,中国对印度的影响则恍如蓬莱仙山在似有似无之间。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我始终坚信,它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好多年以前,一位好心的印度朋友对我说:"在 1945 年以前,是中国学习印度,那以后是印度学习中国。"他称之为 one-way traffic(单向交通)。我感谢这位印度朋友的善意。但我却不相信,这就是事实。于是在探讨中印文化关系,我有意去搜寻中国影响印度的事例。印度民族是一个有天才的民族,但对历史却不重视,古代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真正历史的书。想在那里面搜求我想要的资料,有如大海捞针。但是,如果真是历史事实,不管埋藏得多深,总会留下痕迹的。比如 cīnī 问题,痕迹是留在语言上,我抓住这点痕迹不放,结果就产生了那两篇论文。现在这一篇关于制造磁器技术的文章,真相隐藏得更深;但是我相信,我还是把它抓住了。

希望这一个尾巴不会惹起读者的厌恶。

1994 年 7 月 27 日

《国学研究》第二期祝词

祝贺《国学研究》第二期出版。

想谈几点意见：第一，前不久接到吴江同志的信，附有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国学问题的文章。接着我就接到了上海《文汇报》直接给我的信，要求我参加国学问题的讨论。我都还没有答复。如果答复的话，我就会说，我不参加讨论，也不赞成讨论。像国学这样的题目，难以讨论。想给国学下个定义，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永远也不会有大家都同意的定义。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不一样，定义很难下。与其在下定义上下工夫，莫如切切实实地读一些书，切切实实地思考一些问题。根据自己的认识去钻研，去探讨，有了心得，就成文成书。这比争定义，说空话要好得多。

第二，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我们过去讨论了几十年，有人也吃过苦头，现在不必谈了。但是，最近几年来，我逐渐觉悟到，二者之间实有密切的联系。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对于王梵志的诗，中外敦煌学研究者颇不乏人。个别的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发表后，外国一个国家的学者很不满意，准备组织班子，汇集文章，大张旗鼓地加以批评或者批判。后来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及时出版了。那个国家的学者一经读到，大为叹服，于是宣布解散班子，停止批判。如果项书不出，批判的结果一发表，不怀好意者就会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挂上钩。这样一来，一个学术问题立即变成政治问题。因此，在今天世界上，学术实在脱不开政治。我们时刻想到这一点，会促使我们更加努力，

更加小心翼翼。不管我们研究的是国学的哪一个部门,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学术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关于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国外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有这样的主张。我在最近几年来写过长长短短的几篇文章,宣扬这种看法。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我认为是中国对人类杰出的贡献。在香山饭店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做过一个很短的发言,题目就是:"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1]。我对此点深信不疑。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而且涉及未来的21世纪。原来我也同别人争辩过。现在我的做法变了。我想到中国过去有一个近视眼猜匾上的字的笑话。一个近视眼说,匾上是什么什么字。但是此时匾还没挂出来。21世纪就是一个还没有挂出来的匾,匾上的字是什么,谁也说不准。如果有人愿意猜,那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但是不必争辩,争辩是徒劳的。我们最好学一学京剧《三岔口》,每个人要自己的枪刀,但谁也碰不着谁。

1994年8月23日

注　释

〔1〕指1993年5月24日在"香山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因内容与其他文章重复,《文集》未收。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各位来宾，朋友们：

刚才主席让我作学术演讲。我本来就有点惶恐。这样一来的话我更加惶恐了，为什么呢？因为作为陈先生的弟子，我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学习得相当不好，在座的好多陈先生的弟子都比我强，今天安排我来讲话，胡守为同志给我讲过几次，一定要我讲。我说我不行，现在又来了一个学术报告，实在是不敢当。我也没有什么稿子。昨天下午我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的很多看法是昨天才形成的，也就是说，昨天下午才把整个的今天要讲话的大体框架完成，因此，我讲的话，恐怕很多地方是外行，请大家指正。

我今天讲，也要有个题目，我想讲讲“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陈先生一家，从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先生开始就是爱国的，散原老人是爱国的，陈先生是爱国的，陈先生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流求、美延的下一代，我想都是爱国的。四代、五代爱国的，起码三代。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老人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

* 广州中山大学于1994年举办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旨为“《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本文系作者在此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啊，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这几年呢，我就考虑爱国主义，词是个好词，可是我就考虑这又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就说爱国主义应该区分两种：一种真正的，一种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的。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干脆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再举的话也容易；希特勒就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这么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我就不多说了。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人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在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

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所以二人相对流泪,二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碑上的碑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也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从汉朝一直到满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呆了好多年,因此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什么原因呢?在座的都是历史学家,也有搞外国历史的,都清楚。原因很简单,我们是实事求是的,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所决定的。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我们天朝大国,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那个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朝,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

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来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清朝，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清朝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清朝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别人，这话是不对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的话，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合符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

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文化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后来陈先生讲于七年(1911～1928年),从辛亥革命起,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这个国家不能存在了,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的解释。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清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

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他的心态看得出。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在座的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时事，也关心现在的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繁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 1929 年写了一首诗，送

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瀛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不仅限于此。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五十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四十五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若他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作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的赞扬。我已说过，历史不是我的本行，所以，今天所讲，是我的乱想乱讲，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羡林案:

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作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长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

我觉得，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一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二是也决不侵略别的国家，所以我说，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密切相连的。

我讲这些话同长城有什么关系呢？同我讲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既然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时时都有外敌，应付的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不顾自己人民的死活，当然更不顾敌方人民的死活，破釜沉舟，与敌人血战，争个你死我活。一种是防御退避，尽量挡住外敌的入侵，让自己的人民过上太平的日子。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所采取的对策基本上是后者，是第二种：防御退避。

长城就是这种政策的最具体的表现。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我可以举一个近代的欧洲的例子。法国为了防御入侵，费了极大的力量，花了极多极多的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马其诺防线。但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他决不会修什么防线，而是处心积虑，只想进攻，只想侵略，只想杀人。我并无意谴责德国人民。我只是说，法西斯头子是侵略成性，至于德国人民，他们同法国人民一样，也是爱好和

---

* 本文是作者于 1994 年 9 月 23 日在北京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前半部分内容因与其他文章雷同，故删。——编者

平的民族。

讲到这里，我的主题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华民族由于爱好和平成性，才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在北方修筑了万里长城，成为世界上的奇迹。长城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这并不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吹自擂，理智和常识会告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这是事实。

今天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世纪末。大家都看到了，全世界多处战火飞腾，有些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事实是完全违反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意愿的。我们中华民族本着我们根深蒂固的爱好和平的民族性，热烈拥护和平。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决不会侵略别人。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容忍别人侵略自己。我们现在开这样一个会，其目的无非是促进友谊，促进了解，促进合作，促进和平，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我相信，这是今天到会的各国代表们的共识。让我们共同携手前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吧。

1994年9月6日

在中国亚非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的这个报告曾经在亚非学会常务理事会上讲过，即“东方文化问题”。因为再过6年，我们就要进入21世纪。到了21世纪，我们的中国文化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上究竟还占有什么位置？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这个人大家知道，不是搞什么哲学的，更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我经常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胡思乱想吧。当然，胡思乱想也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其中我认为正确的部分不妨与大家谈谈，至于不正确的部分就不值得一提了。此外，在我们国内思想意识界里争论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谈一谈，因为这跟我们也有联系。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不是什么学术报告，没有什么稿子，甚至连发言提纲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在谈家常，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能讲的很零乱，那也没关系。

过去有个笑话（我已忘记是在什么书上记载的），说是有两个近视眼的人，彼此的视力都很差，但谁也不服谁，总说自己的视力比别人强。某日，镇上有一大户要悬挂大匾，这两个近视眼的人约好以辨认匾上的字来测试谁的视力好，以便比出高低，决一胜负。其中一位事前搞了一个小动作，向大户的家人打听了匾上的字。届时，这两个近视眼的人如约前往，参加比试。第一位近视眼的人抬头远望，高呼认出了匾上的字比如说是“光明正大”四字。当这两位近视眼的人在争论不休之际，旁观的人却告诉他们：大户门上的匾尚未悬挂出来哩，哪来的什么字呢？这个笑话很有意思。现在我们在谈论21世纪，其实21世纪尚未来临，任何人的谈论无异

于近视眼的人在观匾一样，姑妄言之而已。现在任何人对21世纪中的东方文化问题的看法都是一种假设，不是什么理论问题，因为理论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论。就上述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刊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第二篇文章刊在《中国文化》上。又零零碎碎写了几篇，现在外边有所反映，我也收到了不少来信，有非常赞成我的看法的，但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既然我们都是近视眼，大家都在猜匾，都处在同等的位置上。你赞成我的意见，我也不特别高兴；你反对我的意见，我也不特别不高兴，我主张我们大家一起唱一出"三岔口"。"三岔口"大家都知道，打的很热闹，但是谁也打不着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人问我：某某人写文章反对你，你为什么不答复呢？我说我绝不答复，任何人反对我，我都不答复，因为大家都在猜匾嘛！现在《文汇报》在讨论国学问题，国学跟东方文化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下面将要讲一讲关于国学的一些情况。他们也给我来了信，还附了好多文章，并希望我写文章，参加战斗。我没有答复他们，如果答复的话，第一，我不参加战斗；第二，要参加战斗的话，还是演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不是什么理论的争论问题，还是你猜你的，我猜我的，大家都在猜测嘛！

究竟有没有东方文化？现在社会上有人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说什么根本不存在什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话恐怕有点问题了，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客观存在，你不承认，它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本书名叫《丝绸之路》，是一位在伊朗出生的法国籍的学者写的，他名叫玛扎海里。该书很厚，最近已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本书我希望大家有时间不妨一读，非常有趣。该书不仅是一本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而且对中国、欧洲也颇有研究。该书涉及的语言非常

之多，我们中国人掌握不了那么多语言，欧洲人也不行。这个玛扎海里生在伊朗，讲波斯语，阿拉伯语也不在话下，另外他还掌握突厥语系的许多语言，几乎丝绸路上的沿途语言他都能掌握，所以这本书很值得注意。它里边讲的好多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中国人发明的。我最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发表在北师大学报上。李约瑟讲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其中好多事情连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可是李约瑟是英国的科学家，不是东方人，他讲这个东西是中国发明的，那个东西是中国创造的，实际上李约瑟讲的比玛扎海里这本书中讲的还要多。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我们天天在接触，就不以为意，不觉得奇怪，如两片刀片合在一起，中间加一扣子，就成了一把剪刀，剪刀也是中国发明的。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多极了，过去西方人是竭力加以抹煞的。但我们也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无限地夸大，夸大到包括卫星、导弹等高科技，都说是古已有之，这样说恐怕也不大对头，这两种极端我是不赞成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丝绸之路》这本书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在穆斯林的初期，大家知道穆罕默德这个人生于中国宋齐梁陈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在唐初去世，他的一生跨越了隋代。据说远在1300年以前，在伊朗和阿拉伯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古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中国人却有两只眼睛，其余的人都是瞎子。这种说法我觉得有其客观性。在公元7世纪时，人类文化基本上是两大体系，即东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中间虽有断层，直至现在形成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主，加上印度、日本、韩国。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分析，越分越细；东方是综合，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将这两个在当时最有智慧的国

家作一对比,中国人比希腊人多一只眼睛。后来又进一步说,希腊出理论,中国出技术。这话有道理,希腊的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外,还有很多,可是像中国的四大发明,古希腊一个也没有,古希腊在技术方面没有什么东西。根据李约瑟、玛扎海里的意见,我们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明何止四大,恐怕四十大、四百大都有,这是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最近,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争论,我认为他是为某种政治服务的,没有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人类的文化是很多的,但客观地说,只有东西两个,第三个是找不出来的。远在1300年以前,伊朗和阿拉伯人就定了一个标准:一个是有理论,一个是有技术,希腊出理论,中国出技术。这话我有点修正,说中国一点理论都没有也是不对的。希腊出理论,中国出技术,这是他的看法,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有道理。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是一分为二,要分析;一个是合二而一,要综合;是否能这样说,请同志们考虑。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吴文俊教授给《九章算经》,写了一篇序言,很值得一读。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但在东方、中国与希腊乃至欧美各国,对待数学的态度是不同的,怎么不同呢?欧洲对待数学,是从定理、公理出发;中国对待数学是从应用、实用出发。这是一位数学家的观察。吴文俊的观察跟我所思考的问题可以说合得来。从公理、定理出发,就是理论,从理论出发。而我们是在于运用。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在研究数学的出发点上也是不一样的,从而也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是根本不同的。是否可以这么说,也请同志们考虑。

至于东方文化,我认为是有的,这是无法否定的,而且与国学也是有联系的。譬方说我们的汉语没有形态变化。19世纪时,马建中写了《马氏文通》,该书是以拉丁文、英文为依据的,马建中认

为中国汉语跟西方的语言不一样。尤其到了“五四”运动，胡适等人，还包括鲁迅在内，他们主张要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大家知道鲁迅有一句名言：中国人糊涂，思想糊涂，语言糊涂，他的意思是指我们中国的语言不精密，不像英国人那样精密。我们的语言没有形态变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字，比如我吃，昨天的吃是这个吃字，今天的吃也是这个吃字，明天的吃仍然还是这个吃字，没有变化。他认为这就是不精密。再譬如有人打电话，问对方是哪儿？对方答曰：“我是北京大学”。这就不通，你怎么能是北京大学呢？你应该说“我是北京大学某系的某人”，这样就精密了；如果只说“我是北京大学”，这就不精密。其实这么一来，反而罗嗦了，多此一举。胡适和鲁迅当时就主张改革语言，他们当然也主张简化，鲁迅也赞成拉丁化，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改造语言，将中国的语言改造成像英语那样精密。有一个笑话，年青的同志恐怕不知道，我国过去已有一个“他”字，五四时期又造了三个：一个是人字傍的“他”，表示男人；一个是女字傍的“她”，表示女人；还有一个是牛字旁的“牠”，表示中性。我们虽然都继承下来了，但有其毛病，不如就是一个“他”字更好。比如今天我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究竟要写哪个字（他与她）呢？我觉得这个“他”字不改更好。此外，鲁迅在20年代末翻译书时常用“历史底地”一类的词儿。大家知道历史（History）是名词，Historical 是所有格，用底下的底。再加上 ly，成为 Historically，成了副词写成历史底地。鲁迅等对语言的改革，其实是一出闹剧。解放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我从一开始就参加该项工作，至今已40年了。中间经过了好多过程。后来又经过好多次的沧桑变化，现在仅以拉丁化为辅助，汉字仍然保留。

大家知道，现在有什么模糊语言、模糊数学、模糊逻辑等，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模糊了。数学怎么是模糊的呢？数字是很精确的，

我也不大懂。模糊语言的道理非常清楚,比如今天天气好,什么叫好?谁也说不出来,千言万语也讲不出好来。今天有阳光,阳光的温度是几十度?多少度才算好啊?是28度、29度?怎么也解释不清楚。只说今天天气好,我们听懂了就行了。再比如你比他高,你一定要问什么叫做高?什么叫做低?我们的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模糊的,问题是模糊现象符合宇宙的本象。据自然科学家讲,宇宙间没有哪个东西是完全清楚的,真的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金也没有。“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上面已经讲过,东方是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但西方不讲整体概念,不讲普遍联系。大家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西方的。在中国则不然,你如果头疼的话,可能在脚底下扎针,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的。但在西方的医学里,就是分割开,脑袋是脑袋,脚是脚,截然分开。现在西方又兴起了几种学问,模糊学是其中之一,浑沌学也在其中。他们认为20世纪以来,只有三大学问: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第二是“量子力学”,第三就是“浑沌论”。“浑沌论”是自然科学,我也不大懂,不过看过有关介绍。浑沌论是讲世上万物都有普遍联系,是讲整体性,如北京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别处,这就叫“浑沌”。当然其中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大约与资本主义是同时开始的,对人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电灯、电话都是自然科学应用的结果。现在有一个词叫做“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就接近迷信。大家知道中国的特异功能,特异功能用自然科学是解释不了的,我们贵州省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人曾来京表演,他能在烧红的鳌子上行走而不被烧坏。另外,他还能在用锋利的刀片扎成的梯子上拾级攀登而不伤皮肉。这些现象要作何解释呢?现在看来,西方的自然科学也不是万能的,虽然它曾造福于人类。这一点西方人也是有所感觉的,所以开始从分析转向综合,从越分越细转向模糊,

就是要看整体，这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这其实是东方文化的真正内容，最根本的精神。当然，主张“浑沌论”、“模糊论”的人与我的解释不一定相同。

东方文化，第一它是存在的，第二我们应该加以弘扬。弘扬我们中华的优秀文化，不能把它说成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沙文主义。到了21世纪，东方文化将在世界文化这个领域里起主导的作用，我们并不是要把西方文化加以消灭，那才是傻瓜，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我们所有从事科研工作的、所有的学会都面对21世纪的问题，我们亚非学会当然也不能例外，大家都来考虑这些问题，这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我给同志们讲一讲国学问题。国学问题与东方文化有关系，因为国学弘扬了东方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北京大学从去年开始研究国学，我们过去有研究国学的传统，后来断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学是被打倒的东西、被认为是影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我们东方文化是有些好东西，如中国古书上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有人说这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大家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很正确的。可是现在有人反对，说什么提倡新国学，其目的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如一些书上就有文章反对东方文化、反对国粹、反对国学。最近《文汇报》开辟专栏，专门讨论国学问题，这很有意义。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的有些话很有用，当然，我们不是要把封建社会搬到社会主义社会里来，不是这个意思。昨天我接到一封来自通州运河中学的来信，运河中学是非常有名的学校，该校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材，

1947年朱自清先生曾去该校讲学，现在又邀请我去讲学。该校通过研究国学，通过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的文化都是精华，没有糟粕，不能那样说。问题是精华和糟粕是非常难分的，有时它还会变化。如孝敬父母的孝，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五四"时代，孝一定是糟粕，毫无疑问；到了六七十年代，孝还是糟粕；可是到了今天，我们不是还提倡要孝敬父母和尊敬老人吗？我是不赞成《二十四孝》的，但孝敬父母，恐怕到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得孝敬父母，因为父母老了，从人道主义出发也应该得到赡养和尊敬。所以说精华与糟粕有时是不易分清的。

我刚才说过，我思考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些，倘若要让我讲下去的话，恐怕要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今天就把这些意见提出来，有好些问题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总之，对我们亚非学会、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究竟如何研究亚非问题，特别是对东方文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1994年10月22日

建议重写《中国通史》

中国是文化古国和大国，又是历史大国。我们的历史在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以前，中国的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等，都编撰过《中国通史》。尽管名称不同，其为《中国通史》则一也。这些大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详尽地搜集资料、学风谨严、立论有据。他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成绩，远迈前古。在中国和世界，都获得了同声的赞扬，起过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后人决不会忘记的。

但是，沧海桑田，时移世迁，到了今天，这些著作，都在某一些方面，显得过时了，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了。

首先是考古发掘工作日新月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过去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现在看来，不行了。有人说六千年，甚至说七千年。总之，中国历史的时间上限没法封顶了。在地域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过去，大家几乎都认为，中华文化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但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却证明了，南方的吴、越、楚等地，甚至僻远如云南，也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发展一元观难以自圆其说，而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发展的多元观。

其次，我最近忽然有了一个顿悟：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内容之一是爱国主义传统。说中国人天生就爱国，这是唯心主义。存在决定意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存在”，也就是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我认为，爱国主义有两种：被侵略、被压迫者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侵略者、压迫者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爱国主义，是假冒伪劣的爱国主义。二者泾渭分明，切不可混淆。中国的爱国主义基本上属于前者。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文天祥、陆游，明代的史可法等等，都可以这样解释。对于清代的林则徐、邓世昌等等，更应当这样来看待了。

西方国家不能说没有爱国主义，不能说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像法国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就是爱国主义的杰作。但是，西方国家立国的时间短，找不出像中国的岳飞、文天祥等这样闪闪发光的爱国者，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无法改变。到了后来，法西斯的爱国主义是假冒伪劣之尤者，只能令人耻笑了。

总之，我认为，爱国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通史主要内容之一。

此外，上述诸大师的《中国通史》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印记。不管这个烙印多么轻微，恐怕总会是有一点的。

根据上面我说的理由——其他理由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没有必要再举了——我建议，有关单位，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或《历史研究》编辑部，出面组织力量，重新撰写一部能适应今天情况的《中国通史》。

1994年10月23日

含英咀华　古为今用

——就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答记者问

一　问:《存目》的由来及编纂《存目丛书》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

答:将近三年以前,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刘俊文等同志开始酝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工作,得到了总会完全支持。又得到了广东三越公司陈显强先生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题词鼓励。

《存目》的由来,要从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谈起。当时从全国征集到的图书共10254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些图书并没有全部收入《四库全书》中。未收入的计有6793种,当时也各写一篇提要,称之为"附存目录",简称"存目"。详情见杜泽逊先生的文章。《存目》中的书有的因为犯了清代的忌讳,未被收入。有的有其他原因,未被收入。收入者和未被收入者都各有良莠,不能一概而论。《存目》颇多稀见而极有价值之作。平时求之难得,现在一旦影印出版,对学者极为有用。

在全世界古今所有的国家中,文字记载量最大,质最高,历史最悠久,方面最广阔,而又持续数千年始终没有间断者,只有中国一家。此乃天下之公言,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对人类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仅此一点就足以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精华与糟粕决不是像一般人

想象得那样，泾渭分明，有的是难以分辨的。而且这还会随时代的演变而互易其位。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含英咀华，去糟取精，结合眼前情况和需要，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譬如，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些纲纪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也在不同时代受到激烈的批判。又譬如中国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法也有过同样的遭遇。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想达到这目的，国内必须安定团结，必须“和”。纲纪学说，如果运用得法，可能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国际上何独不然！安定团结，和睦共处，是我们的命根子。能做到这一步，再济之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扬我们固有的爱国主义。我们必将立于不败之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能建成。这不但牵涉中国人民的恒久福利，而且也将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共同走向大同之域。这是头等大事，焉能掉以轻心！

《四库全书》还有我们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包含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的许多典籍就包含着我上面谈到的那一些精神。《四库全书》虽然被人贬为《四库残书》，这只是对部分书籍而言，并非全体。我们现在还必须利用《四库全书》，就因为它搜罗宏富、查用起来方便。我们的《存目丛书》也想达到同一个目的。

再进一步言之。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得到了举国上下的同声赞扬。但是，文化的载体很多，非文字的载体也不少，比如长城就是。在众多载体中，文字载体，也就是古代典籍，占的地位最为重要。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中华典籍，浩若烟海。不用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专门学者，查找起来，也会感到困难。有了《四库全书》再辅之以《存目丛书》，形成了一个整体，真所谓“珠联璧合”。

因此,我们的书必将受到国内以及国际学术界的欢迎,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怀疑的余地。

二 问 编纂《存目丛书》在学术界引起关注与讨论,海内外学人有何有益的建议?

答 这样一件大措施,引起关注与讨论是十分自然的。其中有赞同者,有反对者,有对我们的个别提法提出商榷者,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赞同者给我们以勇气,反对者给我们以镜子。他们都绝对是出以公心,都是想把事情办好,决无个人恩怨。因此我们都非常感激。有好的建议,我们一定采纳,比如避免重复,我们就立即采纳了。限于篇幅,不能细说。

三 问 据记者所知,好多读者对《存目》的有关书籍不甚了解,担心一些低级趣味、迷信、黄色的书籍会借此流传。

答 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读者将来看到我们出版的书,就能够知道。当年征集书籍时,通俗小说、弹词宝卷、科举时文及全毁书等都被排除在外。

四 问 总编纂认为还有何重要意见要告诉读者。

答 有两件事情,还要交待几句:

第一 我们《存目》唯一目的就是满足社会需要。我们原想按照经、史、子、集四部顺序出书。但是根据大陆上一些调查,还有台湾中国文教研究基金会的调查,社会上对子部需求量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先出子部。

第二 眼下,还有一部叫做《续修四库全书》的书正在编纂中。务请读者注意:这部书同我们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全是两码事,千万莫混淆。据我们了解,二者可能有一小部分书重复。我们的意见是:两部书印数都不可能太多。稍有重复,无伤大雅;二者并存,有利学者;可共戴天,同履大地。至于"修",只要"修"得好,我们衷心赞扬。我辈自愧庸陋,不敢言"修"。俗话说:敲锣卖糖,

各干一行,即此是也。

1994年11月24日

祝《长江画报》创刊

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总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这个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黄河流域确实孕育了我们的古代文化。

但是，黄河流域果真是惟一的一个孕育古代文化的地方吗？

最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证明了，中国南方一些地方，比如说浙江、云南等地、还有属于古代楚国的一些地区，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从这些考古发掘中，人们必须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南方，同北方一样，对中国古代文明也曾有过重要的贡献。这是从地域上来讲。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同样也必须改变旧观念。过去号称5000年的中国文化，现在必须拉长了，拉到6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现在的情况推测起来，中国古代历史，不管是从地域上来看，还是从时间上来看，都不能封顶。地域将会越来越扩大，时间将会越来越拉长。这些都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前不久，在一次历史学家的会上，我曾根据我在上面说的这种看法，建议重写《中国通史》，颇得到一些同行们的赞同。中国古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两句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长江画报》创刊了。顾名思义，当然是要报导有关长江的情况。云雨巫山、惊险三峡等等，当然会在报导之列。我在上面讲的南方文化，特别是楚国文化，是不是也可以加以重视，加以报导呢？如此，则功德无量矣。

祝贺《长江画报》的创刊　祝它繁荣昌盛，长命千岁。

1994年11月26日

希望在你们身上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老年人当然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

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决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我说的这一番道理,迹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的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做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

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1994年12月4日

1994年我常读的一本书——《陈寅恪诗集》

陈先生的诗艺术性极高，但不易懂。我特别喜欢他说的：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和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最需要的。

1994年12月29日

附　　录

《图画与表演》汉译本前言

《图画与表演》被译为汉文发表，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光荣。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读自己的书，作者自然是高兴的。但是，我特别高兴的是中国的学者们认真对待我的研究工作，以致不嫌麻烦，把它译为自己的语言。

为这本书搜集资料，我用了很多年。写作、编定、读校样，又用了几年。说真的，驱使我承受这些劳心又劳力的困难的原因，一直是希望自己能够给那些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人们提供一些新信息、新概念、新洞察力。说到底，变文是在中国发现的，正如每个人都真切意识到的那样，变文代表汉文最早的方言叙事文学。此外，我欠了中国先驱者们很多债，他们对这个课题做了这样多重要的基本探讨工作。因此我也把这一本书看做我偿还巨大债务的一种办法。

把什么东西从英文译为汉文，并不容易，特别是像《图画与表演》这样颇为专门的书，它接触到世界上这样多的地区。因此我更特别赞赏承担这一件艰巨任务的同行们。

学术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真理，一旦找到真理，又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在过去，我碰到一些用汉文、法文、日文、俄文或其他语言写成的很优秀的东西，我第一件情不自禁要做的事，就是使这些东西为不能读原文的人们所利用。一想到在中国有些人认为《图画与表演》值得译为汉文奉献给自己的国人，我就既十分欣慰，又觉

得不安。

梅维恒

1989年8月6日

(季羡林译)

念诵[1]甘露

导引密呪[2]

妙[3]师尊王[4]大罗阇[5]万岁[6]！

(唵！南无[7])雪山女[8]之夫！
诃罗[9]，诃罗，诃罗，大天！

伟大的牟克多难陀！
　　万岁妙师尊薄伽梵！
万岁妙师尊薄伽梵！

(唵！南无)雪山女之夫！
诃罗，诃罗，诃罗，大天！

唵！师尊！万岁师尊！
你存在、纯识和快乐[10]的化身！
你存在、纯识和快乐的化身！
牟克多难陀妙师尊！

(唵！南无)雪山女之夫！

诃罗，诃罗，诃罗，大天！

南无无穷无限的千形尊神，
千足，千眼，千头，千臂，
南无永恒不可限量的千名丈夫[11]，
他支撑着一千个亿的时期[12]。

唵！南无师尊湿婆[13]！
他的形象是存在、纯识、快乐。
他超越能见的世界，寂静，
他无须支撑，光辉闪烁。

南无牟尼多难陀师尊！
他把生徒从轮回中救出来，
为了信徒他具有一个身躯，
他的本质是纯识和存在。

唵！愿师徒都受到福祐。
愿师徒同把善业之果来享受。
愿师徒共同获得精进。
愿师徒的学习充满光辉。
愿师徒永远不互相怀恨。

吉祥师尊凉鞋五偈

I　唵！南无众师尊，师尊的凉鞋。
南无至高的师尊，至高的凉鞋。

南无阿阇梨[14]和陀[15]主的凉鞋。
南无南无吉祥师尊的凉鞋。

2 南无南无吉祥师尊的一双凉鞋，
具有 aim 和 hrī 字母的神秘，
具有 śrīm 字母的巨大光辉，
又阐释字母 oṃ 的秘密。

3 南无南无吉祥师尊的一双凉鞋，
这凉鞋传授关于大梵[16]的知识，
它有各种形象，譬如 Hotra 祭火，
Hautra 祭火[17]、祭主、祭品和祭祀。

4 南无南无吉祥师尊的一双凉鞋，
它们是欲望等毒蛇的迦卢陀[18]，
它们赐予辨识和冷静的宝库，
它们使人得到真知和顿时解脱。

5 南无南无吉祥师尊的一双凉鞋，
它们是渡过无尽轮回之海的舟船，
它们赐予人们以坚定的虔诚，
它们是烧干愚痴之海的火焰。

吉祥师尊之歌

唵！薄伽梵婆陀湿婆是这一组吉祥师尊之歌赞歌与神呪的仙人。

诗歌的韵律多样多种
吉祥师尊最高神我[19]是它的神灵。

haṃ 是种子字母，saḥ 是力量，kroṃ 是门门。
念诵它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吉祥师尊的恩典。

现在禅定。
要静思那永恒的师尊之足，
它揭示了 Tat[20]，把湿婆本性张扬；
它抓住了幼苗般的灯光火焰，
它是一切字母的能看到的形象。
师尊住在莲花里面，
haṃ 和 saḥ 是莲花瓣；
它们是神圣的世界之因，
无所不在，随意住于众多躯体中间。

我的任务是低诵《吉祥师尊之歌》，以求实现人生四目的[21]。

御者[22]说道：
1 在美妙的雪山[23]峰巅，
雪山女在湿婆面前跪倒，
湿婆是与虔诚合一的恩主，
雪山女满怀敬意地问道：

吉祥女神说道：
2 唵！南无，天！众天之主！

高于最高者！宇宙之师！
娑陀湿婆！大天！
请赐我关于师尊的知识。

3 啊，恩主！走甚么道路，
一个有形体者能溶入大梵？
啊，恩主！请怜悯我！
我跪倒在你的双足前。

恩主说道：
4 女神！你就是我自己，
出于对你的爱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对全人类都有利，
过去从没有人问过这问题。

5 在三个世界中都很难得，
你请谛听，我告诉你。
大梵与师尊是一不二，
美人！这是真理，是真理。

6 吠陀、经论、古事记，
还有历史等等学科，
密咒、神秘图解等知识，
传承、神秘咒语等学科。

7 湿婆信仰、萨克蒂信仰理论，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论文，

给那些心灵被迷惑的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带来了沉沦。

8 祭祀、发誓、苦行、布施,
还有念呪和朝山拜神,
而对师尊的真如懵然无知,
这些人真正是傻瓜一群。

9 师尊不异于觉醒的神我,
这是真理,真理,毫无疑问。
因此,为着能得到他,
聪明人必须努力去追寻。

10 隐蔽智慧的创世的大幻,
来源于愚痴,住于人身;
他的光辉让(真知)升起,
他的名字就叫做师尊。

11 敬事吉祥师尊的双足,
自我净化,万恶排除,
具身者[24]如何成为大梵,
出于怜悯我对你讲述。

12 忆念过师尊的莲花足,
把水洒上自己的头顶。
一个人获得了善果,
等于沐浴在一切圣水中。

13 能令罪恶秽物干涸，
师尊足上面的水，
能点燃智慧明灯，
能带领人跳出轮回。

14 啜饮师尊足上的水，
为的是得到智慧和超脱；
它能铲除愚痴的根，
它能消灭再生的业果。

15 啜饮了师尊足上的水，
吃师尊吃剩下的饭，
要经常沉思师尊形象，
要经常把师尊密咒来念。

16 他住在圣城迦湿[25]，
他脚上的水是恒河，
师尊本人是宇宙之主，
他无疑是渡人的赞歌。

17 师尊足上水是(圣水)，
他是迦耶[26]，他是不朽[27]榕树，
他是圣地钵罗耶伽[28]，
师尊的化身，南无，南无。

18 永远忆念师尊的化身，

永远低呼师尊的名字,
永远服从师尊的命令,
除师尊外,不想别的事。

19 师尊舌头上的最高知识,
能够获得,由于他加恩。
要永远沉思师尊,
像贞妇忆念夫君。

20 自己的生命阶段,自己的种姓,
自己的声誉、繁荣和福祉,
这些东西统统都要丢掉,
除师尊外,不想别的事。

21 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
那除了我谁都不想的人;
因此,要尽上最大的努力,
以求得取悦于师尊。

22 在三界中,神仙和阿修罗,
还有蛇神,都明确昭告:
师尊舌头上的智慧
虔奉师尊就能够得到。

23 字母 gu 意味着黑暗,
字母 ru 意味着光明;
师尊无疑是最高智慧,

它能吞噬愚痴的暗冥。

24 字母 gu 是第一个字母，
代表着大幻等等德[29]；
第二个字母 ru 代表最高智慧，
它能摧毁大幻的迷惑。

25 这样，师尊地位至高无上，
连神仙们也难以到达；
哈哈和胡胡[30]的随从们，
还有其他干闼婆都敬礼他。

26 对所有的生物来说，
确没有比师尊更高的真如；
要献上饰品、车辆等等，
还有座位、床铺和衣服。

27 为的是取悦于师尊，
让师尊意足又心满；
一定要对师尊礼敬，
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

28 要经常对师尊礼敬，
用行动、心思和语言；
要毫无顾忌地服事师尊，
长跪在师尊的面前。

29 把身躯、器官和生气
奉献给妙师尊;
把自己的妻和一切
奉献给妙师尊。

30 美人!不要收回身躯,
它充满 蠕虫、虫子和灰垢;
难闻的尿和粪便,
痰、血、皮肤和肉。

31 爬上了轮回之树,
坠入了地狱的海洋,
师尊救出所有的人,
南无师尊吉祥。

32 师尊是梵天、毗湿奴,
师尊是湿婆尊神,
师尊是最高的梵,
南无吉祥师尊。

33 南无师尊湿婆,
宇宙唯一的因,
渡过轮回海之桥,
一切智慧的主人。

34 他用智慧眼药之杖,
把所有人的眼睛弄亮;

眼睛为愚痴黑暗所蒙，
南无师尊吉祥。

35 你是我父，是我母，
你是亲属，你是神，
为了了解轮回，
南无吉祥师尊。

36 他的真理使世界真实，
他的光辉使世界光亮，
他的快乐使人们快乐，
南无世尊吉祥。

37 他的存在使世界存在，
他照亮世界现太阳身，
他的爱使儿孙爱我们，
南无吉祥世尊。

38 他使世界显现，
心思不能把他照亮，
他照亮醒、梦和熟眠，
南无师尊吉祥。

39 由于他的智慧，这世界
不被看做为分歧割分，
他的唯一形式是真理，
南无吉祥师尊。

40 自认为不知道者知道，
自认为知道者不知；
除了绝对精神外别的不想，
南无吉祥尊师。

41 他看样子是宇宙之果，
实际上他正是因；
他既是因又是果，
南无吉祥师尊。

42 宇宙形状千千万万，
他同任何事物无区分；
因与果只是幻象，
南无吉祥师尊。

43 他的一双莲花足，
祛除二分论的苦痛；
他总把人救出灾难，
我向吉祥师尊致敬。

44 湿婆发怒，师尊救你；
师尊发怒，湿婆无助；
因此，要尽上一切力量，
求得吉祥师尊的庇护。

45 我敬礼师尊的双足，

双足就在语、思、心范围里；
双足有不同的光辉，白与红，
代表着湿婆和他的威力。

46 字母 gu 超越一切德，
字母 ru 没有任何形；
Guru 被认为是
给人超越德的本能。

47 亲爱的！吉祥师尊被说成是
湿婆，洞见一切，没有三只眼；
是毗湿奴，没有四只手，
是大梵天，没有四张脸。

48 我双手合十来致敬，
为的是(师尊)慈悲之海能增涨；
由于他的恩惠，一个凡人
能从多变的轮回中解放。

49 吉祥师尊的无上形象，
对有明辨之目者是醍醐；
不幸的人们看它不见，
有如盲人不能见旭日东出。

50 亲爱的！你应当天天
向吉祥之主的双足致敬；
不管它们是在什么地方，

你都要恭谨又虔诚。

51　高贵者！聪明人经常献上
蜜蜂飞鸣其上的鲜花一束，
向着薄伽梵转轮王所在之处，
宇宙的兴灭他亲眼目睹。

52　我向师尊的曼荼罗[31]致敬礼，
它包含着吉祥之主三师祖，
包含着象鼻神[32]、三威力、八怖畏[33]，
包含着九私陀、三钵楚伽[34]、二足，
包含着十杜蒂[35]、三曼荼罗、十毗罗[36]，
包含着六十四私陀、九法印，
包含着五个毗罗的系列，
在一起的有吉祥摩哩尼[37]和密呪大君。

53　整个一百种呼吸控制，
十分艰难，又带来病痛，
这样长时间地去磨练，
于这个究竟有什么用？
要经常做事一个师尊，
以求达到纯真的自性；
只要这个境界能出现，
呼吸自己就能够息停。

54　沉思自己师尊的形体，
就是沉思永恒湿婆的形体；

歌唱自己师尊的光荣，
就是歌唱永恒湿婆的光荣。

55 我们敬礼指路的师尊，
哪怕一点点尘土从他脚上落下，
也能够在轮回的海洋上，
把一座桥梁来搭架。

56 得到了他的恩惠，
人们要把愚痴丢掉；
南无吉祥师尊因陀罗，
为了所愿能够得到。

57 师尊的莲花足能扑灭
所有轮回中的烈焰；
它们处在月轮上梵罅隙[38]
那一朵白莲花中间。

58 在千瓣莲花的圆形的空里，
有一朵具有三条线的三角莲；
各以 a ka tha 为首，两侧 ham 和 saḥ
要忆念师尊就住在中间。

59 愿吉祥师尊那神圣的眼光
永远地停留在我的身上；
它创造了所有的世界，
它带来了所有的营养；

它代表了全部圣典的观点，
它认为财富完全没有用；
它扫除了错误和缺憾，
它的目光在绝对真理上集中；

60 它是构成世界三德最高主，
唯一目标是指出解脱的道路；
它支撑着所有的世界。
它是支撑的中间顶梁柱；
它洒下了慈悲的甘露，
它是所有的真性[39]的集合；
它创造了整个的时间，
它代表了存在、纯识和快乐。

61 亲爱的！经过了理智光焰考验，
我认为它[40]是密咒之王。
像真金在火中锻炼过，
愿它日夜保护我们免于死亡。

62 它[41]行动，又不行动；
它很近，却又很远；
它在一切事物之中，
又在一切事物之外。

63 "我没有生，也没有死；
我自己没有始，也没有终；
我不变，我是纯识与快乐；

我小于最小，大于最大。

64 我高于一切原初事物，
我永存，身光自照，完整，
我洁净，我是最高虚空，
我是不朽的快乐，我不动。

65 要了解师尊的精神力量，
通过这四种知识来源：
吠陀、直觉、历史、随量。
要永远把师尊来忆念。

66 看到了你的虔诚，
大智女神！我告诉你，
怎样把他的本质
去深思，去考虑。

67 包括能动的和不能动的，
整个宇宙的情况，
他都能够揭示出来，
南无师尊吉祥。

68 一切吠陀的顶宝
把他的莲花足装璜，
他是吠檀多莲花日，
南无师尊吉祥。

69 只要忆念着他，
智慧就自然成长；
他是一切的成就，
南无师尊吉祥。

70 他是有知[42]，永恒，寂静
他跨越苍穹，纯真，
他超越声、点、伽罗[43]
南无吉祥师尊

71 他弥漫这整个的世界，
里面有能动和不能动
里面有生命和无生命，
南无吉祥师尊。

72 他据有智慧的力量，
他为真如花环所装璜，
他赐予享乐和解脱，
南无世尊吉祥。

73 他赐予了自知之明，
把所有的业果烧光，
在无数生中所积累，
南无世尊吉祥。

74 没有真理比师尊更高，
没有苦行比服事师尊更深，

没有真性比了解他更大，
南无吉祥师尊。

75 我的主是宇宙之主，
我的师尊是三界师尊，
我的我是所有生物之我，
南无吉祥师尊。

76 禅定的根是师尊形象，
礼拜的根是师尊脚跟，
密咒的根是师尊言语，
南无吉祥师尊。

77 师尊是始而无始，
师尊是最高尊神，
比师尊更高的没有，
南无吉祥师尊。

78 在圣水中直至七海
沐浴所能得到的功德，
只需啜饮师尊脚上水滴
千分之一就能够获得。

79 毗湿奴发怒，师尊救你，
师尊发怒，没有人能助；
因此，要尽上一切力量，
求得吉祥师尊的庇护。

80　师尊就是整个宇宙,
包含梵天、毗湿奴、湿婆本身,
比师尊更高的没有,
因此,要礼拜师尊。

81　虔诚礼拜师尊,
能得到智慧和知识。
比师尊更高的没有,
师尊弟子要对他沉思。

82　比他更高的没有,
吠陀说他是“非这非那”。
要经常敬礼师尊,
用心思,用说话。

83　只是出于师尊的恩典,
只是由于对师尊侍奉热爱,
梵天、毗湿奴和湿婆,
才能够创造、维持和破坏。

84　天神、紧那罗和乾闼婆,
饿鬼、夜叉和天庭歌者,
连那些牟尼们都不知道
正确服事师尊的规则。

85　由于我执和骄傲,

有苦行力和智慧的人，
在生死轮回的旋涡中，
宛如陶器放上了水轮。

86 如果不敬事师，
连神仙、饿鬼、夜叉、乾闼婆、
紧那罗、仙人私私陀，
也都不会得到解脱。

87 伟大女神！请听禅定，
它能带来一切快乐，
经常带来一切幸福，
提供物质享受和解脱。

88 我忆念师尊，吉祥最高梵，
我谈论师尊，吉祥最高梵，
我礼敬师尊，吉祥最高梵，
我崇拜师尊，吉祥最高梵。

89 他是梵乐，赐予最高幸福；
他是绝对，知识的形体化；
他超越二分论，像天一样；
“你即彼”[44]，指的就是他；

他是一，永恒，纯洁，不动；
他是一切思维的见证人；
他超越一切情况，丢弃三德，

我要敬礼他这位妙师尊。

我敬礼师尊，大梵，
他永恒、清净，不闪烁，
他无形，不被污染，
是永恒智慧，纯识、快乐。

注　释

〔1〕梵文 svādhyāya 这个字，根据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书名《佛教念诵集》，译为“念诵”。

〔2〕mantra，根据《翻译名义大集》，译为“密咒”。

〔3〕sad，根据《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aṇḍarīkasūtra），译为“妙”。

〔4〕nātha。

〔5〕Mahārāja，rāja，义为“王”，“罗阇”音译。

〔6〕jaya，义为胜利，一般译为“万岁”。

〔7〕namaḥ namo，义为“敬礼”，根据中国旧译，音译为“南无”。

〔8〕Pārvatī，即 Durgā，根据《佛教语大辞典》译为“雪山女”。

〔9〕Hara，即 Śiva。

〔10〕sat 存在，cit 纯识，ānanda 快乐。

〔11〕puruṣa，本义是“人”。有时译为“原人”，譬如在《梨俱吠陀》中。佛典中有时译为“丈夫”。

〔12〕yuga，印度古代宗教神学认为宇宙生灭共分四个 yuga，一般译为“时”。四个 yuga 是：kṛta－或 satyayuga，纯善时；tretayuga，三分时；dvāparayiga，二分时；kaliyuga，极恶时。“时”字不易懂，我改译为“时期”。

〔13〕Śiva 这个字仍然只能保留旧的译法。否则，一加改动，立即会形成混乱。

〔14〕achārya，师父。

〔15〕Siddha，仙人，圣人，半人半神者。

〔16〕按照语法形式，在这里 brahma 是中性，英译文作 who，是错误的。

〔17〕hotrāgni,祭主火;hautrāgni,祭事火。
〔18〕gāruḍa,解毒神呪。
〔19〕ātman,原义是"自我",音译"阿特茫"。
〔20〕tat,义为"那个",约等于英文的 that,指"宇宙本质"。印度宗教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命题:tat tvam asi,"你就是那个",指人与宇宙合一。
〔21〕指 dharma,法;artha,利;kāma,欲;mokṣa,解脱。
〔22〕sūta,义为"御者","民间歌手"。我倾向于前者。因为在《薄伽梵歌》中,"御者"是黑天。英译文为 Sūta,不知所云。
〔23〕原文 Kailāsa,《翻译名义大集》译为"雪山"、"昆仑山"。
〔24〕dehī,来自 deha(身躯),《翻译名义大集》译为"具身","有身"。
〔25〕Kāśi,今瓦拉纳西。
〔26〕Gayā,圣地名。
〔27〕Akṣaya,榕树名。
〔28〕Prayāga,今阿拉哈巴德附近恒河与阎牟那汇流处,公认的圣地。
〔29〕guṇa,作为哲学名词,意思是"特质"、"性质"等等。
〔30〕hāhā,hūhū,都是乾闼婆的名字。
〔31〕maṇḍala,圆坛。
〔32〕Gaṇapati。
〔33〕Bhairava,《翻译名义大集》译为"怖畏"。
〔34〕Baṭuka。
〔35〕Dūti,难近母的侍女。
〔36〕Vīra,义为"英雄"。
〔37〕Mālini,字母。
〔38〕brahmarandhra,脑袋中的隙缝,据说人死时灵魂从此处逃出。
〔39〕tattva,《翻译名义大集》译为"真性"。
〔40〕指《吉祥师尊之歌》。
〔41〕据印地文译本,指师尊或梵。
〔42〕caitanya,《翻译名义大集》译为"有知",神我之一名。
〔43〕原初声,包容宇宙的点,伽罗 kalā,世界的显现。
〔44〕Tat tvam asi,印度奥义书重要命题。"彼"指的是宇宙,意思是"天人合一"。

牛棚杂忆

祝　　词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
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
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
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
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
一片赤诚。

目　　录

自　序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决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

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沾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

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1976年，我的书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16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

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一些元帅、

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明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已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

——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凘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1998年3月9日

一 缘起

"牛棚"这个词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称,却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一切讲"法治"。讲"法治",必先正名。但是"牛棚"的名怎么正呢?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现在想用法来正名,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更生动,更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他们是专在暗中下"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这一帮家伙被关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帮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祐,以至于感激涕零了。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不但赶上这个时机,而且能住进大院。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

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在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耸然、毛发直竖呢?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像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太巫了。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学活动,没

有白费力量。我虽然自己被请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

犹有进者,这一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决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决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这是崭新的创造,从来也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在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溶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翰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但是有哪一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

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自己要写，非不可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的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

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

60年代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国际饭店会议”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在铁道修建以前，是国内外的交通要道。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我只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一些情况。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来头是很大很大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偏偏忽略阶级斗争。我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

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我只把它当做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我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我还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三十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帐,脸上依然是笑迷迷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捕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从不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

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项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三　1966年6月4日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1966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蓓蕾，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

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5月25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6月1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

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6月4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嘀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 terra incognita (未知的土地)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

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

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

我自己怎样呢?我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我,我还能住在家里,我还有行动自由。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有一天,我到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给我贴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是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欢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迷雾。我的木脑袋不开窍,看来今生无望了。我上面说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臭文,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后来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著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看来这一套手法是有来头的,至少是经过什么人批准了的。后来流毒无穷,什么“利用小说反党”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依次出笼,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资本主义毫不相干。我是真

心实意地歌颂祖国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它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

反正我此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这时的燕园比起六月四日来，其热闹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时候，许多边远的省份，受到了千山万水的阻隔，没有能赶到北京来，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现在都赶来了。燕园在平常日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辽阔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极其渺小。山边树丛，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我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仓中一粒米了。

据我的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什么叫"走资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个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个头头，他必然就是"走资派"。于是走资派无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觉悟奇低，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个单位必有一个走资派，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个大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反正我这个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没有人可讲。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怜我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唯物主义者应该讲实事求是。当前的所做所为，是哪一门的实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将也决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

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鲜血直流。在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场面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批斗”的场面我却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到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这种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说不清。是想镇慑“犯人”吗？我说不清。参加或参观批斗的人，有的认真严肃，满脸正义。有的也嘻嘻哈哈。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来取经朝圣的人们，有的也乘机发泄一下迫害狂，结果皆大欢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果然来到了。这种“先进”的经验被取走，转瞬之间，流溢全国。至于后来流行的坐喷气式，当时还没有见到。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研究过，好像至今也还没有人站出来申请专利。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书

记。帽子是现成的:走资派。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现成的:反动学术权威,另外还加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给他们二人贴的大字报都很多,批斗也激烈而且野蛮。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以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唾沫与骂声齐飞,空气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了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剥陆离的美国军服。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6月18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止到那

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人们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那一夜，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6月18日，必然要斗鬼。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与其盛，千载难遇。”此是外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四　对号入座

暂时的逍遥，当然颇为惬意。但是我心里并不踏实。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头上也是应该戴上帽子的。我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应该对号入座。当时帽子满天飞，号也很多。我觉得有两顶帽子，两个号对我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两顶帽子对我都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首先他应该是一个当权派；不是当权派就没有资格戴这顶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好多倍的小不点官儿。但这也毕竟是一个官儿。我是当权派无疑了。我走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说不清楚。既然全国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走了资本主义，我能不走吗？因此，我认为这一顶帽子蛮合适。

什么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不管我的学问怎样，反正我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权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资产阶级呢？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我学习了将近二十年的政治，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个人考虑，而且还不老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有这样的思想，当然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几个因素一拼凑，一个活脱脱的反动权威的形像就树立了起来。不给我戴这顶帽子，我反而会觉得不公

平,不舒服。我是心悦诚服,"天王圣明,臣罪当死"。

但是问题还不就这样简单。我最关心的是: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从50年代中期起,全国都在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越学习越佩服,简直是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地佩服。在无数次的学习会上,我也大放厥辞,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吐沫飞扬。然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发现,以前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联系自己的实际。现在我必须联系自己的实际了。我想知道,这样两顶帽子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在新社会,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生活当然是好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被扣上敌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却会非常不舒服,简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还会随时招来横祸。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嘛。过去我对于这一点只有理性认识,从来也不十分关心。文化大革命一起,问题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这是万分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对号入座,甘愿戴上那两顶帽子。非我喜开帽子铺,势不得不尔也。但是,这两顶帽子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万分关键。到了此时,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努力想找一个定性的根据了。

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但是其间界限却万分微妙,简直连一根头发丝的千万分之一都不到。换句话说就是若无实有,却又难以捉摸。在某一些情况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专家和任何定量分析专家都无能为力。我自己也是越弄越胡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是一个哲学问题呢?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哲学问题,它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是一个法律问题,为什么法律条文中又没有表露出来?我对法律完全是门外汉。但是我在制订法律的最高权力机构呆过五

年，从来没在法律条文中见到什么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词儿。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对理论有了兴趣。我对今天说白明天说红的完全看风使舵的理论，只有厌恶之感，没有同情之意。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在对号入座的过程中，忧心忡忡，完全是为了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我们平常讲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门。给别人戴什么帽子，都与己无关。我就这样顺利地度过了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切肤之感。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天王圣明，臣罪当死"。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子的。可我现在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好像是寒天大风要出门那样。现在帽子满天飞，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难道正副上帝分工还有一个掌管帽子的上帝吗？

在革命群众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还没有人公开训斥我，更不用说动手打我。我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可是印把子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从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我忙上一阵子，紧张一阵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秃头无字并肩王"。我觉得颇为失望。但是，既有祟命，当然要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于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我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我毛骨耸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

们拒绝接受，“你拿回去吧！”他们说。我当然敬谨遵命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极其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呢？我说不清楚。要考证也没有时间，只好由这一群红卫兵裁决。我的桌子上，墙上，床上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琳琅满目。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主要对象。他们说什么是四旧，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谨遵命，心里头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为经典性的说法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时以内，我“破”了不少我心爱的东西。我回忆最清楚的是一个我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欢喜。他们不知道怎样灵机一动，发现我挂在墙上的领袖上没有灰尘，说我是刚挂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诚。事实上，确实是我刚挂上的；但我敬谨对曰：“正是由于我敬神虔诚，‘时时勤拂拭’，所以才没有灰尘。”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当时虔诚达到顶峰的时期，心里就有一个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许多关于全国破四旧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藏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一幅王雪涛的画，都被当做四旧破掉了。这只是戋戋小者。全国究竟破掉了多少国宝，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果当时全国真正完完全全贯彻破四旧的方针的话，我们祖国的宝贵文物岂不一扫而光了吗？即使我们今天想发扬，还留下什么东西值得发扬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还是回头来谈戴帽子的问题，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难忘的一件事。革命群众或者上头什么人究竟要给我戴哪一顶帽子？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一个问题。随着革命的前进，我渐渐感觉到，他们大概给我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顶帽子。我上面已经说

过，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这样一顶帽子。双方不谋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来讲，这是敌我矛盾。但是，上头又说，敌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吧。

革命群众没有把我忘掉，时不时地还找我开个批判会什么的——要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别，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他们管这个叫做“修正主义”，多么奇妙的联系啊！据说我在《春满燕园》中所宣扬的也是修正主义。连东语系也受到了我的牵连。据说东语系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对于这一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于接受修正主义这一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茫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不管怎样，给我戴上与业务挂帅有一些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又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真是十分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并不就是完全美妙，自己还是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处处有网罗，人人可以用鸟枪打，用石头砸；但是毕竟还有不打不砸的时候，我乐得先快活一阵子吧。

五　快活半年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必须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

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事,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点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别人只能带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姐仍在当权,他们就能鹤立鸡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子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

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1965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对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入"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入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子，到处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再要上一点野蛮，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爬进车厢，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点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乱，到处天翻地覆。有人说，这叫做"乱了敌人"。一派胡言乱语，骇人听闻，是自己乱

起来了。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我觉悟低，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

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觉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难忘。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已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了会场,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这真让我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 1966 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

里根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

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点想不通。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白天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蚊子不得其门而入。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

代父母挨咬。早晨起来,伤痕遍体,我毫无怨言。而且生活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纷纷追赶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们人多势众,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欢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条,立即跑回村内,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烧,就地解决,吞下肚中。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彩色,带来一点快乐吗?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

六　自己跳出来

好景从来不长。

我快活到了1967年的夏秋之交。

此时北大的革命小将，加上一些中将和老将，早已分了派。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三国演义》上说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是到了分的时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爷"。此人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

有压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有的学生逐渐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

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大都自称为某某战斗队,命名几乎全取自毛泽东的诗词,什么"缚苍龙"战斗队,什么"九天揽月"战斗队,又是什么"跃上葱茏"战斗队,诗词中可以用来起名的词句,几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组成的战斗队没法起名的地步。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组成的战斗队。成立手续异常简单,只要贴出一张大字报,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看看究竟谁战胜谁",再喊上几句"万岁",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记,不用批准,决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当时究竟成立了多少战斗队,谁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于九泉,恐怕他也只能认输了。

这时学校里大字报的数目有增无减。原来有的墙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应用。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来,专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宣布某某战斗队成立之外,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只有四五张,五六张;有的则扩大到几十张,甚至百张,大有越来越长之势。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据说有的学生则靠写大字报练习书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大字报的书法水平确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这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恐怕很多人会想不到吧。

用大字报来亮相的战斗队,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最初各占山头,后来又逐渐合并。从由少变多,变为由多变少。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怎样斗争,我不大清楚。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费厄泼赖"的。在中国,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只管目的,不择手段;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叫做"派性"。这种新东

西，一经产生，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抗外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对抗力量？有人贴出大字报："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这是何等地惊人的决心！如果在建设四化中有这个劲头，我们中国早就成了亚洲第一条大龙，后来的四小龙瞠乎后矣。

现在时过境迁，怎样来评价这两大派呢？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上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和学生组成。由于种种原因，老头参加的是不多的。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有时候，一个被诬蔑成有问题的教员或干部，两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两派都有点患迫害狂的样子，以打人为乐事。被打者头破血流，打人者则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颇具匠心。自行车链条，外面包上胶皮，打得再重，也不会把皮肉打破，不给人留下口实。那一位"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谁是江青的最忠实的信徒，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两派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则始终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当权派的新北大

公社占有整个北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井冈山只在学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守卫森严。两派逐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粗,把昂贵钢管锯断,把一头磨尖,变成长矛。这种原始的武器虽“土”,但对付手无寸铁的井冈山,还是绰有余裕。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药的人。在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派交过几次手,械斗过几次。一名外边来的中学生就无缘无故地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之下。

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但中间也不缺少令人解颐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他们的一些举动迹近儿戏。比如有一次,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唇枪舌剑,充满了火药气味。两派群众高呼助威,气氛十分紧张、严肃。正当辩论到紧急关头,忽然从大饭厅支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嘭地一声,掉下来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我国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爷”就有这样一个绰号。事实真伪,我们不去追究。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两派群众都瞪红了眼睛,恨不能喷出火焰焚毁对方,却从天上降下来这样一个插曲来,群众先是惊愕,立刻转为哈哈大笑。这一场激烈无比的辩论还能继续下去吗?同样成串的破鞋,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这些小小的插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

我还在大饭厅参加了另一场两派的大辩论。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全都改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也许只有井冈山这样叫)“勤务员”。真正让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气氛,就好像法国大革命时那样,领导人的头衔也都平民化了。坐在台上的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

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是党中央明令要保护的少数几个人中之一。他是怎样参加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井冈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从别人嘴中断断续续地听说。他不满那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逐渐流露出偏袒井冈山的情绪。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组织群众，向他围攻；有的找上门去，有的打电话谩骂、恫吓。弄得这一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原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时，实逼处此，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干脆下海。立即被井冈山群众选为总勤务员之一。现在他也到大饭厅来，坐在台上，参加这一场大辩论，成为坐在主席台上年龄最大的人。这时大饭厅里挤得水泻不通，两派群众都有。辩论的题目很多，无非是自以为是，而对方为非。这让我立即想到美国总统选举时两派候选人在电视上面对面辩论的情况。辩论精彩时，台下的群众鼓掌欢呼。一时大饭厅中剑拔弩张而又逸趣横生，热闹非凡。

当时整个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闹嚷嚷，乱哄哄（全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一句“乱了敌人”的名言，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谁能知道谁是敌人呢？当时全北京，全国的群众组织在分分合合了一阵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在北京这叫做天派与地派。每一派都认为对方是敌人，唯我独革。军队被派出来支“左”，也搞不清楚谁是“左”。结果有的地方连军队也分了派。这实际上是乱了自己。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会站在旁边，站在暗中，拍手称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怎样呢？

我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一派，做一个逍遥派是我唯一可选择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样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

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想到快意处,不禁一个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间决没有世外桃源,燕园自不能例外。燕园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做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全校的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不钻避风港,我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了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

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这一位女首领的。她愚而多诈，心狠手辣。我不愿意冒同她为敌的风险。我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去游行示威。大概是因为印尼方面烧了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的两大派哪一个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排上了几十辆租来的大汽车，供游行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的群众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就成了问题。两派认识我的几个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我跟前来献殷勤，拉我上他们的车。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的女干将，拉我特别积极。从内心里来说，我是愿意上他们的车的。但是，我还有顾虑，不愿意或者不敢冒然从事。新北大公社派来拉我的人也很积极。最后，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一路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馆，喊了一阵口号，又浩浩荡荡地回到燕园来，皆大欢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家中去"闹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并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单单到他家去"闹"。反正当时任何一个战斗队，可能在某某后台的支持下，都有权宣布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连他

住的确切地方都不知道。这一次因为路近,没有乘坐大车,绝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为属于“有车阶级”,于是便骑车去了。由于两派群众混杂在一起,我没有像到印尼使馆去示威时那样受窘。没有人来拉我参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骑车单干户。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车队中随大流骑向前去。过了青龙桥,我看还有人骑车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从起来,跟着那些车骑向前去。一直到了万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道不对头,忙回转车头,又来到了青龙桥,却听群众中有人大声嚷嚷,说是已经“闹过革命”了。我只好随人流回到燕园。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将军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连大门都没有看到。我想,当时很多人闹革命就是这样闹法。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必须提一提。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有一些在前一阶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之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有的也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我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有不少东语系的教员动员我参加学习班。井冈山的人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我参加自己的学习班。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虑,决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来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两派各自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捧得像圣母一样。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这个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话必须说出来,心里才痛快,我对于两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这就给我招来了麻烦。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怎能还有什么办公室呢?但是,在我记忆中,确实是在办公室中会见了她们。我现在一时还想不清楚,以后或许能回忆起来)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O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我发现,我现在的处境几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样。我有点不耐烦了。我曾说过,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我就这样上了山(井冈山)。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

海下了,山上了。这个举动有双重性。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过去必需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没有侥幸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过去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反动组织,我的历

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时，新北大公社那位女头领肯定已视我如眼中钉。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况且她此时正如日中天，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趾高气扬，炙手可热。我季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她能善罢干休、饶过我吗？而且此时形而上学猖獗，在对立面成员的言谈中，文章中，抓住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对方打成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大脑中管语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个卡片柜里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错。一旦拿错，让对方抓住小辫儿，"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头领就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她的徒子徒孙经常为此而为她捏一把汗。这样的形而上学再加上派性，就能杀人而且绰有余裕。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侥幸心理并不可靠。我怀着这种侥幸心理，在走钢丝，随时都能够跌下来，跌入深渊。这一点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1967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时，流言极多。一会说要揪我了；一会又说要抄我的家了。我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这暴风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压了下来，把我压垮，压碎。这时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员恐怕都有我这种感觉，而我最甚。炎炎的长夏，惨淡的金秋，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七 抄家

随着天气的转凉，风声越来越紧。我头上的风暴已经凝聚了起来：那一位女头领要对我下手了。

此时，我是否还有侥幸心理呢？

还是有的。我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

然而我错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俗话说："英雄不吃眼前亏。"我决非英雄，眼前亏却是不愿意吃的。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这叫做"革命行动"，我天天听到叫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我只感到，这实在是一桩非常离奇古怪的事情。什么"革命"，什么"造反"，谁一听都明白；但是却没有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坏事，什么样的罪恶行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掩护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离奇古怪的人物，我要拼命维护什么人的"革命路线"，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然而我却丝毫也不清醒，仍然要维护这一条革命路线。

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我那年近古稀的

婶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全家都在风声里”，人人浑身打战。两位老妇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我们眼前晃。我此时脑筋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分子”。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中国八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从抄家的行动来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今天社会风气，稍有良知者都不能不为之担忧。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这种不良的社会风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话扯得太远了。有些想法决不是被抄家时有的，而是后来陆续出现的。我当时既不敢顽强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同禽兽打交道是不能讲人话谈人情的。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我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惊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我知道，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当时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们的木棒中，他们的长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这些小将究竟年纪还小，旧社会土匪绑票时，是把被绑的人眼睛上贴上膏药，耳朵里灌上烛油的。我这为师的没有把这一套东西教给自己的学生，是我的失职。由于失职，今天我得到了点好处：我还能听到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并不美妙。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

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我此时仿佛得到了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透过几层墙壁，我能看到"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他们所向无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他们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我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我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在他们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刻被毁。看来对抄家这一行，他们已经非常熟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强化实践的结果。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然而我的心在流血。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找我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我家来过，知道我的书都藏在楼下。我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我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车库原来准备放自行车的。如果全楼只有几辆车的话，车库是够用的。但是自行车激剧增加，车库反而失去作用，空在那里。于是征求全楼同意，我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小将们深谋远虑，涓滴不漏。他伸手向我要钥匙，我知道他是内行，敬谨从命。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遭殃的情况，我既看不见，也听不到。然而此时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库里一切破坏情况，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这一批小将，东方语文学得不一定怎样有成绩，对中国历史上那一套诬陷罗织却是了解的。古代有所谓"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顺藤摸瓜，把与被抄家者的三亲六友有关的线索都摸清楚，然后再夷九族。他们逼我交出记载着朋友们地址的小本本，以便进行"瓜蔓抄"。我此时又多了一层担心：我那些无辜的亲戚朋友不幸同我有了关系，把足迹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们哪里知道，自己也都要跟着我倒霉了。我的心在流血。

我蜷曲在厨房里,心里面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恐惧吗?是的,也不全是。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总之,我是又清楚,又胡涂;又清醒,又迷离。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像是几只蚂蚁,别人手指一动,我们立即变为齑粉。我们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答。我不知道,我们是置身于人的世界,还是鬼的世界,抑或是牲畜的世界。茫茫大地,竟无三个老人的容身之地了。“椎胸直欲依坤母。”我真想像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中的沙恭达罗那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生母天上仙女突然下凡,把女儿接回天宫去了。我知道,这只是神话中的故事,人世间是不会有的。那么,我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

暗夜在窗外流逝。大自然根本不管人间有喜剧,还是有悲剧,或是既喜且悲的剧。对于这些,它是无动于衷的,我行我素,照常运行。“英雄”们在革过命以后,“兴阑啼鸟尽”,他们的兴已经“阑”了。我听到门外忽然静了下来,两个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汉,一转瞬间消逝不见。楼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英雄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此时正值朔日,天昏地暗。一片宁静弥漫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个孤苦无靠的老人,从棒影下解脱出来,呆对英雄们革过命的战场。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样被洗劫的情况,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话——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我们哪里还能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呢？我们都变成了木雕泥塑，我们变成了失去语言、失去情感的人，我们都变成了植物人。

但是，我的潜意识还能活动，还在活动。我想到当时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好人打坏人是应该；坏人打坏人是内讧。如果把芸芸众生按照小孩子的逻辑分为好人与坏人两大类的话，我自己属于哪一类呢？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点，也不管我干过多少错事；我坚决认为自己应该归入好人一类。我除了考虑自己以外，也还考虑别人，我不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能教天下人负我"的曹孟德。这就是天公地道的好人的标准。来到我家抄家打砸抢的小将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时受到蒙蔽干了坏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发泄兽性的迫害狂，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说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世界上还有坏人吗？他们在上面那种说法的掩护下，放心大胆地作起恶来。事情不是很明显吗？那几句话，我曾五体投地地崇拜过。及今观之，那不过是不讲是非，不分皂白，不讲原则，不讲正义的最低级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可惜受它毒害的年轻人上十万，上百万，到了今天，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了，有的飞黄腾达；有的找到一个阔丈人，成了东床快婿；有的发了大财，官居高品，他们竟没有一个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一点悔恨，岂非咄咄怪事！难道这些人都那么健忘？难道这一些人连人类起码的良知都泯灭净尽了吗？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这一夜是我毕生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明，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历数我的"罪

行”。我这个人大概还有一点影响，所以新北大公社才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走出大门，我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锁锁死。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我那辆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我知道，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者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上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颗重型炮弹。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专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那样的“错误”或者“罪行”他们是决不会犯的。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的抄家术真正是无懈可击，怅然离去。

我的处境，井冈山领导表面上表示同情。我当时有一个后来想起来令我感到后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冈山总部里。我害怕，公社随时都可能派人来，把我抓走，关在什么秘密的地方。这是当时屡次出现过的事，并不新鲜。井冈山总部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我有点迟疑。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准备同

公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我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我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用那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东西能准确吗？能公正吗？与其将来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现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笼。我在上面谈到，那年夏秋两季我时时感到有风暴在我头上凝聚，随时可以劈了下来。现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砍向我的脖颈。原来我认为天地是又宽又大的。现在才觉得，天地是极小极小的，小得容不下我这一身单薄的躯体。从前读一篇笔记文章。记载金圣叹临刑时说的话："杀头，至痛也。我于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这个"反革命"帽子，也是于无意中得之，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说：奈何！奈何！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我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在最初几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没有人来。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公社视我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

“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则是阶下囚了。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

第一次审讯，还让我坐下。我有点不识抬举，态度非常“恶劣”。我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我心里还在想：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极为激烈。结果审讯不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最初审讯我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当年审讯我的朋友们！你们当时对这些“底”是怎样想的呀？你们是不是真相信，这一切全是真的呢？

这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谈他们的“底”。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秘的信件。事实是，我原来住四间房子，文革起来后，我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多半，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的负担。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证”。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第二个

“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革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我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我的房里我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我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第二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我的。我对蒋介石的态度，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相以外，从1932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好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历史的规律是，一个坏统治者，一旦被人民赶走，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个坏毛病，别人给我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我都保留起来，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烧掉的。结果我果然由这一张照片而碰到点子上了。审讯者硬说，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他们还没有好意思给我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已间不容发了。我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我百喙莫明。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现在我真正紧张了。我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也无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我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这些"革命家"我却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在派性加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呢？

这是决不可能的。

我于是连夜失眠。白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审。晚上躺在枕头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饭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才会过去。能不能过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一会儿又看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满嘴的尖齿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龄则变成了一个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从梦中跳了出来。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些东西。

最可怕的是环顾眼前，瞻望未来。

环顾眼前，我已经坠入陷阱，地上布满了蒺藜和铁刺，让我寸

步难挪。我反对那一位“老佛爷”，这一下子可真捅了马蜂窝。站在我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我相信绝大部分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则不可以理喻。他们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自惟二十多年以来，担任东语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员，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聘请的。我虽有不少缺点，但从不敢作威作福，总以诚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视若仇人，怒目相向，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原来我认为是自己的一派，态度与敌对的一派毫无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后还是落在自己脸上！我脑袋里还有不少封建思想，虽然我不相信“一日师徒，终身父子”这样的说法，但是对自己有恩无怨的老师，至少还应该有那么一点敬意吧！

总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

一年多以来，我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作为旁观者，胆战心颤。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岂但辱而已哉！早已超过了这个界限。我们中华古国，礼义之邦，竟有一些人沦落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原来我还可以逍遥旁观，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阱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还有别人都没有的装满半焚信件的篮子、一把菜刀和蒋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长出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摆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从呢？

我必须做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况且还有一个紧箍咒：谁要走这一条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自绝于人民"。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唯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决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

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革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时"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某某。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

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更向后回转，一转转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点的是项羽，他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死的。对自刎这玩意儿我实在非常担心。一个人能有多大劲能把自己的首级砍下来呢？这比用手枪自杀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当年项羽有一把手枪的话，他决不会选择刀剑。

我的思绪不但上下数千年，而且纵横几万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头子们。据说，他们自知罪恶多端，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点氰化钾，必要时只要用牙齿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狱了。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便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没听说其他国家向日本学习的。不过这种方式一个人还实行不了，因为剖了腹一个人也是不会立即死去的，必须有一个助手在旁，自杀者一经剖腹，助手立刻砍下他的脑袋，日文叫做“介错”。我还听说，日本青年男女在热恋最高潮时往往双双跳

入火山口中。这也不能普遍实行，没有火山的地方，就绝对行不通的。

就这样，我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有时候，我想得非常具体，非常生动，我把死人想像得就像在自己眼前一样。我仿佛看到了鲜红的血流满尸体，可怕而又具有吸引力。我知道，这决不会给我带来愉快，然而却是欲罢不能，难道上苍就真不给我留一条活路了吗？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兴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

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了。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和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服安眠药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方式，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能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勤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

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吧。

我的理论基础大抵如此。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究竟要采用什么方式呢？不用细说，大家一定都能猜到：资本主义方式。好在我已经被打倒，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嫌疑我也无须避讳了。

在自杀行动中，决心下定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决定用什么方式。现在我的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周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恕我借用一个当时极为流行的词儿——要考虑大方向。大方向无非是有两个：一近一远。近是就在家里，远则要走出家门。最方便当然是在家里。但我顾虑重重。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到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为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得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自己亲人的房间，她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靠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里不行。

那就在外面吧。在外面也有一个方向问题，而且方向的头绪更多。我首先是受了我上面提到的中文系那一位总支书记的启发，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

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有诗意呀!简直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的兜着走了。我否定掉这个想法,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王国维是最著名的例子。可我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在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我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游园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茂。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须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干净,又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过此则广陵散矣。

我的心情异常地平静,平静得让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没有研究过古今自杀人的死前心理学。屈原在泽畔行吟时的心情,从他的作品中得知一二,但也不够具体。按道理,一个人决定死是非常困难的,感情应该有极其剧烈的波动,甚至痛哭流涕,坐卧不宁,达到半疯的地步;然后横下一条心,慷慨死去。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一没有饮恨,二没有吞声。我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异样,感到不可理解。

但是,平静中也有不平静。我想到明天此时,我直挺挺地躺在圆明园荒凉寂寞的大苇坑中。那里几乎是人迹不至的地方。不知道会隔多少时候才会有人发现了我的尸体。此时我的尸体也许已经腐烂了,也许已经被什么鸟兽咬掉一只胳臂或一条腿;肚子也许已经被咬开,肠子、五脏都已被吃掉;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眼下还是一个完整的我,到了那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浑身颤

抖，我想不下去了。我仿佛能听到那时候新北大公社的广播台声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播放："反革命分子季羡林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罪该万死！"井冈山的广播台也决不会自甘落伍，同新北大公社展开"打倒季羡林"的竞赛。

但是，不管这些幻想多么可怕，它仍然阻挡不住我那自杀的决心。决心一下，决不回头。我心情平静，我考虑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留下这样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她们一定明白我的意思的，她们的感情也没有激动，眼泪也没有流下。我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那毫无用处。伴我一生的那些珍贵的书籍，我现在管不了啦，这就是我生离死别的一幕。一切都平静得平淡得令我害怕。

我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服用的中西安眠药成箩成筐，我深通安眠药之学，平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不少，丸与水都有，中与西兼备。这时我搜集在一起，以丸打头，以水冲下，真可谓珠联璧合，相辅相成，我找了一个布袋子，把安眠药统统装在里面，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

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我迈步出门——

九　千钧一发

然而门上响起了十分激烈的敲门声。我知道，红卫兵又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批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深知自己毫无发言的权力。我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我立即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贴耳，跟着出去。家里的两位老太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押走。她们也同我一样一言不发。当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大权操在别人手中的时刻。走在路上，我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我的态度恶劣至极，竟敢反唇相讥。今天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煞煞我的威风。我只有洗耳恭听，一声不吭。我意识到，一场特大的风暴正在我头上盘旋。我以前看过的那一些残酷斗争的场面，不意今天竟临到自己头上了。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今天成了主角了。说心里不害怕，那不是真话。但是害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脑袋里懵懵懂懂，又似清楚，又似胡涂，乱成一团。我想到被绑赴刑场的场面。我还没有被绑赴刑场去杀头或者枪毙的经验。我现在心里的滋味是不是同那件事有点相似呢？我说不清楚。事实上，我认为还不如杀头或者枪毙，那只是一秒钟的事儿，刀光一闪，枪声一响，我就度过难关了。现在我却不知道，批斗要延长多久，也不知道，有些什么折磨人的花样。……

一路之上，我不敢抬头，不敢看别人。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

我。我想到鲁迅的小说:《示众》。我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我周围必然有一大群像小说中所说的观众。他们大概也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可惜我不可能也无心去聆听他们的议论了。

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就被押解到一个地方。我低头看到地面,我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我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我不敢看任何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被命令面壁而立。我的耳朵还没有堵上,我还能听到说话的声音,有的声音我是熟悉的。我只觉得人影纷乱,我只听得人声噪杂。到场的人一定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我屏心静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的。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了一声更为清脆的耳光声,声音近在眼前,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我意识到,这一声是发生在自己脸上了。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我吃了老虎胆、豹子心,胆敢起来反对他们那一位女主人。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我自作自受,又何怪哉?除此以外,我想还有别的根由: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禽兽比人要好,它们爽直,肚子饿了就吃人或别的动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兽比一比,究竟怎样呢?

这些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当时我只是一头就要被吃的牲畜,我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胡涂。我面壁而立,浑身的神经都集

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在准备着承受拳打，承受脚踢。我知道，这些都只能算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哩。

果然，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召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上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

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胡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

命吧。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头，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8341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它确实能令人惊心动魄，毕生难忘。它把人的残酷的本性暴露无遗。然而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一条命。"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后怕。如果押解我的红卫兵晚来半个小时的话，我早就爬过了楼后的短墙，到了圆明园，服安眠药自尽了。如果我的态度稍微好一点的话，东语系新北大公社的头领们决不会想到要煞一煞我的威风，不让我来陪斗，我也早已横尸圆明园大苇塘中了。还能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程度的最低线。我所遭受的显然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的。这些都是胡思乱想。反正性

命是拣到了。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

既然决心活下去了,那就要准备迎接更残酷更激烈的批斗。这个思想准备我是有的。

我在这里想先研究一个问题:批斗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人发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发明出来的吧。如果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有专利权的话,这个发明者是一个天才,他应当获得头等大奖。但是我认为他却是一个愚蠢的天才。这种批斗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在旧社会,县太爷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夹板,甚至用竹签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让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你不是已经用大喇叭、大字报昭告天下了吗?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命拣到了,很好。但是拣来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批斗开始了。原来只让我做配角,今天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激烈的敲门声响过之后,进来了两个(比上次少了一个)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押解着我到了外文楼。进门先在楼道里面壁而立。我仍然是什么都不敢看。耳旁只听得人声嘈杂。我身旁站着两个面壁的人。我明白,这是陪斗者。我在东语系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培

养出来的教员和学生,工作起来,有条不紊,滴水不漏,心里暗暗地佩服。还没有等我思想转回到现场来,只听得屋里一声大喊:“把季羡林押上来!”从门口到讲台也不过十几步。然而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呀!四只手扭住了我的胳臂,反转到背上,还有几只手卡住脖子。我身上起码有七八只手,距离千手千眼佛虽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经够可观的了。可是在这些手的缝里还不知伸进了多少手,要打我的什么地方。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合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我先声明一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再变为什么,我记不清了。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我心里一愣,几乎吓昏了过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的仇恨,都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这个挂头牌的主角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地上没有缝,我是钻不进去的。我就“安之”吧。

“打倒”的口号喊过以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我也不知道,读语录会起什么作用。是对“革命群众”的鼓励呢?还是对“囚犯”的镇慑?反正语录是读了,而且一条一条地读个没完。终于语录结束了。什么

人作主旨发言——好像就是到我家去抄过家的学泰语的王某某——,历数我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我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捏造、罗织、说谎。我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但是没有感到什么忿忿不平,——惯了。他说到激昂处,"打倒"之声震动屋瓦。宇宙间真仿佛充满了正气。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我在大饭厅陪斗时,只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这声音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次却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否已经鼻青脸肿,没有镜子,我自己看不到。不久有人把我从地上拖了起来,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此时我想坐喷气式也不可能了。围攻者中我看清楚的有学印地语的郑某,学朝鲜语的谷某某,还有学越南语(?)的王某某。前一个能说会道,有"电门"之称,是"老佛爷"麾下的铁杆。后二者则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你们只须出一个女的铁杆社员,就足能把我打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千只脚了。何必动用你们武斗时的大将来对付我呢?你别说,这些巨无霸还真克尽厥职,决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动地表演)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这时

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回头一看，后头没了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腔子里，喘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这样走回了家。

我又经过了一场血的洗礼。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

跟着来的是一个批斗的高潮期。

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隔七八天，总有一次批斗。对此我已经颇能习以为常，"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是在批斗方面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这一条像骆驼钻针眼似地拣来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圆明园了。

这一个高潮期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开始直到次年的初春为批斗和审讯阶段；从初春到1968年5月3日为批斗、审讯加劳动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我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我生平获得的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北京刚一解放，我就参加了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后来进一步发展，组成了教职员联合会，最后才组成了工会。风闻北大工人认为自己已是领导阶级，羞与知识分子为伍组成工会。后经不知什么人解释、疏通，才勉强答应。工会组成后，我先后担任了北大工会组织部长，沙滩分会主席。在沙滩时，曾经学习过美国竞选的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初经解放，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为了开会布置会场，我曾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且以此为乐。当时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后来听说一个权威

人上解释说：知识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我的政治理论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工人而能属于工人阶级？为了调和教授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心里始终是胡里胡涂的。不管怎样，我仍然兴高彩烈地参加工会的工作。1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我仍然是工会积极分子。我被选为北京大学工会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这个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我的特殊罪状。北大"工人阶级"的逻辑大概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臭知识分子，得以滥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宽宏大量，现在竟成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头儿，实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对北大"工人阶级"的这种逻辑，我是能够理解的，有时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有个人考虑。至于北大"工人阶级"是否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当时还没有考虑。但是对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却大惑不解。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当了教授，当了系主任，甚至当了副校长和工会主席，可并没有真正统治学校呀！真正统治学校的是上级派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老革命个个都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不愧是国家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成了"走资派"，我觉得很不公平。现在又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拉进了"统治"学校的圈子，这简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先谈我这个工会主席。我被"打倒"批斗以后，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后。在对我大批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他们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员和学生有所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颇为明显的：工人比学生力气更大，行动更"革命"（野蛮）。他们平常多欣赏评剧，喜欢相声等等民间艺术。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们大概发现了人批斗要比评剧和相声好看,好听得多,批斗的积极性也就更高涨。批斗我的机会他们怎能放过呢?于是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两个工人,要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批斗。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我早已无车可骑。这样我就走在中间,一边一个人推车"护驾",大有国宾乘车、左右有摩托车卫护之威风。可惜我此时心里正在打鼓,没有闲情逸致去装阿Q了。

听说,北大工人今天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来,一起批斗。如果真弄成的话,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出戏呀!这要比杨小楼和梅兰芳合演什么戏还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着,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实在是大煞风景。但是,"我们工人有力量",来一个就先斗一个吧。就这样,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只剩下一个人,就像平常劳动那样,偷工减料,敷衍了事。他们决不率由旧章,而是大大地发挥了创造性:把在室内斗争,改为"游斗",也就是在室外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我胡里胡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我不知道沿途"观礼"者有多少人。从闹哄哄的声音来推测,大概人数不少。口号声响彻云霄,中间搀杂着哈哈大笑声。可见这一出戏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这一次不让我坐喷气式,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来揪斗我了。人们干事总喜欢一窝蜂的方式,要么都不干,要么都抢着干。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一窝蜂。在文革以前,北大根据教委(当时还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研究所。校长兼党

委书记陆平亲自找我，要我担任所长。其实是挂名，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觉得关系还不错。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里的人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别的什么性，决不能放过批斗我的机会。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总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园的所里，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多。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至于批斗发言，则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说八道，百分之九是罗织诬陷，大约只有百分之一说到点子上。总起来看水平不高。批斗完了以后，我轻轻松松地走回家来。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

在一次东语系的批斗会上——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批斗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原则，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渐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记住了——，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习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现在是对"敌"斗争了——这个"敌"就是我——，大家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斗争的主题是从我被抄走的日记上找出的一句话："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了。"这就犯了大忌，简直是大不敬。批斗者的理论水平极低——他们从来也没有高过——，说话简直是语无伦次。我坐在喷气式上，心里无

端产生出鄙夷之感，可见我被批斗的水平已经猛增，甚至能有闲情逸致来评断发言的水平了。从两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记中关于江青的那一句话，证明我的派性有多么顽固。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我边坐喷气式，边有点忿忿不平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我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我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实在可恶之至！

这样的后悔药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点我自己知道。我下定决心，不再去想。还是专心致志地考虑眼前的处境为佳，这样可能有点实际的效益。我觉得，我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种锻炼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而是特殊的锻炼。说明白一点就是专门锻炼双腿。我分析了当时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小时而仍然能坚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倘若在批斗时坐喷气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患简直是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惩罚我哩。我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坐喷气式坐到半个小时以后，就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潜台词是："下定决心，

不怕苦痛，排除万难，去争取不要倒下！”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我坚持再坚持。到了此时，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激昂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我听起来，只如隔山的轻雷，微弱悠远而已。

这样的经验，有过多次。自己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根本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必须有点长久之计。我于是就想到锻炼双腿。我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我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我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而后止。这样的体育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站在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我能从远处看到来我家押解我去批斗或审讯的红卫兵。我脾气急，干什么事我都从来不晚到。对待批斗，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斗也能正点开始。至于何时结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站在阳台上，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天，我在“锻炼”之余，猛然抬头看到楼下小园内竹枝上坐着的麻雀。此时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万木枯黄，叶子掉得精光。几杆翠竹更显得苍翠欲滴。坐在竹杆上的几只小麻雀一动也不动。我的眼前一亮，立刻仿佛看到一幅宋画“寒雀图”之类。我大为吃惊，好像天老爷在显圣，送给我了一幅画，在苦难中得到点喜悦。但是，我稍一定神，顿时想到，这是什么时候我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我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真可谓顽固至极，说我“死不改悔”，我还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

类似这样的奇思怪想，我还有一些。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

逃呢?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我看到脚下乱爬的蚂蚁,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蚂蚁呢?只要往草丛里一钻,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飞的小鸟,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天空任鸟飞,翅膀一展,立刻飞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总之,是嫌自己身躯太大。堂堂五尺之躯,过去也曾骄傲过,到了现在,它却成了累赘,欲丢之而后快了。

这一些幻想毫无用处,自己知道。有用处的办法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确实认真考虑过这一件事。关键是逃到什么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乡,这是最蠢的办法。听说有一些人这样做了。新北大公社认为这是犯了大法,大逆不道,派人到他的家乡,把他揪了回来,批斗得加倍地野蛮残酷。这一条路决不能走。那么逃到哪里去呢?我曾考虑过很多地方,别人也给我出过很多点子,或到朋友那里,或到亲戚那里。我确曾认真搜集过全国粮票,以免出门挨饿。最后,考虑来,考虑去,认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险,还是留在北大吧。这是一条最切实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难忍受的路,天天时时提心吊胆,等候红卫兵来抓,押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这才叫做"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没有劳动怎么能改造呢?这改变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暂时略有喜意。

从今以后,我就同我在上面谈到的首先被批斗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时,在外文楼批斗这一位老教授,我当时还滥竽人民之内,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同志"。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

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八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据我从旁观察，从那时起，北大工人就变成了白领阶级，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头禁子，自己什么活都不干，成了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我颇有点腹诽之意。然而，工人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我自己只不过一个阶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也不敢说三道四了。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古脑儿爆发出来了。在大饭厅批斗向壁而立时，许多响亮的耳光声，就来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与某一些教授的脸相接触中。我这些话，有一些工人师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子，就应该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接受也否认不了事实的存在。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工人监督下进行劳改。多脏多累的活，只要他的嘴一动，我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旁边颐指气使。他横草不动，竖草不沾，就这样来"领导一切"。

这样劳动，我心里有安全感了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并不怕劳动。但是这样的劳动，除了让我失掉锻炼双腿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外，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东语系或北大的某一个部门的头领们，一旦心血来潮，就会派人到我劳动的地方，不管这个

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总能把我手到擒来。有时候，在批斗完了以后，仍然要回原地劳动。坐过一阵喷气式以后，劳动反而给我带来了乐趣，看来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我决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或者几十成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况且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只脚"，那可真是如堕入十九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熏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它们不知道我是"黑帮"，只知道我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

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

但是，人生总是祸不单行的，天堂也决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我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我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我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这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我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我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我就乘机滚了蛋。我脚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只脚正式走路，另一只是被拖着走的。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我不敢进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见了我都会怒目而视，我哪里还敢自投罗网呢？看到我这一副狼狈相，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上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上边怪罪下来，不但我吃不消，连那位工人也会受到牵连。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此时，北大的两派早已开始了武斗。两派都创建了自己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点。掌权的公社派当然会阔气非凡。他们把好好的价值昂贵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了长矛，拿在手里，威风凛凛。井冈山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据几座楼，相互斗争。每一座楼都像一座堡垒，警卫森严。我没有资格亲眼看到两派的武斗场面。

我想,武斗之事性命交关,似乎应该十分严肃。但是,我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一场激烈的武斗留下的战场。附近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是两派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里莞尔一笑。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我脸上没有笑意已经很久很久,笑这个本能我好像已经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但是,真正的武斗,只要有可能,我还是尽量躲开的。这种会心的微笑于无意中得之,不足为训。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两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敌人。我若遇到武斗而躲不开的话,谁不想拿我来煞气呢?我既然凭空捡了一条命,我现在想尽力保护它。我虽然研究过比较自杀学,但是,我现在既不想自杀,也不想他杀。我还想活下去哩。

劳改初级阶段的情况,大体如此。

十一　大批斗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

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想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谄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

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每读一篇，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直接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

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最高指示者乾纲独断，毅然昭告天下：文革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时我真要更加用万倍的激情来歌颂我们"人民的大救星"。那该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我劳改了整整1968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春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

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闭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

1968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水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肉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

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哩嘟噜，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粗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喷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肉里面扎。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拧到背上，脖子上

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身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噪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了这么快的。于是我身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砰砰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身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

十二　太平庄

我原以为，或者毋宁说是希望，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然而"造反派"的脾气却不是这样。

他们要趁热打铁。

就在大批斗的第二天，我们一百多号"黑帮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厂去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我知道又出了新花样，还不晓得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哩，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当我扛着行李走在那一条倚山傍湖的曲径上时，迎面遇到前一阵被当做走资派批斗过的姓胡的经济系教授。他虽然还没有"解放"，仍然是一脸晦气；但他毕竟用不着到煤厂去集合了。在我当时的眼中，他已是神仙中人，真让我羡煞。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煤厂。对我们"反革命分子"来说，这里是非常令人发怵的地方，无异于阎王殿。昨天的记忆犹新，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感。我走了进去，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这是第一个下马威。我随时准备着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上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很不舒服。觉得这不一定是吉兆，其中暗藏着杀机。然而我又不能虔心请求，恩赐几个耳光，那样我才会觉得正常，觉得舒服。我只有把这痛苦的不安埋在自己心中。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一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

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右手执钢管制成的长矛一根，开口训话，讲了一大篇歪理。我们现在没有坐喷气式，能够清清楚楚地听懂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为不少，比如："你们这一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梦想翻案！"他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是不吃素的！"这一点我最清楚，而且完全相信。因为他们的长矛确实曾吃过几次人肉了，其中包括校外一个中学生的肉。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这吃肉的长矛不要吃到我身上来。当时杀死一个"黑帮"等于杀死一只苍蝇，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反而会成为"革命行动"。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我们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一个耳光或用脚一踹，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上去猛揍一顿，鼻青脸肿，一声不敢吭，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我是懂得的。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拖人的原则，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心里吓得直打哆嗦。我幸而只是猴子，没有成鸡。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队的押解下，排队登上了几辆敞篷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二百号。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又下车整队，只能有一辆车开往我们此行的目的，也就是我们劳改的地方太平庄。从二百号到太平庄，还有四五里路是要步行的。可是在列队时，我们几个年老的黑帮被叫出队列。这次不是要杀鸡给猴看了，而是对我们加以优待。我们可以乘车到太平庄，其余的人都要步行。这次大恩高厚，实在出我意外。你能说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吗？我实在真是受宠若惊了。

到了太平庄以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我不知道，这些平房是干嘛用的。现在早已荒废不用。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的土。好在我们此时已经不再像人。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同我们无关了。每

屋住四个黑帮,与我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还有我非常熟悉的国政系的一位姓赵的教授。他好像是从走资派起一直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程陪同",一步没缺。我们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上一声,敢笑上一笑。我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我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这也算是一种"异化"吧。

我此时关心的决不是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只是想喝一点水。我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没有入口。天气又热,又经过长途跋涉,渴得难以忍受。我木然坐在床板上,心里想的只是

水　水　水。

如果我眼前有一点水的话,不管是河水,湖水,还是海里的水,坑里的水,甚至臭沟里的水,我一定会埋头狂饮。我感觉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有水喝。我梦想"时来运转风雷动",我一旦被"解放",首先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通水。如果能有一瓶冰镇啤酒,那就会赛过玉液琼浆了。

"水,水,水",我心里想。

但是一滴水也看不到。

我忽然想到在大学念书时读过的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s),其中有一行是:

Water, water, everywhere (水,水,到处都有)。

这里指的是海水。到处有水,却是咸的,根本没法子喝,我此时连咸水也看不到,我眼前只有一片干黄的尘土。同古舟子正相反,我是:

Water, water, nowhere (水,水,无处有水)。

我坐在那里,患了思水狂。恍恍惚惚,不知呆了多久。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

而押解我们到这里来的革命小将和中将，对于这个风景宜人宛如世外桃园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举行暴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手持长矛。他们内心是胆怯的。其实我们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知识分子，哪里还能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我们只是虔心默祷上苍，愿不吃素的长矛不要刺到我们身上，我们别无所求，别无所图。看了他们这种战战兢兢的神气，心里觉得非常可笑。

到了夜里，更是戒备森严，大概是怕我们逃跑，试问在旷野荒郊中我们有逃跑的能力和勇气吗？也许是押解人员真正心慌。他们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到厕所去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我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我什么人都看不到，只好对空高呼："报告！"在黑影里果然有了人声："去吧！"此人必然是长矛在手，但是我没有见到人影。

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我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抓长矛一手抓棒的押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

此地风光真是秀美。当时是初夏，桃花、杏花早已零落；但是周围全是树林，绿树成荫，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锦绣一般。再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平常时候，这样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必然会引起我的兴趣，大大地欣赏一番。但是此时，我只防备头上的棒子，欣赏山水的闲情逸致连影儿都没有了。也许真

是积习难除,在满身泥污,汗流浃背的情况下,我偶一斜眼,瞥见苍翠欲滴的树林,心里涌起了两句诗:

栽秧燕山下

慊然见绿林

当年陶渊明是"悠然见南山"。我此时却是"悠然"不起来的,我只能"慊然"。大自然不关心人间的阶级斗争,不管人间怎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它依然显示自己的美妙。我不"慊然"能行吗?

我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大批斗时的伤痕,我身心完全垮了。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此时,大队人马里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子里寂静无声,连院子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地爬了出去。路上碰到黑帮难友马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

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眼中仿佛是一个带爱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睾丸看上一眼，给我一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红色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睾丸的肿竟然消了。我又能够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头子，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美。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子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粗糙，粗米或窝头，开水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

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性命。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真希望长期呆下去。

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但是，我们的希望又落了空。

造反派的脾气我们还没有摸着。

有一天，接到命令：回到学校去。我们在太平庄呆的时间并不长，反正不到一个月。

返校就返校吧。反正我们已是"瘸子掉在井里，扶起来也是坐"，到什么地方去都一样。太平庄这二十来天，我不知道，在虐待折磨计划中占什么地位。回来以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还会想出什么花样来继续虐待和折磨我们。

到了学校，下车的地点仍然是渣滓洞阎罗殿煤厂。临走时给我们训话的那一个学生模样的公社头子，又手执长矛，大声训了一顿话。第二天，我们这一群黑帮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自已动手，修建牛棚，然后再请君入瓮，自己住进去。

这几排平房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经过这里。我也曾在这里上过课。房子都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程度。屋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窗子破旧，有的又缺少玻璃，阻不住冬天的寒风。根本没有暖气。按上一个炉子，也只能起"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总之，根据我在这里上课的经验，这个地方毫无可取之处。

然而今天北大公社的头子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做牛棚，把我们关在这里。牛棚的规模是，东面以民主楼为屏障，南面

以外文楼为屏障，西面空阔的地方，北面没有建筑的地方，都用苇席搭成墙壁，遮了起来。在外文楼与民主楼之间的空阔处，也用苇席围起，建成牛棚的大门。我们这一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为久已荒废，地上湿气霉味直冲鼻官。监改者们特别宣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可以铺在地上挡住潮气。意思是让我们感恩戴德。这样的地方监改者们当然是不能住的。他们在民主楼设了总部，办公室设在里面，有的人大概也住在那里。同过去一样，他们非常惧怕我们这一群多半是老弱的残兵。他们打开了民主楼的后门，直接通牛棚。后门内外设置了很多防护设施，还有铁蒺藜之类的东西，长矛当然也不会缺少。夜里重门紧闭，害怕我们这群黑帮会起来暴动。这情况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可叹。在西边紧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座席棚，原名叫外调室。后来他们觉得这不够“革命”，改名为审讯室。在这里确审讯过不少人，把受审者打得鼻青脸肿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外文楼后面搭了一座大席棚，后来供囚犯们吃饭之用。

黑帮大院的建筑规模大体上就是这样。这里由于年久失修，院子里坑坑洼洼，杂草丛生，荒芜不堪。现在既然有我们这一批“特殊”的新主人要迁入，必须大力清扫，斩草铺地。这工作当然要由我们自己来做。监改人员很有韬略，指挥若定。他们把我们中少数年富力强者调了出来，组成了类似修建队的小分队，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其余的老弱残兵以及一些女囚徒则被分配去干其他的活。工地上一派生气勃勃的劳动气氛。同任何工地不同之处则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敢说说笑笑，都是囚首丧面，是过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劳动大军。

我原来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平房现在已经拆掉）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

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成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有一丈多高，人们是无法爬出来的。原来是毫无阻拦的通道，现在则俨然成了铁壁铜墙，没有人胆敢跨越一步了。

席棚搭完，我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我们被调去的人，谁也不敢偷懒耍滑。我们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觉悟特别高。我们只害怕有意外的横祸飞临自己头上。这时候，监改人员手里都不拿着长矛了，同在太平庄时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太平庄地处荒郊野外，而此处则是公社的大本营，用不着担心了。我们心里也清楚：虽然他们手里没有长矛，但大批的长矛就堆在他们在民主楼内的武器库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到手的。而且他们现在手中都执有木棒。他们的长矛是不吃素的，他们的木棒也不会忌荤的。

我的担心并没有错。西语系教法语的一位老教授，当时岁数总在古稀以上。他眼睛似乎有点毛病，神志好像也不那么清醒，平常时候就给我以痴呆的印象。他大概是没有到太平庄去经受火的洗礼；在被批斗方面，他也没有上过大的场面，有点闭目塞听，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长矛不吃素的感性认识。现在也被调来用铁锹捣地。在干活的时候，手中的铁锹停止活动了一会儿。他哪里知道，监改人员就手执木棒站在他身后。等到背上重重挨了一棒，他才如梦方醒，手里的铁锹又运转起来了。这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插曲一过，天下太平，小小的审讯室里响彻铁锹砸地的声音，激昂而又和谐，宛如某一个大师的交响乐了。

劳改大院终于就这样建成了。

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子向南的一排平房子的墙上，用白色的颜料写上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一个字比人还高，龙飞凤舞，极见功力。顿使满院生辉，而且对我们这一群牛鬼蛇神极有威慑力量，这比一百次手执长矛的训话威力还要大。

我个人却非常欣赏这几个字,看了就心里高兴,窃以为此人可以入中国书谱的。我因此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大字报锻炼了书法,打人锻炼了腕力,批斗发言锻炼了诡辩说谎,武斗锻炼了勇气。对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你能说十年浩劫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此外,我还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是万分正确的,他说中国是文字之国。这种做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汉朝有"霄寐匪祯,扎闼宏庥",翻成明白的话就是"夜梦不祥,出门大吉"。只要把这几个字往门上一写,事情就"大吉"了。后来这种文字游戏花样繁多,用途极广,什么"迎门见喜"、"吉祥如意"等等,到处可见。连中国的鬼都害怕文字,"泰山石敢当"是最好的例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此风未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好像只要写上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已完成。至于服不服务,那是极其次要的事情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属于这种情况。八个字一写,我们这一群牛鬼蛇神,就仿佛都被横扫了。何其简洁!何其痛快!

从此以后,我们这一群囚徒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

十四　牛棚生活(一)

我们亲手把牛棚建成了,我们被"请君入瓮"了。

牛棚里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学家不是宣传过"到处有生活"吗?

但是,现在要来谈牛棚生活,都还非常不容易,"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我考虑了好久,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学一学过去很长时间内在中国史学界最受欢迎,几乎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以论带史"的办法,先讲一点理论。但是我这一套理论,一无经可引,二无典可据,完全是我自己通过亲自体验,亲眼观察,又经过深思熟虑,从众多的事实中抽绎出来的。难登大雅之堂,是可以肯定的。但我自己则深信不疑。现在我不敢自秘,公之于众,这难免厚黑之诮,老王卖瓜之讽,也在所不顾了。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可名之为"折磨论"。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这一条纲贯彻始终,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左右一切。至于这一条纲的心理基础,思想基础,我在上面几个地方都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谈了。从"打倒"抄家开始,一直到劳改,花样繁多,令人目迷五色,但是其精华所在则是折磨人。在这方面,他们也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最初对于折磨人,虽有志于斯,但经验很少,办法不多。主要是从中国过去的小说杂书中学到了一点。我在本书开头时讲到的

《玉历至宝钞》,就是一个例子。此时折磨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原始、生硬、粗糙,并不精美、完整。比如打耳光,用脚踹之类,大概在原始社会就已有了。他们不学自通。但是,这一批年轻人勤奋好学,接受力强,他们广采博取,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正如在战争中武器改良迅速,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人的方式也是时新日异,无时不在改进、丰富中。往往是一个学校发明了什么折磨人的办法,比电光还快,立即流布全国,比如北大挂木牌的办法,就应该申请专利。结果是,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由粗至精,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寡及众,折磨人的办法就成了体系,光被寰宇了。如果有机会下一次再使用时,那就方便多了。

我的"论"大体如此。

这个"论""带"出了什么样的"史"呢?

这个"史"头绪繁多。上面其实已经讲了一些。现在结合北大的"牛棚"再来分别谈上一谈。据我看,北大黑帮大院的创建就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

下面分门别类来谈。

(一)正名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这一群被抄家被"打倒"的罪犯应该怎样命名呢?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我们曾被命名为"黑帮";但是,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其名不雅驯。我们曾被叫做"王八蛋";但是,此名较之"黑帮",更是"斯下矣"。我们曾被命令为"反革命分子"。这确实是一个"法律语言";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被普遍采用。此外还有几个名,也都没有流行起来。看来这个正名的问题,一直没有妥善地解决。现在黑帮大院已经建

成了,算是正规化了,正名便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初搬进大院来的时候,每一间屋的墙上都贴着一则告示,名曰“劳改人员守则”。里面详细规定了我们必须遵守的规矩,具体而又严厉。看样子是出自一个很有水平的秀才之手。当时还没有人敢提倡法治。我们的“革命”小将真正是得风气之先,居然订立出来了类似法律的条款,真不能不让我们这些被这种条款管制的人肃然起敬了。

但是,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这些小智者也有了“一失”,失就失在正名问题上。《劳改人员守则》贴出来大概只有一两天就不见了,换成了《劳改罪犯守则》。把“人员”改为“罪犯”,只更换了两个字,然而却是点铁成金。“罪犯”二字何等明确,又何等义正辞严!让我们这些人一看到“罪犯”二字,就能明确自己的法律地位,明确自己已被打倒,等待我们的只是身上被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这一群从来也不敢造反的秀才们,从此以后,就戴着罪犯的帽子,小心翼翼,日日夜夜,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把我们全身,特别是脑袋里的细胞,都万分紧张地调动到最高水平,这样来实行劳改。

我有四句歪诗:

大院建成,
乾坤底定。
言顺名正,
天下太平。

(二)我们的住处

关于我们的住处,我在上面已经有所涉及。现在再简略地谈一谈。

“罪犯们”被分配到三排平房中去住。

这些平房,建筑十分潦草,大概当时是临时性的建筑,其规模比临时搭起的棚子略胜一筹。学校教室紧张的时候,这里曾用作临时教室。现在全国大学都停课闹革命已经快两年了。北大连富丽堂皇的大教室都投闲置散,何况这简陋的小屋?所以里面尘土累积,蛛网密集,而且低矮潮湿,霉气扑鼻。此地有老鼠、壁虎,大概也有蝎子。地上爬着多足之虫,还有土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总之,低矮潮湿之处所有的动物,这里应有尽有。实际上是无法住人的。但是我们此时已经被剥夺了"人籍",我们是"罪犯",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住,都是天恩高厚,我们还敢有什么奢望!

最初几天,我们就在湿砖地上铺上席子,晚上睡在上面,席子下面薄薄一层草实在挡不住湿气。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子成堆。每个人都被咬得遍体鳞伤,奇痒难忍。后来,运来了木头,席子可以铺在木头上了。夜里每间房子里还发给几个蘸着敌敌畏的布条,悬挂在屋内,据说可以防蚊。对于这一些"人道"措施,我们几乎要感激涕零了。

这时候,比起太平庄来,劳动"罪犯"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至少扩大了一倍。其中原因我们不清楚,也不想清楚,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观察了一下,陆平等几个"钦犯",最初并没有关在这里,大概旁处还有"劳改小院"之类,这事我就更不清楚了。有一些新面孔,有的过去在某个批斗会上见过面,有一些则从没有见过面,大概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新"揪"出来的。事实上,从入院一直到大院解散,经常不断地有新"罪犯"参加进来。我们这个大家庭在不断扩大。

(三)日常生活

牛棚里有了《劳改罪犯守则》,就等于有了宪法。以后虽然也

时常有所补充，但大都是口头的，没有形诸文字。这里没有"劳改罪犯"大会，用不着什么人通过。好在监改人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官方的称呼？——出口成法，说什么都是真理。

在"宪法"和口头补充法律条文的约束下，我们的牛棚生活井然有序，早晨六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子正中，发号施令。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很少手执长矛，大概是觉得此地安全了。跑步算不算体育锻炼呢？按常理论，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除了干体力活以外，谁也不允许看一点书，我们的体育锻炼已经够充分的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再说我们"这一群王八蛋"已经被警告过，我们是铁案如山，谁也别想翻案。我们已经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身体锻炼不锻炼完全是无所谓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我发现的"折磨论"。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我们在整天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

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洗漱完，排队到员二食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百多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根据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谁也不敢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脚。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的"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当时"劳动罪犯"的生活费是每月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即使让我买，我能买得起吗？靠这一点钱，我们又怎样"生"，怎样"活"呢？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我们无份。我们只能在楼外树底下，台阶上，或蹲在地上"进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我们无关，只能吃点盐水拌黄瓜，清水煮青菜之类。整天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没有。我们只能同窝头拼命，可是我们又哪里去弄粮票呢？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

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及了。

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我们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了活,不管是多脏多累,一律到劳改大院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队长分配牛马一样。分配完了以后,工人们就成了甩手大掌柜的,在旁边颐指气使。解放后的北大工人阶级,此时真是踌躇满志了。

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忘记的。在出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是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能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我们被叫到办公室去,先喊一声:"报告!"然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惩罚如上。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而且脑袋里除了数学公式之外,似乎什么东西也挤不进去。连据说有无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我经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双眼下鼓起两个肿泡。我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背语录有什么用处呢?也许有人认为,我们这些"罪犯"都是花岗岩的脑袋瓜,用平常的办法来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家"于是就借用了耶稣教查经的办法,据说神力无穷。但是,我很惭愧,我实在没有感觉出来。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监改人员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会有这样的威力,他们自己也

并背不熟几条语录。连向"罪犯"提头时，也往往出现错误。有时候他提了一个头，我接着背下去，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过一两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没有发现。我此时还没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蒙混过了关。我如真愚蠢到起来"自首"，那么监改人员面子不是受到损害了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此，我们就边干活，边背语录。身体和精神都紧张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于我参加的劳动工种，那还是非常多的。劳动时间最长的有几个地方。根据我现在的回忆，首先是北材料厂。这里面的工人都属于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拥护"老佛爷"的。在"劳改罪犯"中，也还是有派别区分的。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时候会有不同。我在这里，有两重身份，一是"劳改罪犯"，二是原井冈山成员，因此颇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训斥的机会多了一点。我们在这里干的活，先是搬运耐火砖，从厂内一个地方搬到小池旁边，码了起来。一定要码整整齐齐，否则会塌落下来。耐火砖非常重，砸到人身上，会把人砸死的。我们"罪犯们"都知道这一点，干起活来都万分小心谨慎。耐火砖搬完，又被分配来拔掉旧柱子和旧木板上的钉子。干这活，允许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们简直是享受天福了。厂内的活干完了后，又来到厂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边，去搬运沙子，从一堆运到另一堆上。在北材料厂我大概干了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几句，在这里干活的只是"罪犯"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都各有安排，情况我不清楚，我只好略而不谈了。

我从北材料厂又被调到学生宿舍区去运煤。现在是夏天，大汽车把煤从什么地方运到学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抬着，堆成煤山，以减少占地的面积。这个活并不轻松，一是累，二是脏。两个老人抬一筐重达百斤

以上的煤块或煤末,有时还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难的。大风一起,我们满脸满身全是煤灰。在平常时候这种地方我们连走进都不会的。然而此时情况变了。我们已能安之若素。什么卫生不卫生,更不在话下了。同我长时间抬一个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学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监督劳动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低声对我说:“我们的命运看来已经定了。我们将来的出路,不外是到什么边远地区劳改终生了。”这种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想呢?

以后,我的工种有过多次变化。我曾随大队人马到今天勺园大楼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过石头,挖过稻田。有一次同西语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着一个工人,到学生宿舍三十五楼东墙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这次工人师傅亲自下了手,我们两个老头只能算是“助教”,帮助他抬抬洋灰包,递递铁锹。这位工人虽然也绷着脸,一言不发,但是对我们一句训斥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心里实在是铭感五内。十年浩劫以后,我在校园里还常见到他骑车而过,我总是用感激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背景渐渐消逝。

此外,我还被分配到一些地方去干活,比如修房子,拔草之类,这里不一一叙述了。

既然叫做“劳改”,劳动当然就是我们主要的生活内容。不管是在劳动中,还是在其他活动中,总难避开同监改人员打交道。见了他们,同在任何地方一样,我们从不许抬头,这已经是金科玉律。往往我们不知道,站在面前谈话的是什么人。但是对方则一张口就用上一句“国骂”,这同美国人见面时说“hello!”,一样,不过我们只许对面的人说而已。监改人员用的词很丰富,除了说“妈的”以外,还说“你这混蛋!”、“你这王八蛋!”等等,词彩丰富多了。如果哪个监改人员不用“国骂”开端,我反而觉得非常反常,非常不舒服了。

(四)晚间训话

我先郑重声明一句:这是劳改监改人员最伟大的最富有天才的发明创造。

在我上面谈“劳改罪犯”的日常生活时,曾谈过监改人员在管理“劳改罪犯”的许多发明创造。这些监改人员,除了个别职员和一些工人以外,有一多半是学生。这些学生平常学习成绩怎样,我说不清楚。但在管理劳改大院时的表现,我作为一个老师,却不能不给他们打很高的分数。过去我们的教学颇多脱离实际的地方这主要由教学制度负责,我们当教员的也不能辞其咎。在劳改大院里,他们是完全联系实际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组织的才能,管理的才能,训话的才能,说歪理诡辩的才能,株连罗织的才能,等等,简直说也说不完。再加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果断和勇气,说打人伸手就打,抬脚就踢,丝毫也不游移迟疑,我辈老师实在是望尘莫及。

但是,他们发明创造的天才表现得最最突出的地方,却是晚间训话。

什么叫“晚间训话”呢?每天晚上,吃过晚饭,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面训话,这个人好像是上边来的,不是我们在大院里常碰到的那些人,他大概是学校公社的头子之一。这个训话者常换人,个中详情我说不清楚。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因为它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是没有多少的,讲大道理必然每天重复。他们的训话是属于“折磨学”的,是这一门学问的实践。训话者每天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我们满头都是,如果真正没有,他们还可以栽在你头上嘛。小辫的来源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

白天劳动时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我们每天的书面思想汇报中一些所谓"问题"。我们劳动都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并不是由于我们"觉悟"高，而是由于害怕拳打脚踢。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不定哪一个"棚友"今天要倒霉，让监改人员看中了。到了晚间训话时，就给你来算账。至于写书面的思想汇报，那更是每天的重要工作。不管我们怎样苦思苦想，细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这个刀笔师爷之国，挑点小毛病是易如反掌的。中国历史上这类著名的例子多如牛毛。清朝雍正皇帝就杀过一个大臣，原因是他把"朝乾夕惕"，为了使文章别开生面，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二者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颂圣"之句。然而"龙颜大怒"，结果丢掉了脑袋。我们监改人员的智商要比封建皇帝高多了。他们反正每天必须从某个"罪犯"的书面汇报中挑点小毛病。不管是谁，只要被他们选中，晚间训话时就倒了大霉。

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的。"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监改人员先点名。这种事情我一生经历多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只有一件极小极小的小事，却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就是我将来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

其他"罪犯"站在这一间房子的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还没有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把他倒剪

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措施是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两只脚——千只脚是踏不上的,这只不过是修辞学的夸大而已,用不着推敲,这也属于我所发现的“折磨论”之列的。

这样的景观大概只有在十年浩劫中才能看到。我们不是非常爱“中国之最”吗?有一些“最”是颇有争议的;但是,我相信,这里决无任何争议。因此,劳改大院的晚间训话的英名不胫而走,不久就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成为北大最著名的最有看头的景观。简直可以同英国的伯金翰宫前每天御林军换岗的仪式媲美了。每天,到了这个时候,站在队列之中,我一方面心里紧张到万分,生怕自己的名字被点到;另一方面在低头中偶一斜眼,便能看到席棚外小土堆上,影影绰绰地,隐隐约约地,在暗淡的电灯光下,在小树和灌木的丛中,站满了人。数目当然是数不清的。反正是里三层外三层地人不在少数。这都是赶来欣赏这极为难得又极富刺激性的景观的。这恐怕要比英国戴着极高的黑帽子,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御林军的换岗难得得多。这仪式在英国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而在中国首都的最高学府中只持续了几个月。这未免太煞风景了。否则将会给我们旅游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惋惜的是,我们晚间训话的棚外欣赏者们,没有耐性站到深夜。如果他们有这个耐性的话,他们一定能够看到比晚间训话更为阴森森的景象。这个景象连我们这个大院里的居民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到。偶尔有一夜,我出来小解,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里一些树下都有一个人影,笔直地站在那里,抬起两只胳臂,向前作拥抱状。实际上拥抱的只是空气,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棚友已经站在那拥抱空虚有多久了。对此我没有感性认识,我只觉得,这玩意儿大概同喷气式差不多。让我站的话,站上一刻钟恐怕都难以撑住。棚友们却不知道已经

站了多久了,更不知道将站到何时。我们棚里的居民都知道,在这时候,什么话也别说,什么声也别出。我连忙回到屋里,在梦里还看到一些拥抱空虚的人。

(五)离奇的规定

在黑帮大院里面,除了有《劳改罪犯守则》这一部宪法以外,还有一些不成文法或者口头的法规。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几句。现在再选出两个典型的例证来说上一说。

这两个例证:一是走路不许抬头,二是坐着不许翘二郎腿。

我虽不是研究法律的学者,但是在许多国家呆过,也翻过一些法律条文;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一个人走路不许抬头的规定。除了生理上的歪脖子以外,头总是要抬起来的。

但是,在北京大学的劳改大院里,牢头禁子们却规定"罪犯"走路不许抬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出这个极为离奇的规定来的。难道说他们读到过什么祖传的秘典?或者他们得到了像《水浒》中说的那种石碣文?抑或是他们天才的火花闪耀的结果?这些问题我研究不出来。反正走路不许抬头,这就是法律,我们必须遵守。

除了在个人的牢房里以外,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在院内,还是在院外,抬头是禁止的。特别在同牢头禁子谈话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抬头看他一眼的。如果哪一个"罪犯"敢于这样干,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拳打脚踢,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我站在牢头禁子面前,眼光总是落在地上,或者他的脚上,再往上就会有危险。他们穿的鞋,我观察得一清二楚,面孔则是模糊一团。在干活时,比如说抬煤筐,抬头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再不允许抬头,活就没法干了。有一次,我们排队去吃饭,不知道由于什么

原因,我稍稍抬了一下头,时间最多十分之一秒。然而押送我们到食堂的监改人员立即作狮子吼:"季羡林!你老实点!"我本能地期望着脸上挨一耳光,或者脚上挨一脚。幸而都没有,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老实"了。

至于翘二郎腿,那几乎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习惯。因为这种姿势确实能够解除疲乏。但是在劳改大院里却是被严厉禁止的。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有关袁世凯的记载,说他一生从来不翘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双腿并拢,威仪俨然。这也许是由于他是军人,才能一生保持这样坐的姿势。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都是平常的人,不是洪宪皇帝,怎么能做得到呢?

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我们"罪犯"们已经丢掉了笑的本领。笑本来是人的本能,怎么竟能丢掉了呢?这个"丢掉",不是来自"劳改宪法",也不是出自劳改监督人员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觉自愿"。试问,在打骂随时威胁着自己的时候,谁还能笑得起来呢?劳改大院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笑声的,有的话,就是来自牢头禁子口中的。在寂静如古墓般的大院中,偶尔有一点笑声,清脆如音乐,使人院顿时有了生气。然而,这笑声会在我们心中引起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在我耳中心中,这笑声就如鸱鸮在夜深人静时的狞笑,听了我浑身发抖。

十五　牛棚生活(二)

(六)设置特务

这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者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也学会了利用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决不会径名之为"特务",而称之为"汇报人"。每一间牢房里都由牢头禁子们任命一个"汇报人",这个"汇报人"是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的?他们是怎样从牢头禁子那里接受任务?对我们这些非"汇报人"的"罪犯"来说,都是极大的秘密。据我的观察,"汇报人"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时间也长一点。我顺便在这里补充几句,"罪犯"们中有的根本不允许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回家,有的每个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这叫做"区别对待"。决定的权力当然都在牢头禁子手中。"汇报人"既然享受特权,"士为知己者用"。他们必思有以报效,这就是勤于"汇报"。鸡毛蒜皮,都要"汇报",越勤越好。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他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我还观察到,有一天,某一间屋子里的"汇报人"在一个牢头禁子面前,低头弯腰,"汇报"了一通,同房的某一个"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间专供打人用的房间里去了。其结果我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应付外调

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

我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我写完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有的要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鲁的。有一天,山东大学派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我就被带进审讯室,接受我家乡来人的审讯了。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我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的"罪犯"。这两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头发,打人;用脚

踹我。满口山东腔,"如此乡音真逆耳",我想到吴宓先生的诗句。我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我真恶心到了极点。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使用着山东"国骂",逼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久经疆场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看来还是兴犹未尽。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份,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八)　连续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每天在监改人员或每天到这里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我一下子就想到农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每天向农民分配耕牛的情景。我们现在同牛的差别不大。牛只是任人牵走,不会说话,不会思想;而我们也是任人牵走,会说话而一声不敢吭而已。

但是劳动并不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生活内容,换句话说,并不是唯一的"改造"手段。我们不总是说"劳动改造"吗?我一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极为难得的实践,我却仍然认为,这种"劳动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体,而不能改造思想,改造灵魂。它只能让"犯人"身上起包,让平滑的皮肤上流血,长疤;却不能让"犯人"灵魂中不怒气冲冲。劳动不行怎么办呢?济之以批斗。在劳动改造以前,是批斗单轨制。劳动改造以后,则与批斗并行,成了

双轨制。批斗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残酷的手段,把“犯人”的身体改造与劳改伯仲之间而已。

但是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辈“罪犯”选择的话,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因此,我们虽然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我们已经被分配好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一个单位,由于某一个原因——其中并不排除消遣取乐的原因——,要批斗我们“罪犯”中的某一个人了。戴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立即奉命来“黑帮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大院的“办公厅”。由负责人批准批斗。过了或长或短的时间,被批斗者回来了。无人不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间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至于有多少人这样被押出去批斗,我没有法子统计。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大院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犯”。我作为一个原井冈山的勤务员,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在不赦。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我每天早饭之后,都在提心吊胆,怕被留下,不让出去劳动。我此时简直是如坐针毡,度秒如年,在牢房里,坐立不安。想到“棚友”们此时正在某处干活,自由自在,简直如天上人。等待着自己的却是一场说不定是什么样的风暴。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走进大院,监改人员就把我叫到对着劳改大院门口的一座苇席搭成的屏风似的东西前面——屏风上有许多字,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了——,低头弯腰,听候训示:“季羡林!好好地去接受批斗!”好像临行时父母嘱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气!”在这期间,我被押去批斗的地方很多,详细情形我不讲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礼如仪”。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号,接着是胡说八道,胡诌八扯的所谓批斗发言。紧张的时候,也换上两个耳光。最后又在“打倒”声中一声断喝:“把季羡林押下去!”完

了,礼仪结束了。我回到大院,等于回到自己家里,大概也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

(九)1968年6月18日大批斗

我在上面谈到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6年6月18日,第一次斗"鬼"。因为我当时还不是"鬼",没有资格上斗鬼台,只是躺在家中,听到遥远处闹声喧天而已。1967年6月18日,此时这个日期已经被规定为"纪念日",又大规模地斗了一次"鬼"。因为我仍然没能争取到"鬼"的资格,幸免于难。

到了1968年6月18日,我已经被打成了"鬼",并已在黑帮大院中住了一个多月。今年我有资格了,可以被当"鬼"来斗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沉重的灾难,是好久没有过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头禁子们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个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在列队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老工作人员。由此也许可以推断,这次斗鬼的出席人员是由各系所单位确定的。这一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我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颜悦色。我简直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我们这一伙"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当人来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使我终生难忘。

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

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地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人声也更嘈杂了,砖头瓦块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上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痛定思痛,我回忆了一下今天大批斗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热闹而又隆重呢?小小的批斗,天天都有,到处都有。根据心理学的原理,越是看惯的东西,就越不能引起兴趣。那些小批斗已经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今天的大批斗却是一年才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轰动燕园了。

(十)棚中花絮

这里的所谓"花絮",同平常报纸上所见到的大异其趣。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名称,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

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又由于大家都能了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隐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用不着学者们再写作《〈牛棚杂忆〉索隐》这样的书。

1 图书馆学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作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我们早就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难以幸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头上的是些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批斗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竟在牛棚中相会了。反正我们现在早已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同谁说话。幸而我还没有变成瞎子，我还能用眼睛观察。

在牛棚里，我辈"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胡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凡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2 法律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

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具有一个老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竟有了"同棚之谊"。

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各按照批准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3　东语系一个女教员

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耿直,表里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

“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

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推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

有一个牢头禁子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华。”

“哪一个‘华’呀?”

“中华民国的‘华’”。

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个“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严神圣的、代表“聂”记北大革委会权威的劳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为“中华民国”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是胆大包天,狂妄至极!非严惩不可!立即给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个有天才的牢头禁子,忽然异想天开,把她带到一棵树下。这棵树长得有点奇特:有一枝从主干上长出来的支干,是歪着长的。她被命令站在这个支干下面,最初头顶碰到树干。牢头禁子下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时她的头必须向后仰。又下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越来越低,不但头必须向后仰,连身子也必须仰了。但是,又来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已极低,她没有练过马戏,腰仰着弯不下去。这时口令停了。她就仰着身子,向后弯着站在那里。这个姿势她连一分钟也保持不了。在浑身大汗淋漓之余,软瘫在地上。结果如何,用不着我讲了。我觉得,牢头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一位女教员却是苦矣。

一夜折磨的情况,我不清楚。第二早晨起来,我看到她面部浮肿,两只眼睛下面全是青的。

4 生物系党总支书记

我在北大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内会很多。因此,我早就认识这一位总支书记。我们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革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是天然的“走资派”。所以在第一阵批走资派的大风暴中,他就被揪了出来。第一个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参加者之一。在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辈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拥护那位“老佛爷”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别多。在黑帮大院的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也因而占绝对优势。我可是万没有想到,劳改大院建成后,许多“走资派”在被激烈地冲激过一阵之后,没有再同我们这一批多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被关了起来。这一位生物系总支书记却出现在我们中间。

大概是因为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详情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我只看到一个例子,就足以让人毛发直竖了。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句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是那位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荫中悠然地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头禁子。我实在莫明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头禁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我听了打了一个寒战: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试问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惩罚?谁要是想实践一下,管保你半秒钟也撑不下来。这样难道不会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吗?

此外,我还听说,没有亲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员中的两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样开罪了自己的学生。作为牢头禁子的学生命令这两位老师,站在大院子中间,两个人头顶住头,身子却尽管往后退;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着,就全靠双方彼此头顶头的力量。

类似的小例子,还有一些,不再细谈了。总之,折磨人的“艺术”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如果年久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

5 附小一位女教员

这个女教员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不清楚了。我原来并不认识她。她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关进牛棚的,我也并不清楚。

根据我在牛棚里几个月的观察,牢头禁子们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专业,还似乎有点有条不紊,泾渭

分明。专门打这位女教员的人就是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详细情况,当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则是,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就一直挂到现在。

6　西语系的一个"老右派"学生

这个学生姓周,我不认识他,平常也没有听说过。到了黑帮大院,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在中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1957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这个期间他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吆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

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7 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

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考据癖,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12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十六 牛棚生活 （三）

（十一） 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的财物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他这

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不是"棚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恶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

"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

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雳一般，听到了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门，看到这位张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足征眼睛是完整的。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试想，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粘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旁筛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白天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级了，升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水车，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水，供全体囚犯饮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王教授会同我并列。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大罪，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干，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

上下刀,我也必须把开水打来,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偷偷地在茶炉那里泡上一杯茶,抽上一烟斗烟。好像是乐在其中矣。

(十二) 特别班

这一批牢头禁子们,是很懂政策的。把我们这"劳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实行了半年多的劳动改造。念经、说教与耳光棍棒并举。他们大概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现在是采取分化瓦解的时候了。

"特别班"于是乎出。

牢头禁子们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从"劳改罪犯"中挑选出来了一些,进这个班。

这个班的班址设在外文楼内。但是,前门不能走,后门不能开,于是就利用一扇窗子当作通道,窗内外各摆上了一条长木板,可以借以登窗入楼,然后走入一间小教室。这间教室内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摆设? 我不清楚。在我眼中,虽然近在咫尺,却如蓬山万里了。

我是非常羡慕这个班的。我觉得,对我们"劳改罪犯"来说,眼前的苦日子,挨打,受骂,忍饥、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够过去了。但是,瞻望将来,却不能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出头之日呢? 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却没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岛屿。我盼望着出现点什么。这种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现在出现了特别班,我认为,这正是渡过大海的轻舟。

特别班的学员有一些让人羡煞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佩戴领袖像章,他们有权利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在牛棚里,党员是剥夺了交党费的权利的。特别班学员是否有了权利? 我不知道。我每次

听到从特别班的教室里传出来歌颂领袖的歌声或者语录歌的歌声时，那种悠扬的歌声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学员们一些——是否被批准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权，我也是羡慕得要命。比如他们敢在牢房里翘二郎腿，我就不敢。他们走路头抬得似乎高一点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么想也能够踏着那一块长木板走到外文楼里面去呀！

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一直到"黑帮大院"解散，特别班的学员也没能真正变成龙跳过了龙门。

（十三）　东语系一个印尼语的教员

这一位教员原是从解放前南京东方语专转来的学印尼语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人非常聪明，读书十分勤奋，写出来的学术论文极有水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他留学印尼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也曾尽了点绵薄之力。因此我们关系很好。他对我毕恭毕敬。

然而人是会变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这也未可厚非。但是，对我这一个"异教徒"，他却表现出超常的敌意。我被"揪"出来以后，几次在外文楼的审讯，他都参加了，而且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胜过其他一些参加者。看样子是唯恐表现不出自己对"老佛爷"的忠诚来。难道是因为自己曾反苏反共现在故作积极状以洗刷自己吗？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想法。否则，一般的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解释，还是不够的。

然而政治斗争是不讲情面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帮大院"，钦赐低头，正好看到写在马路上的大字标语：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我大吃一惊。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审讯我的小会上，他还是“超积极分子”，革命正气溢满眉宇。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来有人揭了他的老底。他在夜间就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自绝于人民”了。

对于此事，我一不幸灾，二不乐祸。我只是觉得人生实在太复杂，太可怕而已。

（十四）　自暴自弃

在牛棚里已经呆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胡涂，心情越来越麻木。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如果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地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过去被认为是人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以人待己。我这个人从来不敢狂妄，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我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我一不吝啬，二不拜金。在这方面，我颇有一些“优胜纪略”。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天到药店去打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我了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中，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我立即退还给他，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这种心理我以后才懂得。1946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卖了一只金表，寄钱给家里。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多给了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我也立即退还给他。在大人物名下，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对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来，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

没有的。

到了现在，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短论长，也由它去吧。

而且自己也确有实际困难。聂记革委会赐给我和家里两位老太太的“生活费”，我靠它既不能“生”，也不能“活”。就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也还是不够用的。天天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学生宿舍区二十八楼，二十九楼一带去劳动，任务是打扫两派武斗时破坏的房屋，捡地上的砖石。我记得在二十八楼南头的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杂物，乱七八糟，破破烂烂，什么都有。我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了霉的干馒头。我简直是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队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这行动有极大的危险性，倘若在路上邂逅碰上监改人员或汇报人员，那结果将是什么，用不着我说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

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十五）"折磨论"的小结

牛棚生活，千头万绪。我在上面仅仅择其荦荦大者，简略地叙述了一下。我根据"以论带史"的原则，先提出了一个理论：折磨论。最初恐怕有很多怀疑者。现在看了我从非常不同的方面对"黑帮大院"情况的叙述，我想再不会有人怀疑我的理论的正确性了。

"革命小将"们的折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决不会暴露自己心里的肮脏东西，别人也不便代为答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劳动改造"。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就是我对"折磨论"的小结。

十七　牛棚转移

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牢房里也装上了炉子，生上了火，虽然配给的煤不多，炉火当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来，屋子里已经是温暖如春了。

可是劳改的队伍却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来。什么原因呢？我不清楚，当然也不敢问。我此时反正已经堕入阿鼻地狱，再升上一级两级，是鬼总是鬼，对我无所谓了。

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一个干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

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绷是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唯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今时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或者单纯一声 hello! 现在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

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荡。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事生非,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的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散。文革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唯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

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楼,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体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

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十八　半解放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1968年，进入了1969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我说不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踹，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待遇却不知为什么显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没有，实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是青年人，活泼爱动，学习休息时，他们就吹拉弹唱。有一个同学擅长拉二胡，我非常欣赏；但又不敢忘形。年轻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则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气氛很不协调。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我当时自己不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 1966

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1966年6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千楼。亲眼看到文革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让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有来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另有任用"。

根据什么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最好。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时我曾看到郊游时汽车上总载着一只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游玩够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杀掉,做成羊肉抓饭,吃饱了回家。我在新华营,在菜窖里搬菜,曾拉出来,被批斗过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1970年旧历元旦,奉召回京。

十九　完全解放

上一节的标题是“半解放”，这一节是“完全解放”。我这样写都是毫无根据的。这两个词儿都不是科学的或法律的用语，其间界限也不分明。这都让法学家或哲学家去探索吧。

仍然谈我的情况。回校以后，我有一股振奋的情绪。就在这一阵振奋中，我们都住进三十五楼。似乎是根据一种新精神，也许是一种新规定，每个系的办公室都设在学生宿舍中，大概是想接近学生，以利于学生的“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吧。上、管、改的精义就是把老师，老知识分子置于学生的管理和改造之下。提倡初年级的学生编高年级的教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十五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的党政办公室。这一些办公室与我无干。我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的朝外有大玻璃窗子的极小的一间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我的差使就是当门房，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第一个任务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我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同志”了，我都认识。高年级学生也认个八九不离十。新学生则并不清楚。我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我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

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于有电话我就接；没有电话，我就闲坐着。难在什么地方呢？据我统计，似乎女生的电话

特别多，要我每次传呼都爬上三四楼，这倒是很好的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爬楼运动"；无奈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是任何体育锻炼专家也难以做到的。我爬了几次，觉得不行，就改为到门外楼下向上高呼。这办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一点麻烦。我的能力如此，有麻烦就让它有麻烦吧。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非常容易的。来了报纸，我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我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就在完成这三项任务的情况下，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我每天八点从十三公寓走到三十五楼，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六点回家，每天十足八个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我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又恢复了我的原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了。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翻译《罗摩衍那》

但是，我是一个舞笔弄墨惯了的人，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我过不惯。当个门房，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也无事可干。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也觉得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到了古人这两句话。我何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一干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有的是在我处境中没有法子干的，比如打麻将等等。我习惯于舞笔弄墨久矣。想来想去，还是出不了这个圈子。在这个

环境中,写文章倒是可以,但是无奈丝毫也没有写文章的心情。最后我想到翻译。这一件事倒是可行的。我不想翻译原文短而容易的,因为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是摆脱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避免经常要考虑挑选原文的麻烦。即使不会是一劳永逸,也可以能一劳久逸。怎么能说翻译是"无益之事"呢?因为我想到,像我这种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就根据我这一些考虑,最后我决定了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有一些颂更长),至少有八万多诗行。够我几年忙活的了。

我还真有点运气。我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大家都知道,订购外国书本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我的眼前了。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这算是文革以来几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我脸上。

可是我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我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我的门房里去呢?我当时还是"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我头上还戴着"帽子"——也不知是些什么"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觉得到。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我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我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我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我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就是"顺口溜"吧,有时

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我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一个小插曲

春光虽好,我自己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我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有一天,我正在向门外张望,忽然看到右门外专门供贴大字报之用临时搭起的席棚上贴出了很多张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有的教员还在江西鲤鱼洲没有回来。内容是批判516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我原来想不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统"的窄狭的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大字报。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对我来的:我成了516的嫌疑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稍微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516组织,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我哪里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革命"组织呢?我同516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是驴唇对不

上马嘴。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这一次我却笑不起来。几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时，我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次我连哼都哼不起来了。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东语系的革委会和军工宣队是怎样考虑的。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更滑稽的还在后面哩。全国上下大声嚷嚷了一阵516，北大井冈山的一位头领公然承认自己是516分子；可是最后却忽然销声匿迹，——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516组织。这真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成为文革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一幕闹剧

不管人世风云如何变幻，文革浪涛怎样激荡，时间还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流驶。转瞬之间，文革好像高潮已过，有要结束的样子了。虽然说"乱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主要是乱了自己，还是以不乱为好。现在是要拨乱恢复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居然主持党支部的工作，实在有点太"那个"了。

要想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首先要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根据什么法令，所有的党员("四人帮"等当然除外)都失去了组织。现在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才能恢复组织生活。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那一位非党的工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出一个，当做标兵，演一出恢复组织生活的开场戏，期在一举通过，马到成功，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个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党性强。具此二标准者，

庶乎近之。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谨慎的筛选，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属兼贫下中农的姓马的党员中了标，他是我作为系主任兼导师精心选择留下当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现在，我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正好成了他的党性的试金石。具备这两个条件，又有这样"亮相"的机会的，东语系并无第二人。谁敢说这不是天生的"佳选"呢？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同东语系全系的留校师生被召到学一食堂里去开会，每人自带木板小凳。空荡荡的食堂里，饭桌被推到旁边去。腾出来的空地上，摆满了小木板凳子，我们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几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不少的东西。我仔细一瞧，有毛料衣服和裤子，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还不像今天这样多，算是珍贵稀有的东西），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跟在"革命群众"的后面。还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闲心去一件件地仔细瞅。我只觉得，这颇像一个旧品展销义卖会。可是在这些东西旁边，有几本用很粗糙的纸张油印成本的讲义，我最初还不知道是什么讲义；也不知道这样粗糙的道具为什么竟能同颇为漂亮的西装裤子摆在一起。对所有的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们在今天第一个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会上会起什么作用。我满腹疑团坐在那里，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

人到齐了，时间到了。主席宣布开会。他先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做法，然后就让这位选中的标兵发言，或讲话，或"检讨"，反正是一个意思。这位标兵站起来，走到前面，威仪俨然，义形于色，开始说话。说话的中心主题是：不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金童玉女。这里要解释一句：金童玉女是旧社会出殡时扎的殉葬的纸人。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谁一听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今天这一出戏是针对着我来的。我有点吃惊，但又不大吃惊——惯了。只听我这位前"高足"，前"接班人"怒气冲冲地控

诉起来，表情严肃，声调激昂，诉说自己中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糖衣炮弹，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等，等等。说到自己几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时，简直是声泪俱下。他用手指着桌子上陈列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于是怒从心上起，顺手拿起了桌子上摆的那一摞讲义——原来是梵文讲义——三下五除二，用两手撕了个粉碎，碎纸片蝴蝶般地飞落到地上。我心里想：下一个被撕的应该轮到那漂亮的毛料西服裤或者收音机了！想时迟，那时快，他竟嘎然而止，没有再伸出手去，料子西装裤和收音机安全地躺在原地，依旧闪出了美丽的光彩。我吃了一惊，恐怕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撕东西的行动，应该是今天大会的高潮，应该得到满屋的掌声。然而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体与会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场是一片惊愕的寂静。

这一幕闹剧以失败收场了。

在散会后回三十五楼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不撕可能最透露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西装裤子，而偏偏撕很难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梵文讲义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来已经十年多了。当学生时对我温顺如绵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态性的大标语上，按惯例从来没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两个人是这样干的，恰恰都出在东语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说的这一位。这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北大一时传为“美”谈或者笑谈。在我第一次混迹“革命群众”中参加学习的小组会上，我曾对他坦率地提过意见，我说，他既不像一个烈属，也不像一个贫农。他大概为此事耿耿于怀。以后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难道与此没有联系吗？

这一幕闹剧以后东语系的党员是怎样逐渐恢复党组织生活

的，因为与我基本无关，我没有去注意，今天更回忆不起来了。

我的恢复组织生活

时序推移，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北京大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要结束了。剩下的大概还只有两三个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写一个榜的话，我不是孙山，就是还在孙山之下，俗话说"名落孙山"了。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我知道，这一下轮到我了。我此时早已调离了那个门房，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记告诉我，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给。我当然非常感动。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东语系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的不动地交给了系总支。这位同志告诉我，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否开过支部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系里军宣队的头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总支书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对。要说思想问题，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说政治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只能说没有。但是，我一时很窘，半天没有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干部来找我，告诉我，支部决议：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我勃然大怒。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上，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

位干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脸上一下子也严肃起来:"我们党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了。

我的《牛棚杂忆》也就算是写完了。

二十 余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须还要啰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

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果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 1978 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

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1959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

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革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918 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

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

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革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革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个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革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去国外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而不是虚假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从何而来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

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二一 后记

我从1988年3月4日起至1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她抄出来。到今年6月3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是在，此心可质天日！文革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的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革前的友谊，以及文革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

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革以后的产品。如果文革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她去吧。

1992年6月3日 写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季羡林文集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作者＝
页数＝７１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
《韩国学论文集》新序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序
《周林文集》序
《世界散文精华》序
《张侠画集》序
《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序
《人学大辞典》序
《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序
《玉华宫》序
《清代海外竹枝词》序
《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序
《谢华朱健龙绘画合集》序
《雪庐诗稿》序言
《文学语言概论》序
《东方文学史》序
《中国翻译词典》序
《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序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中德关系辞典》序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小引
《海外博士文丛》序
《世界十大史诗画库》序
《敦煌吐鲁番学论集》序
《白凡逸志》汉译本序
《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序
《大唐西域记校注》再版后记
《雅俗文化书系》序
《未名集》序
《汉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目录汇编》序
《西文中国学研究图书目录》序
《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跋
《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敦煌学辞典》序
《怀旧集》自序
《人生箴言》序
《东方文论选》序
《敦博本禅籍校录》序
《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序

杂文及其他

一点希望－－庆祝《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
对开好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两点意见
祝贺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
祝贺《学林》创刊４００期
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
诚挚的祝贺　热切的希望－－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十

周年

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学

藏书与读书

老年谈老

六字真言

漫谈古书今译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对于《基督的最后诱惑》的意见

对于《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的一点意见

对余太山中亚研究的看法

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

佛典中的“黑”与“白”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历史研究断想

“天人合一”新解

在“纪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七十周年暨俗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祝贺《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出版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专而又通的榜样

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在跨越世纪以前

决不丢掉自己的本色－－祝《群言》出刊一百期

推荐《吴宓与陈寅恪》

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

推荐十种书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关于临清的一个掌故

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推荐《学人》杂志

在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养生无术是有术

国学漫谈

老年

写文章

翻译的危机

获奖感想

寻根漫谈

《齐鲁文化特刊》创刊祝词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从西域文化的传入谈起

开卷有益

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读《丝绸之路》的观感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读《丝绸之路》札记

老少之间

再说“嚏喷”